

目 录

翁同龢自订年谱	翁开庆 整理 朱育礼 点校(1)
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译	夏春涛(57)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	司马文韬(99)
1935年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记录	杜春和 耿来金 整理(128)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译(上)	天津编译中心 供稿(180)
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	[日]江口圭一著 杨光尘等译(225)
翁文灏纪事诗选	杨永庆 整理(268)
杨秀清给林凤祥等一篇诰谕	抄件正误 祁龙威(278)
《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评价	知之(282)

翁同龢 自订年谱

翁开庆整理 朱育礼点校

编者按:此篇原名《松禅年谱》(以下简称《年谱》),系翁同龢生前自订,起自道光十年庚寅(1830),迄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五月,手稿本凡五册,原藏其侄曾孙翁之熹(克斋)先生处。1961年,之熹先生又依《年谱》手稿本另录副本,凡三册;对翁同龢自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五月开缺回籍至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五月逝世这六年的事迹,根据《翁文恭公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及家藏其他有关翁同龢的资料补订,附《年谱》后。《年谱》内容虽有一部分取于《日记》,但采自《日记》外的资料也不少;况《日记》起自咸丰八年戊午(1858)六月,而《年谱》则起自道光十年庚寅,所以这部《年谱》是研究翁氏生平的又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迄今尚未正式刊印过。

文革之际,之熹先生在天津寓所中的文物图籍,包括这部《年谱》的手稿本五册及副本三册,悉遭抄没,直到1979年才陆续发还了一部分书籍。其中《年谱》手稿本只残存一册,副本则残存两册,所幸合残存的手稿本与副本,仅失去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一月至十一月,现已无法求其完璧。之熹先生已于1972年逝世,其哲嗣开庆先生深恐《年谱》再度失坠,重新抄录整理,于1993年5月无偿捐赠翁同龢纪念馆,并由该馆馆长朱育礼先生参阅有关资料校订。今适逢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暨翁同龢逝世九十周年,特将《年谱》公

诸于世，以作纪念。

为补《年谱》甲午年之阙，附录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时的奏折两件，亦为首次公开发表。（此两件奏折，由开庆先生与翁同龢玄孙、美籍华人翁兴庆（万戈）先生提供，朱育礼先生标点。）

道光十年庚寅（1830）

四月二十七日寅时，生于京师罗圈胡同寓所。

十一年辛卯（1831） 二岁

十二年壬辰（1832） 三岁

是年三兄中式顺天乡试举人。

十三年癸巳（1833） 四岁

九月，张夫人率全家由潞河还乡。

十四年甲午（1834） 五岁

三月，吾母携三兄两姊及龢赴江西，十二月，随吾母归里门。吾父步月中庭，龢牵衣行，拊龢顶曰：“儿知吾有所思乎？”对曰：“知之。”曰：“何思？”对曰：“岂非以祖母年老，不能即归耶。”吾父叹嗟流涕曰：“是儿可喜。”

十五年乙未（1835） 六岁

从表伯朱启宇先生受读，大侄曾文同塾。

十六年丙申（1836） 七岁

十七年丁酉(1837) 八岁

十八年戊戌(1838) 九岁

六月，吾父告养旋里。

十九年己亥(1839) 十岁

二十年庚子(1840) 十一岁

三兄中式进士。六月，英夷扰浙江，吾邑震恐，全家侍先祖母避地灵岩山蒋氏丙舍。八月还家，复赁屋于苏州吉庆街，余与两姊、大侄均随往。

二十一年辛丑(1841) 十二岁

从李惺园先生元瑛，岁贡生。受读，始作诗。

二十二年壬寅(1842) 十三岁

五经、古文粗读毕，学试帖诗。[五]月，海警又至，奉先祖母避于南乡之卫家浜。卫氏诵芬堂空屋多狐兔，余家至则寂然。九月还家。诗有佳句，屡为吾父、三兄所称赏。是年正月大姊归俞荔峰秀才大文。吾父以刘蕺山《人谱》一册示龢，日夕读之，懔懔恐失坠。

二十三年癸卯(1843) 十四岁

二月始作八股文。九月，应县试，正案名列二十外。十二月，应府试，适闻大姊凶耗，遂不待覆试，买舟径归。

二十四年甲辰(1844) 十五岁

应院试不售。[十]月先伯朗若公卒。

二十五年乙巳(1845) 十六岁

三月，三嫂携源、松两侄入都。五月，应府试，名列第三，府学桂星垣先生文耀也。六月，先祖母张太夫人卒。八月，应院试如有能信之者，与大侄同取诗赋兄之齿雁行赋，诗题：娟娟缺月隐云雾。遂同入泮。学使张筱浦先生带。余拔入府学第四名，十一月送入泮。吴中风俗，新生参谒礼毕即疾趋而出，谓之先出学门。余执不可，从容徐步而出。学师冯树尊先生秉桓，常州人，举人。年八十矣，激赏余曰：“勉之，他日大器也。”

二十六年丙午(1846) 十七岁

肄业游文书院。应乡试，卷出高嵩渔乙巳进士，名长绅，知县房，力荐不售。

二十七年丁未(1847) 十八岁

学师保举优行，有“品端学敏”之奖。肄业紫阳书院，岁试，学使李楠堂先生煌颇赏余赋，取列一等第七，正场列二等十三名。

二十八年戊申(1848) 十九岁

科试取诗赋名德之与赋，径一围三，正场列一等第三。余以附生不欲应选拔试，云樵兄、绂卿侄强余入，遂得选拔第一，科试正案亦列第一矣，始食饩。九月，安葬张太夫人于鸽峰新阡。与五兄、曾文考游文书院，尚早，因入市楼早食，而楼忽倾，自分必死，竟从人丛中跳而免，三人皆出，危矣哉。

二十九年己酉(1849) 二十岁

侍吾父母偕次姊入都，三月抵都。四月，次姊适归安钱编修振伦。是月为龢授室汤氏，肖山文端相国金钊之女孙，内阁中书敏斋先生修之长女也。六月还家。以选拔生例应督抚学政会考也。淫雨

积久，江湖并涨，舟行邗沟，几覆者屡矣。十月，应江南乡试归，阻风燕子矶，偕云樵兄、绂卿侄遍游江边岩洞。十一月，偕杨灝石同舟行，亲友送余于河滨，独绂卿悲不自胜，十二月抵都。是年末领落卷，不知卷出何房。

三十年庚戌(1850) 二十一岁

正月宣宗成皇帝升遐，吾父恭理丧仪，值宿禁城内，龢常随侍，一切典礼皆得与见。六月，应朝考，列一等第五。务民之义。诗题：兴雨祁祁时。复试擢第一。诗题：秋光先到野人家。引见以小京官用，分刑部，在江西司行走。初入署治事，见刑杖，急起避之，同人皆笑。九月，恭送梓宫，派押杠差使，侍吾父于东华门南池子寓斋。十二月，充实录馆详校官。

咸丰元年辛亥(1851) 二十二岁

五兄自家乡来考试荫生，分兵部。是岁吾父充顺天乡试副总裁，龢与五兄回避，五兄回南。

二年壬子(1852) 二十三岁

□月，实录馆议叙，作为实缺小京官。八月，应顺天乡试，中式第二十七名。房师呼延冠三先生振，辛卯解元，甲辰翰林，陕西长安人、座师麟梅谷先生魁、朱桐轩先生凤标、吕鹤田先生贤基。四书题：“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一节，“诚者物之终始，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二句，诗题：“业广唯勤”，得[修]字，经艺为吕师所赏。

三年癸丑(1853) 二十四岁

□月，三嫂携源、松两侄抵都，三兄由怀庆南行赴琢俟军营。四月，移寓南横街，会试不售。卷出文式言先生房格，工部郎中。为主司邵又村少宰灿所摈。六月于捐铜局报捐，历俸本部，引见作为额

外主事。七月闻绂卿侄疾卒，病卧累日。

四年甲寅(1854) 二十五岁

时江西司司员多告假归，余每日诣实录馆校对，饭后出西长安门，赴部决事。昕夕与共者王丈蓉洲宪成、张君惕斋兴仁、吴君柳堂可读也。堂上官屡派余审案，余力辞之。是时年少，锐于治狱，每日矜其能。王丈实左右余，其不至为小人之归者，王丈之力也。

五年乙卯(1855) 二十六岁

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七月，患牙痛，极剧。医者费姓，洞庭山人，教以艾灸法，余妻手炷数百始渐愈。

六年丙辰(1856) 二十七岁

日课一文。三月，会试，头场病痢，草草交卷出。是时闻扬州托营庇次，三兄驻邵伯收兵，意绪甚劣，二场渐愈矣。四书题：“告诸往而知来者，洋洋乎发育万万物”一节，“莫如为仁”一句，“游鱗萃灵沼”得“灵”字。榜发，中式六十三名。座主彭咏莪相国蕴章、全小汀尚书庆、许滇生尚书乃普、刘韫斋阁学琨。房师贡荆山编修璜，拨房金子梅给谏钩。复试一等第二名，殿试一甲第一名。余卷本列第二，裕相国诚复视，拔第一卷入。上谕读卷官曰：“今科所取甚允洽。”及拆封，奏龢名，上喜动颜色曰：“此翁某之子，深知其才。”奏第二名孙毓汶，上曰：“好，其父孙瑞珍与翁某皆上书房师傅，诚佳话也。”是日引见，上注视良久，朝考卷另束发交读卷大臣，谕不必入等第，改充实录馆协修，署纂修官。四月十九日汤文端公薨于京师，内子归哭过哀，五月朔，发咯血疾，自此缠绵不已。十一月，实录告成，赏随带，加二级，并俟散馆后遇有升缺，开列在前。

七年(1857)丁巳 二十八岁

派翰林三十人抄《文选》，余亦与焉，适病目，作字甚苦，自三月至五月始竣两卷。内子病剧，余归横街寓，日夕为之求医。四月略瘥，余气刚，偶口角，疾复作，入秋益剧，诸药杂投无效。

八年戊午(1858) 二十九岁

三月十八日内子卒，临死执余手曰：“吾已矣，为臣当忠，为子当孝，夫子之责也。”内子事亲孝，通书，略能诗，喜画而不工也，以无子女，常悒悒致疾。伤哉！四月考试差。六月，充陕西乡试副考官，偕潘伯寅祖荫学士同行。学士为余总角交，极文字之乐。八月入闱，中秋前三日，闻督学陕甘之命，适患足疾，至是益剧。九月，发榜，以足疾留陕西省一月。十月，赴三原县接印往事，是月按试凤翔，按试乾州。十二月，回三原，决意引疾，请开缺调理。

九年己未(1859) 三十岁

正月奉批回：准其开缺回京。后任杜瑞联丁忧，景其浚缘事皆未至，继之者慎毓霖也。三月，启程登华山，援铁绠达北峰，未到南峰而返，遇慎毓霖于潼关，交印□，于四月抵都，以病未散馆。十二月起病，召见于养心殿西暖阁，温谕良久。是年八月感伏暑，迷不知人者三日。

十年庚申(1860) 三十一岁

三月，五字案急，户部尚书肃顺与大人有隙，排挤不已，必欲致之狱。三次明白回奏，上深察其无他，卒保全之。龢以三大愿誓于神明。四月补散馆，《燕山八景赋》、《高超百尺嵒诗》，列一等第二名。前此阅卷大臣不粘名签，至是始粘曰某，拟取第几。分教庶吉士，上亲阅定，朱笔判名次。八月，英夷犯京师，上幸热河。九月，奉

两亲至房山，余往来定省。十月回京，充文渊阁校理。

十一年辛酉（1861）三十二岁

四月考试差。七月，上晏驾于热河，于内阁哭临。十月，梓宫始还京，随吾父迎于清河道旁哭临。是月，两宫皇太后召王大臣等入见，暴载垣、端华、肃顺之罪，执付狱，寻赐载垣、端华死，诛肃顺于市。今上御极，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苗沛霖入寿州城。十二月，特旨命吾父销假，听候简用。吾父三疏固辞，不允，以大学士衔管工部事务。是年夏，院长全小汀师派数人同清秘堂诸君检点宝善亭所藏书籍，龢亦与焉，得见秘笈善本甚多。

同治元年壬戌（1862）三十三岁

正月，三兄回京，甫三日曾国藩劾奏寿州绅、练仇杀事，落职逮问，入狱论死。先是兄尝累疏，言苗沛霖反侧状，中旨谓且镇抚之。十一年正月，苗沛霖围寿州城，时兄适被命来京，四月交卸，徇州民之请，登陴死守。八月食尽，军士皆啖草根。九月城陷，州民汹汹，言沛霖本无反志，特与孙家泰为仇，请兄讼其冤。兄既具疏以羁縻之，而手疏言沛霖实反，请命将四路合剿。已而沛霖移兵城外，不杀一人。兄于岁底北行，复累疏暴其罪状。至是曾国藩劾奏语，乃谓徐立壮之杀，实以媚苗沛霖云云，故遭此严谴焉。二月，吾父被命直弘德殿，偕祁相国隽藻、倭大司农仁、李编修鸿藻并授皇上读书。三月，充会试同考官，得士八人，后拔入三人。四月，考试卷分教庶吉士。六月，擢右赞善。七月，充山西乡试正考官，副之者孙编修念祖也。八月，抵山西，闻八月发榜。九月，回京复命，召见于养心殿。十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十一月朔，吾父忽感疾，神气不清，越三日进清痰药得吐，而中气不继。病中所言皆皇上圣学及国家安危大计，既而遂不语矣。初七日寅时遂弃不孝而长逝矣，呜呼痛哉！初六日有旨，释三兄出狱侍汤药，比归，吾父已不语，犹睇之微泪。呜呼！尚

忍言耶！吾父之疾，以误服温补致不起，实不孝等通天之罪。遗疏上，上震悼，赐奠，诸孙皆蒙恩赏，予谥文端，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十二月，奉灵柩于观音院禅寺。

二年癸亥（1863）三十四岁

居忧，自去岁迄今岁十一月，即住丧次，未尝稍离。二月，三兄遵旨入狱。四月，曾源殿试一甲第一名，海内传为佳话。呜呼，吾祖、父积累之深，吾兄救焚拯溺，生死不渝之志，孰知之而传之哉。中秋后随五兄觅西北山吉壤，得延楼南煦家隙地于昌平州东十里，地名新庄。十一月二十五日，敬奉灵榇暂安。龢居山中一月始归。是时家乡新复，未克归葬也。十二月，三兄蒙恩释出戍新疆。

三年甲子（1864）三十五岁

居忧。三月，三兄长行，前数月胸中如结，送别之顷，益不忍言。四月，抵太原，留二月，甘肃统帅都兴阿奏请留营，乃从之于花马池，中秋抵营。九月，五兄授湖南盐法长宝道，十一月出都。

四年乙丑（1865）三十六岁

二月，服阕起复。三月，补右赞善，分教庶吉士。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闰五月，病痢。六月，署实录馆总校官，逐日校勘无余力。六月转左赞善，是月迁右中允。十一月奉旨在弘德殿行走，召见固辞。两宫皇太后褒谕再三，勗以勉承先人未竟之志，流涕受命。次日即于帘前进讲《治平宝鉴》，自后五日一班进讲。是月二十日突闻三兄讣，肝肠欲裂。三兄自中秋血痢，投参苓愈剧，至十月二十七，终于花马池军次矣。今年迭次以战擒首逆，赏五品、四品顶戴。至是特旨开复原官，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赐恤。先是吾母吐血，卧不能起，讣至不敢告，出则素衣，入则强笑，呜呼酷矣。十二月，母病愈，始徐以闻。吾兄弟相聚之日少，计三十六年中相处者才十一、二

年。小时诗文兄实启之，近年来乃从狱中问读书法，犹冀他日白首相随之乐，今竟已矣。

五年丙寅(1856) 三十七岁

正月，三兄灵柩到京，停于城外天凝寺，予谥文勤。二月擢侍讲，每日侍上临书信讲《帝鉴图说》毕，复讲《庭训格言》。四月大考翰詹，特旨徐桐及臣龢毋庸与。命恭代阅《文宗显皇帝圣训》，自三月至六月毕，凡一百十卷。七月，偕倭良峰相国、徐荫轩前辈联衔具摺请准李鸿藻终制，不许。十二月，《文宗显皇帝实录》告成，以先公曾充监修总裁，加恩赐祭一坛，加同龢四衔，旋复叙劳，遇缺题奏。岁暮，命书“福、寿、龙、虎”及吉祥语字式，上仿书之。

六年丁卯(1867) 三十八岁

二月偕倭、徐两公联衔谏止临幸王府，召对一次。自四月至七月良峰相以疾在告，余与荫轩逐日侍学，未尝少休。借东安门外关帝庙屋三椽为小寓，既而移于栅栏外车厂旁肆中，题其门曰：“门多长者辙，臣是酒中仙。”四月，复移寓于菜厂胡同，屋稍多，与良峰相国同居。仲渊癫痫增剧，九月几殆，入冬略瘥。八月，五兄授四川臬司，留署湖南藩司。是年编录《列朝圣训》及《开国方略》，每日进讲，并讲祁相国所辑《史鉴摘事》一巨册。圣学日进，书法挺秀。十二月擢右庶子。

七年戊辰(1868) 三十九岁

复移寓关帝庙，既而卜居静默寺。七月，捻匪平，赏加一级。是月疏请开缺回籍葬亲。予假三个月，毋庸开缺，以先公灵榇南归，命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八月，具舟潞河，偕曾桂扶父、兄两柩及余妻柩南行，庞氏舟附焉，许表兄钟秀同舟。时撤勇络绎，兵、民互猜，睢睢盱盱。舟抵临清，水涸，乃从临清出陆，过东昌到张秋易舟。九月

二十日抵里，是月二十六日，奉先灵敬安于鸽峰茔次。十月朔，奉先兄葬于穆穴，是月十四日，北行登岱，遇雪半途而返。十一月杪抵都，始闻擢国子监祭酒之命，入值如故，十二月，五兄擢陕西藩司。

八年己巳(1869) 四十岁

遇堂期入署治事，剔肄业生补班之弊。助教瑞龄侵挪公项，撤之。补发各省监照二万。上于三月中开笔作论，龢实司讲事，常左右之。七月，武英殿灾，具折请停宫禁一切工程，罢外省传办各物。疏稿具，倭、徐两公见之，欲附名同上，遂联衔上，有旨嘉纳。

九年庚午(1870) 四十一岁

奏请复国子监肄业生，恩赏银六千两，重修南学学舍，定取肄业生四十名，资其膏火。章程甫立，六月，迁太仆寺卿。先是，书房授书系徐学士专责，是岁四月，懿旨命臣龢授生书，仍兼讲书等事。六月，《礼记》毕，接读《易经》。十二月，《易经》毕。七月天津夷衅起，曾国藩请革府、县职以谢之。臣桐、臣龢同被召见，龢稍有论列。

十年辛未(1871) 四十二岁

接授《左传》。上作论稿，龢点勘者居多。七月擢内阁学士。十月，奉母移居内城东华门，十一月，以母病请假三次。十一月五兄擢陕西巡抚。十二月，疏请开缺侍养，赏假两个月，毋庸开缺。是月母病不起，二十四日辰时弃不孝矣，临终曰：“汝等行好事，作好人。”恩旨褒恤，有“贤母”之称，赐银二千两治丧，谕祭一坛。二十七日迁殡于城外南横街。

十一年壬申(1872) 四十三岁

正月【二十二】日，迁殡于观音院。二月，五兄奔丧抵京。四月，扶柩由潞河还南。六月抵里。此行也，哀痛之中殆无生理，从五

兄携仲渊一房并安孙连舟而行，临清登陆，安孙入船，辛苦万状。九月二十一日，谨奉母柩合空于鸽峰兆域。买地为筑墓庐计而未逮也，与兄同住新买隔壁仲氏屋。

十二年癸酉(1873) 四十四岁

正月，省外家汤氏于肖山，时外舅敏斋先生歿已二年。妻弟伯述秀才，才隽之彦也。与泛镜湖，游兰亭，寻禹穴，手拓石字，遇雨戴笠而行，留肖山三日归。过杭州，雨甚，暂到西湖，居城中逆旅，喧杂不能堪，乃冒雨而去。至松江访士吉侄学舍时署娄县训导，遂至上海，究观洋人所创楼阁车马之属，临流而哭，留一日归。过昆山食于村居，忽汗发不可收，晕而醒，抵家二月杪矣。三月呕血升许，几殆。六月丙舍成，即居焉，日夕依墓下，旧疾渐愈。复入城一行，编次先人诗集成，并修族谱，盖一年来萃力于此。又徒步访族中古墓，得朔州稽勋公墓，盖若有启之者。

十三年甲戌(1874) 四十五岁

正月偕庞昆圃游江阴之散墩。墩者，大坟也，或曰吴王之女散葬于此，或曰非也。其旁多老梅，高寻丈，大合围，凡数百株，天下之奇也。又从兄及庞宝生、赵次侯游邓尉，时值积雨，而斯游未尝遇雨。游天平，登山之半，寻玄墓，过香雪海，观司徒庙古柏。菖蒲潭者，梅花最盛，村落皆如画。南行至石壁，有小庙，下临太湖。伟哉此游也，然终以雨故，匆匆而返。去年渐行时过苏州，由穹窿山乘兜子，六时而往返数十里，其时新霁，花光粲然，余将老葬于两上天井之间村名矣。三月服阙，葬亡妻于兴福山之檀树坟。四月，从兄携安孙、斌孙辞墓北行，天暑，舟中酷热，足疾与时感缠绵。过南阳湖，有龙入舟，至济宁而去，识者曰：“此黄大王也。”六月抵都，命在弘德殿行走。是时躬亲大政，至书斋时少，入值以午。七月，王大臣具疏，请停圆明园工。龢特蒙召对，因具陈民生艰苦，众怨沸腾。是日有

旨停园工。九月，五兄授湖北巡抚，十月启行，送之于芦沟。十一月，圣躬患疹痘甚剧，半月渐安，谕旨中所谓“天花之喜”者也。数蒙召见，与诸王、枢臣、御前大臣联衔具折请皇太后权同听政。是月邀恩赏戴花翎，余与荫轩侍郎欲疏辞，不许。十二月，上疾益剧，犹屡入见。初五日被急召，趋入，日将落，时到者不过三四人，即入对于西暖阁。御医李某尚哓哓称说，余叱曰：“何不用回阳汤。”有顷则报圣驾登遐矣。恭亲王等同赴东暖阁，上枕一人坐，已属纩矣，一恸几绝。是夕召见两次，恭闻今上承大统之旨，命与军机大臣拟旨，余与伯寅有所建白，皆采纳。竟夕哭于直廤，以后每日三奠，均在乾清宫丹墀上行礼，与枢臣同班。命穿缟素百日，奏缴花翎。

光绪元年乙亥（1875） 四十六岁

正月，奉懿旨，偕醇亲王、魁龄、荣禄赴东西陵相度地势，定双山峪为惠陵复命。偕王大臣恭修陵工，自是数往来工次。余议以石像生一项无益于观瞻，而劳费最巨，于召对时面陈请停工。即蒙允许。与醇邸倡和诗极多，所谓长歌之哀过于痛哭者也。八月，署刑部右侍郎。[十]月，充武乡试正考官。浙江葛毕氏毒毙本夫一案，言官劾奏以为诬，余反复供状，以可疑者五具驳，同官中有不愿者，余力持之。是年充文渊阁直阁事。十二月，赴暂安殿行周年祭，甫归，即蒙懿旨偕夏同善在毓庆宫授今上皇帝读，余具疏固辞，不许，面陈再四，亦不许，遂流涕受命。是年七月，五兄兼署湖广总督。

二年丙子（1876） 四十七岁

正月二十二日，上在养心殿识字。每日偕御前大臣、亲王伯彦诺谟祜、贝勒奕劻、额驸景寿及夏同年同善入殿，讲《帝鉴》一段，清、汉字各五六。四月二十一日，上至毓庆宫读书，揖诸臣称师傅，以后逐日入值。圣性聪敏好学，比至年终读《大学》、《中庸》，至《论语·泰伯篇》，字迹端劲，记古事甚多。四月，余生日骑马忽坠，伤右

只，赖蒙古医德恩治之，犹在假十日始扶掖而出也。正月调补户部右侍郎。滇铜初次来局，积弊甚多，竭剔抉之，虽未尽，然颇用力矣。八月，署兵部右侍郎，子松入闱也。十二月充经筵讲官。筹儿补内阁侍读。侄孙斌孙还南，应试获隽，为之狂喜。

三年丁丑(1877) 四十八岁

授书如故。三月斌孙中进士，选庶吉士。七月朔，帘前召对。凡见皆垂对，惟军机大臣及穆宗侍臣三数人不垂帘，龢其一也。面陈辞墓日久，恩给假两月，回籍修墓，蒙恩允许。是月十六日具折，次日出都。醇亲王传旨，以海上风涛无定，回京时着由陆路行走，毋庸拘定期限。由通州入船，三日抵津。携妾及斌孙乘轮船名海宴，甫出口而风大作，颠簸一昼夜达烟台，泊一夜，与同舟杨古酝秀才、朱叔彝太守登芝罘，风稍定，又两昼夜达沪渎。二十六日抵里，竟谒西山墓下，同留宿，时二姊在里中，悲喜交集。正在祭先祠，谒各处墓，将作楚游，而于八月七日突闻五兄凶耗，魂胆皆裂。次日携奎孙由沪渎乘江轮名江靖，十四日抵武昌，一恸殆绝。兄于七月晦夜汗喘交作，顷刻长逝，是夕夜饭犹思弟不置也。与幕中周子京对榻，每日破晓，登署后小阜看江，日出哭奠，日入而卧。具折展假一月，九月初六日，奉兄柩浮江而下，用轮船带行。是月二十四日到家，留六日仍至上海，乘轮船北趋。十月十六日抵京，温谕周挚，适符三月期也。授书如故，年终上读《孟子》至《存乎人者》章。

四年戊寅(1878) 四十九岁

授书如故。五兄之葬本以四月十五日，侄辈听乡里人言，改前十日。既葬，筹儿由陆北来，五月五日抵天津，时疫疠正行，触秽气遂病，仓卒舆疾行，初十日抵京，越四日遂不起。噫！天欲剪余祀，其奈何哉。两孙长者安孙尚读书，次曰椿孙跳荡不可究诘。正月，以河南请裁漕米，部具驳疏，余单衔密疏请准行，有旨诘责因何两

歧。嗣蒙召对，具言之。而河南、山西遂有特旨发帑、发粟、裁漕之举，沛然德音，天下感戴。余备员户部，目击各省荒旱，穀下饥民塞途，为之累歉。夏侍郎屡以大义见责，愧负良久终身之恨也。五月，拜左都御史之命，每逢双日入署，与科道接见，同官咸集也。曾桂列京察一等，欲辞免而未能也。夏侍郎出河南学差。

五年己卯(1879) 五十岁

授书如故。正月，擢刑部尚书，是年开印起书房始整工。整工者，膳后复来，申初始退。退后出西长安门，赴部办事，同堂六人，无日不到，向来所无也。与大学士议山东朱[永康]谋杀委员高[文保]一案，置朱于法。改定刑律中伙盗者量改一等，又改偷窃钱票者计赔以银价高下为断。四月，臣龢生辰，蒙赐匾额等。以清尊对客，不敢循俗演剧也。是月调工部尚书，谕以刑部太繁，故调略简之缺，体恤周至。吏部主事吴可读以穆宗圣嗣未定，建疏力陈，竟以死殉。前此懿旨因有今上将来诞生皇子，即立为穆宗嗣矣。至是臣请再降谕旨，将来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大宗之圣子，并于召对时分析言之，得旨允行。先是崇厚奉使俄国，臣屡言其必偾事，又以伊犁不必索还为言。是年十一月，崇厚果擅许俄国陆路通商等十八条。廷论哗然，屡次集议。

六年庚辰(1880) 五十一岁

正月，与上元乾清宫筵宴，又与廷臣宴。会议崇厚罪名，比照增减制书律，暂候奏结查办。万青药参案以皆无实据，照失察家人例交部议处。二月，坤宁宫吃肉。三月，派充会试副总裁，正总裁为景廉，余与侍郎麟书、许应骙副之。四月十三日放榜，得士吴树棻等三百十人。知名之士甚多，同邑庞幼庵鸿书、杨莘伯崇伊皆中。斌孙散馆列一等第七，授检讨。月杪，儿妇携两孙南归，时安孙病吐血数月，不欲其归而不能止其行也，送之凄恻。上读《礼记》毕，接读《春

秋左氏传》，兼读《诗经》。左氏用道光年间御定本。讲《鉴语经世编》及书房存记名折。五月，会议新疆俄事及崇厚罪名，余与伯寅在内阁另具一稿，见者佥以为然。是月二十七申刻，日戴珥且双虹，见于东方。六月，上命书箇扇三柄。是月二十三日，地微震，殿梁有声。万寿赐听戏二日。七月，俄事日棘，朝廷命曾纪泽由英赴俄，递国书。曾纪泽奏请速免使臣罪，为转圜地。两宫皇太后同见枢臣，命将崇厚释放。十四、十六两日，日晕，有黑气。此数月内以慈禧皇太后圣躬违和，征各省名医入诊。夏子松同年卒于江苏学政任，此友平生所服，故记之。八月，恭视太庙神龛规制，议将册宝箱每案叠三层安奉。是月十八日，两宫皇太后召见王大臣于养心殿，臣龢与焉。时俄以十八条要挟，诸臣持两端，唯恭邸言战不足恃，不敢作孤注一掷。侍郎宝廷与面争，臣则谓伊犁可弃，则十八条不可准。又言战非难，必皇太后先定主意，枢臣及诸臣一心则可，若旋战即和，贻误更大。工部司员夏震川递封事，指斥诸臣，语极切直。越日，会议于内阁，军机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暨右庶子张之洞咸集。惇亲王领衔复奏，大略谓俄系大国，与我壤地相接，彼既遣使布策来，俟到时商议，不致决裂。余单衔递封奏一件。九月，懿旨派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刑部尚书潘祖荫、工部尚书翁同龢于南书房公同阅看内外诸臣折件及电报、电复等件。自朔日起，自是折奏皆五人联名。蒙见，谕：“俄事唯军机及尔三五两大臣是任。”余力言西安、汉中等处通商及松花江行船两事不可允。是月初二日，安孙娶妇，常州恽杏耘之女。是月恭送实录、○○○玉牒、圣容、○○○册宝奉安盛京。工部应办彩棚、仪驾等事极繁重。斌孙回南。十月，坤宁宫吃肉。时日本灭琉球为冲绳县，总署允行，此上年七月事也，至是言者欲俟俄议定再与细议，因下南洋及江、浙、闽、粤各督抚详议。曾议俄款粗有头绪。移居东单牌楼二条胡同新屋，此湖南黄恕皆前辈所居也，每月租金二十四两，有太湖石数株，有刻字曰：“肖山胡吟”一行。《诚斋易传》批本乃宣庙潜邸旧物，藏臣家久矣。因进呈，

逐日讲数叶，粗明剥复否泰之理，又以《通鉴览要》小本进，取其易于翻阅。十一月，上读书不佳，臣每以危言规切，唯写大字甚有腕力，尝赐朱书“龙”、“虎”、“福”、“寿”字，赋诗记之。十二月，进讲《通鉴辑览》。俄议屡有波澜，至是始定，删西（安）、汉（中）通商一条，归我帖克斯川一带地方，领事仅设嘉峪关、土鲁番二处。嘎界照明约，塔界在明、崇两约之间，于是废崇厚之约，另立新约。书房功课，读《左传》至宣公十二年，《诗经》至江汉之章。

七年辛巳（1881）五十二岁

正月，派管理国子监事务，以陈奂《毛诗传疏》与潘尚书联衔进呈，奉旨：“发南书房阅看。”有旨褒嘉。与上元宴，与廷臣宴。俄议又争得数条，俄民在伊犁一体完税，换约五年改十年。土鲁番、张家口两处行栈，他处不准。与惇、醇二邸、潘公联衔陈奏折一件，论俄事及海疆防务。二月，朝鲜闵尚书等求书，闵号杓庭，其正使任应准号淡斋来谒。左季高来京，授军机，管兵部，与余一见甚相契。以圣祖圣训进讲，上于史书中批宋璟、李林甫贤奸迥判而明皇不能别，词甚浚厉。五侄曾桂以京察一等蒙恩放湖南衡州知府。三月五，侄妇病瘵卒，贤孝之妇也，伤哉！立仲渊之第四子康孙为后。上体素弱，而左右内监每讳言，余屡斥伊辈诬罔，此为结怨中官之始。初十日夜半，惊闻慈安太后示微疾上宾，亟趋入，门犹未启。天明，命诸臣入哭于○○○钟粹宫。余治办朝帘、幡杆、夹杠、架衣，数刻而具。是日，派惇亲王、恭王、奕劻、景寿、宝鋆、灵桂、恩承及臣龢恭理丧仪。自是三祭必在事间，四日值宿于附近公所，每夜巡行，而工部事尤丛集，命穿百日孝。是月梓宫奉移观德殿。斌孙来京。四月，发汗症仆于殿墀。俄事议结，与枢廷、译署联衔具折。二十四日上御书斋，余于早祭后仍驰入侍功课，复数月皆如之。五月，内阁所储香册、香宝竟失所在，余督工部制造，连夜制成一份。大侄妇自家乡来京，俞调卿甥同来。即住余家，闰七月回南。六月，彗星见于八谷，

近紫微垣，旋入紫微，指北极，芒甚长，二三尺。二十日得南信，安孙竟于本月初八酉时卒于常州恽氏，老泪不胜挥矣。肝疾大作，在直庐终日偃卧。七月，查出镶红旗满州印领大员葬银系伪印，以该处书吏刑部审办。曾桂侄赴衡州任，奉三嫂同行，余策骑送至通州，一刻而别，即驰归。御史邵积诚劾工部总办多大员子弟，谕撤王庆钧帮总办差。余草奏陈明，素麟、景灝亦大员子，但俱系屯田司掌印主稿，凡大事皆屯田司承办。于公事一切无误，不能撤换。是月太白经天，彗星尚守四辅，无芒旋隐，又一彗见于斗柄下，芒一寸，后乃长至丈许。闰七月。讹言甚多，谓“涿州挖河，出刘伯温碑”，极诞。张凯嵩奏，房山山中白莲教或云在理教聚众多人。八月，大侄妇携斌孙夫妇及稚子由横家移居城寓。请发九朝圣训，列朝御制诗文集，平定粤、捻方略储于国子监。偕惇邸恭诣普祥峪定东陵，演龙輶勅车，并察看○○○芦殿地盘，归次邦均感疾，力疾驱驰。九月，派管理火药局。是月十七日斌孙随行，孝贞显皇后奉安定东陵前。九日梓宫启行，臣职司尤重，步从时多，届时随入地宫，以恭理事毕，勤慎周详，赏加太子少保衔。以天下舆图进，详论形势。十月，坤宁宫吃肉。讲《开国方略》。上批史论，略谓唐之所以亡者，宦官而已，懿宗而后更无法度云云，语甚激切。欲看《道德经》及《孔子家语》，遂以两书进。《家语》经窜改，《老子》非治天下之法，上意在博览也。十一月，上读书甚倦，余于皇太后召对时切陈之。余督司员修工部则例，日看数卷，旧缺承办丧仪一门，今补之。十二月，得见书斋后室宛委别藏书籍。“宛委别藏”者，嘉庆时藏书之所，大抵未经收入四库者，内浙江采进者为多，皆写本也。上批鉴，撮数语，寓攘夷之意。赏臣带嗉貂褂。写《夙兴夜寐箴》进呈。派充管理沟渠河道差。宫殿各处屋檐上宝匣全被贼匪窃去，一一补安如式。感冒请假五日。

八年壬午(1882) 五十三岁

正月，坤宁宫吃肉。朝鲜使臣金德容，年六十三，以所著古文见

示。二月，坤宁宫吃肉。写进《白居易乐府》数十首，又摘抄《会典事例》，备召对时咨询所及。地微震二十一日，三月杪。近时臣工奏折六十件，每日请上阅之。四月，德孙在家乡完姻，娶庞伯申女。集同人料理全小汀师家事，铭彝归宗，麟祥分产。整顿国子监南学。五月，懿旨发光禄寺少卿王家璧折一件，命于书房进讲。六月，会同宝鋆、李鸿藻、徐桐、麟书筹议整顿八旗官学事。斌孙又举一子之廉二十五日。七月，奏准凡孝廉方正应国子监录科者，毋庸补捐贡监。是月京师大雨，浙江、安徽、江西皆报水灾，懿旨饬部拨银十八万分赈之。朝鲜国乱，囚其王，逼死其相，其大院君李显应实阴主之。遣吴长庆带兵往讨，而日本亦兴师问罪，吴长庆俘其大院君至津。大院君者，国王之本生父也。八月，督修紫禁城城墙。周子京维都、士吉侄皆下榻余斋，应京兆试，试毕各归。派复核朝审册。十三日长星见于东方，芒长一二丈，晓时见之在柳张翼间，旋在鬼柳之际，行甚迟。派管理户部三库事务。御史洪良品劾景廉、王文韶于云南报销案得贿。派惇亲王、翁同龢详询复奏，越日奏并无确据。奉旨俟崔尊彝、潘吴章到案，仍着麟书、潘祖荫详细推鞠。有大星赤色，于二十五日午未间坠地有声。九月，御史邓承修再劾报销案，懿旨添派惇亲王及臣龢查办崔尊彝、潘吴章等。彗光淡而芒长如旧。二十五日查估地坛望燈杆。十月，坤宁宫吃肉。象入西长安门，忽狂逸，毙三人于途。讲抄《三习一弊疏》，并本朝诸名臣奏议，以《百孝图》进呈。地微动二十三日，金星过日在地平下二十七日。彗留张度同上。十一月初五日，王文韶告养开缺。命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仍兼毓庆宫行走。具疏恩辞，奉旨一道，又蒙皇太后面谕：“择人极难，毋得固执。”乃顿首受命。是日命潘祖荫同值枢廷余班次在景廉下，潘祖荫上。每日枢廷撰旨毕，即诣书房，恭侍书房功课，余仍授上书，前月地动，深州为甚。彗星出天狗，旋即敛尽二十三日。火药局弊极多，次第清厘之，三库亦弊藪也，不能搜剔，去其泰甚而已。十二月，侄曾桂续取张氏，诗龄先生之幼女也，由松江送至衡州。十四日皇太后圣躬大

安，枢臣入贺，赐“松竹并茂”四大字。岁底皇太后御书“所贵唯贤”四大字。上读《左氏传》将毕。检点身心，过多善少，誓以“忠信”二字自励。

九年癸未(1883) 五十四岁

正月元日，召见枢臣，皇太后、皇上同坐御榻，上在太后之左，略如宋宣仁故事。臣等奏事，面请裁决。赐八宝荷囊。自是每日召见臣工，上皆入座。坤宁宫吃肉。法越事起，李相力主在宝胜通商。恭邸以疾，久在假，同值潘公以父忧去。二月，坤宁宫吃肉。上读书稍怠，臣言语讦直，不无龃龉。是月读《左氏传》毕，选汉、唐古文进读。二十一日，西南坠一星如碗，余亲睹之。皇太后赐御画墨花巨幅。云南道员崔尊彝中途病故，唯潘英章解京，督司员严讯之。三月，法越事浸炽，余持红江各国通商不得入滇境之说。游百川查勘山东黄河，主分流之说，至是奏言坚筑堤岸，余议以为是。四月，讲《明史》，派阅新贡士复试卷，派教习庶吉士。五月，上读《古文雅正》，此选本最纯粹者也。南横街屋，龙兰簃元僖旧居也。兰丈出京，让先公居之，曾交过户部官房价，而起造之费未酬，至是兰丈手书谓：“此屋归翁氏，三十年以后作为翁氏世业。”云云。余备二千金交其兄子贊宸、贊新，而两君坚不受也。法越电报络绎，越将刘永福歼法将罗非亚，而法兵亦破南定入河内。先是三月末，命李鸿章督师出关，旋令与脱使议事。至是李奏边衅万不可开，而言者纷纷，谓属国不可弃，乃拨饷四十万，饬滇、粤募土勇。上始作论数行，以后日日如是。云南报销【案】将次议上，而惇邸忽欲从重，屡请起面陈。至是太后特召见惇亲王、阎敬铭、张子万、麟书、翁同龢、薛允升于东暖阁。惇邸力斥诸臣所定之非，并言：“此潘某授意翁某者也。”余在上前力析其谬，谓臣等所拟无一字不按律例。律例者，祖宗成法，国家宪章，岂可意为轻重，凡数百言，诸公亦同词剖析，始定议。翌日奏上，照议允行。旋部议景廉、王文韶、董恂、奎询、奎润皆降三级

调用；刘长佑，杜瑞联降二级调用；余罚俸九个月，准抵销。景廉留军机、总署两处行走。六月，御史光熙折略言，定东陵释服期近，游观声色土木诸事，恐从此而兴。折交毓庆宫，臣因进讲，推阐切陈之。邵汴生前輩卒，余以三十年故交，一恸而归，归后刷病三日。自十六日起，大雨连昼夜，九衢泥淖，军机直庐水深二尺，民居颓坏甚多。万寿节群臣于乾清门上行礼，停止听戏。二十七日上祈晴，是日雨势顿衰。七月，命醇邸到军机处会商法越事。修建南学学舍，并西序石径、碑石。曾侯在法国与彼上沙侯者议越事，意在请我退兵，而越之南定已被法占。刘永福屡次小胜而已。法攻越顺化都城，越请停战。士吉侄来京小住，八月即归。是月二十四日大雨，山水陡发，永定河决。八月，进呈工部新修则例。越南与法立约十三条，一切听命，同僚多不谓然。始议以彭玉麟募勇防广东，左宗棠、李成谋防沿海，李鸿章防津沽，骎骎及战事矣。德孙举一男。九月，刑部秋审黄册，军机大臣例得参酌。余以陕西官犯马仲篪一起斩罪，入实未协，乃加签改缓。派修火药局房屋墙垣工。派修国子监工程。刘永福败退至越之山西，于是议定照会法国。若进兵北圻，决与开仗。饬谕沿海各督抚，严防水口，仍保护法商。摘唐炯顶戴，革职留任，令王德榜率新募勇出关。同官李高阳相国意与余同，而刚柔进退，议论往往不合。十月十四日，日未出时，东方天赤如火；臣以《宋史·天文志》及《文献通考》所记详陈之。二十三四日尤甚，竟至半夜。《开天占经》谓：“天变色主四夷交侵。”直至十一月十八日始不见。是月十七日始发法国照会，并宣布各国以战事。岑毓英请带二十营亲赴越南，允之。派修城上堆拔并城墙工。于奏对时发汗症甚剧。十一月，坤宁宫吃肉。廖寿恒封奏，谓宦寺宜择老成者，并论及土木之工、传办之件。慈谕：“宫内太监皆守规矩，皇帝左右有不遵法度者，翁同龢即指名具奏。上始作《望雪诗》四句，此后日以为常。初六至十四日天赤尤甚，圣意焦劳，臣等引咎自责。上作《六国论》，甚畅。山东河议未定，陈士杰主筑堤，游百川主分流。工部实司其

议，讯询众论，分流入徒骇须建闸，恐夺溜，姑主筑堤，而仍开浚徒骇。以左相集助国子监二万金发商生息，为南学士子膏火等用。十二月，上始作《祈雪书怀》五言一首，诗笔日进。法攻越北宁，并窥我琼州。彗星见于天津第八星上，光小而淡。越之山西为法所破，刘永福、唐炯两营退扎兴化，令粤东派兵援之。查估火器营营房工程，偕麟芝庵策骑往，半日而毕。越日查健锐营，宿碧云寺，夜起听泉声，查工时无屋不到，曹司诸君之力也。皇太后赐“旁综广深”四字。拟进《春帖子词》三首。银库今年新收一千五百五十万四千二百四十两，实存九百八十四万八千六百五十二两。管库堂官六人，非出差即告病，余与李高阳则每期必到，而余以居近，尤数往，于收发时全力注之，极繁琐，极劳顿。综计一年中，圣学稍进，而民生日蹙，边事日棘，水灾屡告，言路颇杂，菲才当此实愧弗胜。

十年甲申(1884) 五十五岁

上读古文，进讲《开国方略》，作五言诗。赐○○○《穆宗圣训》三十二函。二月，上作论，每日以办过臣工奏折请上批之，略如朱批谕旨之式。越南事棘，北宁城为法兵所陷，太原城亦陷。手绘缩本地图并越南图以进。三月十三日，以军机奉职无状，恭亲王开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均开去差使，降二级调用。臣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自此月后，书房退时以未正一刻为度。是月遂有与法讲和之议，下廷议，皆以为是。四月，遣嫁侄孙女于国氏，新郎国裕，字子余，行七，癸未进士，年二十五。五月，进讲司马光《稽古录》。闰五月，以倭仁所辑《启心金鉴》写进。上每日圈点四叶。自谅山捷音到，乃与法相持，已而廷旨撤兵。七月，法兵攻马尾，张佩纶退衄，法亦被创。补刊《国子监志》。八月，鸡笼失守，旋收复，关外大捷。九月，书房与御前大臣联衔递封事。法事久不决，警报叠至，朝廷主战。广绍彭卒，为之处分家事极难。十月，皇太后万寿，赐臣匾额一方，曰：“诚明纳诲。”开复

革职处分。十一月，上诗文皆进，曾赋汉章帝曰：“白虎亲临幸，诸儒议五经。惜哉容窦宪，諫诤未能听。”不假思索，一挥而就。苏元春报谅山大捷。日本乘朝鲜之乱，发兵踞王宫。山东河工日难，或主请分流，或主疏浚，或仍筑堤，工部议奏之件，皆出余手。十二月，我兵于越南迭获胜仗，宣光及所属三府县皆复。以《东莱博议》日日进讲且读。

十一年乙酉(1885) 五十六岁

正月，上讲《大学衍义》及《吕新吾书录》，甚有心得。镇南关失，旋复。杨玉科阵亡。法国不索兵费，朝廷许罢兵。二月，和议三条始画约，唯时谅山我兵大捷，台湾告警，朝廷宣谕罢兵。勘东陵岁修工程，归游盘山，于所谓桃源洞者见一立石，隶书隐隐“三将军到此”数字。三月，上自去年起，每日作论、作诗、批折无间断。四月，以徐松龛所撰《瀛寰志略》进。上试马于宫门东长街，阅侍卫马步射于西苑，凡八日。移书斋于补桐书屋，又移于长春书屋，又移于画舫斋，始作《赞》、《铭》等杂体文，派拟。六月，朝俄有密约。发汗症，旋愈。以休沐日游西山翠微。七月，幸西苑，赐书斋臣坐船。偕麟芝庵查估健锐、火器两营营房工程，住卧佛寺，过摩河庵睹九莲菩萨画像。懿旨令写平日上所作诗、论进呈，几论三十，诗四十，装一册，嗣后每月写呈一册。八月，充顺天乡试副考官，正考官潘祖荫，余与奎润、童华副之，斌孙充同考官，请回避，旨毋庸。【题】：“实能容之”三句，“子华使于齐”全章，“孔子尝为京吏”一节，诗题：“尽放冰轮万丈光”得“光”字。凡一万一千三百二卷，宗室六十七卷，初三进呈前十卷，九月十二日放榜，得刘若曾等二百□十人。余与潘公总角交，论文悉合，所得卷彼此互阅，亦有相抵牾者，然而卒相合，盖莫逆者天下无如吾二人也。是月以《东莱博议》进讲。十月，再勘健锐营工。士吉侄卒于金山学官任。十一月，会议黄梨洲、顾亭林从祀孔庙。礼部议驳，余草疏与潘伯寅、孙燮臣、孙子授、龙芝生、盛伯

羲联衔上之。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议,再驳。有“不得谓躬行实践之儒”语。司值张子腾家襄病卒。命孙诒经在毓庆宫行走。上喉病,十余日未到书斋。查估内城河道。是月,调补户部尚书。管理者阎相国。相国虽以理财为务,然持大体,节冗费,与余最契。君子人也。是年书房功课:作论、作诗,讲史鉴、圣训无虚日。

十二年丙戌(1886) 五十七岁

与廷臣宴。钩宋拓《张迁碑》刻之。以中书端木采所辑《读史法戒录》进呈。二月,吃肉。再疏请黄宗羲、顾炎武从祀。谕:“从礼臣议,毋庸从祀。”是月二十七日,皇太后、皇上恭谒东陵,派同惇亲王、大学士恩承、协办大学士福锟、尚书翁同龢、左都御史祁世长留京办事。故事:留京者看调兵合符。符储于柜,锁钥甚坚。由中使交出,诸臣接受而已。是年,惇邸请启柜点检,乃交。合符信牌箱二,内四匣最要者,调兵符也。每日卯正正刻入,酉初二刻出,轮流值宿。典合符箱,稽察四门管钥,未正发报,接报则无定时,凡十日。是月,上体感热停饮。余请旨传薛福辰、汪守正来京诊脉。四月,见李若农所藏《华山碑》,脱两叶之本。马氏玲珑山馆旧物。金冬心钩寄苏斋即此,吴山夫金石本中刊之,为海内第四本,实为最精之本也。侄孙婿国子余病瘵歿,越十日,侄孙女亦卒,此事最伤余怀。派殿试读卷元赵以炯、邹福宝、冯煦。是月起,懿旨传每日午初下书房,臣婉陈为时太促,恐入室后宦官宫妾闻见猥杂,以未刻下书房为宜。本欲撤讲,阎相国力言始止。六月,驳山西按亩征土药事,上作律诗讲史事,每日批《明史》数语,又以近时奏折分门缮写,请上批之。是月初十日,醇邸面奉懿旨:“皇帝典学有成,明年正月归政。”醇邸约余等在月华门议事,余以为宜请起面论,请缓降旨,而殿门已闭,不得入。遂草一疏,与御前大臣伯彦诺谟祜等联衔上之,大略言:“宣训政不宜归政也。十四日,礼亲王世铎领衔六部、九卿折,醇邸单衔折,余等与伯王联衔折同日上,未蒙俯允。十八日,懿旨以皇帝吁求

多聆慈训，允训政数年。二十二日召见，臣因力言：“皇上春秋方富，未能周知天下之事。宗社所系，岂一、二臣所能赞襄。此事外廷不知，内廷诸臣必知，即内廷不知，臣实知之。”太后默然良久，遂谕京城复制钱事。月杪京城大雨，余屋几颓。慕卿由家乡来京。七月，以《魏郑公谏录》进讲王益吾新刻者。户部遵旨议复制钱事。上奉皇太后诣北海，驻跸六日，仍每日作诗或作论。八月，直隶报全省水灾，截江北米五万石，懿旨以中秋进项再留二万发赈。顺天府报灾，发米五万，银二万。派复核朝审。因请铸制钱购倭铜三百万，论价极琐屑。中秋游秘魔崖，一宿而返。九月，上诣北海看箭，凡八日。
懿旨，传功课减半。此次阅宗室射，盖四十三年未举之典也。与恩露圃相国查收内城河道工程。片奏北海水闸口有往来人迹，请添建堆拨，添用闸军，以明严密。十月，派充会典馆副总裁。皇太后赐御笔菊花一轴，兰花四幅。再游秘魔崖，并至天太山，一宿而返。上以召见臣工，当如何咨询，令具书以进，因分部、分省略举故事，分书以进。进讲《大学衍义》，仍作论、作诗，每日如此。十一月，偕麟公查火器、健锐两营工程，策骑往还三日。赴东陵收岁修工，往还七日。是年，上初祀南郊，敬谨陪祀。十二月，与醇邸、枢廷及户、工部诸君议黄河事。上赐“福”字加“寿”字。皇太后赐御笔“福”大字、御画钟馗。是年书房功课：批折，讲《大学》，仍作诗作论。

十三年丁亥(1887) 五十八岁

正月，上诣祈年殿祈谷，敬谨陪祀。部议以京师制钱一时难铸，请先提湖北、三江及浙制钱解京，奉懿旨诘责。户部堂官均严议，议上革职，奉旨改为革职留任。是月十五日，皇上亲政，御太和殿受贺，群臣俱加一级。与上元宴、廷臣宴。内传自此以后，上每日召见办事后始到书房，未初即退矣。引见人员仍系圈单，不传口敕。上召对臣工，日必四、五起，皇太后时或在座。二月，同值孙予授因惩办银库吏史松涛勒罚事交议，罚俸一年，命毋庸在毓庆宫行走。上始指

圣人堂行礼在乾清宫东廊，上书房之北。皇太后召见，询书房功课，敬对：“工夫太少，讲读诗文不能遍及。”并泛论各省督抚贤否，因及各省民力凋弊，虽洋药税厘并征，入项稍多，然不足弥海军之缺。同年延树南卒。树南遇我甚厚，昌平核桃园地，伊所售也。是月书房常撤。三月，派修宝源局炉座房。上奉○○○皇太后诣西陵行敷上礼，臣随扈行礼。懿旨派恭、醇两邸及臣龢带同风水官英年前往九龙峪相地。峪在东口子门外五里许，脉从壬来，九节盘旋而下，此地十三年前曾一到也。复奏此地极佳可用。往返凡十日，归途过芦沟，东凭亭园，花木之盛，甲于京师。上躬耕籍田，臣派从耕。先一日，户部设农具、五谷箱于中和殿。臣以农官得侍班。此典自乾隆三十三年后，距今百余年矣。讲《孟子》。内传满书功课改于办事前在养心殿，以四刻为度，到毓庆宫专办汉书功课，不过一时许，余力陈圣学宜及时自励。四月，上于书房散后诣北海画舫斋习射，并阅侍卫等射，嗣后五日一次。皇太后召见，谆谆于书房功课，并勗臣以尽心规劝，至于挥涕。至钱法事，臣对：“大钱已行三十年，一旦更制，民间猜疑。”派修理雍和宫工程。中官求荐木厂，怒斥之。阁相屡病，部事余主之。制钱甚少，而大钱折当极难处。闰四月，查收两营兵房，于卧佛寺一宿。五月，懿旨：“大婚典礼，着户部先筹银二百万，并预捐各省银二百万。又○○○谕：‘着长春官总管太监连英总司传办一切。’二十七日酉正，太白昼见。六月，奏故司业治麟孝行，请付史馆列《孝友传》，奉旨允行。过巴沟铭鼎臣山庄，颇有野趣。七月，永定河开口。直隶及南省皆水灾。得南信，仲渊侄于是月十三日长逝，盖久病也，为之一恸。斋宫动工，移书房于养心殿东暖阁，以养心门西头屋为余等直庐。八月，纂卿侄南归，送之通州。斌孙吐血未愈，闻仲渊讣后，欲亟行而不得也。用度空乏，贷广夫人三千金，月息四厘。河决郑州，淮甸震恐。偕伯寅联衔请分导下河诸水归海，以防黄、淮涨溢。廷谕下江督、苏抚酌行。派李鸿藻驰往河南督办郑工。九月，筹郑工急款。斌孙南归时，病未痊，意与俱驰矣。筹郑工银六

百万，先拨二百万。寓居东偏之屋颓废殊甚，因重葺之。郑工浩大，费无所出，不得不为节缩之计，并开捐例，而同堂意见又不合，极纷纭也。十月，见沈仲复所藏关中本《华山碑》宋拓。国子南学诸生彬彬向学，诸作皆可观。学政蔡干禾大年为之师，培植者不少。以《文类续编》中高宗御制《濮议辨》进览。书房既移养心殿，一日，上偶下座，余见一人自外来，历阶掀帘，口中呜呜，便衣毡帽，余叱之，乃踉跄去，因奏之，命责八十板，于是总管以下皆侧目矣。孙公以臂病，累月未入值。十一月，上命至醇邸问候，因入一见。中旨趣发制钱，而制钱铸出者尚不及百万，因请与大钱搭放，恐市面惊疑也。十二月，户部、国子监、京察道堂有举无劾。国子监进呈安丘王筠、浏阳邱子稑所著书，又请于南学肄业生充官学教习。懿旨开复革职处分。皇太后赐御笔大“龙”字。是年自亲政后，到书房必已刻，功课甚少矣。八月以后余独值，乃稍复旧制。每日诗、论并作，亦批史事数则，文义通敏。

十四年戊子（1888）五十九岁

正月，奏京师月饷搭制钱，每人扣银三钱，发制钱一吊，市间有废弃大钱之说。添拨大婚典礼一百万。进讲《周礼》。邸报：“云南石屏、建水等处地震，死者四五千人。”二月，上祀大社大稷，朝日坛，皆陪祀_{文昌庙}^同_{关帝庙}。上耕籍田，臣龢以户部官侍上播种。观肃王坟架松。三月，上作诗，有“微雨来时花气活，轻雪走处草痕苏”，真佳句也，敬记之。复讲《鉴语经世编》，久不讲矣。四月，上时享太庙，臣陪祀，常雩礼，陪祀，六部到者，唯余一人。初十日，上恭奉皇太后驻跸西苑之南海，王大臣等均花衣递如意二柄。得闲往丰台看芍药，仅见蓓蕾，花则入篋矣。书房初在补桐，旋移长春书屋。借都广司小屋，为入值时憩息之所。又续筹郑工银一百万。侄孙宜孙以海运差来京省视。五月，部驳奉天土药票捐。京师地微震初四申正。进

讲康熙、雍正两朝圣训。北郊陪祀。郑工将合，而西坝忽沉一船，东坝蛰并走一占。与祁子禾重装报国寺旁买画《妙因胜果图》。六月十九日奉懿旨“皇帝典学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明年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又奉上谕：“敬念圣母三十年为天下忧劳况瘁，兹复重申前命，敢不祗遵。”是月雨雹大如拳，大风。以银五千购定黄氏屋，前此盖赁居也。是月二十九日，南海会元殿天篷为风所拔，并坠殿角鵠吻篷材皆中折如截，有铁鼎重数百斤者数枚，均移聚墙阴。此处上寝宫也，幸以万寿典礼，驻跸宫中，故未受惊。七月，续筹拨郑工银二百万先筹一百万。初五夜之雨，北山冲三四村，南山冲二十三村，死者二万。永定河南三工浸决，而房山县水忽大发，冲失村庄十余余捐赠百金。群臣请上皇太后徽号。进《九朝东华录》新刊本。阁相准开缺。八月，派充顺天乡试考官福锟、翁同龢、许赓身、薛允升，宜孙、炯孙回避，不得应试，共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六卷。宗室题未写“论语”二字，特寄谕于题纸注明。是月斌孙由南来京。九月初七，进呈前十卷，十四日发榜，复命始知此次臣与福锟并为正考官，盖特恩也。续筹典礼五十万。上奉皇太后诣万寿山。十月，懿旨立副都统桂祥之女叶赫那拉氏为○○皇后。翻盖东院厢房三间，又起灰棚四间于东后院。十一月初二，行纳采礼，与后邸筵宴。偕麟公查收两营工程，住卧佛寺，归途瞻仰颐和园，时正在兴作也。蒙皇太后召见。谕书房须习小楷，讲经书，并谕归政事宜，以万几事重须稟命对。十二月十六日太和门火，由贞度门起，五更余即趋入，时冰雪凛冽，贞度门已毁，焰已息矣。忽从茶库穿而东，一刻飞上太和门罘罳，须臾落架，又越而东，毁武备院、毡库，至昭德门而止。丑初起，酉正息，王大臣等始传散。偕孙燮臣联衔封奏，请停办铁路片，言停工作，惜经费，开言路，杜幸门，由是电止勘路，议稍纾矣。郑州河工合龙。皇太后赐御书大“虎”字，并朱拓“鹤”字。是年书斋功课为时太促，且往往撤去，屡次陈奏，未能回也。五月地震，六月风灾，七月西山发蛟，腊月太和门火，身为大臣，毫无补救。

积忧成痼。

十五年己丑(1889) 六十岁

正月，祈谷坛，陪祀。所以记者，六部中唯余一人也。以冯桂芬所著《抗议》进呈。初八日，日抱珥，五色向上。与廷臣宴，此年例也，可不记。惇亲王薨。综计大婚典礼银五百十万两交进五百十万。御史屠仁守请归政后臣工密奏，仍书皇太后圣鉴云云。○○○懿旨：“撤去御史，议处。”旋议革职，永不叙用。次日，臣蒙皇太后召见，臣以屠仁守所言，天下之公言也，叩头请宽其责，并具陈当世要务，并言亲政后断不可改章程。蒙谕：“汝心忠实。”懿旨加恩前枢臣，臣交部议叙。自正月初十至二月初九，皆蟒袍补褂。是月二十七日，大婚礼成，懿旨加恩廷臣，臣蒙赏戴花翎。二月初三日，上亲政，御太和殿，宣诏颁行天下。次日，上以大婚礼成，御太和殿受贺，颁诏如昨仪。六日，恭上皇太后徽号册宝，次日，上御殿受贺，颁诏。蒙卿侄自南中寄鹤一双。派阅各省举人补复试卷。斌孙以署撰文，得保侍讲衔，尽先升用。大婚典礼。三月，上躬耕籍田，臣从耕。复讲《帝鉴图说》、《通鉴论》，两书皆切于日用也。再上皇太后徽号册宝。翌日，御太和殿，颁诏，百官表贺，前此乃补进同治年恭进之件。闻家乡有流民麌占田，电致护抚黄公查办。阅宗室复试卷。四月，截南漕十万石，并轻赍等银，发山东赈。阅汉馆生卷。○○○太庙时享，陪祀每节皆然。常雩，陪祀。上有《斋宫斋宿诗》，命南书房属和。阅新贡士复试卷。侄孙奎孙、孙椿孙均来京。同龢六十岁生辰蒙赐匾额、对联、如意、寿佛等件。阅贡生朝考卷。派教习庶吉士。五月，皇太后赐御画团扇，并山水小幅。久旱，遣官诣邯郸县请龙潭铁牌。同治年中有此例。既抵京，次日大雨。阅考试中书卷，住贡院七日。同派者徐桐、李鸿藻、汪鸣銮也。六月，阅各省优贡朝考卷，阅试汉教习卷，住贡院七日，发吐血病。七月，山东黄河冲决章丘县大寨等庄，通州运河决口。十六日，具折请假两月回籍修墓，谕赏两月假。

修墓事竣，加恩赏给驰驿回京。十八日出京，椿孙随行。于白塘口登海宴轮船，二十一日酉正开行，二十二日午正泊烟台，历时一开，二十四日卯正抵上海。儿妇及两孙媳因避流民之乱，暂寓上海。乃挈以归。住慕侄南泾塘屋。其夫妇为余料量，一切极周挚。八月，住西山丙舍，手订义庄规条。二姊住章家角，虽远然数相见。友朋中唯濒石新逝，馀尚无恙。偕赵介人作邓尉之游，宿玄墓还元阁，于虎山桥看月，过虎丘，往返五日。闻此月二十四日京师大雨，祈年殿灾，以惊诧不已。九月，与二姊别，昏声而出。初三日行，慕侄送余至上海，值风雨，坚请缓行，乃于市栈借住。时亦出游，所谓园亭者多洋式，不称意，客亦如之，往往默坐其中。唯铸厂、船坞、洋枪局、织布局等处为有益耳。十六日携之善入舟，茂如偕行，即来时海宴船也，慕侄别去。十七日开，大风颠簸，一日始息。亥初泊烟台，泊一时许，十九日酉正抵大沽，次日入口，泊白塘口。二十五日销假请安，臣首以祈年殿为意。上亦深以为惊惧，曰“变不虚生”者再。十月，妾陆氏感风湿症，极危笃，服牛黄散而转。吾乡自九月初至十月初，一月大雨，水骤涨，禾尽淹，里中诸君电来告急。乃偕潘伯寅、汪柳门、廖仲山、徐颂阁、恽次远、陆凤石联衔具折请赈。奉旨拨江苏库银五万两，复奉懿旨发内帑五万两速赈。余与潘公各捐赈一千两交苏州善士谢绥之。浙江、湖北亦报灾。十一月，派阅考御史卷部属考。恭阅谕旨，颇有振发意。感寒发热，请假五日。发下懋勤殿所藏碑帖，令臣等检阅一过。自是月二十日起，咳呛不得眠，至腊月不支，乃请假服药。十二月，赐观慎德堂藏宋拓皇甫诞碑。琦善家物。跋谓“机务二字未坏”云云。上选《抗议》中六篇为一册，饬装治置案头。阅汉荫生卷。赐观三希堂藏王氏三种真迹王羲之《快雪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咳呛吐血，请假十五日，延陈粥臣治之。同邑诸君电谓吾邑荒二三分，今免征苏州一府为办赈，赈则刁民必返索原租，嘱电止免征云云。余答以议赈乃公道，催租必致乱。又有以前意为请者，答云：“免征，朝廷特恩；勘荒，有司专责。不敢请，亦

不敢阻。若以一邑之言而阻全郡蠲缓，恐贫民无告益多。”皇太后赐御书“长寿”字，御画“翎毛”各一轴。奉恩旨长、元、吴、昆、常、昭六县漕米停征，条银、芦课被淹者全蠲，薄收者减成征收，是年书房功课温理者多，作诗文少，讲求史事，紬绎圣训则日不遑也。

十六年庚寅(1890) 六十一岁

正月元日寅刻，书“虎”字数十幅，又以甲寅日寅时书数十幅，盖余庚寅生也。与廷臣宴。是年以年逾六十，例不陪祀。书房课程照旧例。以今年上二旬万寿，赐宴于太和殿。是月杪，咳始止。二月，御前首领太监马双福讦前首领王万荣得粤海监督广英银数万，治双福罪，余不问。拨库款二百八十八万五千大修黄河堤岸，从山东巡抚张曜请也。闰二月初四日亥初，地微震。上奉皇太后谒○○○东陵，十五日起銮，二十三日还京，臣派出随扈。臣特至○○○惠陵宫门，九顿首而还。阅直省举人复试卷。三月，上御太和殿颁万寿恩诏，群臣表贺。阅宗室复试卷。四月，神机营借洋债三千万，每年责户部筹息二百万。阅汉荫生卷，阅贡士复试卷，磨勘贡士卷。派典试读卷官。宜孙押运来京。阅贡士朝考卷。五月，皇太后赐画团扇、折扇各一柄。考取南学肄业生一再复试，严核之。阅考试国子监学正、学录，入闱七日。六月，自前月杪至初十日，雨连日不止，雷电交飞，颓墙之声相应也。余屋四围之墙皆塌，无室不漏。借住内务府关防衙门，以便趋值。通州平家疃决口，宝坻鲍丘水溃堤，固安南三工决口，良乡、涿州水入城初七日。十一日，上祈晴，是日皆晴。自十一日后，雨止矣十八九又大雨。发内帑五万交顺天府赈济，拨米一万五千石设六门外粥厂，派京堂六员，分驻六厂。河南汝宁县风灾，坏城堞及民居九千余间。永定河决北三号，冲南苑直至永定门，一片汪洋。余策骑察看水势，饥民塞路矣。每日办炊饼一千交长素厂带放，此涓滴之水耳。与京尹陈六舟函商赈抚事。京师义士捐资设厂。斌孙亦开圆通观厂，遣人四出援救。万寿

节赐听戏于西苑之纯一斋，凡三日，派臣进膳。七月，赏听戏二日，六部堂官皆与。拨顺天府赈米十万石，大钱七十万串。开顺、直赈捐。拨银十万速筑永定河。患下血几一月始止。本科殿试一甲二名文廷式卷内有“间面”二字，读卷官未经签出，吏议罚俸六个月，准抵，承修太岁坛工程。八月，日与南学诸生相策励，以经义治事两大端，俾分途学之。捐俸修南学房屋。派估圆明园八旗营房。禄米仓亏空，旨饬户部堂官密盘，同官轮替，二十日始毕。此仓应存米三十万石，今盘见只十五万三千余石，于廒坐中获张六一名，黑衣伏梁上，著名仓库也，得南电，知四侄妇周氏于本月十四日病卒。创办义庄，操持内政，实四侄之贤佐也。还清广宅贷款三千金，顿释重负。九月，阅汉荫生卷。进讲○○○高宗圣训。查圆明园营房工程，借宿铭鼎臣巴沟别墅，便道过秘魔崖。宿□□，游宝珠洞、香界寺、龙王堂、大悲寺、三山庵、证果寺，所谓八大刹也。部疏工作太繁，请分别缓急。得谕旨。十月，续拨顺属赈米五万。次孙椿孙于本月十八日病殇于家乡，电来知之，伤哉。遣仆范升乘轮归里，接儿妇北来。本部考送总理衙门章京。潘伯寅以是月晦歿于京邸。平生故人唯伯寅为莫逆，殡殓皆亲其事。十一月，同直孙子授病殇，为之一恸。二十一醇邸薨。上召见臣龢、臣家鼐于西苑三勤殿，欷然长号，声出户外，询一切典礼与今日服色，臣具四条以进。先是，尝以怡贤亲王丧仪及《濮议辨》陆续上呈，故上意亦有主宰也。既退，复召见一次，命赴军机处偕庆邸及枢臣拟懿旨。旋奉○○○懿旨：“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议奏。”嗣是数与诸公集吏部公所，先具十二条上之，特谥曰“贤”。上即日以长春书屋为寝宫，坐褥皆用黑布，凡九日，有旨撤去，仍如常矣。下月初三释缟素，初十初祭，十六大祭。十二月，国子监、户部两处过堂，定京察有举无劾。此两月中余时时呕水，腰臂痛，支离殊甚。年例赐“福寿”字。复阅候选知府王恂所进《通鉴引义》五十三卷。请于嫂氏，命以斌孙次子之廉为安孙后，熙孙次子之循为椿孙后二十日。醇贤亲王移殡于海甸。

之蔚秀园，园即王赐园也。会议醇贤亲王祭礼。皇太后赐御笔“松寿”二大字。内务府于部年拨六十万外，又请三十五万，余持不可，同官遂有违言。桐城诸生方寿衡以书赠予曰：“崇圣学，开言路，求人才。”言皆切实。今年上亲政，理万几，又时至邸第省亲，功课大减矣。余家运甚蹇，病体日颓，了无人生之乐。

十七年辛卯(1891) 六十二岁

正月，上御太和殿，群臣行礼，不作乐，不宣表，停宗亲宴。各国公使至总署贺年，轮臣皆与言，此年例也。自今年起，始貂裘挂珠。上元后始有书房，首陈圣德宜以敬畏为务，他语尚多。察典下，照旧供职。上御紫光阁，召见各国公使，皆鞠躬致辞，庆亲王传谕答之，次日赐宴于总理衙门。二月，退值于趯台阶上倾跌，臂微伤。趯台即瀛台也。其阶五十三级，每日必陟此也。广东监生赴滥录科者百弊丛集，为言官所纠。余谓中皿当复三十六名之中额，而广东录科定取七百名则弊可稍祛矣。斌孙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出使日本大臣黎莼斋言：“日本兵政修，商务兴，而深忌他国之垂涎，东海宜与连衡。”策骑至翠微山看杏花，才一宿耳。御史高燮曾请日讲，有旨驳斥。三月，寓之东院筑室十楹。以吉林将办铁路，命户部提款一百二十万，各省八十万。阅考试汉荫生及翰林院孔目卷。奉旨：“户部堂官偕贵恒、许应骙查各仓工程。”仓场严议均落职，因议办法条奏之。二十五【日】，天色黄，已而赤，灯无光，大风随起，可怕也。伯述长子邦直自津来依余。四月，颐和园工程将次告竣，皇太后于是月二十八日驻跸三日，百官花衣递如意。抖晾乾清宫旧藏实录，凡四日，共二千七百六十九函，玉牒一百包，辰入申出。得睹乾隆中《南巡图》十二卷画院徐扬绘，五十一年。以《执中成宪》进讲。五月初七日，奉谕保护教堂，严拿匪犯正法。江阴、阳湖皆焚教堂，盖深虑沿江哥老会之起也。永春侄孙押运来，其弟炯孙随之南归应试。户部筹饷五条，内一条以八旗米折改放实米，旗兵不愿也。宝

抵蝗虫萌生。二十九日。雷震闪，雨雹如核桃。六月，东院危斋忽圮，前一日犹携两稚子徘徊于斯也。皇太后万寿，停止听戏。^①七月，以广东录科冒滥，故考政加严。自五月起，每考到录科，余必到，场规一如学政。严出广东结官之例，余两次被住彝伦堂后屋，被遣者纷纷来诉，峻拒之。骤惊，车几覆，微伤。八月，奉先祠神龛于新堂，设羊、豕恭祭。赐○○○世祖章皇帝《劝善要言》一册。查估○○○雍和宫工程，翻盖客座，揭瓦始知一栋已折。九月初八，斌又举一女。考南学肄业生。得江南题名，知姪孙中八十二名，顺孙中一百十名，为之欣慰。姪孙试毕即来京，前数日到矣，今既中式，则须南归填亲供十月望去。阅顺天乡试复试卷。礼部议复翁同爵捐置义庄，改题为奏，奉旨赏给御书匾额。十月，与孙莱山倡和诗十余首。李若农之侄饴选为余画大像。闻噶台亲王伯彥诺谟【枯】卒于关外途次，此书房二十年来旧交也。其人质直坦白。汗症屡发，甚至舌尖麻木。热河匪徒肆扰，拨部库五万济之。以康熙分府及新刊十三册各省地图进讲，凡沿海要隘皆手画以进。十一月，命奕劻带同文馆洋人教习二人，在书斋讲解洋文。命臣龢及孙家鼐在西苑门内骑马。热河报擒斩伪王季妖师、伪侯韩惠等五名，路始通。偕孙燮臣诣蔚秀园醇贤亲王周年行礼。右臂麻木，百方治之，无甚效。自是遂不能榜书。十二月，拔南学期满肄业生，既引传，何联恩请引见，此数十年未有之事也。既用知县，何用州判。适叶侄孙女病卒，盖久病矣。拨内务银二十万，原请三十万，上饬稽核耗费，故减去十万。然自是内府诸君侧目，谓余实发其复不知讲帷所陈，从不及时事也。皇太后赐“益寿”两大字，余照年例。是年，上政事益繁，功课益少，唯于各省舆地，孜孜讲求，而洋文乃懿旨命习，未敢少懈也。

^① 慈禧太后生日为十月初十，光绪皇帝生日是六月廿八，此云“皇太后万寿”，当作“皇上万寿”。

十八年壬辰(1892) 六十三岁

正月，元日雪，朝贺时，六花盈袖。端木子畴撰，子畴，孝子也，尝辑《通鉴》中人君宜法者数百条，手书成册，余奏进之。与廷臣宴。二月，恭代撰拟醇贤亲王墓碑。顺孙、炯孙以会试同来。阎丹初相国卒于虞乡。阅直省举人补复试卷。三月，上躬耕籍田，臣随行播种。派充会试正总裁官，祁世长、霍穆欢、李端棻为副。十三日上堂阅卷，二十三日撤查。撤查者，各回住屋阅二三场卷也。房考同，实进五千九百九十六卷。霍慎斋同年下血剧病，竭力调护始起，出闸一月即故。勘经策常至夜分。灯下看朱字变碧，俄而变墨，自知精力衰矣。四月初六日进呈前十本。十二日放榜，得刘可毅等三百十人。派阅散馆卷，乌达峰尚书拉喜崇阿以外班而亦与，向来所无也。遵旨诏醇贤亲王园寓，恭送发引。归途看大觉寺永乐年华严钟，钟高三丈，中外皆刻经。派殿试读卷官，一甲刘福姚、吴大鉴、陈伯陶，传胪恽毓嘉。是年殿试改于二十五日，以醇贤亲王安葬典礼也。五月，皇太后赐御画山水纨扇一柄。阅新贡士朝考卷。秀庄侄孙随叶茂如来京。顺孙南归。奎孙举一子名之崇。六月，畿辅义仓，徐荫轩相国所创也，近拉余劝捐，至是又添祁子禾尚书，遂联衔奏事。连雨无屋不漏。上祈晴即晴，有《喜晴诗》。有飞蝗成阵，却食谷叶，不甚为害。南电知予二姊于十九日卒于常熟。至是而同气尽矣，伤痛成疾。闰六月，仙蝶集藤花架下，饮以火酒，一拂而起。永定河决此三工，永清、东安、武清当其厄，死者数万。始坐肩舆。山东黄河、奉天辽河皆溢。派充会典馆正总裁。是月雨多。右腕忽肿成块。七月，斌孙办圆通观赈，专办固安二十八村。拨十万赈云南。炯孙归，就姻曾氏。上偶作诗论，余皆未暇，唯圣训则进讲无虚日。镇江告灾，请截漕五万。山东河决，请截漕新漕。八月，祁子禾病歿。春闱同事竟失二人，祁尤为朝廷惜。右耳肿痛累月。给事中洪良品奏：“朝审内那永氏一案，疑窦甚多。”派臣与怀塔布复讯，妥拟研讯两月，至十月底始奏结：“那永氏照刑部原拟，无谋杀夫事。葆环定绞

监候情实。”九月，表侄许联桂号丹庭从江西来，年十八矣，怆念许氏之衰。自此起，夜卧如水，往往寒噤，饮食极少，倦不可支。派武殿试读卷。十月，上亲阅武进士弓箭技勇，定甲乙。次日御殿，传胪皆有旨催促，极忙迫也。皇太后万寿节，特传于丰泽园听戏七日，赐观龙灯。以王夫之《读通鉴论》进呈。派充查仓大臣，此差无事，几成具文。十一月，是月书房移回毓庆宫之东室，始传辰正到书房，已初一刻退。圣体虚弱，太医每进寒剂，臣辄论之，至是，用培本暖中之品。懿旨命御前、枢廷及臣等同看复奏。金以为宜。南中书来。奏卿侄定议以顺孙为嗣。十二月，上于西苑颐年殿面赐臣工“福寿”，如咸丰以前乾清宫故事。皇太后南向坐，上南向立，挥翰如飞。特传书房三人在内务府大臣之前。派总办万寿庆典王大臣，臣与孙家鼐、松淮与焉。筱山侄调补岳常澧道。皇太后赐御书“长寿”字一轴，又加赏袍褂两副，貂皮八只。懿旨颁赐各省银，每省二万两，顺、直则每年二万，以为常。派查京尹孙楫于属员升调有无徇私，旋与徐相国查明复奏。○○旨毋庸议。

十九年癸巳(1893) 六十四岁

正月，每年二日诣国子监。朝服升堂释菜，登降拜起，尚能如仪。集公所会商庆典事宜。与廷臣宴。徐相国约余同至畿辅义仓。拨银十万赈山西饥。二月，发汗症。得电知吾邑西乡七十图去年旱荒。庆典处会衔奏皇太后徽号。是月于上前颇有论说，意在调和宫廷，以圣孝为本。买日本铜十万担。上耕籍臣播种。奏拨义仓谷二万石，派修撰黄恩永等四人赈张家口外饥民。庆典处奏事奉懿旨：“辇路两旁，铺户稍加修葺。经坛点缀，撙节办理。”三月，截湖广漕米六万，变价并运脚银解征山西赈饥。命恭代撰《御制万寿寺碑文》，朱笔改数字。寄银二百两为吾邑西乡助赈之款。斌又举一女。正阳门上江西边鵠吻吐气如虹，记同治壬申春大内宫殿皆有，梯视云是蚁蝶也。四月，勘《会典》稿本，日不暇给。奉敕书《万寿寺碑》，

臣病臂不能书，乃以李文田代，而仍书臣名。秀庄侄孙以县丞分发浙江。皇太后赏纱葛等件。五月，皇太后赐御画扇、折扇各一。永春侄孙押运来印若携其弟玉行来见。派修西直门至颐和园石路工程，与福公锯偕。俞甥调卿之子冠群号敬丞，来应京兆试，下榻余斋。以修工事，中官有荐木厂者，叱退之。吉卿侄署衢州府。六月，书斋功课不时，即到亦不过三刻。以恭办庆典，准王公、内外大小文武官员报效银两。查勘石路，定“选旧换新”办法。复校两淮新修《盐法志》，逐卷加签，半年始毕，驳回订正。大雨□日，墙颓屋坏，天安门内波声汹汹，圣意殷殷，为沿河万姓虑。有旨饬查顺、直州县被灾，并京城倒塌房屋、被伤人口。上屡次祈晴。斌为瘦狗所噬。芦沟桥南堤开口，十二日通州北、东两门外村庄全行漂没。拨义仓谷百石交西城、银五千往通州办急赈。与徐荫轩、李兰苏联名募捐急赈，余首捐三百，前后共集得□□万□千。永定东五号、七号皆决四十丈，被淹处较庚寅年尤甚。与徐荫轩联衔请发通仓米二万，又定分三路发赈：通州交编修陈竹香，芦沟交御史徐叔鸿、翰林樊稼轩、部曹濮紫泉，中路交安平公所，皆同人所集之款也。飞函各处，皆谈赈事，京城齐化门外女化为男，阜成门外龙见。七月，月初尚连雨。所急者，皆赈务也。续拔义仓米三千石发南红门赈。国子监录科加严，每考必亲莅，而广东卷三次皆封固，俟大收毕乃发榜，共取七百七十八名，全行录适矣。八月，得养正阁精刊本。因极陈声之色戒，命充顺天乡试正考官。以孙毓汶、陈学棻、裕德为副考官，房官谢隽杭因病，奏准出闱。以十七房分阅。十三日上堂阅卷，二十三日撤堂。宗室取中五名。看朱字成墨，眼益花矣。九月初六日进呈前十卷，初九日定草榜。十二日发榜。得士马镇桐等□百□十人。是科闱中倡和最乐，孙莱山平生故人，内监试李莼客，庚辰门人也。御史联隙惇奏本科顺天乡试幸中者多，派麟书、徐桐查办。旋奏蔡学渊、黄树声、万航均革，周学熙、汤宝森、陈光銮传齐复试。拨米三万石，银二千交顺天府添赈。查收圆明园八旗营房工程，并勘颐和园牌楼后

续添之新石路一百十余丈。腿疾时作。十月，皇太后万寿节。赏听戏七日。王大臣共三十人。旨着户部每年添拨内务府经费五十万，嗣后不得向户部拨借。特旨传翁某、孙某俱由内左门出入，恐乾清门阶级高，冰雪滑也。以五十金为河西务赈捐。十一月，庆典报效除扣俸外，户部交□□两，国子监四百两。景秋坪师之内侄德藩为其家料理帐目，称亏银万两，与兰荪、锡之、芝庵平其事。湖南善化翁氏由余姚迁居，有莆田旧谱，覃溪先生题之。今其系奉来索题。因检余姚家谱，与吾铁庵公所辑者世次不合。余姚脱何公，则公两代，故学涵称四十世，其实四十二世也。龢则四十一世。以抄本《天禄琳琅书目》进呈。腿疾屡作，并觉虚羸，往往夜卧寒呕。议定分段点景，城内二十六段，十三人分办，尽公摊之一百二十万；城外三十三段，内务府五人分办，尽内外大臣报效银约八九十万，城内近禁门一段亦归内务府办。嗣掣签每人两段。又修理道旁房屋一段。许星叔尚书病卒，故人之最契者也。亦余壬戌分房得士。十二月，上於颐年殿面赏“福”字。办京察，户部劾二员，国子监照旧。内务府既奉旨添拨经费，至是又以御茶膳房每月一万由部代垫，又护军钱粮每年三四万竟无着也。余以为此两事皆不可缓。议准暂挪。派充国史馆副总裁。汗症大发一次，另奖南学生五百二十两，此皆余所留照费，每年皆然。内务府又请借户部银六十万，交议，议上借□十万。谕依议，而以内府大臣不能撙节，交部议处。于是怨者专集余身矣。家乡天官坊老宅之西曰“老堂”者，山愚府君所葺。额久失而屋尚在，粤寇后竟成瓦砾场矣。余拟重建作翁氏家塾，令侄孙熙孙督工成屋十间，颇坚固，而家塾经费无着，不知何日能副此愿也。皇太后赐御书“松鹤”二大字轴及“福寿”字。是年，书房功课益减。上刻意节俭，于内府尤多裁抑。

二十年甲午（1894） 六十五岁
 （正月至十月已佚）

【十一月】懿旨授恭亲王军机大臣。并谕撤满、汉书房，臣力争不可。越日，召臣赐对，谕：“满功课、洋文均撤，汉书不传则不撤。”臣叩头称：“圣明洞鉴。”又有“汝信实可靠”之谕。复州失守。上面谕：“书房照旧。”懿旨准派员在沪会议。会译署，照会美使田贝。汝城县失守。皇太后见起，面奏辽沈告急情形，拿解旅顺失事诸将。发汗症，肝气、横脉见劲象。牛庄失守，宋庆退田庄台。今年恭逢皇太后万寿，冬至次日在皇极殿行朝贺礼。上御太和殿受贺。派充方略馆总裁。阴晦时多，气象凄懔。凡电旨皆孙、徐两公动笔。

十二月，上于养性殿面赐“福”字。刘坤一到京，授钦差大臣，节制关内外各军。旨停年例及明春一切筵宴。拿问卫汝贵。御史安维峻妄言时政，革职发军台。张荫桓奉○○○密旨出使日本。小山侄授江西臬使。盖平失守，倭兵浮海窥威海卫。召见养性殿，催刘坤一启行，吴大澂出关。翌日召对，置卫汝贵于法。赏“松寿”二大字一轴，吉语四方。王文韶到京。山东荣城县失守，威海益危矣。饬海军舰出口迎击，毋徒坐守。王文韶充北洋帮办、北洋事务大臣。除夕，王大臣于皇太后前行辞年礼。

自念以菲才而当枢要，外患日迫，内政未修，每中夜彷徨，憾不自毙。讲帷职事，仅有数刻。最难处者，于枢臣见起之先，往往使中官笼烛宣召，及见则闲话数语而出。由是同官侧目，臣亦无路可以释疑。尝叩头奏：“昔闻和珅曾如此，皇上岂欲置臣死地耶？”终不能回，亦奇事也。

二十一年乙未（1895） 六十六岁

正月，慈宁宫、太和殿行朝贺礼。元日，上手授八宝荷包、御书“礽”字。奉先殿站班，于舆中再授荷包，此枢廷例赏也，偶记于此。次日，坤宁宫吃肉，与蒙古王公偕，亦枢臣旧例。威海南三炮台失守，海舰依刘公岛，犹报击沉倭船两只，旋报北三台亦失矣，既而刘公岛亦失，海舰全没。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彼国不与商，谓非十

足全权不可。皇太后召见，谕撤使归国，惟美使田贝居间转圜，仍令总署致信于彼，留作退步。翌日召见，语略如昨。懿旨派李鸿章赴日本，即令来京请训，并开复一切处分。各国护使馆兵入京城约二百余。李鸿章到京，与枢臣同入见。鸿章奏：“割地诚不敢，譬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余于上前争之，既退至传心殿集议，李欲拉余同使，盖休我以难事也，余笑领之。译署敕书稿。宋庆收复大平山。李相奉使，议论喧然。

二月，李相面奏，略及割地，余不谓然。慈圣起居违和，李鸿章来京未召见，割地之议，大拂慈怀。宋庆败于大平山，敌扑牛庄，魏邦焘、李兴锐两军皆败，牛庄失。南电知吉卿侄初十卒于里门，惟一孙在侧，可伤。上左胁下患疖甚剧，余与孙公皆进膏药方，太医皆不用。宋庆于田庄台获胜，既而大败，田庄失守。吴大澂退至石山，撤吴大澂帮办，来京听部议，旋革留。令将军永德驻喜峰口，将军丰绅驻八里桥。福建澎湖倭竟登岸，旋失守，李鸿章奉使至倭，与彼使会晤，中途被倭人手枪中左颊，其子李经方来电如此。

三月，余力筹台湾饷五十万，由南洋往。旋台湾告警，李相电停战，节目止奉、直、东三处，台不在内。派署吏部尚书。时议欲弃台，余力争不可，遂大抵牾。恭邸在，告以兵事就商，邸亦无可否。阅直省举人补复试卷。李相电：“二十三日画押，限二十日在烟台换约。”俄请暂缓批准和约，两同官均有成见，欲草草定议，余与兰荪相对流涕。上不允割台，词气严正。言路均谓和议不可行，而弹余徇庇吴大澂。嗟乎！吴大澂之进退，岂小臣所敢与议哉。持诸折就商恭邸，邸谓：“廷议徒扰邦交，宜联而已。”病脾泄服药，不敢请假。

四月，庆邸偕枢臣请见皇太后，内侍传躬感冒，不能见，一切请皇帝旨办理。翌日，传懿旨：“和战两有弊，不能断。”令枢臣妥商以闻。仍至恭邸处集议，孙公草宣示议和诏。使俄大臣许景澄电：“俄云相助。”亦无的实语。恭邸力疾销假。北洋报初四、五日天津大风雨，海啸，计六十余营被淹。上意和约不得不批准矣，遂用宝，派联

芳、伍廷芳送约。俄勒日本以辽地还中国，余拟乘此缓换和约，同人不谓然，至于攘袂。法、德、美三国驻使亦以缓期，正在徘徊，已届十四日之期，上催伍廷芳等在烟台即日换约，遂于是夜子初换讫。病愈甚，不食者五日。阅贡士复试卷。朱谕一道，饬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至内阁恭阅即前日宣示诏也。和约既换，而台湾固未允割也，于是又派李经方会日本桦山商办。小山侄抵京请安，蒙召见。

五月，熙麟奏朝考不公，是非颠倒，遂改定三卷，内曹元弼一卷字迹模糊，余知为江南经生，力言之，而原阅卷三人皆察议。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台民拥立为总统，旋报基隆失守。小山侄由海舶南行，炯孙随去，计住京才二十四五耳。法挟归辽事以为有功，遂定从前分界通商之约。英使又出而阻挠之，不得，则又以英缅未定之约欲占猛乌、乌得二处土司地。汤伯述来京，数日去。

闰五月，上奉皇太后驻跸西苑。与徐筱云谈借款事，竟致忿争，余甚悔之。发电订正徐公九三扣之误。一侍郎、七御史连街劾徐君两乌分界事，旋又因借款事被劾。甘肃河州、狄道回民起事，○○命董福祥带兵往援。

六月，阅优贡朝考卷。孙毓汶请开缺，允之。徐用仪被劾，退出军机处并总理衙门。命李鸿藻、臣龢均在总理衙行走，力辞不许。江西信来，筱侄举一子。钱应溥入直军机处。炯孙携眷到京。万寿节赏戏三日。山东黄河分溜至安山，破堤入运。京城疫气流行，僵者极多，配药施济。余羸病不堪，时下白沫。每日书房、枢直、督办处、户部，已不胜烦，加以译署，真不支矣。

七月，派管理同文馆事。日本使林董定交款二万万之磅价。英使欧格讷来，要挟八事，内四川烧教堂一事最重。李鸿章自日本归，上慰问毕，谓：“二万万款从何筹给？台湾一省送与外人。”词甚峻厉，命留京入阁办事。翰林六十八人连街劾李相。阅考试御史卷。法使施阿兰要挟数事，余概斥之。

八月，国学大成门外柏树为雷所击。与赫德议交款按磅价有无

流弊。英使欧格讷以川案与两邸争论，两邸允之。刘秉璋革职，永不叙用矣。德使紳珂亦来要挟。磅价照赫德所拟较林董原议可省一百四十万，遂定，凭据四份，彼此签名。火药局之晾药房失火，未伤人。各国使臣来署，往往咆哮恣肆，非复前比矣。

九月，李相与林董在总署议归辽事，余等不在座。道员荫昌议挑旗兵赴津习洋队。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见，其言周孔之道环球无以易，惟今日养民之政衰。十一日，有星自南坠北，色青，时酉正二刻。慈驾幸西山，循登高故事。欧使告归，其与恭邸语特切至。上御文华殿，见英使欧格讷，以其陛辞归国也。此特举之加礼，前此巴兰德归时曾有之。袁世凯练洋队七千人，由部筹饷百万。归辽之约，李与林画押，而商务则由总署细核，尚未定议。绂卿大侄妇来京数年多病，是月二十八日竟不起，一切丧费余主之。十月十六日，移殡龙泉寺，斌孙宿寺中。

十月，李相与林董议商约。赏听戏一日，又三日。胡燏棻办津芦铁路。十七日，上宣谕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均革职永不叙用。余友李若农文田卒于任，不第文字交也，为之一恸。

十一月，董福祥报河州解围。凡甘肃行军进退，一切电旨皆余手稿。英、法两使以渭江分界事彼此争执不已，余告以此两国之事，与中无与。因定先立渭江约，南边再定。两邸允英使于西江口岸。自广西浔州下连广东入海，即梧江也，此处开口则广东一省穿透。议借款极纷纭，余在户部，尤吃重也。

十二月，上于颐年殿面赐“福”字。余以西江开口则野人山应全[让]我。俄君加冕，彼使请中国派王公重臣往贺。京师南城有人立强学会，令都察院封禁。考同文馆学生，三年一次，谓之大考加优保也。斌举一子。进春帖子诗，此枢臣与南斋旧例，先立春一日在懋勤殿跪进，谓之跪春。皇太后赐“荣庆”二大字，匾字四方，并“福寿”字，皆年例也。英、德两国先愿借二万万，旋因李盛铎自上海电言：“美国肯借，利息可轻。”遂复绝英、德，而美款仍游移。李相言法

国可借，因发电驻法使臣庆常，令向法政府商之。一切来往电信皆总署公电也。懿旨命李鸿章出使俄国，邵友濂为副。命张荫桓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在总署议商约。除夕恭诣养性殿行辞年礼，赏春条及荷宝，赏“龙”字。是年，书房进讲，不过一刻许，实不能有敷陈。

二十二年丙申（1896）六十七岁

正月，朝贺，○○赏赐如例。元旦日出时，有五色气在北面，礼王云：“非弭非抱，不入占。”是月十三日，内侍传懿旨：“书房撤。”驾诣颐和园，余等移寓军机公所，距园甚近。军机直房在东宫门外北朝房，旋改南朝房，稍宽。十六日，赐颐乐园听戏三日，并看灯、花炮，鱼龙曼衍，不可胜记，王大臣凡八十二人。是日月蚀。廷臣宴即于仁寿殿举行。次日赏饭于西配殿，凡二十六人。命恩佑带诸臣遍游园中胜处。李相赍国书五件，送各国瓷、铜、玉器三十四件启行。各处借款均罢议，专待法国之款，而法使施阿兰狡诈万端，要挟百出，本议无扣，至是竟称九扣，余不允，旋亦罢议。而日本交款日迫，商与展缓不能，至是乃以借债一事专卸于余身。肝气抑郁，与人言不免激昂，而高阳李公亦致憾于余矣。廷寄饬各省开矿。阅季沧苇标点《通鉴》一周，三月始毕。南漕改折，下部议，部电江浙督抚，皆谓可行，刚子良以为有害兵食，遂驳止。恭邸在园养病，有要事皆就商。

二月，谕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二十三夜亥刻，户部火，余急赴之，饬各司检印信，移文卷，断火道，保后库，而二堂、大堂皆烬矣。臣入奏奉职无状，每办诸事，无一顺人心，即无一惬己心，故遭此变。火实从颜料库司堂起，堂在户部二门内，二堂既烬，乃借湖广司司堂为公座。

三月，法使施阿兰要挟龙州铁路办法，坚持不允。额相开缺。命王文韶、张之洞办芦汉铁路事。以百金助湘省赈。甘回事未定，以董福祥为前敌总统，魏光焘为后援，以嘉峪关外事付邓增会、饶应

祺剗办。

四月，斌孙闻其母母病，仓卒南归。英使窦纳乐语言不逊，电龚照瑗告英外部。李相既行，其密电本交张樵野，而往来电信则专付余与张译递，盖谕令如是，而同人颇疑为专擅，其实余岂乐办此等事者哉。电皆余手写进呈。李相与俄密约遇事相援，密旨允行。筱侄擢江西藩司。在总署会商联俄事，二邸、诸公毕集，乃拟旨一通，并约文全篇，均电发。内监阎得兴、王□、聂得禄均于戌所拿获正法。侄孙琳孙来京，捐布经历。咏春亦由海运差来，下月去。俄开东三省铁路，并欲开中国银行。

五月，初八日醇亲王福晋薨逝，定期年服。懿旨：“皇帝万寿，照常行礼，乐设不作，停止听戏。”上于初祭后释缟素。李兰荪舌蹇，左体酸软，大类中风。

六月，重修户部衙署开工。英使窦纳乐来索前十年粤东法理冈赔款，竟斥粤督抗违。余与辩论，而张君右窦使，谓所言实是公法。余曰：“我不谙公法，只知公理。”上腹疾已半月，值醇贤亲王福晋奉移园寝，乃力疾恭送至倚虹堂。电询李相与俄商铺轨尺寸，往返数四，卒照俄轨。浙江改铸制钱，每文七分，余定稿准之，江南亦请如之，而刚君执不可。之善从里中来。永定河北中汛七号漫口，发义仓余款买饼饵救被水饥民，此次灾情不减十九年。谕臣与法使施阿兰换约，约本凡三：一，光绪十二年越南商务；一，十三年越南界务、商务；一，二十一年两广界务。此早经全权画押，今用宝后派员在换约内不列名，另有凭单画押。侄孙锦孙绣庄办浙海运来，下月去。

七月，朔日合两邸到署公定准俄办铁路。督办处令各省均一律改用快枪。电来，知儿妇张氏初五日病卒，而德孙妇于前日亦歿，家运如此，难矣。以熙孙之第二子之循为椿孙后，之廉以承重成服。道员塔克什纳赉中俄密约本由海到京。入夏屡发吐血症，老景日增，齿牙动摇，淡食饱闷。考户部愿送总督人员，取十六本。借方略馆闲屋，为退食之地。

八月，英使窦纳乐仍肆要挟，既开西山，仍索野人山，电龚使告彼外部横索无理。张之洞进《承华时略》二册。会典馆稿本不免积压，排日阅七八本。中秋日，皇太后召见玉澜堂，赏枢臣福寿锞，每人二百，赏戏两日。上侍慈圣御龙舟，臣等乘轮舟于昆明湖观灯。赏蟒袍、尺头等。以密约本用宝交俄使喀希尼赉归俄国。庆邸、张君与余皆于凭单列衔画押，翌日以约本及管钥恭缴。上吐血又发。总署考试各部院章京，张君阅满员卷，余阅汉员卷一百本。有一卷余已摈之，恭邸欲取，余争之力，遂不欢而散。鹿传霖电奏瞻对应改土归流，中旨不允，以后遂有战事，而藏中喇嘛诉冤。

九月，盛杏生观察以王、张两公荐，承办芦汉铁路来京。福箴庭相国卒，数年同官，甚契洽。兰荪疾渐平，销假。游乐氏园，入遗光寺，因至明景泰陵，坯土之外，悉为麦陇，仅有一石碑矗立，高宗诗论刻焉，感慨久之。贾人持李秀碑古拓薛稷涅槃经残刻，云是荣仲华物，各题数字还之。命询盛宣怀借洋债集股票有无把握。命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李相回京。携俄国书并宝星进呈。斌孙由南回京。李相在总署行走。张南皮相国予告，食全俸。

十月，英使于“新疆设领事”及“与法国均占”二条竟允删去，而西江通商则要索王府坚持之。陶模、董福祥、奎顺报关内外一律肃清。皇太后万寿，赏戏三日，懿旨赐枢臣坐蓬船。法使言法君欲赠宝星，遂以十事要请。《一统志》于西江上、下流未详起止，故彼族据为不止梧州，检广东所刻《内府舆图》及天津刻《沿海各口图》较详，持与窦纳乐力辩，乃语塞。是日斯使令其国保护小吕宋华民，伊直任不辞，可见小国易驯也。德国不愿黄遵宪为驻使。李鸿藻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罗丰禄出使英国，随员中有之绰名，盖杨艺芳所嘱也。余在政地而以子弟属人，可乎？告罗撤之。

十一月，四川报绥定、夔州、酉阳山颓壅江，江溢，流数千家。西江通商，开梧州、三水二口，南宁再议。东陵松虫为灾，虫黑色有毛，啮叶几尽，甚毒。德使海靖阴狡略同英、法之使，所要甚多，尤注意

于海口借埠。赐坐暖蓬冰床。拨华俄款，开银行。

十二月，颐年殿赏“福”字。国子监京察过堂，户部京察过堂皆无劾。同文馆岁考。载灝之子溥伟特赏贝勒，为载澂后。法使以英开西江，遂索开矿，索接路矿，指滇粤路通百色，与辩论至抗声拍案，不允一字。看国史馆书，日凡五六本。部中欲请办亩捐，已具稿矣。司官毛庆蕃、孙毓骏力争不可，余用其言，撤不办。皇太后赏御书“逢吉”二大字、“福寿”字、“华曜山房”四方，赏活计一匣。腰痛不可支，数日方愈。上诣醇贤亲王园寝，恭视奉安。除夕，养性殿辞岁，赏春条、荷包。是日，上侍皇太后诣西苑侍膳、听戏、看烟火。圣孝承欢，天下称颂。

综计此一年，外人要索，循环无端，每从译署归，昼不食，夜不眠，痛亦寝弥矣。

二十三年丁酉（1897） 六十八岁

正月，朝贺如礼，赏赐如常年。上御太和殿，不作乐，不宣表。退诣贤良寺先公位前行礼，此数十年元旦必至之礼，特记之。次日，坤宁宫吃肉，此为祭新月神。二月、十月则为祭大神。向例正月之祭，蒙古王公皆与，人数较多，惟枢臣在列。西江通商约，派李鸿章画押，谓之中缅附约，旋派李鸿章为换约大臣。拨盛杏生银行一百万，英既得西江约，法又来索利益，余检上年问答，以龙州铁路与西江通埠相抵，伊始无词。时事之艰，惟李相洞悉，相与咨嗟，甚至涕洟也。去年延一美国人吴德斯律师，在总署实无所用。有法国人桑尼宜以洋文信投余，请将中国银钱市面情形密告之，许赠贿六百磅，由总署发还之，奇事也。京察题本上，枢臣均蒙恩议叙。各国使臣入觐于文华殿，惟施阿兰违例由中门出，海靖责敬大臣掣伊袖，皆哓哓无理，次日设宴于总署款之。

二月，命张荫桓以头等钦差出使英国，贺其主在位六十年，颁贺物十六件，又〇〇〇东朝御笔等十件，上赐十件。山东黄河凌汛，

决口二处，在历城、章丘交界。日本交款尚短一万多，余曰：“借款乃国家事，还债乃户部事，吾与同官力任其难。至向何国称贷，则合肥相国亦不得辞其责矣。”由是始有英、德两国同借之议。崇礼、许应骙均在总理衙门行走。节过惊蛰，犹大雪数次。兰荪病甚。

三月，各国争觐见礼节，力驳之。之繕赴津到省。炳孙得子。拉借洋债者甚多，余答以在总署讲论，私宅一概不与闻。懿旨：“革贝勒载澍职，重责八十，永远圈禁。”懿旨：“发内帑银十万赈四川，五万赈湖北。”命户部筹拨银十万备川赈。法君送宝星由使臣施阿兰进，上御殿见之，有加礼，又进火枪二支，弹一箱。

四月，陶模之子某著《求己录》一书，论时务而以儒先之说为根本，通才也。赏戏两日。派阅考试试差卷，每人取八卷，不拆弥封，次日，命军机大臣复看。户部二堂落成，余等始还座。俄使吴克托穆到京，章京迎于永定门外，府尹亦亲迓，备公馆，设行厨，舆马之盛，前此未有也。单开王爵乌和他木斯科礼物多珍异。芦汉铁路借此国款，余力赞成之。俄使进见于文华殿，面递宝星。枢臣到园，蒙皇太后召见，赐食、赐御画条，又命看俄国所进声筒。俄使送王大臣礼，受之，以礼单交总署奏闻。二十七日，俄使再见于文华殿，呈进皇太后宝星、国书。上起立受，又立宣答敕，彼使亦颇恭敬如礼。宴俄使于总署，菜用西宾馆，皆洋式也。

五月，添派李鸿章办借洋款事。电谕张荫桓，到英后毋允加税免厘，盖洋税无把握也系传○○○懿旨。端午，皇太后赐团扇、折扇，皆御画，又尺头等，赏听戏两日。初七日，上诣醇贤亲王园寝，行释服礼。园寝银杏一株，金元时物，前月杪，懿旨伐去之，俾明堂开展。拨芦汉款四百万。英使窦纳乐进见文华殿，递国书、英后照像。赠吴克托穆礼物，盖施报之恒情耳。十三，斌孙扶柩南归，之润同行。张子青相国病歿。领回答俄后十件懿旨，俄君十件上旨，吴王赏八件皆○○○懿旨，两羽林军各四件。懿旨赐俄使宴于总署。派阅考御史卷。与吴王辩论，余以图们江置中国码头明告之，伊亦未拒，

但云水浅耳。与德璀琳论铁路利益。看聂士成《东游纪程》。派吕海寰为德国驻使。以五事要吴使，吴使无词。鹿传霖奏德乐格忒斯地归诚，旋恭寿、文海陆续奏，鹿办此事措置失当。

六月，日本公使雉野文雄觐见。南信顺孙又添一子，名之涛。慕卿十八起感冒，吐泻发热，初不以为意，越两日而病情大变，气仅如丝，乃断棺备衣，赖吴子备一手调治，用参附重剂，竭力挽回，竟得无恙。高阳李相国竟以前疾顿逝，亦吴子备下药也，岂非命耶。高阳与余论交三十年，意气相得，至是而平生知己尽矣。万寿节于阅是楼赏听戏两日。顺孙得电来省其父。

七月，派教习庶吉士李公缺。赐《方略》一部一函。廖寿恒在总理衙门行走。侄病屡反复，立秋始定。感热服药，服人参头眩。斌孙到江西省祖母，遂携之润赴金陵。军机值房雨漏，揭瓦之。

八月，发寒噤旧疾。命署吏部尚书。炯孙患吐血，幸即止，携其妇、子南归。皇太后召见枢臣于乐寿堂，赏银锞，每人二百两。中秋日，蒙懿旨命臣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力陈办事无一称职。赏听戏，是夜，慈驾于夜明幄次行礼，入舟看烟火，枢臣等坐翔云轮船从。阅宗室乡试复试卷。

九月，顺孙南归，之缮由南来。会典馆在禁城内，其左近失火，驰入救之。德使海靖辞行，赴南洋索胶澳泊船。懿旨派恭亲王、庆亲王会同礼部、内务府办庆贺典礼。上谕：“钦奉懿旨：‘本年万寿在颐和园排云殿受贺，宣表行礼。’躬进贺表。”瑞典挪威国使臣柏固觐见。十九日于入对时忽气逆，同官垂问，退后僵卧，粒米不能入口，次日力疾入，未请假，吴子备用参服之，仍胀。阅顺天乡试复试卷。张荫桓由外洋回京。发考试南书房卷，命看照原发次序递上。始至马家堡看新造火车，送慕卿侄南归。慕卿新愈，为之悬悬。

十月，汗症又发，发必兼泄，形为之羸。恭进庆贺贡物。即日皇太后召见，赏御笔画一轴，绣蟒一袭。自初七起推班九日。初八日皇太后御仁寿殿，赐群臣宴朝衣冠。上亲进酒，赐酒者凡十八人，臣

以枢臣得与。先期工部搭彩殿，内务府进宴图。殿内近支王公十张，彩殿内王公大臣六十四张，廷中二品大臣六十张，二宫门外三品以下官五十六张，宴桌共一百九张，技艺九项。赏听戏前后七日。初十日万寿节，上亲进贺表，率群臣行礼。十一日，近支王公宴，上躬进舞，恭亲王等皆彩衣进舞凡十对。是日，赐近臣至排云门看灯，并坐翔云船进膳，赏御书“长寿”字。李相屡借洋款不成，张君荫桓以为于国体有碍，而李相极诋前此与日本定磅价暗中吃亏，彼此交讧。十五日，山东曹州有毙德国教士之案。二十二日，李秉衡电：“德兵船直至胶澳，占山头，勒我兵速撤，我兵四十八点钟退尽。”云云。巨野已获凶盗四名。遵旨电饬李秉衡：我兵勿先开炮。饬许景澄向德外部理论。发照会于德国，责其不照会遽调兵船。警报络绎，章高元退扎四方山。上力持“不战”二字，述慈圣甚焦劳。恭邸以连日电奏、电旨抄呈慈览，下园面递，归云：“皆蒙垂纳。”自是，每有胶件皆邸下园亲进。俄使巴布罗福到署，言已派兵到胶与德国诘难。德使海靖由南洋归，恭邸首责之。然章高元被羁洋舰，德提督携炮入胶州矣。

十一月，初四，奉旨派臣与张荫桓前赴德馆解说。即日往，告以先撤兵，再商办。自此起，凡与德使问答，均次日即抄呈。余作一奏欲递，而恭邸尼之。斌孙携之润到京。海靖到署，二邸及诸公皆集，听言益横，必要重办东抚，并添出曹州七州县、巨野教案，恭邸仅令办照会来再议而已。初十日，与张君再诣德馆，持六条驳诘之，以为必大闹，而竟得十之七八，余即假其铅笔详注于下，并允胶澳兵悉数入船，不登岸。次日到署，与两邸定照会海靖稿，即昨所语也。庆邸于第六条“不得赔偿”句下添“当另案办理”五字。又发照会诘责海靖。具稿后，李相笔削数字，张君不悦，力阻勿发。上谓前日所递问答，慈圣有“办得甚好”之谕。十四日，三赴德馆，问以照会须复，答大致相同，并允将船退出胶口。十五日，李相与巴使谈，竟请俄代索胶澳。德使久不照会，遂又变卦矣。英使窦纳乐来署，探问胶事。炯

孙到京。日使谓以胶暂租与德。俄得李电，以三舰赴旅顺矣。二十二日，四诣德馆，催其照复。伊云：“胶退兵，办不到。”因告以胶开通商口岸，可免各国饶舌，彼云恐俄不愿，余与力争，张竟无言。宋报俄船到旅。北洋报英船入旅湾。与刚公论事不合，刚欲赴各省查办中饱，余谓宜责成各省督抚也。言路纷纷，但云宜备战，不言开战。三十日，五诣德馆，称教案可了，惟请准德商由胶至济南铁路。余不允，即乘此催胶口退兵。彼云：澳内仍归中国。惟须准让租界中盖船厂、煤厂、炮台耳。余定以胶口开各国口岸，海亦无词，云下月初六日互换照会。

十二月，颐年殿面赏“福”字如例。俄船已到旅顺，不闻与德为难，转与德兵官通往来。余疑俄将此占旅顺，与李相商办法，而李相自任俄意无他，此船必退。初五日，海使送照会稿到署，合署公商，皆云初意办不到此。余以铁路一条多流弊，恭邸云且允之，须中德合办耳。即日六诣德馆，以驳改两条示之。伊强辩，因以守口之利，只许占一岸；次日照会竟欲全踞胶澳，另一件言曹州府复有驱逐教民事，并指言提督万本华所指使，此案不办，兵不撤；又次日则大肆狂悖，将下旗归国云云。时两邸均在署，遂撤万镇任，候查办矣。愤懑之极，精神不支。俄巴使到署，谓先以松花江章程立刻商定，语亦极横。诘以何日退船，则云：“德若踞胶，我即常泊旅顺。”盖速鸡之势已成，此次李相之电，引狼入室。初九日，德又请照会，早晨请旨，上趣令前往，于是又偕张君往，已第七次矣。海忽软语指地图，则仍是前说，余力持南岸归中，北岸归德，总之，陈家岛断不能让，坚持至两小时之久，余拂衣起。十一日，又往德馆，海以所奉本国训条告我，且云：“若不允，即当战”。并问陈家岛何如？余答以任何恐吓，此岛断不让。海遂起立，口中喃喃，竟由后户出。时张君尚欲留，余曰：“决裂即决裂耳，吾不能忍。”翌日入奏之，上意欲许。退至总署，二邸、群公毕集。海靖因我不允，遂面与二邸议，邸竟许陈家岛让彼，张君一力赞成，余发愤于座上痛斥之，然驷不及舌，已成铁案。

归而肝痛欲死，时则丁酉十二月十二日也。礼邸请假，云病甚剧，精神恍惚，寒噤连发。海于照会内又添铁路由济南至山东界，余又持不可。英使窦见余，提保汇丰借款四厘息，不折扣，五十年还清。胶案结，皇太后召见于乐寿宫。恭邸首陈办理胶事，臣等无状。臣又申言之，叩头不已。慈谕深悉此事之难。赐御书“康乐”二大字，布藻垂文四斗方。时事日难，上诘责诸臣以变法为急。臣对：“宜从内政根本起。”退拟裁绿营、撤局员、荐人才之旨。循例辞年。

自三月迄年底，借洋债，如德贞托曾侯李相画押，又毕德格与红牌议，又李沧桥揽怡和行，又汇丰借四厘半息，盛杏生荐美商五厘息九五扣，又荐英商呼利李相具奏，俄使又出揽，最后英使担保，皆旋议旋散，盖电驻使，均答云不可靠也。是年胶州事起，而余如在汤火中矣，噫！

二十四年（1898） 戊戌六十九岁。

正月，庆贺一切如常礼。是年正旦日蚀八分三十四秒，上御乾清宫，不御殿，群臣蟒袍补褂行礼。初亏有云，俄顷浓阴翳之。俄阻英借款，英又诘俄何以干预，两国相持，无从排解，乃议各借五千万。旨特开经济特科。海靖到署，指摘数端，余力驳之，彼虽怒，似少戢也。是日二邸、相国皆未至，余首座，乃得伸其说。所以汲汲借债者，因倭归本之期已近也，乃思釜底法，与彼商展期半年。海靖照会：谓余种种与之为难，俟李相再商云云。李秉衡吏议处分，恭邸与余请姑缓发，上意不然，遂予降二级调用。上屡趣臣赴德馆再议，臣以海靖桀骜，徒受其侮，往晤无益。部议准黄思永请办昭信股票，每股百两周息五厘，二十年本利并完，意在开中国民债之渐，免借洋债也。英款停议，而转索我利益。海靖照会指称：“翁大人前语失欢，须允沂路及与德先商两条，若不允，即用兵挟办。”于是李相、张君延伊来署，竟允沂路矣。英、俄两国借款均罢，赫德乃出议借汇丰款，而欲指定某处厘务归赫管理。二十日廷臣宴。准容闳办津镇铁

路，容久住美国者也。上索黄遵宪《日本国志》，臣对未称旨，颇诘难。又准外人舆马入禁门，臣谓不可。集议德事，恭邸意在悉允，急须撤兵了事。各国使臣入觐于文华殿贺年，次日宴于总署，悉用洋式。与户部同官商酌，指定厘金五百万始抵每年之息，又议股票票式。恭邸首先报效昭信股三万，旨令其仍领股票，无须报效。各国皆言山东铁路不可与德先商。谕旨切责疆臣于裁兵、节饷空言搪塞。

二月，添袁世凯三千、董福祥五营神机营选锋，各直省办团，询各省勇营实数。定内仓间屋为昭信股局。定汇丰洋行借款，与赫德立合同一十万，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钱指盐厘江苏二、浙东一，归总税务司代征，赫德偕汇丰商人熙尔、德华商人□□到署立合同，用总署印共四份，司员舒文、那桐签名画押。命刑部尚书廖寿恒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俄使来，专言旅大租地及造支路达黄海两事，云：“五日须复。”余直责以坐视不救，彼遁词支吾。发国电致俄君，派许景澄为头等钦差，驻俄专使。十四日，派李鸿章、翁同龢充与德国画押大臣，此事两邸主之，诸公成之，臣衷殊疚，而恭邸力请派臣。谕甥钟銮会试来京。法使吕班又以四端来要挟。许景澄见俄君，论旅大事不能挽回，余因屡发电令许力持。山西抚胡许意国借款，在晋开铁路。月杪恭邸因病请假。

三月，上以旅大开口事屡召李鸿章、张荫桓入见，即派李、张二人画押。余等删其约章数句，并坚持金州一城不入租界。次日又议，忽又于铁路条中变为沿海至营口，余持图大声斥之，伊认笔误，而李相遽许之。刚公有封事，懿旨褒之，大致并各局，办保甲，重积谷也。发吐红症。余建议大开各口，先许各国屯船处所，然后定一大和会之约，务使不占中国尺土，不侵中国利权，共保东方大局，诸公各不谓然。御史文悌愿持书赴俄辩论，不得则以身殉。派署吏部尚书。孙公入闱。俄兵于旅顺开炮登岸，宋庆退营口。斌孙擢翰林院侍讲。英使来索威海租地，谓俄得旅大，英必与抗衡。开吴淞埠为

各国通商口岸。准粤汉铁路借美款办。俄使巴百罗福持国电觐见于文华殿，登纳陛亲递于案。上宣谕用汉语，不用庆王传宣，发下答敕系重定红格正书，此从来所未有也。德使亨利云是德君之弟到京，纷纷议进见礼节。上意欲在毓庆宫，准其乘轿入东华门，臣以为不可，上发怒诘责。十六日，在园值中夜寒甚，气丹田上冲，吐泻并作，危甚。德使进见，礼节系张荫桓所定。皇太后召见，详论之。法使吕班要四条，李相面允之。阅直省举人补复试卷。至碧云寺一行，以验足力。总署始制头等宝星。遵旨诸恭亲王府问好，王疾委顿，流涕不已。阅宗室贡士复试卷。二十三日，总署代递康有为折并书，命将康有为折并书及前两次条陈皆呈○○○慈览。

闰三月，麟芝庵书疾卒，十年来好友，时时过从者也。日本使臣于李相寓面索福建沿海不让他国，允之。初三，在园值，寒战又发，中夜呕泄几殆，次日舆疾入城，未请假，群医杂治。吴子备在京，开麻黄鳖甲，云：少阳下陷。上垂问谆至，并传懿旨，命自卫身体，叩头衔感。安徽藩司于荫棠奏劾翁某、张荫桓误国无状，臣于递上时引咎不置辩也。此折留中。派福州将军兼船政大臣，时船厂重整，未派专员。御史潘庆澜劾康有为保国会之妄。阅新贡士复试卷。之善自津来。德王到京，于进见礼节妄肆求请。御史、翰林数十人连衔言，德兵于即墨毁圣庙像，电询东抚张汝梅，复奏尚无此事，再电驳令详勘。皇太后、皇上诣火器营教饬，阅神机营火器、健锐两营，武胜新队员。湖北沙市洋房为湖南人所烧，日本派兵船来。前此饬张之洞速来京，以沙市教案起，又令折回本任。二十三日，德王西利前作亨利到京，庆邸、李相、张、敬、崇三公迎于马埠，送之入德使馆绿轿黄绊，从者多轿。越两日，亨利觐见皇太后于乐寿堂，次见上于玉澜堂，致颂词，进礼物。上坐，命亨利坐于右偏高机，海靖以下皆入殿立，诸臣、侍卫皆立殿内外，一刻许，于南配殿赐之食。上步行至南配殿慰劳之。面予宝星。庆邸、张君陪游龙王寺，余先退。庆邸设宴于承泽园款待，余亦在座，用洋菜、洋乐。下第举人有保川、保浙

等会，严禁之。法使毕盛递国书，入觐文华殿。特命上纳陛，致颂词，翻译亦同。上亲宣答词，如见俄使例。上亦佩宝星，无异数也。亨利在京城，至天坛瞻仰，又乘马进雍和宫，又游行市肆，出京游居庸关，到处皆具供张，地方官迎接。

四月，亨利称彼君有黑鹰宝星进呈。初五日，上于西苑勤政殿见之，致国电、宝星，上起立，握手赐坐。伊言胶澳练兵，谕以兵船两国并泊。退，命游北海，庆邸、李、张二公陪之乘舟，余径归。致德君国电，答以一等第一宝星。次日，亨利始出京。严饬东抚查即墨圣庙事，张汝梅复奏，并无毁像，取教官切结。拟国电致各约：“广开口岸，振兴商，不得图占土地。”户部昭信股票，京中集得七十四万零，各省七百余万。初七日，上索康有为所进书，再呈一份，命臣传知。臣对：“康某，臣不敢与往来。”上问：“何也？”对：“此人居心叵测，故不敢。”次日，复申前旨，臣对如前，上怒，颇另谯责。传旨张荫桓，越日，荫桓以康书原稿送枢直代递，不知书中何所言也。王鹏运劾余与张荫桓朋谋纳贿。十一日恭亲王薨，懿旨传枢臣赴恭王府听起，两宫震悼，褒恤之例视怡贤亲王故事。荣禄授大学士，管户部。刚毅授协办大学士，调兵部。上传懿旨：“以前日杨深秀，徐致靖言国是未定，此言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臣对：“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退拟旨一道。上欲于宫内见外国使臣，臣对：“乾靖宫非便殿可比，不可。”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有隙，欲臣力保之，臣据理直陈，不敢阿附，退后颓然。二十五日，徐致靖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上欲即日召，臣对宜稍缓。传旨：“以后在宫中见洋人。”传旨：“问张荫桓，宝星数件，如何佩带？”张因附奏请给伊宝星。谕李鸿章、张荫桓：均赏一等第三宝星。二十六日，赏饭于南配殿。二十七日，先谕翁某毋庸上，臣在直房检点官事五匣交苏拉，恭候诸公起下，恭读朱谕：“翁某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姑念在毓庆宫行走有年，著即开缺回籍。”臣感激涕零，次日，具谢折于大宫门外碰头，又次日，颁端节赏葛纱等件。

到寓，臣不敢领，内监传云：“请旨仍赏。”余乃托同官代奏陈谢，未具折也。余既去国之次日，康有为始被召对，命在总署上行走。

五月，料理笔墨，凡求题、求书者一概扫尽。同官颇有来送者，荣仲华馈赆，受之。贾人持汉碑来，价昂不能得。闻胡孚宸劾余与张荫桓得贿二百六十万。十三日，北向叩头，门生等五十人送余登火车，半日而至塘沽，客有来见者并馈赆者，概却之。

附：翁同龢在甲午战争时奏折两件

(一)

臣翁同龢等跪奏，为遵旨会同详议，恭摺覆陈，仰祈圣鉴事。

本月十三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思广益。’着派翁同龢、李鸿藻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钦此。”当于十四日，臣翁同龢、臣李鸿藻同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倭人以重兵驻韩，日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事，此乃一定办法。迭奉谕旨，令李鸿章派兵进发，妥筹布置。兹据电称：历来中国进兵朝鲜，皆由平壤北路进发。现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六千余人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人进义州，均由海道前往；并咨商盛京将军派左宝贵马步八营进平壤，又调提督叶志超一军移札平壤；旅顺等处海口亦已整饬等语，所筹尚属周密。应请谕令李鸿章即饬派出各军迅速前进，勿稍延缓。既经厚集兵力，声势较壮。中国本为保护朝鲜之权，此次派兵前往，先以护商为名，不明言与倭失和，稍留余地以观动静。现在倭兵在韩，颇肆猖獗，而英使在京，仍进和商之说。我既预备战事，如倭人果有悔祸之意，情愿就商，但使无碍大局，仍可予以转圜，此亦不战而屈人之术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兵，必须谋出万全，况与洋人决战，尤多牵制。刻下各国皆愿调停，而英人尤为着力。盖英最忌俄，恐中倭

开衅，俄将从中取利也。我若遽行拒绝，恐英将暗助倭人，资以船械，势焰益张。且兵端一启，久暂难定，中国沿海地势辽阔，乘虚肆扰，防不胜防。又虑者也。然果事已无可收束，则亦利钝有所不计。现察倭人之意，以整理朝鲜内治，保其土地为主，只以中国允其商议不甚切实，但催令先行撤兵，是以未能就范。此时既派大兵前往，与之相持，亦可不必催令撤兵。彼如仍请派员与议，则倭人所请各条如有不妥，我可议驳，如果有裨政务，亦可由我饬行，既可保护利权亦不失上国体制，届时再当请旨遵行。倘仍要求必不可行之事，或竟先逞凶锋，则大张挞伐，声罪致讨，师直为壮，各国当亦晓然共喻矣。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会同覆奏，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谨奏。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六日

(二)

奏为微臣奉职无状，上累圣明，亟请罢斥，以明黜陟事。

窃臣入直毓庆宫，侍皇上读书已二十年，皇上待臣之恩，信臣之笃，非诸臣可比。去年六月，命臣至军机处会看摺件。十月以后，又命臣为军机大臣。时值倭奴逞志，愈胜愈骄。臣于敌势军情懵焉不识，遂致全权之使再出，而和议于是遂成，割地偿款为从古所未有。既不能力争于未画约之前，又不能挽回于未批准之际，依违淟涊，偃卧汎澜，此等情形，直同已死。今御押已签，条约已定，皇上当下哀痛之诏，作舍旧之谋，奋发有为，以雪斯耻。臣之衰残庸懦，自揣万不足以赞庙谟，若再久点朝班，是谓进退失据。缘此沥陈吁请，将臣一切职事悉行革退，俾归田里，以尽余年，则皇上再造之恩隆天厚地，臣当衔结永不忘矣。谨缮陈奏，仍席藁待罪，不胜感激恳款之至。

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文资料选译

夏 春 涛

编者按:在太平天国时期,许多在华的西方人士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对这场运动进行了报道。这些作者虽难免有其偏见和局限,但作为旁观者或第三者,他们的文字较少忌讳,其报道就太平天国史事记录了大量细节,提出了许多疑问或自己的见解,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弥补了中文资料的不足。显然,进一步挖掘和利用西文资料是推动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途径之一。这里选译的几篇西文资料均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绝大多数系首次以译文的形式公布,译文的标题、说明和注释均由译者所加。

(一) 罗孝全 1847 年对洪秀全的印象

说明:这是罗孝全(I. J. ROBERTS)在洪秀全来广州数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原载 1847 年 7 月 29 日的《浸会旗帜与西方先驱者》,对研究洪秀全的思想脉络有重要价值。学术界仅有数名学者引用过这一文献,兹据王庆成先生提供的英文件译出全文。

致《浸会旗帜与西方先驱者》

中国广州，1847年3月27日

亲爱的巴克(W.BUCK)兄弟：

自本月17日写信给你以后，我的传教工作得到了额外的意想不到的鼓励！三四天以前，有两位问道者从二三十哩外的乡村来到我处，唯一的目的是接受福音教导！他们都写了一篇材料，陈述他们的心灵体验，这导致他们来此受教。他们所写的材料简炼明了，叙事清楚，令人满意，读后使我确信主已乐于感化他们的心，驱使他们抛弃偶像，来寻求救世主！我不打算现在就把他们的陈述翻译出来，但在他们成为教会成员以后，我会这么做的。其中一位的陈述与罗马百夫长科尔乃略(CORNELIUS THE CENTURION,一译哥尼流)^① 的陈述极为相像；如果是在使徒时代，我就会用《圣经》语言坦白地说，他见到了天使的景象，天使向他指点迷津，教他一些他以前并不知道的东西，其中有些他似已部分领悟，另一些他承认还不知道其意义。但他所说的这些内容都是《圣经》中所记载的。他已学到的一件事是，偶像崇拜是错的，所以他不久就废弃了他的偶像，并教别人也这么做！这件事发生在几年以前。此前不久，他偶然得到了一本我们的基督教书籍，惊奇地发现该书所教导的正是他在异象中已学到的东西。他便仔细地阅读它，并被书中的真理所感化。他听说“粤东施蘸圣公”(WELTING BAPTIST CHAPEL)^② 在宣传福音；在与一位同姓朋友（或许是亲戚，他已劝导此人废弃了偶像崇拜）商议后，他们一致同意到教堂来，以便更完善地学习主的真道。现在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学习，我几乎相信，是主送他们来这里的，果若如此，不用多久他们就会被

^① 据《新约·使徒行传》第10章记载，科尔乃略平素虔敬上帝，某日曾在异象中见一天使降临，叫他派人到约帕去请彼得，后蒙彼得施洗。

^② 罗孝全在广州东石角的教堂名称。

吸收进教会。随后，福音将会传播到他们的家乡，据他们说，那里有不少人已废弃了偶像。他们都 是极富才华的年轻人，年纪较长的约三十四五岁。他们每人都已教过几年书，似乎擅于写作。这两个人是我今年遇到的第一批问道者，在迄今我所听说过的所有中国人的经历中，他们所自述的那些经历是最令人满意的。我相信，这也许是圣灵感化这个蒙昧民族的开端。愿主使这里的教堂每天都能增加这样的人，他们将被拯救并以主的名义永享天国的荣耀。

您最真挚的朋友

罗孝全

(二) 麦都思对太平军一逃兵的采访

说明：这是英国伦敦布道会麦都思(W. H. MEdhurst)牧师对太平军一逃兵的采访报道，有助于了解太平天国定都之初的历史。原刊 1853 年 11 月 26 日的《北华捷报》。

致《北华捷报》编辑

先生：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广州人，他曾一度是太平王的追随者，于今年 8 月离开南京。他的叙述也许可被认为是可信的，因为其要点与我们所了解的那里的事态是吻合的；他的叙述也是重要的，因为它披露了一些过去并不为我们所知的事实。我认为这个人并没有欺骗我的任何动机，他说话时态度坦率，使人相信他是诚实的。无论是真是假，我尽可能地将他的原话转述给贵刊，贵刊可根据其价值自行处理。

当我问到叛军的宗教时，他以虔敬的神情回答说，他们敬拜上帝。当问到他们何时拜上帝时，他说天天如此，在每次就餐之前。我便让他念一段他们的礼拜用语，于是他唱起了太平王《天条书》中

的荣耀颂(Doxology)。^①他的语调和神情表明他对此十分熟悉。当他谈到他们每天的就餐情形时,我询问他们的食物是否充足,他回答说很充足。至于他们的衣服是否够穿这一问题,他说他们有大量衣物。我接着问他,参加叛军已有多久?他说,他从广州(Canton)起就追随了叛军,他的头发已有三四寸长。我又问,既然你不愁吃穿,并受到良好的教育,死后还可以升天,为何竟离开他们呢?他回答说,哦,那里禁止人们抽大黄烟,更谈不上吸鸦片了;还禁止赌博、饮酒、纵欲、争吵、偷盗;就连骂人也会受到一顿鞭打。我提醒他,若强调这些作为离开他们的理由,人们会误以为你对所有这些劣行有所嗜好,从而就会讥笑你,谴责你。听到这番话后,他显得极为羞愧,似乎恨不能收回他已说过的话。我又问他是否领到军饷,他说,一文钱也领不到,军队每个月末都不发饷。我还问他是否获许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作了否定回答,并说南京的妇女都被集中在该城的一个特定区域,那里满街都是妇女,但禁止任何男人接近,违者处死。

再次交谈时,我问他是否确有太平王这么一个人,或者是否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他已死去,在轿子里到处招摇过市的仅是他的偶像。他说,他毫不怀疑太平王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外出时总是坐在轿子里,但由于被绸子层层遮掩着,因此,一般人并不能看到他。然而,最高级官员每晚都能见到他,他们每晚都去商议朝政和领旨。我又问,你是否曾听说过太平王升天一事?他回答说,当然啦,人们都这么说,他的追随者对此深信不疑。当回到士兵们不领军饷这一话题时,我问他,你们当中是否有人拥有私人财产?他回答说谁都没有私产,任何人一被发现有五元以上的钱,立刻就会被鞭打,因为他没有事先舍弃这些钱;一旦得到钱,将随即悉数

^① 基督教仪式中对圣父、圣子、圣灵的一小段颂赞文。天主教称之为“圣三光荣颂”。在诵念每段“诗篇”和颂赞诗之末,皆诵唱之。

交归总金库，凡私藏金钱者便被怀疑有叛变的企图。那么，总金库里是不是有许多钱？哈！多极了，一堆堆的数不清的银子，这都是留作用来从事伟大事业的。我问道，既然任何人都不得私自拥有金钱，那么，当他们想买些美食时将怎么办呢？他说，没有买食物的必要，因为军需官为每营兄弟买来所需的一切，当饭菜端上桌时，他们各自分到相同的一份，职衔最高的长官的盘中饭菜与最卑微士兵的并无两样。我又问，为什么要实行男女隔离？这种隔离始于何时？他说，自广西开始的所有进军途中，妇女一直与男子并肩作战，而且表现得和男子一样勇敢；但到达南京后，妇女就被隔离开了，因为已不再有让她们参战的必要了。于是她们被分开，从事各种事务，而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学习！每 25 个妇女为一组，由一名女教师统领。至于男人，他们被告知，他们目前的任务就是打仗和工作，一旦征服了整个帝国，他们就可以与妻子团聚。我不禁问道，当战争结束后，每个人如何在这么多的女人中找到他自己的妻子呢？他回答说，每个男女都正式登记过，因此，将每个男人的合法配偶交给本人不会有丝毫困难。我又问他，太平王的追随者中是否有秘密社会成员，诸如天地会、三合会、小刀会等？他直接了当地回答说，没有，因为太平王已将他们处死了。你怎么知道太平王如此对待秘密社会的人？他说，今年五月，太平王杀死了 300 名秘密社会成员（这说明了在戴作士博士从镇江带回的修订版太平王著作中，何以竟删去了所有提到天地会的文字。可能太平王认为他们难以驾驭，因为他们的结合与太平王的宗教观点毫无关系，所以，等到他自认为已足够强大时，就将他们清除了）。说到学习，我问他们学些什么书；他回答说，仅是太平王出版的书，所有其它书籍都已烧了。我又问他，孔夫子的书是否也同样被烧？他说，由于自己不是一个读书人，他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我接着问他是否曾上过学，那时念些什么书。他说，他仅在小的时候上过一年左右的学，因塾师重重地鞭打他，他便逃学了。那一年你念了些什书呢？他说，《大学》和

《中庸》。你是否在南京见过这些书？他说见过，但已被改订过。允许读历史方面的书吗？他不知道。佛教经籍呢？哦，凡属佛教、道教的东西都已无一例外地被毁：寺庙和神像被捣成碎片。他推测这些教徒的书籍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至于和尚、道士，他们不敢露面，已与赌徒、吸鸦片者和嫖客一道，望风而逃。没有必要再谈论这些人了，因为他们已被完全消灭了。我又问他们是否守安息日。他回答说，这已固定化，除非迫不得已，安息日这一天不做任何工作；他们全都集中在大厅里做公共礼拜，跪地祷告，由首领向他们作劝诫。当问到劝诫者是谁时，他列举了一些人，内有一位在南京的赖姓。他对洗礼和圣餐一无所知。我又问他是否常听人提到耶稣。他说，他常听到耶稣的名字，但讲不出所听到的具体内容。我接着问他，你现已确定的看法是什么（他曾在太平王和清军中各呆了几个月）？老实说，你现在倾向于哪一边？他四处打量了一下，问附近是否有人，我们是否会控告他？我们向他表示没有危险。于是，他用力喊道：我拥护太平王。我便旧话重提：那么，你为什么要离开他呢？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兄弟在官军中，我想见他，为此我开了小差；我兄弟为我剃了头，谎报我是皇帝的一名贫苦的臣民，被骗参加过叛军。然后我就被编入官军，我不敢回去，否则会掉脑袋。

以上的陈述所展示的叛军景象多么令人惊奇！这场革命多么合乎道德！它引导十万之众的中国佬成年累月地戒烟，戒鸦片，戒色，戒贪欲；舍弃合法报酬，同意过没有钱的生活（在中国佬心目中，钱比生命本身还重要），所有人共享一切，一体平均；甘冒万死之劫，毫不畏缩地坚持下去。他们的教义或许有缺陷，或许有大小程度不等的错误，但如果上述一切属实（或有一半属实），那么，这肯定是一场合乎道德的革命，是我们时代的奇迹。

麦都思谨上

(三) 密迪乐谈太平天国的宗教

说明：密迪乐(T. T. Meadows)是一位对太平天国抱有好感的英国驻华外交官，曾数番与太平天国接触。所著《中国人及其叛乱》(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1856年初版于伦敦，195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诚如日本学者小岛晋治所言，该书“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观察入微，颇具初期社会学家的规模”(《太平天国学刊》第五辑)。本篇摘自该书第19章，原标题为“太平基督教及其前景”。

我们几乎总以研读太平天国自身出版物的方式来判断他们的宗教和道德信条。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是小册子一般大小；内有一二种简短的正式文件是写给在南京访问的西方人的。

他们的出版物可以划分为三类：

I · 由洪秀全本人撰写，或在一些最早和最虔诚的拜上帝者的协助下撰写的出版物。这一类书籍中有一二部无疑是在运动富有政治色彩之前问世的，而且，所有这些书籍，包括最新出版的在内，极少甚至全然没有谈到太平天国的政治目标。它们可被称作洪秀全的宣传或布道出版物；如果我们除去间接提到他在24岁时所产生的异象（这一异象后来构成了他布道的权威）的书籍，那么，它们并不含有任何新的启示。它们系根据洪秀全所领会的较早的《新旧约全书》新教译本撰成。太平天国现今正在南京不加更改的印刷的《圣经》译本也属于他们出版物中的这一类。

I · 详述托称来自上帝或基督的新启示和记载他们所谓下凡活动的出版物。所有这些书籍必定源自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内有几部是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刊行的。这一类书籍旨在通过影响人们的宗教感情来深化太平天国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出自东王

或他的幕僚笔下的写给访问南京的外国人的一些文书也属于这一类。

Ⅲ·有关军队和官制等纯粹政治性的出版物。

……仔细揣摩前两类书籍的内容，有充分的理由得出下述结论，即天王洪秀全已逐渐退出对太平天国世俗事务的领导。当我们首访南京时，发觉他已完全退出了。这一定是由于他对因东王和西王（尤其是前者）令人迷狂的启示所导致的转折性事件的不满所引起的。从拜上帝者武装暴动的那天（约1850年末）起，东王就在他们的军事事务中起着重要作用；约在1852年中期或末期，洪秀全似乎已完全将这些事务委托给东王领导，使自己从此专门致力于宣传他的宗教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从第二类出版物中觉察到，东王的权力一直处于逐渐上升的态势。在1854年夏天西方人最近一次访问南京的时候，所有源自东王的著述，仍以极大的敬意提到洪秀全。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东王仅是在避免使自己变得有名无实。因为首先可以断言，他无疑是实际上的统治者，所以，他可能会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即和较早的拜上帝者中最真挚的那部分人——他们在目前的权力状况下依旧给予他援助——一道为有名有实而抗衡；其次，“上帝次子”的废黜不会不危及到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整个运动的精神基石。

我常常在思考下面这些问题：“叛军的宗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否是基督教徒？”我发现，如若即刻作出正确的判断，首先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你所指的是哪一种基督教徒？是指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徒，还是指路德宗的基督教徒，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加尔文派的基督教徒，美国美以美会的基督教徒，阿比西尼亚教会的基督徒，科普特教会的基督徒，希腊正教会的基督教徒？”

在一个一段时期内仅以一种态度看待基督教的国家里，无疑最终会出现一些迥然不同的教派，这是已被基督教教会史所证明了的一个事实，甚或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基督

教在问世后的 1800 年中,显然每每因不同国家沿袭至今的不同的传统信仰体系而产生极大的变易;因此,我们应当推知,基督教今后仍将会继续被接受它的国家的旧有信仰所变更。即使是信仰极少而又模糊的未开化的种族,他们在接受传播给他们的所有基督教用语的同时,也会掺入与传道者的命意略异的用语。一个国家中的一些成年改教者(像中国人那样),因在一种奇异的传统信仰中沉溺得既深又久,将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大变更引起他们兴趣的基督教,这并非仅仅有可能——合乎常理地说,这是一种必然。

正如我称之为第一类的出版物所显示的那样,洪秀全的基督教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拜上帝者,是独自揣摩多少有些欠缺的《圣经》译本的产物。这些人直到成年时仍专心于研读中国经典,或多或少地坚信那些传统观点正确地阐明了天地万物的起源和本质,构成唯一正确的心理学和道德律的基础。

当洪秀全开始研读那些数年前粗略翻阅过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时,他已经 30 岁了。从童年时代起,他一直是一名接受正统儒教熏陶的士子。当他接受基督教时,他也全然如此。但几乎可以肯定,无论是他还是冯云山,假定他们已意识到必须与儒教断绝关系,他们都不会在道德和理智方面完全接受基督教,因为非理性和不道德的因素,儒教的一些较为重要的信条,迄今仍构成了他们最深层次的精神生活。洪秀全是个有着强烈宗教感情的人,无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人类对敬神的渴望和对永世长存的思慕。韩山文先生的书,以及太平天国出版物中自称出自天王本人笔下的那些书籍,无疑都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一原因,对于信仰虔诚的绝世天才朱子(Choo Tsze)发轫于这个国家的对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上帝和天所作的无神论的阐释,他自然不会抱有什么同情;因此,他必然会倾向于接受正统范围内的经书所作的极端自然神论的阐释。“帝”和“天”是他从儒教借用到基督教中的关键字。他一直将这些名词所寓指的上帝敬奉为世界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他还从梁发的布道

小册中获知，在西方外国人最为尊崇的古典著作中，上帝并非像中国经书那样仅被偶而提及，而是它们的主题，是具有鲜明人格属性的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统治者。当他自己拥有这些书后，他发现，上帝确以独一的全能统治者的名义被连篇累牍地提到，同时，他因具有更为伟大的人格而有着另一个名字——“天父”；不要忘记，“天父”一词的后一个字在中国人的心中唤起了奇特的崇敬之情。因此，正如他显然已做的那样，在把《圣经》视作真理的最高标准时，他并没有驱使自己摒弃中国经书，而是根据外国经书所诠释的上述词汇的属性和行为，径自认为中国经书中提到“上帝”和“天”的段落正是指 God。此外，中国经书中以箴言和实例所传授的道德，与前者并无任何冲突之处，相反，两者是彼此互相印证的。

对我们目前的意图来说，太平天国出版物中最重要的一部书是《太平诏书》。首先，因为太平天国公开宣布它是洪秀全本人的著作；其次，因为它是洪秀全为辨明他现今所宣扬的体系而写给他同胞中的读书人的，他在辩护时多次征引中国经史文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从而向我们确凿表明了究竟是何种因素导致他自行皈依基督教（除因为精神错乱使得他自信“他的灵魂”确曾升天这一因素外）。我愿借此机会强调，这本书完全证明有些人所谓太平天国方面缺乏文学才华的说法是错误的。它表明他们的领袖本人对他国家的无数文学作品（包括大部分哲学著作）是相当精通的。他的文笔简洁明快，感情真挚，渴望他的读者能够心悦诚服，而不是以激发读者对他本人的赞赏为主旨，这必定只有真正有才华的作者才能做得到。……洪秀全的诏书不是为没有文化或文化水准较低的人撰写的，但却尽可能地写得通俗易懂。

该书的首句证明了我刚才所说的观点。发表在上海的译文^①

^① 所有太平天国出版物均出自麦都思博士翻译，仍以单篇形式发表在《北华捷报》上。——原注

如下：

“道之大原出于天，
谨将天道觉群贤。
天道祸淫惟福善。”

第一行是句引文，构成这部诗体诏书第一节的主题文句，……系源自董仲舒。……正如我已指出的，“道”有时与我们“Virtue(德行)”的含义相同。但是，在这一历代传诵的句子中，它向中国人表达的是“真理”的意思，与“天命”和“天道”的意思相仿。通过沿用中国哲学中这一句和其它几句类似的定型文句，太平基督教的缔造者强烈地敦劝同胞中的读书人。……

前文概述了新的中国基督教与传统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因之所产生的变化。下面，我着手解释它的教义。在此过程中，我将进一步列举一些实例来说明这种关系和变化。

洪秀全无疑想象天父上帝有时以人的形像存在，具有人的属性。也就是说，他把上帝想象得和人一般。他的“异象”并不能就此对我们作出解释，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异象只不过是他醒着的时候严肃思考的主观产物。我已在本书第 82 页指出，有可能洪秀全拘泥字义理解《创世记》的第一和第三章，从而产生了上述观点。我知道，不仅罗马人在他们的教会中将上帝描述成令人尊敬的长者，惯常想象他有着人的形像，而且，英国两个国家教会的许多成员实际上也将上帝拟人化，尽管理论上仍然宣称上帝是个灵。这主要是“(上帝)按他自己的形像造人”这句话引起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洪秀全拟人化的想像。他的新信仰反对多神崇拜，其程度并不亚于反对偶像崇拜的程度；由于是以独一无二的上帝单独与愚昧者宗教中的众多偶像相对抗，因此，他便以上帝像人一样的鲜明人格与读书人否定人格的基本原理中的信仰相对抗。在指出洪秀全的观点中这一拟人论的倾向后，我需要以稍多的笔墨谈谈他的上帝观念，因为他的观念在所有其它方面与基督教新教世界的观点

是一致的。他像正统圣公会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接受《创世记》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在他看来，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创世者，无所不在的人类监护者。

洪秀全阐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证明人类确实存在着手足之情。他们的肉身来自生身父母，但由于“万姓同出一姓，一姓同出一祖”，所以，就他们肉身的本性而论，他们都是兄弟。受《创世记》第二章的启发，他宣称他们的灵魂——即现今所有世人的灵魂——皆禀“上帝之气”以生以出。为证实这一人类同源的教义，他引用了被中国哲学奉为基本原理的格言：“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他还从问世于孔子之前的经书中征引了两句话，大意是说世人是由上天所蒸所降。最后，极为重要的是，他引用了具有心理学意义的《中庸》一书的首句，即孔子所云：“天命之谓性。”

在这里，我们断言这个新基督教所指的人的“灵魂”在含义上等同于正统儒教的“精神”，即人的“本性”。因此，我们可以领会到，在根本没有意识到必须详论这一问题的情形下，洪秀全很自然地宣称每个人的灵魂都直接源自上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在另处以格言的形式明确阐明了这一教义：“正乃人生本性。”

正统儒教因为声称根本不存在来世，所以对人的不朽灵魂一说不置一词。愚昧阶层的佛教和道教迷信提出了“魂”字；但是，从语源学的角度而言，它是由两个字组成，即“云”和“鬼”，后一个字令人生厌，作为人的不朽部分的一种称谓，它尤其应由具有教子意味的字构成。于是，洪秀全采用了一个新字，由去掉“魂”字中的“鬼”字、代之以“人”字构成。因此，在太平天国书籍中，“魂”字由一个新的组合字替代，该字由“云”和“人”组成；可以这么说，就“人”字本身而言，这个新构字事实上并无任何不适当之处。读者应当明白，在提出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正本性这一教义时，洪秀全并没有首先将中国经典与西方经典对立起来，然后决定赞成前者；实际上，在研读后者的过程中，他并未发现任何责难他从前

者接受的教义之处。就我们所能觉察到的而言，洪秀全每当推勘出《四书》、《五经》与《新旧约全书》之间的冲突之处，他或者重新作出解释，以使前者迎合于后者；或者宣称前者一直是错误的。他似乎已断然奉《圣经》为真理的最高准绳，并已接受了他从中所探知的任何新内容。正因为如此，他将世界上主要的（假若不是所有的）魔鬼称作时常行骗的“蛇魔”；这一教义纯粹来自《圣经》，因为在中国文学中，无论是儒家还是迷信，蛇的形象都不具有任何象征恶魔的独特含义，相反，它偶尔还象征着善神。洪秀全认为“蛇魔”就是民间迷信中的地狱之王“阎罗王”；太平天国的所有成员都将阎罗王视为恶魔之首，对它以及作为其妖徒鬼卒的其它邪神切齿痛恨，这是他们的基督教中的一大显著特征。对读书人来说，偶像仅是这些恶魔的看得见的化身；但对愚昧的人而言，偶像正是恶魔本身。太平天国的士兵们在谈起他们“斩杀”昔日所崇拜的这些偶像时总是欣喜若狂，我（当然，我仅把这些偶像看作被嘲笑的对象）起初对此感到不可理解。然而，我很快就领悟到，这是一种心理反应的结果。从童年时代起，他们就一直将偶象看作是令人恐惧的厄运和灾难的遣降者，习惯于谦卑地向其邀宠，他们目前的憎恨和狂喜是对往昔的谦卑和恐惧的一种补偿。他们所怀的感情之强烈，以及《太平诏书》中长段郑重抨击所流露出的这种情绪，帮助我理解了关于初期回教徒的一些记载。的确，每一个抛弃偶像崇拜拥戴一神教的宗教团体都持这种态度。

关于那些其神像被供奉在寺庙里的中国历史上的善人，洪秀全仅是非难崇拜那些人的象征物的荒谬做法，因为他们“早已经升天了”。由于他在异象中看到了天上的圣人，因此，他在著述中总是假定他们在天上；他在某处提到了周朝的开创者周文王和孔子的名字，说他们的灵魂在上帝的面前，因为他们是正人；随即又说他

“自己的灵魂曾经升天”，他“所说的话是真的”。^① 他认为，中国历史证明，中国早在远古时期就普遍地敬拜上帝，直到秦始皇^②出现后；洪秀全强烈谴责了秦始皇的迷信倾向，其程度并不亚于所有的中国士子对其焚书和暴政的憎恨程度。从那时起，偶像崇拜和迷信呈蔓延之势；佛教正式从印度传入；宋朝（在第二个文学时代的开端之前）皇帝终于虔敬地建立起上帝的神像，并在上帝的名字前面加上了形容词“玉”字。因此，这就会感到奇怪，洪秀全何以会说从那时起的最近六七百年间，人们已几乎不识和不畏上帝。在洪秀全的言辞中，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反对宋朝哲学家的一句话，他甚至没有如此提到过他们。尽管他们对中国经典作了无神论或泛神论的解释，但他们至少不是偶像崇拜者；偶像崇拜才是最重要的，正是偶像崇拜激起了洪秀全的轻蔑和憎恨。

在一两个地方，他使用了至今仍用来指古人的“圣”这一名词。但即刻就可以看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这么做仅是为了从属于语言学的需要（因为它们并没有任何别的复合名称），他并不认为它们具有任何直觉意识的属性，并不将它们归因于与宇宙秩序的自然一致；近来他用“圣”字指有人格的、活生生的上帝的意志。

也许，正是从耶稣的本性中，我们可以发现太平基督教与英国两个教会之间的最大区别。《太平诏书》宣称皇上帝是天，谴责了世间之主僭用“帝”这一称号（现今的中国皇帝正是这样做的）的做法，认为他们只能被称作“王”。接着，该书为着力强调这一禁律说道：

“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已耳。天上地下人间有谁大过耶稣者乎？耶稣尚不得称帝，他是何人，敢腼称帝者

^① 参见《太平诏书·原道救世歌》，原文为“周文孔丘身能正，陟降灵魂在帝。……予魂曾获升天堂，所言确据无荒唐”。

^② 原文作“秦皇帝”（Che hwang emperor）。

乎?”

这仅是证实他们并不认为耶稣与天父平等的许多例证之一。太平天国出版物中从未断言圣子与圣父同样永恒，这一事实及下述情形使我们提出如下结论，即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被生育出的凡人。

在孔子的本体论中，“生”这个字被用来指人类和万物在永恒原理作用下的“诞生”；习用语正是用此字来指婴儿因其父而问世。它在《新约全书》的译本中用来指耶稣的降生，系据“begotten”^①这个字转译而来；我们已经看到，它也被洪秀全用来指世人的灵魂在上帝作用下的降生。因此，耶稣和世人一样是孕育而生的，即由上帝所生。这和《希伯来书》第一章——该章称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是“今日”所生——使得太平天国立刻将耶稣看作是一个被生出的人，是同为上帝之子的所有人的长兄。依据上述观念推衍，太平天国每每称上帝为天父；另称耶稣是上帝的长子，是天兄。在所有其他的上帝子女中，洪秀全地位最尊，他曾经应召魂升天堂，面对面地看见过天父。因此，他仅次于长兄，是天父的次子：正因为他已被授权统治世界，所以，为了声音和谐起见，他通常被称作天王，有时被称作真主。读者现在将会觉察到，由于太平天国独特的想象，“上帝次子”的称谓在名义和性质上绝对没有我们乍听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震惊的渎神的僭越。下面一段文字引自洪秀全 1851 年末在永安以天王名义颁发的一道诏旨，有助于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②

这道诏旨接着将东王、西王等称号封给这五位要人，他们从此便不再被称作“爷”。直到约公元 900 年，“爷”这个字仅被用来指父

① “begotten”是“beget”的过去分词，意即（以父亲的身份）给予生命；生（子）。

② 此段文字引自洪氏永安封五王诏，略谓惟有天父才是上、才是帝、才是爷，惟有天父天兄才是圣，他人俱不得僭称。为节省篇幅，兹从略。

亲。后来它开始被用来作为一种尊敬的称号，现已广泛地为所有的中国人（不包括太平天国）所使用，其意略似于德语中的先生、阁下等。因此，对洪秀全的成年信徒来说，他这方面的清教徒教义相当令人困窘。但是，这正从侧面证明了洪秀全的一神教的严格性。所有其它的字，诸如神、帝、上和圣，长期被皇帝们用来称呼他们自己。在太平天国中，限定前三个字仅用来称天父，最后一个字称天父和天兄。因此，耶稣可被称作“圣”，但不是“上帝”或“上”。由于这一表示性质的“圣”字，尤其是此处所限定的“圣”字，他在中国的读书人眼里便具有至善和对受其支配的一切事务的真理的直觉；但是，上述诏旨中的措辞使人们有理由怀疑耶稣被视为无所不能或无所不在。在这道诏旨和所有的太平天国出版物中，天兄耶稣名字的排列均低于天父的名字一格——这是一种附属的表示，中国语言无论用什么词汇都不能较之将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

太平天国的道德法规和沿用至今的极为简单的宗教仪式见于他们的《天条书》。天条即十款天条，该书因此而得名。天条与《圣经》译本中的圣诫并不相同。那些认同圣诫的天条已经作了文字压缩，大概是为了较易于记忆。例如，第二圣诫原有长段文字，摩西——他刚刚率领以色列人逃出埃及，那里几乎敬拜一切“天上、地下和水中的生物”——从中感到不得不明确禁止这类敬拜；但在并无此必要，那里仅有塑像作为敬拜的对象。因此，第二天条为“不好拜邪神”，接着是一段注释：

“皇上帝曰：‘除我外，不可有别神也。’故皇上帝以外皆是邪神迷惑害累世人者，断不可拜。凡拜一切邪神者是犯天条。”

从中我们看出，第一天条的内容被用来解释第二天条。第一天条为“崇拜皇上帝”。总的来说，天条完全充分体现了圣诫的“本旨”；至于两者确有区别的地方，天条仅是被修改得更有广泛性，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被改成“不好讲谎话”。第四天条是个例外，其文如下：“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该天条及其注释仅昭示这

一天的礼拜较他日隆重，只字未提当日不可做任何工作。就他们目前的处境而言，军事工作必须日复一日地进行。

《天条书》描述了正式接受新信仰的方式。它说，天下凡间无人不犯天条，因从前不知道后果，这种举动尚可原谅；但“自今以后，凡晓得在皇上帝面前悔罪，不拜邪神、不行邪事、不犯天条者，准上天堂享福，千年万万载风流快活威风无了期”；那些不这么做的人将被罚落地狱，永远承受痛苦。那些悔罪的人必须“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口祷，或用疏奏”，然后“或用面盆水周身洗净，在江河浸洗更妙”。也就是说，他们是自行施洗。从那以后，他们“朝晚要拜皇上帝。求皇上帝看顾，赐圣神风化心。食饭要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如是则成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灵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天下凡间，无论中国番国、男人妇人，总要如是方升得天堂”。

紧接着太平基督教的创建者们的话之后，是该宗教的一些要点。

与仅允许皇帝拜上帝这一中国现存的敬神规定相反，《天条书》强调任何人都有拜上帝的平等权利；我们从中看不到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斡旋者的教士的征兆。该书规定了感恩和祈祷的几种仪式，供饭前、朝晚和家庭中通常的悲欢场合（诸如丧事、生日、婚娶等）使用。其中一些仪式还以牲醴茶饭作为供奉物（并非牺牲）。礼拜仪式伴有音乐，《天条书》援引《易经》附带证明了这一习俗的正当性，表明它在古代拜上帝仪式中就已使用了。该书没有提到圣餐的庆祝仪式。内有一种仪式由下面这些诗句构成，供礼拜日时复诵：

“赞美上帝为天圣父，
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

赞美圣神风为圣灵，
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

人知悔改，魂得升天。”^①

第一行诗朦胧和部分地谈到了三位一体的教义——之所以说它朦胧和不完全，是因为如此神秘的一种概念绝非寥寥数字就能够讲清楚；最末一行诗看上去似乎谈到了救赎的教义。我之所以说“看上去似乎”，是因为我在上文确凿证明他们持人性原本纯正的教义，这种教义与“原罪”的教义是直接冲突的；我在上文还翻译了《天条书》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勾勒了真正的改教者从皈依上帝到升入天堂的过程，但丝毫没有提到在圣灵的作用下救赎本罪的绝对必要性。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读者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太平天国对耶稣的本性持不和谐的观点；令人更加难以理会的现象仍将会出现。然而，尽管存在着上述现象，即使是处心积虑贬抑新教的天主教，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对上述两种教义略知一二。尤其就救赎的教义而论，他们的许多著述——如本书第 269 页公布的一封信——证明他们习惯性地有着这样一种意识，即他们若希望获得永福，将不得不感谢耶稣基督的劳作和所承受的苦楚。由于可供判断的资料为数极少（这一现象归因于太平天国出版物中，直接论述实际条规的内容，多于论述抽象宗教学的内容），因此，目前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徒劳无益的。

本书第 8 章已经描述了拜上帝者中的狂热因素的起源，以及这种因素何以能够自然而然地为人们所接受并赢得权威，从而导致其始作俑者成为太平天国的实际统治者。通过他们的出版物——那些我划为第二类的出版物——我们获悉，东王杨秀清有时

^① 此即上帝教礼拜仪式中的赞美经。详参《天条书》，本篇从略。

进入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于睡眠的状态,但他正是在那种状态下发布命令和劝诫;传唤其他领导人到他面前来,吩咐将被他宣布为叛徒的人带到他的跟前,通过再三审讯,使他们自行供认确实有罪并道出真相,下令将他们立刻斩首。在此过程中,他是以天父的名义说话的;他的歇斯底里状或昏睡状,便是所谓的天父下凡。一旦昏睡状态——这种状态看来的确先是一阵激动,随后便是十分地疲惫——过后,东王便托称全然不知刚才所发生的事,仅从由他身边的人所作的记录中,知道他亲口所说的话:总之,他的灵魂在这段时间内已不起作用,正是天父占据了他的身体,并藉此传达自己的旨意。天父不时以这种方式发布命令,天父的某个消息或命令将被禀报给东王;一旦昏睡状态结束——这被称作“天父回天”——天父的旨意便一五一十地转禀给他。当他接受这些旨意后,便按其各自性质的需要,表现出惊讶、高兴、对被揭露出的冒犯者的愤慨等神态:天父的这些旨意始终是由他自己再传达给他本人。

西王萧朝贵以同样的方式说出命令和劝诫,作为天兄所说的话。但是,太平天国书籍仅记载了三次这样的活动,其中文字最长的一次见于本书第 100—101 页。^① 其它两次的性质与此类似。与天父下凡的权威相比,天兄下凡处于次要的地位,这就是后者何以会中止或极少发生的原因。

被记录下的天父首次清晰的讲话见于本书第 100 页,时间是 1851 年 4 月 19 日。天父此次下凡时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② 我相信,我们据此了解了“天王”称号的来源。

1851 年 8 月 18 日,天父以诗的形式说了一段话,第五行诗为“天父生全为尔主”。这行诗和上文所推勘的太平天国称耶稣为上帝长子的缘由,向我说明了洪秀全被称为上帝“次子”的原因。事态

^① 密迪乐前文辑录的天兄下凡活动系引自《天命诏旨书》。

^② 据《天命诏旨书》原文。下同。

无一例外地要在后期以理论的形式才得以昭示，那就是东王以天父的名义所说的一些话，这使得洪秀全同意使用那一称号。

所有这些传言的第一句话都明显地为了政治意图。通过抬高其领袖来赋予其事业以尊严；对于那些为其事业和领袖勇敢战斗的人，则许下现世的荣耀和升天后的永福的承诺。但是，1853年12月25日，即约在法国公使访问南京的10天后，在南京却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些事无疑不可能抬高领袖；很难看出公布这些事会对他们的事业有什么好处。下面便是业已出版的有关记录的一段摘要：……。^①

一个人即使长期以来一直有着与异教徒交谈宗教和虚幻世界的习惯，并对别人的奇异言论中混杂着神圣与卑鄙习以为常——即使是对这样的人而言，他仍必须做出一番努力，才能不以一种相当程度的嘲讽之情来阅读上述文字，才能使自己严肃地考虑到这一场景——既是狂热的僭越，又是极不寻常的循规蹈矩，荒谬、琐屑之中混杂着健全的心智和良好的道德——的起因和含意。因此，在继续论述之前，我必须请求读者查看一下地图，并通过沉思下述事实使自己镇定下来，即三位主要当事者中，一位是世人灵魂的造化者，第二位是实际上的总指挥，第三位是这一宗教和政治团体的最富才干的军事领导人；这个团体控制着中国心脏地带数百哩的乡村，约拥有二三十万军队，一旦有可能获胜将永远改变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命运。

这一事件似乎不容置疑地明确了两个事实。第一，天王和东王之间关于上帝下凡不存在任何冲突，因为如果确有冲突，前者绝对不会同意出版讲述自己被迫大为蒙羞的这本书。第二，东王仍未能完全掌握政治权力，故而不能随心所欲；因为尽管他希望获得的这些权力似乎一直是正当的，而且甚至是很值得称颂的，他仍然不得

① 此段为叙述《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内容的文字，兹从略。

不求助于一种权威。但如果滥用这种权威，就难免会使它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否认这种权威无疑会使他的权力丧失殆尽。

如果我们充分地想象洪秀全所处的环境，就不会像最初可能会出现的想法那样，难以理解他何以会绝对诚意地从中扮演那种角色。他精通自己国家的历史，历史上曾有政治家责难（尽管是用尊敬的言语）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的无数事例，在此情形下接受并奖赏这些合理的谴责的君主，则与被朝野视作忠臣的人一道，分享几分厚誉。如今东王的进谏之言正是如此。至于这一事项中的虚构成份，我已就洪秀全最初何以会逐渐地承认上帝之灵降附于杨秀清作了说明（本书第 103—105 页）。《新旧约全书》中有许多描写上帝对世人说话、发布命令和回答异议的段落。在这些段落中，上帝之灵不单是向个人，而是向许多人倾诉；这些人拥有上帝赐降的圣灵，他们的身体是圣灵降附的所在，他们在圣灵感召下说话。但是，读者在毫不费力地发现这些段落的同时，却难以发现明确宣布所有这一切将会中止的文字。有鉴于此，一个仅有不完善的《圣经》译本的中国人，又如何能够得出上帝将永远不再通过人的嘴与世人说话这一结论（基督教似乎至少可以说已得出了这一结论）呢？我重复一遍，如果我们将洪秀全看成是一个骗子，那么，他被记录下的言行——尤其是最新出版的那本书中的言行——就变得极难领悟。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他生性一直是个有着很深宗教感情的人，如今又是一位《圣经》权威的真挚信奉者，那么，单是大卫^①的历史几乎就可以解释他以往的一切行为，尤其是最近这些不同寻常的记录中的行为。对每一位新改教者而言，《圣经》语言有一种全新的意义（现有的事实），这些是许多普通的读者和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从不知道的，甚至是他们自己所无法想象的。就洪秀全而论，

^① 大卫(David)是古以色列统一王国的第一任国王。详参《旧约·撒母耳记》(上)、(下)。

若不是《圣经》中的这些语言对改教者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业已在南京建立起一个主权国家）在回顾一生的经历时，就会比当今其他任何君王显得更为不可思议，因为他在涉足人生时并不比其他中国少年具有任何别的优势，后者和他一样，在山上放牛。“放羊”的大卫被撒母耳按照上帝的口头命令涂抹了膏油。在避难于 Achish 城之前，大卫及其被逐的随从栖身于山地和树林里。与此极为相象，洪秀全在盘桓永安城之前，也露宿在广西的山中。他在开始政治和军事生涯时，每当类似大卫在亚杜兰洞陷入重重包围时，正是东王将他从极端的险境中解救出来；此外他还被天父下凡告诫过一次。实际上，洪秀全长期在特别适于使他希冀、祈求和信奉的环境中研习《圣经》，因而极而有可能将所得到的援助看作是上帝的抉择（他在巨大危险和重重困难中阅读《圣经》，并伴随着奇迹般的胜利和极高的荣誉）；他把自己看成大卫，认为东王是像拿单^① 那样，以上帝的名义谴责他，北王是像约押^② 那样，效命于他的事业并阻止他的意向，这难道没有可能吗？

……太平天国宗教所采纳的道德至今一直是严格的，而且并无堕落的可能：儒教和基督教联袂阻止了那种倾向。……但其关于超自然世界的观点，正在一伙狂热者的手中明显地堕落。就他们的上帝观念而言，他们似乎正越来越夸大洪秀全最初所倾向的拟人化，正将《太平诏书》中认为上帝所具有的精神上和普遍意义上的父性改变为肉体上和有限意义上的父性。他们虽尚未出版任何带有那种意思的书籍，但在与外国人的正式通信中，他们至少已表现出这种倾向，即认为上帝是一位有着人的身体、感情和嗜好的父亲；认为他穿着凡人的衣服；认为童女马利亚是他在天上的妻子；将她和中国众神中的天妈视为一体；认为她不单是耶稣的母亲，还

^① 拿单(Nathan)是大卫王朝的先知，曾就大卫设计夺取他人之妻一事设喻讽谏。

^② 约押(Joab)是大卫骁勇的元帅，大卫的姐妹洗鲁雅之子。

是其他几个儿子的母亲。同样，他们似乎倾向于从愚昧的中国人所信奉的女神中，为耶稣配一位妻子；认为他同样拥有一个儿女满堂的家庭，是上帝之孙的父亲。事实上，东王及其追随者显然是佛教或道教因素的代表，正在与儒家因素相抗衡，以维护自身在这新宗教中的地位。

东王正在利用洪秀全在 1853 年 12 月 27 日的表示（即他一定是《新约》中承诺日后临世的劝慰师），以僭用那一头衔；现在他已经正式将“圣神风、劝慰师”的称号列入他的名下。本书第 427、428 页收录的荣耀颂已被修改，删去了赞美圣灵和三位一体的两行诗，代之以依次赞美五个王的几行诗——东王作为圣神风最先提及。未以任何名号提到天王洪秀全。……这只能用如下的假定来解释——这种假定与前引洪秀全在永安所颁诏旨的语调十分一致——即他坚决而又明确地禁用任何崇拜他本人的称号。

已知的太平天国出版物中的最新一部——英国使团第二次访问南京时获得——是论述上帝本性的两小卷本的第一部分的修订再版本，原著约 10 年前由麦都思博士出版于上海；现今似乎已落到南京的洪秀全手中。修改本由八个段落组成，分别论证上帝的存在、独一无二、名号、纯灵的本性、永在、无变、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其中的每一个特征都阐述得极为详细，从而向所有能够阅读的中国人很好地表达了该书的蕴意。即便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也会认为这些观点是无可挑剔的。

我们的理解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立即看到盾牌的两面。因为当我们留意上帝在整个宇宙间的纯灵本性和看不见的无所不在时，我们不能够同时领悟关于上帝的人格和意志的观念，以及倾向于泛神论的观念。另一方面，当我们注视上帝的意志和鲜明的人格时，我们不能够同时继续持有上帝之灵渗透天地万物的观念，以及倾向于拟人论的观念。我已经指出，洪秀全之所以持拟人论，也许完全是对孔子哲学中的泛神论的一种反应；他在异象（清醒状态

下思维的反射)中看到的上帝,是以人的形式出现的。如今,在麦都思博士《天理要论》一书的再版本中,他已对原著作了增删,表明他仍然持原先的观念。他保留了原著中的这么一句话:“昔有圣人摩西适见神位”;但删去了这样两句话:“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我们既不能看到他的形像,也不能听见他的声音。”^① 同样,笼统宣称上帝无形的一些句子仍予保留,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碍于辨识能力,未能领会其含义;但诸如否认上帝具有人的形像的句子都被删除了。关于这些要点,洪秀全明显地倾向于采用《圣经》中谈到上帝的“手”、“臂”、“脚”和上帝“听说”、“看见”、“行走”、“谈话”的那些句子,这些辞句无疑在他的宗教体系的确立中起了作用。一些添加的字句,折射了太平天国憎恶邪神的特征,偶像正是这些邪神的象征。从整体来看,他们再版这一论著是一个十分令人满意的迹象,因为这证明在最近一段时期的交往中,他们仍在致力于为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观点更为接近打下基础。

……目前,知识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反对太平天国;但是,后者持续的胜利通常会对人们产生影响。如果太平天国继续取得进展,拥戴他们并接受太平学说的读书人就会不断增加;然后,太平基督教中的儒家或理性的成份,与佛教或狂热的成份将会展开角逐,我已指出,极有可能它会以前者获胜而告终。一旦这一教派最终得以确立,它将使得《圣经》成为信仰的唯一标准,将会拒绝信奉一切新的启示。……

^① 这三句分别引自《旧约·出埃及记》第3章第14节和《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8节、第5章第37节。密迪乐的记载澄清了太平天国仅对麦都思原著作了一些枝节性文字更易的说法,对研究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很有帮助。参见拙著《太平天国宗教》,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四)艾约瑟与洪仁玕对话录

说明：英国伦敦布道会艾约瑟（J. Edkins）牧师与洪仁玕的这篇对话录，原刊 1860 年 8 月 11 日的《北华捷报》，披露了太平天国后期的许多重要史实。当时，策划东进战略的洪仁玕亲临苏州，邀请传教士来访，试图以之为中介与列强交涉，争取对方在太平军攻打上海一事上严守中立。由于这一背景，洪仁玕的言语中不无曲意迎合传教士之处，这是我们应加以注意的。

1、首领的异象：何时？有几次？他是如何解释这些异象的？你的看法如何？

他的异象有两次。1837 年，他想象他的灵魂被带到了天上，并被清楚地指示了天国的事情。他说，上帝赐给他一柄剑、一块印，赋予他战胜和征服一切妖魔（邪神、偶像和鞑靼人）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上帝允诺给予他耶稣的合作和天使的帮助。1848 年，他处境极为困难。这时，上帝携同其子耶稣为他下凡显身，指点他（首领）如何稳住统治的阵脚。首领没有提到过任何别的异象。他坚信这些异象是上帝对他的启示。干王相信它们是真的，虽然就应当如何理解它们仍有疑问。

2、东王的异象：首领对它们持什么看法？你的看法如何？

首领不允许对东王的异象提出质疑。当干王表示反对时，首领便不高兴。干王不相信它们。

3、在书面和口头上，现在还称东王杨为圣神风、劝慰师吗？

是的，首领对引自《圣经》的这些名词的理解并不恰当。

4、首领自称是基督的同胞弟兄，意有何指？

他对基督的神性的看法是有缺陷的（我们没有被告知他不相信这一真理。他的错误与其说是肯定性的，不如说是否定性的）。他

认为基督是上帝的使者中最伟大的一位，他本人则仅次于基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他自信是基督胞弟和上帝之子。他称所有的十个王都是他的同胞兄弟。

5、你本人对“三位一体”持何种观点？

干王对此教义的观点和正统基督教徒普遍所持的观点是一致的。

6、以肉、茶等物作为祭品，这一做法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它们只不过是谢恩祭品，并无邀宠的意思。首领完全明白，作为礼拜上帝仪式的一部分，它们是无用的。他和干王本人都不用它们。他指定使用它们是为了适应那些刚刚脱离异教的人的粗鄙观念。

7、烧毁写就的祈祷文的确切含义是什么？这种做法还持续下去吗？

这种做法的含义和前者相同。这种做法不被赞成，最终将被废止。干王已撰制一祈祷文，以便在士兵中广为散发，其文末云：“此祈祷文每人各存一篇，念后不必烧化。”

8、多妻制？

多妻制确已推行。首领知道这是违背基督教教义的。东王是倡导多妻制的主要人物。干王本人已被迫放弃了他在此问题上的顾忌，成为一名一夫多妻的实行者。

9、现在仍实行男女隔离吗？

这仅是权宜之计，现已废止。

10、安息日：守安息日吗？怎样守？

守安息日，其方式是在午夜召集众人祷告和赞颂。一旦恢复和平，将严格地守安息日。安息日定在星期六。

11、举行圣餐礼吗？如何举行？用酒吗？

不举行，他们并不知道圣餐礼。酒在他们的任何宗教仪式中都不使用，法律严禁私人饮酒。

12、洗礼：怎样施洗？可否再次受洗？何人施洗？

洗礼仪式先是洒水，然后洗胸。现今已不严格履行，但在运动开始时是这么做的。不能重洗。任何人都可以施洗。

13、《圣经》：你们已刊行了《圣经》的哪些部分？他们如何看待《圣经》？

整部《圣经》业已刊行。它们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首领勤勉地阅读它们，并能熟记大部分经文。他也爱读牧师班扬^①先生《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一书的中译本。

14、在六个节日中，二月二十一日是纪念天兄和天王登极的节日。这指的是什么？

这是为了将救世主受难的时间同天王登极的时间一致起来。天王告诉过天王，他以前曾听韩山文先生说过，犹太人的逾越节^②发生在二十四日。天王坚持采用二十一日，因为汉字二、十、一可组合成“主”字。

15、你对用于天王的“降凡”一词作何解释？

这仅是指(首领)一出世就负有神的使命，并无其它含义。首领谈到救世主降生时也用这个词。他直到最近才了解救世主的前身或其崇高的神性。

16、你希望传教士来教导你的人民吗？你乐意由传教士提供一些基础读物吗？

我们希望传教士来，若能提供一些士兵使用的祈祷文，将不胜感谢。如果传教士来南京，将为他们建教堂，并允许他们按照他们

① 班扬(J. Bunyan)是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因拒绝信奉国教而被囚禁12年之久，《天路历程》便是他在狱中写就的作品。该书以寓言形式描写梦境见闻，宣扬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强调坚守信仰是进入天堂的窄门，故而与洪秀全的思想十分合拍。《太平天日》一书原名《天启履历》，正曲折反映了班扬对洪秀全的影响。

② 逾越节是犹太教的三大节日之一。据《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记载，耶稣与12使徒的最后晚餐即为共度逾越节，接着便发生了犹大卖主事件。

自己的方式、观点来传教和工作。

17、我们已收到你的《资政新篇》一书的手稿本，它是否得到了天王的认可？是否将刊行？

天王已亲自修订了此书，并批准将之付印。他所修改的主要是论及上帝无形的段落。凡是提到上帝无形的文字都已被天王删除了。忠王已允诺在苏州印刷此书。

18、你在《资政新篇》中的措辞今后是否会被太平朝采用？

天王不同意改变他已经习惯了的一直沿用在天朝书籍和文件中的措辞。天王用“真神”、“上帝”和“天父”来称“God”，但干王反对使用“真神”一词，以“神”不能用“真”和“假”来认定为理由。干王说，天王不愿放弃他从罗孝全先生处学来的这些名词。

19、目前太平军中的宗教状况如何？

宗教状况已大不如前。干王一到南京就觉察到这一点。即使在广西人中，宗教热情也比运动伊始时减弱了。干王已印了一篇祈祷文散发给他的属下。

20 最近是否出版了新书？

干王赠给来访的传教士下列书籍：1、《行军总要》，一部军事用书，1855年出版；2、《醒世文》，1858年出版，敦促汉族人接受太平朝的宗教和政治；3、1860年的历书，由七个王编撰，卷首有天王的两道诏旨；4、《资政新篇》，干王撰写；5、《天妈天嫂辨正》，手稿本，作者同上，是对天王“异象”部分内容的辨正。

最新书目中还列有刊行于1855—1858年间的另三本书，但我们没有得到。

21、是否有销毁孔子的书和其它书籍的法令？

没有。

22、天王是否正在写一部新的中国历史？

他正在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供王子们和宫廷中人阅读。

23、你们目前的疆域有多大？诸王现在何地？

翼王石达开已攻占四川省城成都，现驻扎在该城。此外，他正在征服广西和云南。最近有数万名广西人投奔了他。他的部队中还有四五万苗族人。

英王已赴徽州，以征服安徽省的那一地区。

忠王因取得了征服江苏省（日后将称作“苏福”省）的胜利，近来声威远播。

全国将重新划分为 21 个省，府城的“府”字将被“郡”字替代。

现计有 11 位王，包括天王和他的两个侄子（即第二、第三位）：

(1) 天王

(2) 西王的后继者萧有和

(3) 东王的后继者萧有福

(4) 干王洪仁玕

(5) 翼王石达开

(6) 英王陈玉成

(7) 忠王李秀成

(8) 赞王蒙得恩

(9) 侍王李世贤

(10) 辅王杨辅清

(11) 章王林绍章

以下是王以下的职官名称：掌率、主将、义、安、福、燕、豫、侯、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

24、其他各王——尤其是天王——是否接受你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设想？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引进欧洲的先进东西（诸如铁路、蒸汽机之类）的主张，尤其博得了天王的极大赞同。干王 1859 年到达南京后，向天王进呈了有关上述及类似内容的奏章，天王对之甚感欣悦，因此执意让他接受总理朝政的职务，这一职位过去是由东

王担任的。

25、你在赴南京的途中是否遇到了不少困难？

他说确是如此，整个旅程约历时一年。当到达江西景德镇时，未获通行。他便转奔九江，自该城溯江赴湖北，在该省与一友人盘桓了四个月。然后，他搭上一条商船，顺江前往南京。他曾登上额尔金勋爵远征队的一艘军舰，希望能见到昔日相识的威妥玛先生；未能如愿后，他委托一名中国人捎信给上海和香港的外国朋友，这些信都及时送到了。

26、天王决断所有的朝政吗？

是的，但是他轻视与宗教无关的大多数政务，说它们是“凡间的事”，不是“天事”。他对属于“凡间”一类的奏章和请折，常常仅稍加浏览就批准了，并未仔细地审阅。

27、祖先崇拜被取缔了吗？

是的，在运动的中坚人物即广西老信徒中业已取缔。对于“新兄弟”，目前并不特别强调这一禁令。

28、天王是否对上帝持唯物的观点？

是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允许有与之相左的观点。

29、在感恩祭品中，将三杯茶放在充作祭坛的桌上意味着什么？

他们代表“三位一体”中的三位。天王是这么理解的。他没有询问过此事。这些献祭品只是用来暂时取代偶像崇拜。他本人并不用它们。太平天国的书籍中有许多他还尚未读过。他并不愿意读那些书。

30、第二个公共节日（二月初二）是向天父感恩，其含义是什么？

这是纪念天王诛灭蛇魔的使命。

(五) 杨格非牧师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说明：杨格非（G. John，一译杨笃信），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1860年末曾在天京逗留月余，次年据此在广州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叛乱》（The Chinese Rebellion）的小册子。本篇节译部分以答问形式谈了对太平天国的面面观，很有参考价值。

（第一）他们政府的性质是什么？

在我看来，它是一个表面上的“神治国家”。按照他们自己的解释，天朝的臣民都是选民，上帝是他们的国王，首领是上帝的代理摄政者，南京是圣城——当今的耶路撒冷。天王说，他从上帝那里接受了权力。因此，上帝扶持他掌权，他按照上帝的旨意统治这个王国。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区别完全被忽略了，彼此互相杂揉。在东王（从宗教观点来看，他是这场运动的邪恶天才）死去之前，神治观点已被推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出版了一本妄称详细记录“天父”在各种场合下的下凡活动的书，……无论是当官的还是平民百姓，都极为盲目地相信这些东王和西王伪装的异象。……

东王的用意只是为了将新王朝的宝座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他推测，以他自己的名义讲话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他就亵渎地假冒上帝的名义说话。至于首领是否参与了这种欺诈，或者他是否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无论持何种看法，这桩交易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接受这些异象的，大部分信徒也相信这些异象正是真实的天启。这在我们看来也许会显得奇异。但我们不应忘记，中国人坚信灵界与人世间有着密切联系，有可能进行经常性的沟通。……虽然这些人已将他们以前所信奉的神灵视作卑鄙虚假的而加以弃绝，但这仅是应基督教布道师的要求去做的，他们并没有自行抛弃所有的迷信观念。按照他们的

观念，既然坏人可以变成邪神或假神的代言人，那么，好人又未尝不可以成为好的神灵乃至真神上帝的代言人。究竟他们是否持这种理由，我不准备去评论。我仅仅断言，如果仅有中国佬自己这么做，那是再自然不过了。现在，我们难以断言的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利用这种普遍的轻信心理来欺骗群众，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功，或者这个演员本人究竟会堕落为何种程度的自我欺骗的牺牲品。虽然这些异象已经收场，但是，他们的政体在表面上依然是神治国家。首领仍在声称他的宝座就是天父、天兄的宝座，他的王国就是天国，天使就是他的御林军。……

(第二)：老百姓为什么不返回城市？这是否证明叛军未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从刘姓和蔡姓首领处，我获悉了以前并不知道的情况，即目前不允许老百姓住在城里。他们说，在改朝换代正在继续进行的时候，城市通常应属于士兵，惟有乡村属于老百姓；声称在这方面他们与其他任何一个王朝(包括满清)所采取的政策并无不同。他们说，在已攻克的城市正被敌人包围的情形下，将城门向老百姓敞开无异是自杀行为。这些城市很快就会布满装扮成店主和苦力的清朝士兵，万一敌军攻城，他们将会使局面变得险象环生。一旦疆域内的某一特定地区完全被征服，该地的敌方堡垒俱被拔除，老百姓就将被获许入城，秩序将得到恢复。……

(第三)这些人除了被视为无法无天的劫掠之徒外，还能被看作其他什么人吗？

有不少人是如此思索和谈论他们的。但是，这个城镇(我正在这里写作)的地方官并不这样看待他们。有一天，当我拜访他时，他说：“贼仅仅贪求和满足于劫掠，但长毛叛军的目的却是夺取王位。”的确，他们有一套正规的政府制度；他们臣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得到了保护和尊重；老百姓为他们开市，他们则足价购买所有的东西；外国人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可以在他们的境内旅行(正

和我们一样),而不会受到士兵或百姓的骚扰;他们的宗旨不是别的,而是推翻满清,建立本民族的王朝——这些事实,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实,正是对上述问题的结论性解答。

首领、诸王及众长官并不赞成焚屋、抢掠和屠杀老百姓的行为。在这些方面,忠王的军令十分严格。在苏州和其他一些城市,城墙及城门上均贴有告示,禁止所有这些暴行,违者斩首。就这场运动而言,这些暴行仅是偶然现象,并非基本特征。……

我们最好还应记住,叛军在这方面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基督教国家也能做出与上述叛军暴行相匹的残酷和掠夺的行为。……焚烧上海城郊,毫无顾忌地毁坏清宫财物,这些行径与叛军所犯的任何罪行相比,即使不超过,至少也在伯仲之间。而英、法在上海对付“叛匪”的行为,就残暴这一点而言,已远远超过了背信弃义的鞑靼人在北方的声名狼藉的行为。我们之所以提及这些事情,并非在为叛军的真正罪行辩解,只是为了说明,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这些罪行都会伴随着战争而来,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所从事的战争。……

(第四):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哪些地区?

他们宣称已占领了江苏、江西、安徽、广西、四川和河南六省的最好地区。……

(第五):他们军队的人数有多少?

尽管我曾再三询问过这个问题,但迄今仍未能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他们现在远比过去强大。在最近两年内,他们人数大增。

……

(第六):他们的前景如何?他们有可能成功吗?

如果没有外国的干涉,让他们独自去打自己的仗,他们极有希望取得重大而又迅速(当然是中国速度)的成功。无论天王最终会怎么样,广西叛军一定会胜利。在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它镇压下去。所有较小的叛乱都已与它合流。没有外力援助,鞑靼人若

试图扑灭这场大火，便如同试图将太阳吹到天外一样。他们在远比现在强大的时候就竭力这么做，或许以后仍将会这么做，但只是徒劳。鞑靼人的力量是一个神话，一个幻影，只能被叛军耻笑。

我们已在无意中做了许多加速现王朝崩溃的事情。他们所遭受的一连串失败已使得中国人民看透了其主人的虚弱，这种情形以前是从未有过的。符咒已永远被击破，人民已不再相信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已有意识地，竭力给这具死尸注入了新的生命，并扼杀崛起中的巨人的青年热情。由于我们为满清防守上海，叛军在前进道路上遭到了极为严重的阻遏，他们原本大有希望的前景已被乌云所笼罩。如果上海在他们手中，征服和重建秩序的工作就能够从速进行。但如今，前一项工作的进展必定会更为缓慢，后者则被无限期的延迟了。

我们不应期望在中国完成这一工作能像西方那样迅速，在西方，一切都以火车的速度进展的。但在中国，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前，都要经过持续二三十甚至四十年的角逐和混乱时期。广西叛乱尚处在它的前十年。中国佬是不会把这看作一回事的。

(第七)：就基督徒一词的任何意义而言，他们能被称作基督徒吗？

他们极端仇视偶像崇拜。首领视之为中国的一大祸源，决心将它的一切痕迹扫除出这个国家。忠王说：“让外国兄弟知道，我们决心将偶像崇拜根除出我们的国家，代之以培植基督教。”他们相信并崇拜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保护者——唯一的上帝。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使世界脱离罪恶和地狱的救世主。他们相信圣灵是上帝的化身，是感化万物者。他们相信神的教义。他们反对宋朝哲学家的泛神论观念，持上帝之位格的教义；他们反对流行的多神论观念，有着极为明确的上帝独一的概念；他们反对佛教哲学的宿命论，相信并传播全能的上帝主宰一切的教义。在他们看来，上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位严苛无情的君主，而是一位充满爱

心的父亲，他温和地关注着他们的利益，并亲手引导着他们。正是由于笃信这一事实，加之这一事实的实际重要性，首领才向他的人民宣称至高无上的主是“天父”。

他们视《新旧约全书》为准确无误的福音书。正因为如此，他们刊行了《新约》全卷，《旧约》已印到《士师记》。他们相信来世的赏罚。

他们信奉上述教义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这一信条没有混杂上许多错误，任何人也不会在宣布他们是基督徒方面感到犹豫。但不幸的是，敌人已在麦田地撒了稗子。^① 他们的错误和缺点既非寥寥，也不是无关紧要。

这场运动最坏的特征之一便是东王、西王僭冒神的启示和异象。没有什么比关于天父频频下凡的冗长记录更令人厌恶了。将可憎的呓语假托上帝之口说出，无异是亵渎。我们从中所发现的不仅仅是愚昧，而且是我们堕落的人性中最为污秽的感情的自白。尽管它在我们看来似乎奇异荒诞，但事实上，诸王和官兵们全都虔信这些伪装的异象。首领的宝座正是部分地建立在它们之上。

一夫多妻制是这场运动的另一污点。……

他们关于上帝的观念远不是没有错误。他们宣称上帝并非纯灵。首领坚持认为上帝是有形的。这是人类的思维因无力理解纯灵的观念而容易陷入的一种错误。有些天主教神父就曾认为上帝是有肉体的。当人们听别人讲述从未有人讲过的神旨时，难免会提出如下请求——把上帝指给我们看。关于基督的本性和三位一体的教义，首领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干王的观点是恪守《圣经》的；

^① 这一比喻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据载，耶稣在讲解天国时，将世界比作是一块田地，称人子将撒下好种（天国之子），而作为仇敌的魔鬼将撒下稗子（恶人之子）；到收割时，天使将薅出稗子，用火焚烧；世界末日时也将如此。以此说明天国的振兴常有坏事作梗，但终将会消除。

其他各王和广大官兵的观点也不完善。至于基督的本性，上帝的三个人格的各自区别和本质上的统一，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各王和官兵们即使有所关注，也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仅相信天父是造物主，基督是救世主，圣灵是上帝的化身和感化万物者。这种信仰会对他们的道德品质产生何种影响，我无法断言。他们拥有基督教知识的程度是参差不齐的。广西和广东人由首领亲自教导过，知识面较广。我曾就宗教问题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过愉快的交谈。普通士兵的知识仅限于两三点要义。……

(第八)：首领是否将《新旧约全书》看作是福音书？

是的，确实如此。

(第九)：首领是否接受了拜神仪式？

关于他接受拜神仪式的断言是错误的。……他们完全了解拜神仪式与纯粹的朝廷礼仪之间的区别。

(第十)：他们允许传教士在他们境内自由地传播福音吗？

他们允许这样做。我已得到一道关于此事的诏旨，是由幼天王用朱笔写在黄缎上，并盖有御玺。这道诏旨业已公布过。他们作出这种许诺，并非出自对我们之间所存在的区别，以及情感上的冲突所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无知，相反，他们对此极为关注。他们十分乐意并渴望传教士们能马上到人民中去传播基督教。就在民众中传教而言，他们是立刻并将永远敞开大门的。但是，我不能说他们渴望传教士们现在就到士兵中去。他们担心两件事，即传教士可能会受到意外的伤害，再就是，错误曝光后可能会动摇军队对天王的信任，进而威胁到他的宝座。然而，这种忧虑是暂时性的。一旦天王的宝座已稳若磐石，它就会随之消失。许多首领似乎在此问题上并无丝毫的忧虑。这道诏旨不仅向传教士开放了农村，而且还开放了城市。……至于目前去他们中间是否适宜、安全及有效，每一位传教士应当自行作出判断。

(第十一)：首领的抱负是什么？

这个人很难琢磨。在许多方面，他是个能力非凡的人。他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所有臣民都在他的完全控制之下。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党同伐异。他们都用一种近似迷信的虔敬仰视他。他亲自写所有的诏旨。这些年来，他一直忙于修订中国古书，并以增订的方式重写中国历史。他最爱读的书是《圣经》和《天路历程》。他对《圣经》相当熟悉，在任何场合中都能引用自如。他一直仔细地阅读《六月丛谈》，并参考其中与争论问题相关的神学文章。他现正贪婪地阅读送给他的科学书籍。天王相信他是真神上帝的一名虔诚信徒。他既不抽鸦片和大黄烟，也不饮烈性酒，并制定了最为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所有这些行为。这种品格与现今坐在中国皇位上的愚蠢的君主形成了有利的对照。以上所讲的都是赞许他的话，如果不谈论缺点，将会使他成为有口皆碑的对象。

他提出了一些僭越之辞，这些在我们听起来无异是亵渎。至于这些言辞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我们还很难断言。我个人的印象如下。其他人必须自己作出判断。

他自称是“上帝之子”，是“天主”，是基督的胞弟。他说，他的灵魂曾于 1837 年升天，当时他见到了上帝和基督，同他们交谈过，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消灭偶像、传播真正的宗教和驱逐鞑靼人的权力。他经常在口头和书面上自称是天下所有国家和民族的主。在对这个人作出评判之前，让我们记住他是一个中国人，绝无可能免除他的民族的通病——他迄今几乎是独自从异教的黑暗中奋斗出来，并创立出他自己的神学信条——伴随着他的道路而来的惊人的胜利，时时由于他而带来的近乎奇迹般的成功，这一切必然对他的想像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影响。他的第一个称号“上帝之子”与中国皇帝“天子”的称号是一致的。每一个皇帝都被认为是受命于天来统治的。天王相信他自己也是如此，故而使用了上述称号。

第二个称号“天主”在具有这层含义的同时，尚有其它含义。除了他是天命统治者这一观念外，还有源于他的政府被假定为神权

政体的另一观念。上帝是国王，因此，这个王国被称作天国。作为被指派的这一王国的代理摄政者，他自称是“天主(Heavenly ruler)”，也就是说，是天国“看得见”的统治者。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王朝被称为天朝，国都为天京，士兵为天兵。

为了理解他所拥有的“同胞弟兄”和“二兄”称号的确切含义，有必要探究他对基督的人格、三位一体和人类灵魂的起源所持的观点。关于三位一体的教义，我相信正统基督教徒都能理解，但他却连最起码的概念都没有。按照这一教义，三个人格“不可分离”地彼此互相联系，拥有同等的荣耀，合而成为唯一的上帝。但他否认三个人格是平等的，声称基督不能被称作上帝。他不承认三个有所区别人格都是上帝，认为只有“天父”才是上帝，基督则完全是另一个人。他仅仅将耶稣看作是人的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是一个人。对于耶稣是“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从而构成“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人格，他是全然无知的。一位广西老信徒告诉过我，天王曾教导他们说，基督和他的灵魂都是在世界之前被创造出的，惟有“天父”并非造化，自然而然。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上帝以生以出，各自被指定去实现不同的目的。他们生性都是上帝的儿子，未降生之前都是绝对纯洁和快乐的。但是，尽管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上帝造化，因此也都是上帝的儿子，但在时间、伟大和尊贵方面仍有着重要区别。基督是上帝所生的第一个和最伟大的儿子，远远胜过其他，无论是人还是天使。他的使命也远比上帝的任何其他儿子的使命重要。他降临世间是为了救赎世界脱离罪恶和地狱。上帝造化的所有人的灵魂都同基督有着这种原始状态的亲密的亲戚关系，所有的信徒与基督以及彼此之间，都是“同胞弟兄”。然而，造化秩序的先后和等级上的尊贵仍然是有区别的。首领说，因为基督是上帝的长子，所以他是上帝所生或造化出的第二个儿子。这就是他何以自称是基督二弟的原因。他的使命的重要性也仅次于基督。他并没有自视为上帝，相反，按照他的教义，上帝是独一无二的，并且

无限地高于一切生灵——连基督也不例外。他每谈起上帝、基督和他自己时，如同在谈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一般；他的寓意只是说，他们在情感、兴趣和目标上是一个人。这是比喻意义的说法，他们在谈到全体信徒时经常这样使用。无疑，他们在我们面前讲到“一家一弟”时，指的就是这层意思。

我们应当记住，这个人是在没有外国帮助的情况下形成其神学理论的。三位一体的《圣经》教义可能从未以他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他阐释过。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会把任何人的单纯说教作为依据和证明。我相信，如果有人向他证实他的观点和《圣经》并不一致，那么，他将会与他们绝交。我们希望他能够抛弃错误，不再僭用这些不同凡响的名号，不再妄称这些僭越之辞。

至于 1837 年的异象，他和他的追随者似乎都绝对盲信这是神的旨意对他的启示，甚至干王也深信这一点。他可能确曾有过如同所描述的一些异象或梦境，因此，作为一个东方人（大多数西方人在这一点上不大能理会），他便很自然地相信这是来自上天的启示。他所获得的奇迹般的胜利使他和他的追随者加深了这一信念，这一点正是我们本可以预料得到的。

关于他对我们使用过激和冒犯的语言，以表明其疆域的辽阔和力量的强大，干王说，这是夸张的说法，仅仅是为了激发他周围所有人的信心和勇气。曾与我交谈过的诸王和将领们远没有轻蔑地将西方国家看作是蕞尔小国，似乎认为她们是伟大、富有和繁荣的国家。他们中有不少人知道并承认，他们在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有许多值得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东西。

（第十二）：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传教士的责任十分显然。他们应当通过祈祷和努力，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以纠正他们的错误，在他们中间促进纯正的基督教。他们决心根除偶像崇拜，代之以培植基督教。无论传教士们将做些什么，他们都将在一如既往地铲除偶像。他们正以极为巧妙的方

式自行从事这项任务的前一部分，并试图去做后一部分，但无力独自完成。尽管他们的所有错误既非寥寥无几，也不是无关紧要，但我坚信，他们是将中国从偶像崇拜的黑暗和奴役中解脱出来，并与外国传教士一道使其享有福音的光辉和自由的被选定的工具。假定叛军是名义上的罗马天主教徒，而不是现今表面上的新教教徒，罗马教廷将不会因为他们的错误而抛弃他们。在垃圾中可以找到壮丽建筑的石块；在混乱和不和谐当中，也不难发现他日将使凝视中的世界为之迷醉的秩序与和谐的因素。

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们！这场叛乱是你们的产儿。因缺少你们父母般的关怀，他已长成畸形，并且十分任性；但他仍然具有成为一个完美的人的因素。他对这个国家是福还是祸正取决于你们自己。如果你们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结局将会是前者；如果你们任其自生自灭，结局将可能是后者。作为基督教徒，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的新教传教士，你们的责任正是机智地观察这场斗争，以父母般地牵挂，耐心等待事件的发展，祈求战争与和平的上帝，仁慈地带来和谐与秩序，结束目前的纷扰和混乱。

西方国家对这场运动应持严格的中立政策。如果持与之相反的政策，就会在原则上遭到责难，挫伤运动的领导人对外国人所怀的友善感情，并损害最好的贸易利益。他们仅希望能让他们独自去打自己的仗；允诺他们的这一要求，正是我们能做的最低限度的事。他们并不寻求我们的帮助。他们对自己及其事业的正义性充满信心。他们认为铲除偶像崇拜和推翻鞑靼王朝是由天命所决定的，不可改变也不可违背。而且，他们有着一种强烈而又不容置疑的信念，即他们是由神指派来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而且，时间正是他们独立完成这一使命所需的一切。他们现已占有这个帝国最富饶的一些地区，并正热切地期待着能赢得一个又一个迅速而又辉煌的胜利。不久以后，我们为传教和经商而旅行时的人身安全，以及最重要的商贸分支机构的存在本身，都将依赖于他们。无论我

们说什么与之相反的话，他们都有将这广袤富庶的商业区变成一片不毛之地的能力。他们是我们的朋友；采取将他们变成我们敌人的步骤是毫无理由的。而且，如果我们希望能避免领土争端，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么将这些人当作“公开”的敌人对待，否则就不要插手他们的事情。我们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如果我们不让他们完全自由地去打他们自己的仗，那么，我们就必须将他们完全逐出这一地区，并自行占领这个帝国。这场运动究竟是对还是错，这与我们并无任何关系。中国人应当自己作出判断。革命在中国一直是普遍现象，不止一位革命领袖曾被视作“圣人”。假如目前的这位首领能在公正原则的基础上成功地建立起本民族的王朝，那么，他的名字将会流芳百世，他本人也将被列入最伟大的中华儿女的行列，尽管他的声誉现已大大受损。中立是西方国家所应采取的唯一合理的立场，宗教、商贸和文明的利益均昭示了这一点。

试图支持一个注定会行将灭亡的王朝是愚蠢的行为；试图使一个本不应生存的生命生生不息是罪恶的行为；试图阻碍一支虽有我们作梗但一定会变得更为强大的力量的前进，是利令智昏的行为。假如我们能够将这场叛乱镇压下去，又会给中国人民或我们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呢？果真如此，另一场叛乱将会接踵爆发，而且它将准确无误地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改朝换代的局面必定无法避免。鞑靼人加在这个国家身上的，如不堪忍受的梦魔般的桎梏必将会摆脱。任何人都不要设想会有另一种叛军比现在的叛军做得更好。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的人应当懂得，和过去的绝大多数叛乱相比，广西叛乱是不应受到什么指责的。旧王朝的灭亡总是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中国，新王朝就像长生鸟一样，诞生于衰落的旧王朝的灰烬之中。如果英国并不希望亲自执政，那么，她最好不要插手这场角逐，对争斗的任何一方都不要说三道四。她若站在中立的立场，她将会赢得双方的尊敬；她若有所偏袒，将会有一方憎恨她，另一方鄙视她。在上海，我们已粗暴地违背了这一原则。为

了替清朝守住这座城市，我们已铸成了一个极大的政治性的错误；在丝毫没有将我们的意图正式通知叛军，叛军也根本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挑衅的情形下，我们竟向他们开了火，杀死了他们 200 人，从而犯下了一次可怕的罪行。回顾这种毫无理由的卑鄙的兽行，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和情感的英国人都会感到脸红。我真诚地希望，这样的大错我们将永不再犯，我们的文明和民族的品性将永不再被另一个类似的污点所玷污。

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大事记

(1924—1927)

司马文韬

编者按:1924—1927 年的广东农民运动,是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高涨起来的,又是在国民党的压制下低落下去的,不研究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的关系及其变化,就不能全面地说明广东农民运动的盛衰原因和教训。为此发表这份大事记,以为研究者提供参考。本期先刊出 1924 年部分,内容涉及国民党中央为开展广东农民运动所做出的重要决策;对广东农民的宣传组织工作;为打击各地摧残农民协会的反动势力而采取的措施等。所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民党周刊》、《广州民国日报》、《大本营公报》、《中国农民》、《犁头周刊》及周其鉴的《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其余部分,容后续登。

1 9 2 4 年

1月

1月 20—30 日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农民在全国各阶级中所受痛苦最深,主张由国家给以土地和筹设农民银行,以帮助缺乏土地和

资本的农民，并全力扶助开展农民运动。

1月31日 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农民部。

2月

2月10日 顺德大良农民召开会议，一致决定组织农团。

2月20日 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规定农民部的职务是：详细调查农民状况和农民组织；制定农民运动计划；召集农民会议；出版关于农民状况之小册子及传单等。

2月26日 上海《民国日报》报导顺德大良农团有120余人，多是青年农民。文后附录顺德大良农团章程，共11条，规定“本团以维持种植，自卫农圃，保护农民生命财产为宗旨。”

3月

3月14日 顺德大良农团成立后，除呈请顺德县署立案保护外，并呈请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迅予具函顺德县署，饬即批准立案，以慰民望。”农民部将呈文上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据此致函广东省长公署，肯定大良农民组织农团，起而自卫，“此与本党保护农民之义不背”，恳饬县批准立案。本日，《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广东省长杨庶堪根据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来函，为批准顺德大良农团立案而下达给顺德县长的73号训令：“令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

3月19日 谭平山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照原案通过”农民部提出的“制定农民运动计划案”。该案依据“先要有最精密的团体组织，然后才有农民运动”的原理，提出分别组织自耕农、佃农、雇农等协会及农民自卫团，于国民党区党部成立的地方设立一个总括的农民联合会，于区分部成立的地方设立各协会，以上组织须由各县的区党部或区分部负责组织之。

4月

4月11日 广东油业工会职员周其鉴、胡超二人，以国民党中央特派调查员的身份，返回原籍广宁县开展农民运动，本日召开广宁农会办事处筹备职员会议，议决以周其鉴、胡超为主任，罗国杰为秘书，其余三十多人为筹办员；立即在农民中开展宣传，并派人将国民党中央公函急送县署。

4月12日 周其鉴、胡超会见广宁县长李济源，请其依照中央公函所说迅赐立案。李竟谓：“我此地只接受省长命令，不接受中央命令。”

4月13日 周其鉴将与李济源交涉情形电告国民党中央，请即函致省署迅予电令广宁立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彭湃复函周其鉴，嘱先照手续具呈县署，立不立案由他，此间自当设法。

4月14日 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就“林委员祖涵函请调办汉口党务，所有本会农民部长一职请另委人案”，决议“准辞”，并决定下次会议再遴员接替。

4月17日 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以彭素民接任农民部长。

4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奉孙中山谕，筹备广东农品展览会，是日举行筹备会议，廖仲恺、彭素民、戴季陶、邓植仪、彭湃、甘乃光、石盛祖等出席，决定由农民部、宣传部、组织部、广东省长公署、广州市政厅、广东大学、岭南大学等党政教育机关之人组成筹备委员会，预定经费8万元，定10月17日至26日为展览会期，届时组织各县农民参观团赴广州参观，以增进农业知识及提倡农民的文化运动。

4月23日 《广州民国日报》的《鹤山农民将大联合》的报导称：昨有国民党员任某拟联络该邑党员及热心分子组织鹤山农会。

5月

5月3日 广东农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廖仲恺、彭素民、戴季陶、彭湃等26人出席，议决《广东农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简章》。

5月5日 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修正全案通过农民部筹备广东农品展览会报告及广东农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简章；决议通过农民部提出的“组织农民运动委员会案”和“聘请法朗克为本部顾问案”，决议承认农民部介绍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法朗克参加农民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辅助农民部进行工作，由农民部主理，每星期开会一次，对于中央如有建议得交由农民部提出。

同日 应广宁农会的请求，广东省公署电令广宁县长李济源从速将广宁农会呈文转到省署立案，给示保护。

5月11日 广东省长公署再次电令广宁县长李济源从速将广宁农会呈文转到省署立案。李仍置之不理。

5月15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广宁农会：“贵会呈请省长备案给示，节经本会函致省署特准，……不日当可办妥，特此电告，并通知各位农友为盼。”

5月19日 廖仲恺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农民部提出补助东江农民运动经费，决议由本月起每月补助50元。

5月中旬 国民党中央特派农民部秘书彭湃前往广宁，与该县长及各乡农民接洽，调查该县农会及农民运动情形。但李济源托辞不予接洽。彭湃在广宁停留十天，深入乡村，向农民“宣传党义”。返回广州后，即将调查结果呈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5月29日 佛山南浦农团举行开幕礼，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长廖仲恺，农民部长彭素民，农民部顾问法朗克等人应

邀出席，由彭素民揭幕，廖仲恺、彭素民、法朗克等人相继发表演说。彭素民的演说，“略谓农民有此组织，今后足以自行防制贼匪”。

5月30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南浦农团军之宣言》：“当兹军阀肆恣，外患逼侵之日，吾人日辗转于刀俎之上，我辈贫农，更多几重压迫，非觉悟团结，实无生存。”“本乡农团军之设，纯系拥卫农民自身利益，及维护地方安宁起见。”“本团成立之后，决以实力捍卫里闻，如有匪徒猖狂滋扰，一经拿获，定必送县究治不贷。”

6月

6月2日 农民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提出“佛山属南浦农团成立状况”的报告。

6月5日 广东省长杨庶堪下令免去李济源的广宁县长职务。

6月9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将农民部提出、农民运动委员会拟订的农民协会章程草案交农民部长修正再决。

6月10日 广宁县江屯、扶溪、潭联防团局劣绅黄鄂棠等率团兵围攻江屯、潭埔两地农会，拆毁会所，重伤农会职员五人，掳去一人，抢去会员入会基金，焚毁国民党党旗、农会旗及家具、文件、册籍等。

6月12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修正农民部提出的“农民协会章程修正案”，并决定“由农民部加拟总则一章”。

6月13日 广宁农会将劣绅围攻农会详情具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和省署。

6月14日 广宁农会就惨遭劣绅摧残事，向孙中山等发出求援快电：“伏乞一致主张公道，为敝会一万二千余家六万余众农民被压迫阶级请命。”

6月15日 广宁农会发出敬告全县农民宣言，提出农会与劣绅其势力不能两立，此次事件，并不是几个农会职员的受辱，而是全体农民被压迫之现象。我们反抗这个压迫，更要努力，更要奋斗，更要大家联合起来！

6月16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农民部提出的“农民协会章程总则草案”；决议通过农民部提出的“将农民协会章程建议于大元帅并建议文草案”；决议劣绅黄鄂棠等率众捣毁农会捕掳会员案，“函请省署从严究办”。

6月1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广东省长公署，指出“黄鄂棠等种种不法，案情重大”，“与本党扶助农民政策，大相背驰”，“即希从严彻究，切实办理”。

同日 廖仲恺宣誓就任广东省长。

6月19日 林森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农民部提出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草案”修正通过，将通过案“备函总理请以大元帅名义发布”。

6月20日 广东省长廖仲恺分电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及广宁县长：“查广宁农会被毁一事，昨经杨前任令行究办在案，兹复据该会以捣毁会所殴伤会员各情，邮电前来，应请许总司令饬令县，务将肇事人员拘拿，解省严办，以儆凶横，仰该县遵照。”

同日 顺德县农会通电声援广宁农会，“希大元帅、廖省长极力维持，誓达该会成立”。

6月中旬 花县农会已筹办月余，加入者达200余家。花县农会筹办人陈道周等，呈请国民党中央派员前来指导。“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派农民部秘书彭湃、顾问法朗克“前往襄助一切”。

6月24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将农民协会章程及建议文上呈孙中山。建议文称：“本会以为，欲实现本党对内政策所列举之农民政策，一方固应由政府以政治的设施为贫苦之农民实行解放，一方尤赖贫苦之农民能建立有组

织有系统之团体，以自身之力量而拥护其自身之利益。爰为拟订农民协会章程建议于政府批准施行，期使全国农民得悉在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之下而奋斗，则本党农民政策之实施，可以于此筑基础矣。”孙中山据呈即谕大本营秘书处函达中央执行委员会：奉批照准。

同日 国民党农民部长彭素民致函广东省长公署云：“顷据花县农会筹办人陈道周等来函，内称党员等……发起组织农会藉以保障农民利益，而实现国民党之农民政策……惟此间烂蕙暴徒，受地方豪恶之嗾使；时有危害党员生命、破坏农民团体之恶息，敢请转函县长出示保护，以利进行等情。按农民组织农会，维持自身利益，是乃份内应有之事。……希转饬花县县长，出示保护，以免滋生事端。”

6月25日 农民部长彭素民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复顺德县农会：“据广宁来电所称，该县卸任县长，既有意抑压农会于前，而该县劣绅黄鄂棠等，又肆意摧残于后，实属不明事理，妄逞私图。本会为基于本党政策扶助农民之意旨，业已据情函请省长严行究办。”

6月29日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7期全文公布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的《农民协会章程》。

6月30日 林森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报告“总理批准农民协会章程”；决议通过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第一步实施方案”共7条。方案规定：择定与广州市交通较便，在政治上、军事上重要之县地及农民运动有根据者，如广宁、顺德、鹤山、东莞、佛山、香山及本市郊外各乡村，派遣农民运动特派队员20人前往作实际运动；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一月为讲习期间，讲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员；预定本年9月为成立全省农民协会之期间。会议还通过了农民部提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简章》。

7月

7月3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农民部秘书彭湃兼主任。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简章》规定：该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以实现本党农民政策”；“本所各种事务概由农民部管理，其组织及课程则与组织部、宣传部分别商定之”；“凡国民党党员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者皆得为所员”。

7月4日 广东省长廖仲恺发布保护广宁农会布告，指出：“广宁农会经已核准立案，系为法定机关，无论何人，不得肆意作践。”

7月6日 《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8期刊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修正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宣言》。

7月10日 胡汉民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对农民部提出请办农民半月刊案，决议“交宣传部酌量办理”。

7月14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送广东省署农产品展览会简章12条、农民参观团简章15条，请分别公布咨行。省长准此，除函复并咨行外，特开列该各简章，布告省会地方农商业团体人民知悉，着各精选农产品，踊跃应征，如期送会陈列，以襄盛举。

7月15日 《广州民国日报》正式公布《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宣布本政府为“贯彻三民主义，实行国民革命”，“其特别之任务，尤在督促占全国国民大多数之农民使之加入国民革命运运动”；对于农民运动，“本政府唯有根据主义，作切实之辅助及诚恳之指导”；规定“农民协会之性质，为不受任何拘束完全独立之团体”，“为防御土匪兵灾起见，特许其在一定计划之下组织农民自卫军。”

7月17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农民部

提议农民运动讲习所展期毕业参观军官学校作军事上学习案，决议准往参观，惟学习事应请陆军军官学校自行决定；政治委员会提出关于农民讲习所学生军事训练及增招学生案，决议照原案通过。

7月20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招生布告：“为招考事：照得本党农民讲习所现拟招第二届学生二百名，凡本党党员热心从事农民运动者皆得报考。自本月20日起至月底止，每日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为报名时间。凡志愿报考各同志，请迅即亲携党证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报名可也。”

7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原案修改通过”农民部提出的“组织广州市四郊农民协会案”。

7月22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通告：“本部为实行本党对于救济农民之政策起见，特于本月28日（即旧历六月廿七日）上午9时，召集市郊外已加入本党之农民党员，在广东大学礼堂开联欢会，同时并拟组织广州市郊农民协会，除直接函知各农民党员外，恐未周知，特此通告。”

7月24日 《广州民国日报》公布广东省长公署给各县县长的训令：“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本大元帅三民主义，为农民谋幸福，订定农民协会章程，随由政府发出宣言，申明意旨，应即依照办理。除分行外，合就印发前项宣言暨章程各一份，令仰该县即便遵照，诱掖当地农民，根据章程及宣言，组织农民协会及农团军，实行自卫。如有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各属地方党部委员，前来照章组织时，应竭力援助进行。仍按情形，即时具报。”

7月28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召开广州市近郊农民党员联欢会，近郊农民党员千余人到会。孙中山出席并致训词，他宣布“今日开这个农民联欢大会，这是革命党和农民的第一次见面”，“是政府为农民谋幸福的第一日”，“在中国是破天荒的第一件事”。他表示政府将帮助农民“实行结团体”，“练农民团军来自卫”，“用极低

的价卖枪给你们”。他号召农民同政府合作，一致实行民生主义，为大众谋幸福。广东省长廖仲恺、农民部顾问法朗克相继演说。由大会主席彭湃提出组织市郊农民协会，并选举农民协会临时职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祝词，并授农民协会旗。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花县农会经中央党部函请省署转饬花县县长即日出示保护后，进行更为顺利，农民加入者已不下千余家，已组织成立之村农会有九湖、宝珠岗、元田、广岭、仙阁等十余村，其余各村现亦闻风兴起，迭向该县和市县农会筹备处请愿，派员前往组织。

7月29—30日 《广州民国日报》连日刊登该报编辑委员孙镜亚撰写的《告农民中的同志》，宣称：“就全国说，农民的唯一敌人，是驱兵为匪收匪为兵的直系武人，却不是地主。就广东说，农民的唯一敌人，是背叛本党投降的陈炯明，也不是地主。”“要是误认了地主为敌人，转把真正的敌人放松，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徒足增长社会的纷纭，而无补于革命工作了。”

7月31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现又从事组织香山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已指定谭平山、彭湃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三人为委员，筹备该协会各种计划。将来筹备就善，则由孙大元帅亲临香山指导组织，将以香山农民协会为全国农会模范。另据该报报导：广州市郊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举定杨林康、韩炎、池上平、蔡顺，以及国民党农民部指派三人、组织部一人、宣传部一人作为委员，限以一个月内，筹备完竣，举行成立。

8月

8月1日 花县第二区农民协会正式成立。由九湖、元田、仙阁、凤岗等村农会代表会议选出陈道周、王福三、王岳峰等五人为区执行委员，王礼勋、卢鉴潮等五人为候补委员，并互选出委员长、

理财、庶务等，使各有专司，而利进行。

8月3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彭素民病歿广州博爱医院，终年40岁。

同日 花县宝珠岗、广岭等十余村农会召开代表会议。金以第二区农民协会已正式成立，全县六区中一、三、四、五等区已各有一个以上之村农民会成立，虽不能即时组成区农会，但为期当不在远，目前为统一进行起见，应组花县农民协会临时县执行委员会；又决定即日派员驰往各乡宣传，以促各村农会之成立。

4日 番禺县钟村区陈子衡等联络农民百余人，共同发起组织钟村农民协会，于3日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函省署，令饬番禺县备案。本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转行省署，饬令番禺县署照办。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迩来农民运动，进行甚烈，各属纷纷设立农会。现番禺芳村一带农民，鉴于潮流所趋，特组织农民协会。连日加入者，极形踊跃。现已举定李鸿洗、林宝宸、苏达震、何觉非等为该会委员，实行呈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立案。

6日 广州市郊农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召集各执行委员开第二次会议，选出市郊各乡农民协会组织员共36人。

同日 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于3日将该所学生分为东西南北四组，每组分若干小组，分赴市郊和乡农区实地练习。本日该所报告：各组所到区域，大受农民欢迎。现愿意加入市郊农民协会者，已有万余人。现各区农民要求各生常到演讲，以开农民智识。

7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日昨芳村农会委员李鸿洗、何觉非，邀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秘书彭湃、高等顾问法朗克到会演讲，历陈我国农业不振，农民历久所受压迫之痛苦，种种情形，淋漓尽至，听者为之动容。一般农民心理，莫不欲从速加入该会，共同一致奋斗，以争回农民权利。

9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自国民党发表农民政策宣言，及公布农民协会章程以来，各地农民，均次第奋兴组织农会，除广宁、花县等县正式成立外，继有顺德、东莞等县农会筹备处设立。现闻东莞县农会筹备处进行更为发达，在两月间加入农会者，竟达四千人以上，并拟在虎门宵边乡为该县农民运动之中心点，先组织农民协会，然后根据章程，向各乡实行发展。已定本月12日在宵边乡开全体大会，为第一步之大联合，并演讲农民组织之要旨。国民党农民部届时拟派员前往宣传及指导一切。

8月上旬 广东省长廖仲恺出席香山县大黄圃农民代表会议，演讲《农民解放的方法》。

8月1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推李章达任农民部长，并“呈候总理核定”。

8月11—13日 广宁农会的周其鉴、陈伯忠、罗国杰、王世录、谭鸿机等人两次召开会议，决定在旧日活动地区，在可能范围内提出减租运动之口号，各处农会则依照国民党最新颁布农民协会章程组织停妥，应于最短期间成立全县农民协会。

8月12日 农民部秘书彭湃、组织部特派调查员阮啸仙、虎门党部谭伯翫等应邀于11日赴东莞。行抵停埔，即遇五百余农民携步枪三百余杆列队欢迎。10时开农民联欢大会，到者男女四千余人，首由主席蔡如平宣布开会理由，彭湃、阮啸仙等相继演说。12时再由各乡代表会议，讨论农会组织方法，并拟于最短时间成立农民自卫军。13日彭、阮等返省，农民百余人各携械送出埗头始回。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芳村一带农民，对于农会，早已渴望成立。日昨该区临时执行委员林宝宸等，召集各乡农民数百人，在芳村谢家祠会议，赴会者甚众，随后到会请加入者，尤络绎不绝。当堂组织芳村、招村、涌口、东滘四个乡农会，并成立市郊第一区农会，举定区执行委员林宝宸、苏达臣、李汉泉、黄有、姚锦开等五人，候补委员曾伟庭、李同、刘杨、张骆等四人，及四个乡农会的

执行委员和裁判委员。组织完备后由刘尔松、何友逖等相继演说。查该区此次成立之迅速，闻何觉非、李鸿洗、梁定邦三君亦与有力焉。

8月15日 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在芳村谢家祠举行开幕典礼，到会会员不下千余人，来宾百余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赠送“厚生乐群”之横匾，表示祝贺。该农民协会成立宣言称：“革命政府既为我工人农民而奋斗，我们农民也应当为革命政府努力……作政府的后盾。”

8月17日 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假广东大学课堂考场试第二届新生，赴考者共七百余，多具有中学程度，其成绩异常之优。

8月19日 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赴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的学生返回省城。该所以学生将来到农村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务须略具军事常识，指导农民方能妥善，于6日送学生25名去黄埔军官学校学习军事10天。17、18两日应军校特别区党部邀请，去附近农村作调查宣传工作，各生分头去新洲、黄埔、上庄、长洲、洪福市、平冈、东埔、深井等处调查宣传。各处农民极为欢迎，对于组织农会，尤表同情，下庄且已选筹备委员从事组织。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广州市农民协会宣言，强烈谴责广州商团偷运军械希图反叛政府，要求政府“快些解散商团军，惩办商团长”，并愿作政府后盾。

8月20日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学生33名，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从中选出24人为特派员，拟派往各县从事农民运动。

同日 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已评定郑廷芳等200名为正取，郑尔昌等25名为备取。

8月21日 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第一届学生毕业礼及第二届新生开学礼。大会由农民部长李章达主持。孙中山在训词中说：“你们这次毕业，到各乡去联络农民，这是我们国民党做农

民运动所办的第一件事……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就是大家的责任。”“我们革命是要根据三民主义，大家到各乡村去宣传，便要把三民主义传到一般农民都觉悟。”“诸君去实行宣传的人，居心要诚恳，服务要勤劳，要真是为农民谋幸福。要在最快的时间之内，用极好的联络方法，先把广东省的农民都联络起来，同政府合作，才有办法。”

8月22日 《广州民国日报》刊载《香山农会告农民书》，呼吁农民从速组织农民协会。并详说组织农民协会的种种利益。

8月23日 大本营秘书处复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顷奉大元帅交下贵委员会呈报公推李章达任贵会农民部长请核定等由函一件。奉谕着发总理名义照准，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

8月24日 广州市各团体为声讨商团团长陈廉伯私运军械，誓力拥护革命政府，在第一公园开市民大会，赴会者约二万余人。芳村农会参加大会，并派代表何敬和在会上演说。

8月27日 按照廖仲恺的指示，由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组成、农民部秘书彭湃兼任团长的广东农民自卫军成立，于是日正午12时列队至省署，与稍后到达的工团军一道，向省长廖仲恺请愿，请速下令讨伐商团。廖省长向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训示毕，各团军遂在省署头门草场操练两时之久，始收队而去。

同日 广东省长公署致大本营军政部咨：“现据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呈缴农民自卫军组织详细章程，请予立案等情。当经核明，尚属妥协，应予照准。该农民自卫军，为拥护政府之团体，系用带斜挂胸前，蓝布白字，书明农民自卫军字样。除分别咨行令遵外，相应咨请查照，并祈转饬所属一体知照，以免误会。”

8月28日 广东省长公署训令各县县长：“现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函开：案准本会农民部函称：自政府发表农民协会

章程及对于农民宣言后，所有各县区乡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纷纷组织，而乡村间不无一般劣绅歹徒或乘机而起，假借名义，藉名组织农民协会、农民自卫军，实则暗图伸张己势，以鱼肉乡民。本部为顾全农民利益，慎重农民组织，统一农民运动起见，特请中央转函省署，饬所属各县署，以后凡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者，如未经本党农民部调查清楚许其成立，概不应准予立案。特此函达，并希赐复为盼。等由。准此。相应函达，请烦查照，希分饬所属各县，嗣后对于组织农民协会及农民自卫军呈请立案者，须先经农民部调查准否，方可予立案，以昭慎重，而符党纲，至纫公谊。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既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县遵照。此令。”

8月30日 《广州民国日报》发表《花县农会减租宣言》。宣言说：花县每一亩田（平均以中等计）两造共可割得四石半，除一半纳还田主，自己所得仅二石三斗，每石以七元计，共得十六元一角，如肥料、种子、农具、人工等共须支出廿六元九角，收支相抵不敷十元零八角。况且今年时岁不好，即如早季一亩田已割不到二石谷。所以我们这回要求减租，就是出于不得已的，我们也经召集各村农民代表大会议决一致进行，“我们现在只向田主恳求减租二成，如田主深明大义，那就感谢极了”。另据该报消息：花县农民协会曾召集各村农会代表会议，以切近农民目前要求，议决减租，以和平手段，向田主要求。闻已达到目的者，在大数，有减至四成者。即各田主亦声称，如农会要求，则减之，个人则不能承认。

9月

9月1日 大本营秘书处致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贵会秘书处函呈请委廖仲恺为农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等情，经奉大元帅批准，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以总理名义派任。”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自前月东莞宵边乡蔡如平发起组织东莞农民协会，经本乡及邻乡多数觉悟农民贊成后，即联合多

人分赴各乡向农民联络，令其加入农会。各乡农民，受此联络，都明了农民利益，一时风起云涌，相率加入农会。计加入农会者，东莞除洪屋涡外，还有霄边乡、锦厦乡、涌头乡、下边乡、下冈乡、五桂塘乡等，宝安有罗田乡、燕川乡、楼村乡、水贝乡、塘严涌乡、沙浦乡等（暂划归东莞农会特别区），会员不下万人。农民相信农会确能解除痛苦，对加入农会，较前更为热诚。各乡均欢迎蔡如平到乡演讲农会事宜，每到晚间辄合数千百人听讲。现各乡农会及东莞第一区农会、特别区农会定于9月间成立。

9月2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农民自卫军自成立以来，成绩极佳，每日皆在省署内操练，纪律极严，仍拟陆续招考，以图扩充。

9月4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东莞农民协会自开筹备大会后，已积极进行。第一区农会（虎门霄边）加入者已达廿余村，计千余家，人数达五千人以上，并定9月10日开成立会。其余第二区（洪屋涡等村）、第三区（大怀德等村）将于最近期间开成立会。

9月5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颁布《特派员办事细则》，规定特派员应受本部之指挥；特派员到各乡村应将其工作随时报告，至少一星期报告一次；特派员接到本部命令后，非有特别事故，不得延缓停顿其执行；特派员回部时，应即向本部报到，听候指挥。

9月8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上，于树德提出重申本党纪律案。该案指出：凡服务于本党政府之党员实施其职权时，不可违背本章程、宣言及政纲。如顺德县长周之贞曾任本党分部长，不但不批准农团军，且拘捕农民领袖，罪以擅立农会；又如广宁县长李某亦曾任本党分部长，竟煽动土匪所组织之民团摧残农民协会，声言不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省长之电饬亦复置之不理。会议通过决议，分别训令，重申纪律。

9月17日 广州市郊农民协会为赞助孙中山北伐，致电全国认为：不如此不足以解放受重重压迫之农工阶级，而实行国民之大

革命也。并表示“敝会不敏，谨当荷锄揭竿，以为吾革命同志之前驱。”

9月18日 《广州民国日报》刊出广东农品展览会筹备委员会通告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致广东省长公署函，宣布因时局关系，不能照期举行，已决定改期展览。

9月20日 孙中山自9月13日移大本营于韶关后，感于革命军队经过区域，工人农民之众多，亟待宣传，使其了解革命政府北伐之意义，特以国民党总理名义，令调工团军暨农民自卫军两部，限于三日内赴韶训练。工农团军接令后，于本日下午3时拨队赴韶，不携枪械，专任宣传事务，以扩大国民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之空气于工农群众中去。

9月21日 工农团军晨4时抵韶。午后4时半，孙中山亲临东坝工农团军驻地巡视。孙中山向工农团军演讲约一小时，略谓：“今日见你们这样热烈参加革命前线，极为欢喜。你们须知，革命战争，是不仅靠军事的，最要紧的乃是心战，所以今日你们之来，最大之任务乃在于宣传。革命军之胜败是不能预料的，成功固不足以夸耀，失败则当以能保存实力，才可称为革命军队。但此非宣传之力不为功。本大元帅深希望诸位以后从心战努力。”工农团军合驻一大营棚，门外分树工团、农团旗帜，正中树一大白横旗，上书拥护革命政府6个大字，两旁分树白旗四面，上书赞助北伐讨贼、农工联合起来、打倒国内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同日 番禺钟村特别区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同时成立农民自卫军，有会员1200余名，自卫军126名。下午1时开会，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花县农会、广州市郊农会、广宁农会等团体来宾出席，宾主不下二千人。由卢剑南主席，农民部特派员侯凤墀、韦启瑞等相继演说，至3时散会。

9月26日 孙中山传令检阅工农团军并举行授旗式。工农团军全部820人集合韶关南较场，11时孙中山亲临检阅，并致训词。

勉励团军奋勇杀敌，拥护革命政府。随举行授旗，由团军领袖接受并道谢。同日，为加强工农两军训练和统一起见，经孙中山批准，成立工农团联合办事处，并派大本营参军处副官徐天深为该处主任。

9月27日 工农团军自调至韶关后，日间除训练外，每日均派队到各处联络工农两界，以资接洽。是日，工农两军全体整队入城作宣传运动。适值大雨滂沱，各团长均冒雨前进，衣履尽湿，尤奋勇向前不懈，沿途散放传单五种。全城观者莫不称为劲旅。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香山自前月廖省长亲到该县第九区大黄圃提倡组织农民协会后，当即在该区成立一香山第九区农民协会筹备处，举出筹备员多人担任筹备，并举出组织员多人分赴各乡各沙，从事宣传及组织。筹备至今，现闻已成立者，有六七个乡农民协会，正在筹备中者尚复不少。同时香山第四区亦有多乡成立。

9月28日 长洲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到会者三数百人，由曾如松主席、军校总教官何应钦、农民部代表何友逖致训词，李劳工、军校特别区党部代表李芝龙等演说。广宁农民协会、钟村农民协会、芳村农民协会、军校特别区党部均有匾额赠送。晚7时，军校演出白话剧，观看者五六百人。8时半演完后，校长蒋介石欢迎农会全体会员到校茶会，至11时，始宾主尽欢而散。

9月29日 工农团军联合南韶连联团召开韶关各界赞助北伐大会，在南较场开会，赴会者三千人以上。谭平山主席，孙中山演说，工农团军代表相继演说。

10月

10月1日 孙中山以工农两军素守纪律，将能为各军模范，特令严格训练，俾成劲旅，并以在韶训练殊不方便，于9月30日特令即日回省。工农两军得令后，于本日抵省，即从事训练。

同日 12时，东莞洪屋涡乡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由莫萃

华主席,请农民部秘书彭湃演讲农民之痛苦及救济方法,并农民协会之组织,历2小时之久。后由特派员莫式姜宣读农民部祝词。晚8时半执行委员会会议,邀请彭湃、莫萃华出席,公推彭湃任主席并解释执行委员职权,复议决数案,如组织宣传委员会、农民自卫军、审定会费等项。计宣传员即时加入者有数十人,农民自卫军赶紧一星期成立,至各区农会之成立,亦有讨论。

10月2日 广州市郊石牌乡东北边一带岗地,共千余亩,日前当经省长据报为官产指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划作第二农场在案。但该乡则坚持以该地确非官产,且该地中有蓄水湖四口,每口由乡民出资十余万筑浚,用以灌溉周围各田地。若该地被划为农场,则周围各田地必相率失耕,全乡生命告绝,均表示反对。是日该乡农会代表池某等特请广州市郊农会派员协同前赴省署,请愿省长将案取消,俾安民心而重农业。闻省长据情已允令饬取消。

10月3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北江农民团成立以来,日事操练,可称劲旅。此次联军北伐,该农民团迭经向大元帅请缨,追随帅座效劳。大元帅深为嘉许。惟以农民团之设立,原为自护起见,况现北伐联军,已有数万之多,足以摧敌有余,对于其北伐之请,暂置勿议。拟着其巩固后方,日加训练,扩充队伍,为北伐军之后盾。

同日 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长。

10月6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自广州市郊农民协会成立后,各县农会即相继告成。查现已成立农会47处,人数共6万余。

10月6日—7日 广宁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召开,到会代表32人。大会公推周其鉴为主席,陈伯忠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资格出席。议决组织各区农民自卫军,洞内各区举行减租运动,以及青年教育问题等。选举周其鉴为县执行委员长,陈伯忠为副委员长,罗国杰为秘书,胡超、谭鸿机、严培、李爱、成福、高树南为执行委员,陈之安、陈业颜、陈伯贤、黄毓、成德三、周其铤、陈玉、关应聪为候补委员。当众举出陈伯忠为农民自卫军军长,周其铤、杨建忠

为副军长。

10月10日 广宁县农会举行成立大会。各区乡代表和执行委员到者三百余人，会员到者千余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代表阮笑仙，带领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及广东农民自卫军十人到县，声威更壮。军政商学各界都来观礼。阮笑仙代表授旗授印。

同日 广东农民自卫军与工团军参加广州举行的双十节警告商团示威游行。游行队伍在太平路西濠口转角处遭商团枪击，伤亡多人。

10月11日 广东农民自卫军与工团军全数开赴黄埔，于14日早开始发枪305支（农民自卫军85支），实行军事训练。

10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同意中央农民部部长李章达辞职，以黄居素代理。

10月23日 东莞第二区农民协会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不下二百余，有武装者占半数。12时开会，由莫萃华主席，区农会筹备员莫月江演讲农民协会之建设要义。选举莫月江，刘景新、何荣森、胡美光、梁贺伯五人为执行委员，陈志行、莫廷英、胡景禧三人为候补委员。同日，东莞第三区农民协会开成立大会。该区农会共有十一个乡，人数愈千。到会的有农民部代表韦启瑞、虎门党部主任谭伯翹、东莞第一区农民协会代表蔡如平等，宾主约千余人。

10月27日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特别区党部对于工农团军受反革命派之惨杀，认为切肤之痛，非常愤懑，曾向校长蒋介石请愿教练工农团军，业已挑选十余人担任教练。晚7时该党部于军校大花厅开欢迎工农团军大会，到会者为工农团军三百人，军校学生九百余人，海军飞鹰、福安、午凤等舰官兵八十人，长洲协会会员三十余人。由校长蒋介石致开幕词，金佛庄致欢迎词，继由军校李芝龙、金佛庄、团军代表杨石魂、农民部代表林甦及蒋介石演说。

10月28日 花县农民协会致电孙大元帅、胡留守、国民党中

央各部长、省长、各总司令、各军长、各工会、各农会、各社团、各报馆……此等卖国商团，若不根本铲除，则社会秩序永无安宁之日，而民命危矣。目下广州市商团，表面似乎已扑灭，而六千余杆枪支，尚埋存各商店；各属商团，尚受妖言鼓惑，蠢蠢欲动，仍足为患。万请我大元帅、各总司令，一方清搜广州市商团枪械，一方收缴各属商团枪械，并照工农学兵大同盟各团体要求条件，惩办凶手，赔恤死伤等，俾除后患而平公愤。敝会愿率各农友荷锄候命，以为后盾。

同日 农民自卫军拨队回省。两日后，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毕业，人数共 142 人，分别派往各县从事农民运动。

10月29—31日 《广州民国日报》连载《农民运动的入手方法》一文，署名“小卒”。作者认为：中国革命现非民众的革命不可了。所以农民运动，便是在从事革命事业的最大重要的工作。这种重要的工作，讨论不嫌其详。倘若贸然从事，便会立见失败，甚至使以后欲继续运动而不可得。我以为从事农民运动，只有二句话可以包括，便是“熟知农民之所需要，而投其所好”。我们从事运动者自身之态度方面：第一，绝不能有我是你们的教师、指导者的神气，使他们望而生畏；我们应当深入他们的中间，学他们的生活习惯，学他们的言语，很诚实地做他们最亲热的朋友。第二，态度绝对缓和，绝不能稍露激烈的形迹。因为农民大都是保守的、稳健的、最胆小的，至他们的感情激发成熟，热血沸腾，自己喊出不平的呼声时，我们方能大声地教他们怎样武装来实行革命。这个问题，关系于中国前途，真是大极了。热心的志士仁人们，快来详密地讨论一下，各去分头实行啊！

10月30日 花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呈中央农民部称：花县田维持会罪首江耀忠、江建、刘寿明、江照楼等，已集中土匪六百余名、商团千余名、乡团千余名，共三千余名，在平山、石龙、两龙三墟，由新委花县谭县长指挥，准备暴动，并于 10 月 28 日派人致书该会，限 5 日内取消，并要该会副委员长王福三、九湖乡农会副委

员长王军亲到第二区署谢罪，否则以商乡团兵力对付。迅即转请中央，函致省长，刻日调派大兵剿办商团乡团土匪，解散田主维持会，拿办罪首江耀忠、江建、刘寿明、江照楼四人，各查封其家产，并拿办指挥作反新委花县谭县长，以遏乱源，而维农会。

11月

11月1日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设立之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习期满，在惠州会馆举行毕业礼，由彭湃主席，到会来宾甚众。

11月6日 鹤山县青年社致电孙中山、胡汉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称：反革命派田主绅耆勾结商团土匪，迫压痛苦农民，仇视革命政府，已日烈一日矣。务恳我大元帅速令各军严加痛剿，并搜缴反革命派商团军械，以保民生而除后患。吾农民果欲除自身的痛苦，辅助革命之进行，犹须武装起来，增加实力，然后始能与反革命派周旋，而竟革命之全功。

11月9日 佛山南浦乡日前曾组设农会三所，并办有农民自卫军百余名。有驻防某军，以该农会第三分会所系北帝庙改建，拟将变卖。惟乡人以该庙系乡有之物，非系官产，驻军实无权变卖，致群起反对。该军以乡人反对，突于8日出其强硬手段，带兵数十人，先鸣枪数百响，即冲入该乡，拿去农会一名60余岁之老杂役。本日，又带军队百余人，亦先鸣枪千余响，蜂拥入乡，将该第三区农会全座拆毁，并搜去农民自卫军长短枪支十余杆。

同日 虎门怀德乡近有农会成立，该乡土恶邓远昌、邓庭辉、邓国修等，是日率烂崽数十人，撞进农会连放十余枪，将孙中山肖像及国旗、农旗撕烂，并将家具抢劫一空。

11月11日 孙中山任命工部部长廖仲恺兼任农民部长。

11月12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就9日下午怀德乡乡团长邓远昌、邓国修等，纠集团丁及烂崽捣毁农会，拘捉会员，“希即就近严令该乡团

长立即释放被捉会员，毋得扣留毒打，致干罪戾，是为至盼”。

同日 《广州民国日报》报导：为南浦乡农会会所被驻防军队毁拆事，广州市郊第一区农民协会林宝宸等致电孙中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胡汉民、各军总司令、各工社团、各区乡农会，“请我革命政府，将驻防南浦军队，认真惩办，以儆效尤，否则仅具雏形之农会，不特人人自危，抑亦无难解体立见也”。

11月16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发表减租宣言称：我农民为谋自救计，为争回自己之利益计，爰于（旧历）九月初七日，在县会议决，按各区租额之程度若何，而减轻负担之程度。惟求一日之劳动，有一日之给养。倘有为富不仁田主，行其虐取政策，不谅农民苦衷，我农民惟有团结团体，与之周旋，不达减租额数，以收回应得利益之目的，誓不甘休。同日广宁农民协会还发表给田主的一封信，说明减租要求，原出于万不得已之举。望田主依照本区公议成数，公平完纳。

11月20日 广宁潭墟地主劣绅召集减租区域内之绅富会议，议决一致反抗，相约到收谷时佩齐枪剑，虽打死亦不承认抽取升合。会后贴出反对减租的告示，内有“各业主概不承认，各业佃切勿混交。倘敢违抗，乃属自误”等语。

11月25日 广宁劣绅成立业主维持会，召开会议，决定一致联合反抗农民减租，并向省县两署诬控农会。当晚，出动武装围攻古楼营区农会会所。

11月26日 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达广宁拆石，与周其鉴等人会合。

11月28日 上海《民国日报》广州电称：市长选权，原定仅士工商三界，现农界力争加入。

12月

12月1日 广宁县长蔡鹤朋召集业佃双方和平会议，各区农

民代表按时到会,却不见田主代表到会。潭墟地主江汉英、江淮英于是日纠集匪团百余人袭击社岗农民协会。县农会代表为此往见蔡鹤朋,蔡语多替田主辩护。驻军何克夫旅李营长竟谓农民压迫田主,无怪反抗。

12月2日 广宁县农会代表于是日晨再与蔡鹤朋交涉,辩论甚久。责其坐观农民陷溺不救。蔡仍无若何表示,只允出布告,制止双方战争,静候解决。

12月5日 彭湃向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报告:广宁潭墟地主匪徒于12月2日再次进攻社岗,并在螺岗开始用武力收租。县长偏袒地主,对于地主和匪徒进攻农会抢劫农民之类的事情则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当前形势仍然严峻,请求立即把驻在花县的十名驳壳枪队员派来。

12月7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发表减租运动第二次宣言称:本会但求贯彻此次减租运动宣言,行动至为正当。乃有潭墟田主,恃强压迫,纠集土匪流氓,联络各区绅富,秘密结社,立意摧残,围攻我古楼营农军,袭击我社岗农会,劫掠我洞尾农民,收缴我农民枪械,进袭我塘迳步哨,反对我农会减租,种种破坏农会压迫农民之不法行为,已经使我农民忍无可忍。本会为拥护农民利益起见,惟有根据孙大元帅发表对于农民运动宣言,一面呈由政府缉匪惩凶,一面实力自卫,武装恢复潭墟江屯农会,以与不利于农工人之特殊阶级相奋斗,不达目的不止。

12月10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各乡区执委和代表约五百人集会,提出向县署请愿的九条条件,即:1解散业主维持会;2缉拿祸首江汉英、江淮英等;3逮捕潭墟团局匪徒;4解散潭墟团局;5解除地主武装;6勒令田主赔偿战时一切损失;7拿办省署通缉拆毁农会之劣绅;8恢复潭墟江屯农会;9出示布告地主,不得违抗农民公决减租成数以恤农艰,及严禁 地主自后不得持械纠匪强迫收租。会后游行,沿途高呼:实行减租、万众一心,打倒压迫农民的田

主、实行自卫，农协会万岁，国民党万岁等口号。及抵县署，派代表向县长蔡鹤朋递交请愿书。蔡阅后，代表请照办。蔡与代表辩论，仍袒护田主，但卒为代表战胜，答应即实行拿办江汉英，及承认执行其它各请愿条件。

同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发表第三次减租宣言称：如县长仍不迅即执行九条条件，本会为保障农民团体拥护农民利益起见，当即根据政府宣言，直接行动。

同日 广宁县古楼营、井窟两区农民代表五十多人，在去县城参加请愿巡行途中，遭潭墟团匪截击，重伤二人，掳殴四人，其余伤者十余人。由社岗派生接引之农军队员陈桂燊被乱棒打死，弃尸荒野，为状甚惨。

12月11日 广宁、花县、香山、顺德、南海、番禺、新会、清远、曲江、云浮、宝安、鹤山、海丰、市郊14县47区农民协会以18万会员的名义发表政治宣言，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之国民会议。

同日 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奉命救援广宁农民，是日晚8时在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率领下到达社岗，与彭湃、周其鉴、陈伯忠等人会合，决定翌日包围潭墟。

12月12日 晨7时铁甲车队配合农民围攻潭墟。敌退守江姓炮楼，负隅抵抗。铁甲车队少尉排长张宏远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治身亡。

12月13日 廖乾五赴省城报告及请援，路过四会，往见粤军第三师长郑润琦，向其通告广宁情况。并把往省请兵大意说给郑知。郑态度暧昧，却又缮函一封着带交廖仲恺，大意是说极力保护农会以副部长爱护农民盛意。

同日 早七时，广宁南区团总冯思泰及第八区团总陆少蓬等纠集十三乡匪徒五十多人，袭击锅元区农军，缴击抬枪四杆，洗劫农村，掳去会员七人，掠去财物甚多。同时江屯地主江海宴率匪徒八十余人，四处焚烧农民屋舍，焚毙男妇老幼数十人，财物被掠一

空。事发后，广宁县农会致电各界请援助。

12月14日 广州市郊区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长林宝宸，因反对崇文两堡联团总局藉口办团加抽田亩捐以行剥削，13日在招村被民团围杀。是日晨廖仲恺得到报告后，当即写信给代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胡汉民，请政府将团局局长彭楚立（曾任广州商会会长，又是廖仲恺的亲戚）、副局长苏春荣两人扣留，令其交出凶手，并将该两堡联团局封禁，“以为白昼任意杀人、阻碍农民运动者戒。”后经几次催促，终将彭扣留，勒令交凶。

同日 廖乾五在中央党部向廖仲恺报告广宁情况，并将郑润琦函交阅。廖仲恺以为第三师已负完全责任，只另电他运大炮往潭墟，无庸此间派队。为早日解决广宁农潮，决定组织绥辑委员会。商定廖仲恺后函达大本营，因有胡汉民铣电发出。廖乾五于19日傍晚回到社岗。

12月15日 粤军第三师所派两连兵约一百三十余人到达潭墟，受到江汉英、江淮英等一班地主的欢迎。该部即向铁甲车队发出两件通报，竟谓：“现据广宁各乡绅士呈报，社岗等处乡民与农民发生冲突……敝师长以所报非虚，形同捣乱，无论任何方发衅，均应制止。”“农团军行为殊属越轨，请台务极力开导制止其暴动为要。”

12月16日 廖仲恺草拟给郑润琦、蔡鹤朋、廖乾五、彭湃命令：“前派大本营铁甲车队开赴广宁，保护农会，剿办匪徒，续经第三师派兵一营，前往当地协同动作，谅匪徒不难平定。惟此次调兵，全为护卫农民，清除土恶，务使横霸乡曲、损人肥己者，绝迹销声，不为农害。凡属良民，毋许侵扰丝毫，用符政府捍卫人民之本意。”命令特委蔡鹤朋、彭湃、廖乾五为委员，并请郑润琦派高级副官一人前往广宁，会同组织委员会，办理该地方绥辑善后事宜，并将情形随时具报。此令以胡汉民代帅铣电发出。

同日 11月9日东莞怀德乡恶霸邓远昌、邓庭辉、邓国修等

率武装捣毁第三区农会会所、滥刑掠禁会员一案，经该农会呈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察核，并经省署咨行就地防军及县署严究在案。但各防军及县署均未执行。旋经农民部阮特派员前往，会同防军、县署办理。不料各防军及县署仍置之不理，不肯执行。以致农民有苦莫伸，土霸竟得逍遥法外，而且凶焰更炽，率凶强勒签名迫令解散农会。东莞第三区农民协会被迫续呈农民部，“乞迅速咨派党军到区保护，维持地方秩序，并速咨达省署，即将邓远昌、邓庭辉、邓国修三人下令通缉，为不法者戒，并查封该三人家产，为本会及会员惨受损失赔偿，以警效尤而维农会”。中央农民部据此致函广东省长胡汉民：“函请贵省长查照，饬东莞县长遵照，务将恶霸邓远昌、邓庭辉、邓国修等人紧急缉拿究办，以警效尤，并饬对于农会妥为保护。”胡汉民于是日电令虎门要塞陈司令、东莞梁县长：“查此案前经电准陈司令查复被捉之会员邓雨等两人，已先行释放，余俟会同切实办理。等因。嗣接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函，谓邓雨兄弟仍遭押未放，又经分电查办各在案。兹准前由，除函复外，应请陈司令迅照先今各电，会县查明，分别拘讯保护，妥办见复，并仰梁县长遵照办理。”

同日 詹学新率粤军第三师一排来社岗，会见铁甲车队长徐成章。双方同意令业佃双方停止战争。

12月18日 廖仲恺致电驻防四会粤军第三师长郑润琦：“迭次函电计达。顷由许总司令函转尊处报告内称，特派副官长詹学新率兵一营，前赴社岗，相机办理，并切实保护农会，具见为本党尽力。惟此间特派员报告，土霸凭借碉楼之固，并招聚土匪，四面来攻，掳杀农民，贵部一营，尚未派到，情形危险殊甚。请饬该营带炮一二门，星夜前往应援，将碉楼毁灭，使不得负隅抵抗。本党为劳苦农民利益计，断不能令任土霸猖獗，否则本党保护农民之党纲，不能实行，于本党前途，影响甚大也。诸希尽力。”

12月19日 广宁县农民协会、农民部特派员、铁甲队联名邀

请驻防潭墟的第三师官兵到社岗参加农兵联欢大会。是日午开会，到会者约五千人。会场万头攒动，围观如堵。首由周其鉴宣布开会理由。继由徐成章、李汉魂（第三师营长）、彭湃、罗国杰等人演说，宣传农兵联合的意义和设立农民协会的真相，听众鼓掌之声不绝。最后演出国技、双簧、革命剧等。下午5时半结束。至此，第三师已由到那时完全站在地主方面，而变为采取中立态度。

12月22日 胡汉民铣电由郑润琦寄到驻潭墟部队，并经转到广宁县署和铁甲车队。

12月23日 廖仲恺致郑润琦电：“马电奉悉。委员会自应遵令从速组织，以资裁判。至江淮英、江汉英两人请先逮捕交委员会审讯为要。此层贵部能否办到，来电并未声明。查许总司令巧（十八日）电已令尊处严办，勿任土豪劣绅狡逞，淆乱黑白。良以恶草不锄，将来滋蔓，必为吾党之害。请兄立下刚断，切勿游移。”

12月25日 铁甲车队移驻县城内之圣庙（原农会会所），围观军容者不下二千余人。副队长周士第出面演说：“甲车队奉令来宁和此次来县城一切经过，专系为农民利益而奋斗。我国民党军队觉得农民委实痛苦，无怪我广宁革命农民，人人奋起。希望全广宁农民个个联合起来，我甲车队奉令到此，誓与革命农民同生死，望各位认真努力，争集会结社自由，争农民自己利益。”

12月26日 广宁绥靖委员会召开预备会议，四委员皆出席，宣读胡汉民铣电，讨论并通过会议细则草案，确定议事日程。廖乾五、彭湃提出惩办祸首、解除田主武装、解决减租、赔偿损失、恢复农会诸件，只略为说明，即散会。

同日 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召集各职业团体代表开会，根据章程规定选举11个职业团体与社团为执行委员，6个团体为候补委员。广州市郊农民协会当选执行委员，广宁县农民协会当选为候补委员。

12月27日 广宁绥靖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只议决缉拿祸

首 8 名(即江耀南、冯月庭、江汉英、江淮英、黄鄂棠、冯思泰、陆少蓬、谭倡松)及收缴反革命派田主武装两案。

12月29日 社岗农民12人往抬陈桂燊尸首,突被潭埔团匪用枪轰毙4人。正当双方静候绥缉委员会解决之时,田主又复向农民进攻。消息传来,铁甲车队士兵也异常愤怒,当晚8时半,由赵自选、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围缴团保总局42名枪支,同时廖乾五、徐成章、彭湃在宴席上拿获团保总局长谭倡松。乘夜派赵自选往省报告及请援。翌日晨,铁甲车队押谭倡松返回社岗。

1935年日本驻华总领事会议记录

杜春和 耿来金 整理

编者按:1935年4月8日至10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驻华各地总领事会议,由各地总领事汇报所在地区详细情况,分析与讨论日本在扩大侵华过程中的诸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案,提出建议,以便提交日本政府制订对华政策时采择。由于这次会议“所负使命至重且大”,内容严格保密,故当时中外新闻机构虽作过一些推测性报导,但详细内情“未由探悉”。尽管南京政府不久得知了这次会议的详情,但也未公开其内容。

我们这里公布的这份会议记录,原存本所图书馆收藏的“胡适档案”之中,系中文油印件。它是一位叫徐雄飞的人寄给胡适的。徐在附函中说:“适之先生:兹寄上‘日本驻华领事会会议记录’一册,不知能否收到。此原系秘本,是去年底得着,也许先生还没见过。倘先生阅后有感而见诸文章,尚望勿从正面提到这本记录,更不要提到它的来源。祝先生健康。后学徐雄飞。四月二日。”虽然我们尚不知徐雄飞是何人,他又是从何种渠道得着此记录,但无疑这是一份日本驻华领事们研究侵华政策的真实记录,并为日本政府制订新的侵华政策提供了重要情报和依据。它对于研究“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前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有重要参考价值。

第一日会议情形

时间：昭和十年四月八日。

地点：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

出席者：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驻平代办兼参赞若杉、商务参赞横竹、华文参赞有野、一等参赞堀内、参议岩井、情报部长芦野、书记横川、驻京总领事须磨、驻沪总领事石射、驻汉总领事三浦、驻闽总领事坂根、驻济总领事塚本、驻粤[津]总领事川樾。

列席者：日使馆武官室陆军武官代表影佐、海军武官代表佐藤、上海首席领事杉原。

缺席者：驻福州总领事宇佐美（在途未到）。

主席：日使有吉明。

记录：书记横川。

一 主席致开会词

诸位：本人在未述开会词之先，请诸位起立，为上海事变帝国死难者致哀三分钟（全体起立）。溯自广田外相变更外交对华方策。由水鸟进至啄木阶段后，顿引起各地之猜忌；他方面，中国因将濒于经济破产，而猛向欧美诸国发生密切之经济关系，藉以振兴市场，复兴农村，冀在增加国富之主题下，与帝国作长期抗争。此外，如“赣匪”西窜，中国之军事中心转移。满洲帝国的成立，基础奠定后，中国官民对彼之真意究为如何？中日经济关系，须以如何方式始能纳之常轨等等，我外务省异常关心，故外相方决定有对华会议之召集。其目的不外求得解决上述诸困难问题之捷径。外相更为集思广益计，复命予召集驻中国各地总领事会议，作确定对华外交战略之初步商榷，则本会议无异对华会议之预备会议，其所负使命至重且大也。

本会议召开之理由，既如上述；则本会议应行商讨之內容，不难想像而得。再明白述之如次：1、各地馆务应如何改善；2、如何推行有利于帝国之中日经济调整；3、确定对华外交路线；4、如何拆散英、美、华等现在进行中之经济阵线；5、如何制止排日运动；6、如何恢复华人对日好感；7、如何倾销日货。除以上规定者外，如有遗漏者，亦可临时提出。总之，务期达到不负本会议召集之目的为止。望出席诸位，深思详虑，各抒伟谋，为帝国筑一完成大陆政策之坦途。最后谨以赤诚预祝本会议成功。

二 宣读各地报告

1 驻平代办若杉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政治 自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后，一切政务原由该会直接处理；无如冀、鲁、晋、绥、察等省主席多握有兵柄，并因派系复杂，视该会政如同具文，其人自为谋之现象，实散沙一盘耳。且该会负有折冲华北方面对日外交之责，但各方意见多不一致，实为该会最感棘手者。该会因是名不符实，政务整理委员会竟不能整理政务。该会委员长黄郛氏时时称病请假，其原因在此。故在最近期内华北政务实无清明之望。

B 军事 北平军分会，为总揽华北军权之最高机关，然其不能充分行使其军权，则与政整会如出一辙。考冀、鲁、晋、绥、察等省之驻军，大别之可分为三系——阎系、依张系、韩系。除此三大系之外，则为蒋介石氏之直系部队，而能听平军分会之指挥调遣者，亦仅此一部而已。盖三系部队各自遵行其首领之命令外，又复视利害关系之若何，或合纵，或连横。在实际上，目中并无平军分会之存在也。平军分会成立至今，行将三载，而无所成就者，非无故也。至若

何敬之氏之谋略，不足以肩此重任，亦为附带原因之一。

C 社会 北平因有数百年建都之历史，文化居华北各地之上，但惟其为历史上之首都，民众思想泰半封建而落伍，所仅存之优点，仅质朴刻苦而已。其民间生活，多因受不景气之影响，极不安定。能丰衣足食者，实不多觏也。

D 经济 北平经济状况，就纵的方面而言，自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后即逐渐衰落，至大正七八年而达极点。平政整会及军分会成立，虽曾一时转好，然昙花一现耳。就横的方面言之，在大正九年末，北平银奇紧，商店倒闭，层出不穷。据北平市商会之统计，富有历史营业谨慎之商店，倒闭者约占百分之十至十五，此足为北平商业不振之明证。至于工业多系手工业，无新式者，其困危一如商业，或且过之。金融一业在北平可称骄子，各银行、钱庄几无家不获利润，民间经济除少数例外，均陷于穷苦中。

E 华方对我之态度分述如下

a 官官[方]# 华北官方对我之态度，无论军政当局，均以不惹事生非勉维现状为主旨，凡百我不苛求，一切均可迎刃而解，可谓之对我系妥协态度。

b 民众 民众中之智识阶级，百分之九十五为主张排日者。商人者仅唯利是视，对我无所谓好感恶感。一般民众，民智不开，国家观念薄弱，抱独善其身之主义。故帝国在华北之行动，若不直接妨害其个人自由权利，则漠不相关。

c 排货 排货运动，在大正七八年间，时断时续；近则主张者自主张，贩运者自贩运，此项运动已销声匿迹矣。

乙 对华交涉

代办所负之对华交涉，如通车，通邮，长城各口换防，及战区编新保安队等，均秉公使意旨，会同关东军特派负责人员与华方交涉，采取盘马弯弓之策略，故着着均占上风。唯因有关东军人员参加，步调常不一致，不无美中不足之憾耳。关于此节，迭有专文报

告，兹从略。

丙 当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商业状况

华北经济中心地在天津，而内外蒙之出产品，则以张家口为散集地，北平仅以地方政治中心地而已，故帝国在该地之商业，什九系零卖商，营业不发达，所获仅蝇头微利而已。工业几绝无。而其金融因中国【首】都南迁，已失去其重要性，故北平之正金、台湾、三菱、三友、住友等行出张所，亦只聊备一格，无前此之鼎盛也。

戊 该地帝国居留民情形

在北平之帝国之居留民之最高自治团体为居留民会，其组织尚称健全。居留民中，有固定职业约占百分之八十五，无职业者约占百分之十五，但大部分受有使馆，或关东军部、满洲国、外务省之补助，因其生活能维持，不特能相安无事，且能为帝国效忠，至于此百分之八十五居留民之职业分类，约为商人占百分之二十，自由职业占百分之八，官吏约占百分之三，其他占百分之二十九（派遣军警不在此内），侨民总额共二千三百余人（包括台湾人）。

己 建议

- A 排货问题已无形中止，应乘机辅助零卖商人向察、绥，及进出口商向内外蒙、新疆等地发展。
- B 北支一切交涉，仍采不即不离之态度，就地交涉。
- C 对无职业侨民，应相当加以约束，以免操之过急，引起华人反感。
- D 北平为中国文化有数地区，应在该处建立文化开拓陈列。
- E 收买工作，应继续扩充。
- F 应设立对华人以连络为名，麻醉为实之团体。
- G 低级官员俸给应酌予增加。

2 驻京总领事须磨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政治 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亦即中国之中心地也。然在事实：西南——桂、粤两省，藉西南政务委员会为发号施令机关，而与国府对抗；川、滇、黔三省，在赤军未西窜前，宁方对之亦有鞭长莫及之叹；至于晋、鲁诸省，不过在名义上听命而已。故南京政府实际统治之省区为江、浙、闽、皖、赣、豫、鄂、陕、甘等省区，亦即蒋介石氏直系部队驻在之省区，因是蒋氏在无形中，亦取得中国领袖之地位。在蒋氏实力笼罩下之南京政府，虽实际上能绝对支配，终因西南有胡汉民氏之对立，不能不借重汪兆铭、孙科两氏之助，以资应付。于行政院为改组派所占据，立法院为两造派所把持，而造成汪、孙二氏，亦为南京政府之支柱。基于上述之原因，南京政府关于政治之设施，要员之更换，有时须得蒋、汪、孙三氏之同意，方能实行。隶蒋氏之下者派别更多。如杨永泰、黄郛、张群等为一派；陈果夫、叶楚伦等为一派；宋子文、孔祥熙等亲美者又一派，此诸派在前提均为拥蒋，而在主张上各不相谋，有时且互相诋毁，形成南京政府之独裁政治系建筑于多头之上，基础极不稳固。至于所谓一党国者，不过纸上文章而已。南京政府之政治组织极其特殊，于军政部之外，有军事委员会；与[于]财政、实业、交通、铁道等部外，有经济与建设两委员会，因之设政令常不统一，而蹈【叠】床架屋之弊。此外各院部负责人员，多不能公忠体国，仅知替所属之派系努力，及为自己个人努力；至于中下级人员更等而下之矣。

就表面言，南京政府系在国民党指导之下，其由蒋介石氏推动之新生活运动，亦已实行年余，然而国民政府施政之成绩，仍与往昔北京政府相差无几，此无他，仅骛虚声，不从实际着手也。然而在统制金融，发展交通，尽力治河各部门中奋进不懈，则其将来为之结果，亦必可观。

B 军事 南京政府之军事实权操于军事委员会，亦即操于蒋介石氏个人之手。军委会具有军政部、海军部、参谋部、军事参议院等四院部之权，在实际上，此四院部不过备员而已。因此蒋氏已形成中国唯一之军事领袖。蒋氏个人近年来因欲巩固本身地位计，及含有若干扩充国防成份；努力扩充军备，除海军尚无成就外，陆军方面，在数量与质量上较昔进步，尤其重炮兵之编练，不能不引起吾人之重视。发展空军，为蒋氏唯一目的，除已完成杭州两航空学校，及浙、赣两省——尤其赣省——广辟飞机【场】外，其现有之防空飞机确数虽不能断定，然大约估计，蒋氏所拥有可用之飞机，至少在三百架以上。其次为增辟有关之军事交通路线。盖蒋氏之军事中心，在扬子江右岸沿江一带，故为灵通军运计，以全力发展有关军运之交通路线。如完成浙赣铁路，兴建东粤铁路，完成五省市公路联运等，即其明证。蒋氏治军之着眼在训练系统化，故一切军事教育机关，多直接或间接以彼之名义行之。自蒋氏长黄埔军官学校起至最近止，蒋氏均秉此为治军一贯政策，就中最著成效者，莫如庐山各期军训团。南京为国民政府所在，故警卫异常周密，除驻有大批军警外，南京近郊之防御工事已在着着秘密进行中，且已完成大部。在上段及本段中，所述之南京政府政治、军事情形异常简略，不过仅绘出轮廓，至其详则非本报告所能罄也。

C 社会 南京社会形成，就一般而言因其政治中心地，且东与东亚大埠上海相接，故已由封建而步入具有现代化之阶段中。如习尚，如衣食住行娱乐等，莫不在此一定轨道中推进。除一般中下层阶级人民外，已不能保持过去俭朴之风矣。南京之社会，若表面观察尚属安定，但就其内幕言，失业者与人口总数，几为十与二之比，隐伏危机，良堪注意。

D 经济 因南京系政治中心地，故一切经济活动，暗中实受上海之支配，结果仍与上海同样不景气。他姑勿论，如最著名之京缎业，近已一落千丈，颓势难挽。新式工业中之制蛋业，亦无生气。幸

南京大部居民多直接或间接恃薪俸为生活，尚未卷入不景气之狂涛中，不然，南京经济动脉之紊乱与骚动，当比目前为甚矣。

E 华方对我之态度

a 当局 握有最高军政实权者，内心都对我不满，然因实力不充，对我莫可如何，乃转而为敷衍我，以勉横生枝节。其负有外交责任者，惟知以不发生变故为能事，含有惧我之因素。故帝国对华外交，因对方负有此弱点，在无形中已获得胜利。其他政府官员，多对我存敌视之心，当在可能范围内设法消弭之也。除上述之外，当局中亲英美派则力言排日，实为我折冲对华外交之最大阻力。

b 民众 民众之有知识者，则均仇视帝国，而一般浑浑噩噩之流，对我无所谓仇，亦无谓亲，将来能供吾人利用者，亦即此辈耳。

c 排货 排货运动虽已无形中止，但帝国商品仍不能在南京市场畅销。此中原因，实为富有购买力者大部为政府官员，唯不愿负购买日货之恶名，此种心理之大数，若不设法消除，则帝国商品纵使廉价推销，亦难有若何成绩。

乙 对华交涉

总领事在任内之对华交涉，最重要者厥为藏本副领事失踪案。在该案进行中，已有获得意外收获之希望，无如华方将藏本寻获，致前项努力均成泡影。此外则为公使未来京时，向华方办理公使交办之交涉及有其他日常之交涉，均无甚特殊可记者，兹从略。不过统观总领事任内一切对华交涉，若能持一强硬态度，至低限度总可获得若干胜利，此点至堪注意，故特提出报告。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商业之状况

南京既非中国商业中心地，且帝国侨民不甚多。帝国在南京既无工业可言，而商业亦仅属零卖商，虽间有进出口商，亦上海本店之出张所，无巨额营业。故概括言之，帝国在南京之商业并不发达，能不蚀本者即属良好矣。

戊 该地帝国居民情形

侨居南京之帝国人民，总数约在三百五六十人之间，其中以零卖商为多，百分之九十八人均系生活安定，其生活不能维持者，或者自动或由领事馆协助遣回上海。侨民组织有居留民协会、工商会议分所、在乡军人分会等组织，均成绩平平，因各人忙于个人事业，少有余暇为公共组织尽力也。

己 建议

- A 今后对华外交方针，应贯彻“啄木”主张。
- B 仿效波兰公使办法，设法成立类似中波、中德、中法等学会之“中日”组织，以联络中国知识阶级人士。
- C 请工商省补助在京侨商，推广商务。
- D 增加馆员名额，专事联络中国政府官员。
- E 增加中下馆员薪金。
- F 延长扬子江右岸情报网，以灵通中国军事中心地建设消息。
- G 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应在南京成立支部。
- H 其余详所提专案。

3 驻上海总领事石射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政治 上海市为直隶国民政府行政院之组织，市政府为最高施政机关。市长吴铁城为因地位计，自上海事变后，即着手兴建“大上海”，以建设美名排除攻击者之藉口，而在事实上，所谓市中心区之建设，亦具有若干之成绩。自去年起，吴氏兼任淞沪警备司令，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吴氏已志满意得，唯美中不足者，社会局长吴兴亚氏，教育局长潘公展氏，均隶属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氏之下，因背景不同，时感不能收指臂之效。

B 军事 因上海协定之规定，淞沪区在内为不驻兵区域，然合计上海市公安局全体警察、保安处全体士兵、驻沪宪兵等三项，实

力几达八千人，已超过帝国派遣上海陆战队数一倍以上，唯武器远不如我，一旦遇有类似上海事变发生，暂时尚可应付，但恐难长期支持。以京沪路及沪杭路沿线均驻有重兵，而苏嘉线亦将于年内完成，则在上海南西平方公里以内之华方军运敏捷，我将受其制。此点应请军部注意。

C 社会 上海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已成国际都市。因此社会上一切活动均有现代典型。在他方面，因华人富于保守性，故一部分居民异常守旧，于是整个上海社会，遂为新旧两极端阶级所占有，所有一切光怪陆离，诈伪欺骗，作奸犯科之事，均根源于此。再者，上海社会有一畸形组织，即“青”、“红”两帮是，其中流品复杂，足供帝国利用，年来已收有成效，今后当进一步而扩充之（利用青红帮）。

D 经济 上海为中国经济核心，能彻底明了上海经济情况，即能详悉中国经济动态。自世界不景气以还，上海经济既步入艰窘之中；更因中国内地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农村经济破产，现金集中上海而无法运用。而在事实上，更有出人意外者，因国际借贷之无法抵补，因美国之提高银价，白银外流，最近半年来反筹码枯竭。即此一端，以充分反映整个上海。现金集中之上海，亦即整个中国经济恐慌之全貌。其次，上海经济之窘迫程度，可以一年来中国金融市场折息变动之事实说明之。盖普通观察中国金融市场，多以上海折息为准。1934年1月，因福州事变解决，又值商清淡时期，故折息极为松弛，平均计为五分。2月素为淡月，故折息平均只为一分左右。3月平均为三分。4月以后，因农产品登场，逐渐上升，平均为四分。5、6两月平均为六分。7月迭二分。8月市面紧缩，平均逐渐升至九分。9月更至十二分。10月份以白银开始外运，即节节上涨，至11月，竟出四角大关，实罕有之象。12月虽稍迭，亦在十分左右。因现金枯竭，故折息方渐上升也。

上海之进出口业，居中国各埠之冠，故上海对外贸易，足为中

国对外贸易之代表。在上年国际贸易局公布之报告，上海之进口业呈空前之不振，尤以进口业为最，足证明中国一般购买力之低落，而为上海或中国经济恐慌之有力说明。

上海各业中最不景气者为纺织、火柴两业，其他如最可靠之地产，几至无人过问，以致倒闭停业之商店工厂不知凡几。在前最繁盛之南京路，今已成不景气街之代表。然在此情形中，有一相反之事实发生，即在商业萧条之现状下，而投资消费事业者大有人在。吾人于此，可得一投资生产事业无利可获之反证。据上海市商会之统计，1934年中，沪上获利之商店仅为总额之百分之三十五而已。犹有一事，更为吾人所注意者，即钱庄庄票在上海市场上向为最有价值者，今竟时常发生不兑现之事，而不能如往昔之流通市场上而无阻。由此观察，可知筹码之枯竭程度，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矣。

在上年中，各业总结账报告，仅银行一业有利可图，就其表面似金融业之繁盛，乃市场极振之结果。考其究竟，乃因市场不振，各商店工厂纷向银行以最高折息抵押现金，而银行乃能因此获利。关于此点，亦足为上海或全中国金融恐慌有力之例证。上海及全中国经济恐慌之原因安在？一语破的，则为农村破产，购买力极度低落，寝假而工厂存货山积，商店营业清淡，似此情形，上海及全中国之经济，必然发生极度之恐慌。中国政府有鉴及此，乃有复兴农村之计划，及督促各银行对农村投资，此举固系对症下药，但投资数额不巨，杯水车薪，于事实无多大裨益也。

根据以上所述，总领事提供正反两点，兹先就正面而言之，欲求帝国制品能在中国畅销，当先望中国能在短期恢复景气，然而中国恢复景气后，中国之国货制品及美国制品必为帝国制品之最大劲敌。帝国制品能否畅销尚属疑问。再从反面言之，因恐有上面正面之结果，则设法延长中国不景气之局，其购买力必愈低落，纵以极廉价格倾销，恐亦难达到如期目的。故总领事认为，本会议应定一能握中国经济枢纽，而在事实上又能办到之方案，则将来在任何

情形之下均能运用自如，左右逢源也。

E 华方对我之态度

a 当局 上海市当局，自上海事变以后，时以再度引起类似此种事件之发生为惧。故在表面上之态度，为“敬鬼神而远之”，而其内心，因无时不愤懣不平也。

b 民众 兹分三类说明如下：(1)反帝国者，此类为各学校教职员、学生、作家、新闻界、一部分富有民族思想之商人、律师、工人等。(2)模棱两可者，此类多系无知识商人、妇女等。(3)拥护帝国者，此类一部分商人及帮会中人为多。

F 排货 因帝国之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排货运动，而中国政府在表面上，又不得不敷衍而作官样之取缔，故在上海之公开排货运动刻已停止，而排货之潜势力则尚存在，虽不能公开及充分发生其作用，但究竟为帝国对华贸易进程中之暗礁。

乙 对华交涉

闻上海事变后，由驻上海总领事馆与上海地方当局之交涉，多属琐细事件，无甚可记者，但总括言之，所有自昭和七年以来之对上海地方当局之一切交涉，均无丧权之和处，总领事或可告无罪于万一也。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商业

A 工业 帝国在上海之主要工业为纺织业，虽值昭和九年末及十年初之中国极度不景气，然以有帝国之补助，故营业均较上海之华、英纺织业为佳。其次为日用品制造业，虽无利可获，然亦多能勉维现状。

B 商业 帝国在上海之商业，营业最佳者为海产业、糖商，次之者为日用品商，再次之者为五金机械商，最劣者为航业之日清汽船公司，幸有政府之常年补助金以资周转，否则殆矣。在华出口业

者以三井、三菱等为巨擘，现因汇率关系，营业不如往昔。

C 金融 银行中之正金、台湾、住友、三井、三菱、东亚、兴业、拓植等上海分行，昭和九年之贷借对照表，均有纯利列入。

戊 该地帝国居留民情形

旅居上海之帝国侨民，总数约为 27000 余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为商人，侨民组织有：(1) 居留民协会；(2) 日本人俱乐部；(3) 日本人青年会；(4) 商工会议所；(5) 棉纺上海支部；(6) 在乡军人上海支部；(7) 上海万国义勇团日本队。以上各团体，均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为帝国之有力臂助。侨民中有少数不良分子，其行动常玷辱帝国，近总领事馆已拟具严厉取缔办法，交由警察署切实执行。侨民创办之各级学校，成绩尚属不恶，应更进一步由政府扶助其扩充，以收最高效率。

己 建议

- A 议定掌握中国经济枢纽之有效方案。
- B 扶助侨民各项组织之发展。
- C 应在倾销以外，另定扩充对华贸易捷径。
- D 外务省驻沪文化事业部，应加以扩充。
- E 重新规定各总领馆首席领事职权。
- F 增加中下级馆员俸给，或规定一日汇低落时之补助办法。
- G 各地总领事，应再谋更迅速确实可靠之联络。
- H 其他详所提专案中。

4 橫竹商务參贊報告

本人于上月（三月）奉公使命回国，分谒外相、商相，除述中国经济现状贸易入超之新形势，及帝国在华北投资分类统计，如何恢复对华商务等，外相、商相均饬本会议详为审议，兹将本人管见所及者，分别述如次：

世界各国之贸易现状，在 1933、1934、1935 年中各有数分好转

趋势；而中国则与此恰恰相反，背道而驰。中国之一切贸易已渐衰微，就中国之一般经济系统而言，因农村恐慌，及“共匪”、“土匪”、天灾、人祸等原因，遂陷入极疲敝困窘之境，在去年尾尤为恶劣，购买力减低；在他方面，工业因多种原因，至本年度益呈不况，为纱厂、水门汀、火柴、制纸，与其他近代工业，已达到不可言状之穷境。金融界自去年来尤甚，此则由于美国购买白银所致。因此之故，中国之内外贸易输入为十亿二千九百万元，输出为五亿三千五百万元。而1933年则为输入四千五百万元，输出为六亿一千二百万，合计为十九亿五千七百万元，其百分比去年比前年输入减少三成四分，输出减少一成二分。若与1932年较，则输入减少三成七分，输出减少三成。又与1931年较，输入减少五成三分，输出减少六成二分。1931年为满洲事变之年，亦即中国贸易状态最好之年，合计贸易税额为三十六亿五千万元（包括满洲）。自1932年后，逐渐减少其输出之比较，自1931年后入超甚大。查1931年入超八亿六千四百万元，1932年入超八亿六千四百万元，1933年入超七亿三千四百万元，1934年入超四亿九千四百万元，以上为中国对外贸易之梗概。至于国内贸易，在1931年，输出输入合计二十五亿零二百万，1932年二十二亿零五百万元，1933年十九亿六千七百万元，故之国内贸易亦呈逐渐减低之势，盖亦国内经济不况必然结果也。

虽然中国之对内对外贸易之所以衰落者，固因受世界经济之影响，但亦有特殊关系在，特殊关系者何？天灾、人祸为原因。天灾原非国民所能阻止，而在人祸为原因中，“土匪”、“共匪”，为中国经济不况特别原因中之为害最烈者。关于根本原因之天灾，南京政府对之虽设有经济水利等委员会以谋救济，然而人为的改良，则非短期间所能奏效也。此外中国经济体系中之危机最深者，为白银问题。查过去半年中，中国现银据海关统计，流出者达二亿六千万元之巨，以致发生今日金融梗塞病态，苟此问题一日不能解决，则中国经济现状之好转实无希望也。就事实言，白银问题之能否解决，

全视美国之态度如何为断。然目前情势观察，美国白银之购买政策，恐不能转变方向，且有继续提高银价之趋势，因是此问题，遂与白银、通货、财政均为不继财政之一环。白银问题已略如上述，而中国通货，果能与之并行昂贵乎？或可与白银相分离乎？南京政府虽已倾全力研究而行之，人为政策，辄归失败；今于莫可如何中，始采取健全通货政策，以平衡税、输出税力图补救然，海外银价高贵，欲谋银之流入，势有不能。且政府之力，又不能绝对阻其流出，更加贸易不振，华侨之税款减少，白银之安定，实非易易。现闻南京政府拟采统一发券制度，同时禁止外国银行发行纸币。但欲实行此政策，必须借款，而借款问题，因无确实担保，恐难实现，纵英美及我帝国均有援助之心，而具体办法，尚难提出也。

溯帝国之整个经济生存，几全建筑于出口贸易事业之上，故亟应努力发展出口贸易，自不待言。然自满洲事变后，我国之大部资金纷向满洲投入，虽满洲市场曾随活跃气象，然终因满洲市场自身之消化力薄弱，致帝国商品不能畅销。至其消化力薄弱之原因，则系由满洲输出贸易不振所致。考满洲之输出贸易，以特产品占首位，以受世界不景气影响，使大豆之消费减退，出口随之锐减，大豆、豆油之外销，大都输往欧洲，而以德国为甚，约占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六；豆饼则输至帝国。近来德国之油脂工业为振，及帝国之农业衰颓，以致形成满洲特产物输出额锐减之趋势，而往昔之出超变为入超。满洲国经济状况，目前既难入帝国商品绝好市场之选，故不得不向中国本部进攻，以图增加帝国之出口贸易，而维持经济生活之命根。然亦因中国之不况，及时断时续之华人排斥日货，难达预定目的。犹幸帝国商品在印度、澳洲、海峡殖民地、东非洲、新西兰、荷属东印度、中美洲、南美洲各地能占优势，稍偿对华贸易不振之损失。但自世界经济会议失败后，各国在上述各地竞采保护贸易之政策，实行经济关锁主义，于是我帝国之商品，遂时受强力排击，而不如往昔之繁荣矣。帝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之情势既已变

化，为今之计，“中国市场价值之再认识”实为刻不容缓之因也。完成此项计划，仍应继续减低汇率，藉以诱致商品之价格腾贵而大事倾销，以奠定在中支之帝国经济基础，使与华北连络呼应，再进而驱逐欧美在华之经济势力，达到独占目的。惟兹事大，应由本会议详为讨论。

其次，就国际经济势力下之中国经济势力而言，中国经济实权均操于外人之手，故帝国欲建筑在华经济之特殊势力，除完成帝国商品畅销全华之伟大计划外，更应进一步，以强力与英、美在华经济力量斗争。英美在华占贸易上之首位，而帝国则在华投资上已着先鞭，今后应以“投资”之既成武器，打倒英美而获得对华贸易之第一位。换言之，即继续直接事业投资，以握中国经济之实权，而致英美之死命也。就目前中国政府债务总额而言，外债总额为五亿八千六百万元，其中帝国占百分之三十八·二，英国占百分之三十六·一，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六，美国占百分之七·一，德国占百分之二。吾人一观此比率，即知帝国在华经济上之势力，已具有与英美一战之可能也。兹更将帝国在华投资数字列表如下，以作史上之检阅。

甲 直接事业投资(单位千元)

运输业	20125
银行业及金融业	65,046
矿业	9,717
进出口贸易业	248,167
制造业	232,697
其他	72,105
总计	647,859

乙 中国公司团体之贷款

汉治平	40,000
-----	--------

南浔路	10,739
纺织业	7,988
地方公业	18,700
总计	77,427

丙 中国政府之贷款

有担保借款	45,469
无担保借款	200,089
交通事业债务(除铁道外)	35,433
铁道债务	176,164
总计	488,155
以上三项总计为	12,173,441

此外帝国私人对华主要借款大致如左表：

债权者及债权名	借款本金 (单位千元)
三井物产财部国库券	2,441
日本兴业银行	
第二交通银行借款	20,000
吉会铁路借款	10,000
满蒙四铁路借款	30,000
山东二铁路借款	20,000
第二次中国政府利息借款	7,997
第三次中国政府利息借款	5,286
第四次中国政府利息借款	5,300
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合组银团	
参战借款	20,000
参战利息借款	10,000
中国汇业银行	
有线电报借款	20,000
金磅森林借款	30,000

前二项三次利息借款	1,125
又五次	7,608
又六次	2,659
又七次	9,118
福建省证券借款	3,000
大仓组合	
财政部国库证券	18,81
中日兴业	
汉口造纸厂借款	1,000
第一次河南省借款	1,000
山东省实业借款	1,000
台湾银行	
江西省中国银行借款	1,000
广西士敏土厂借款	3,000
泰平组合	
兵器借款	32,018
又同上利息借款	16,470
林熊祥	
福建省财政整理及实业奖励金	2,000
兴业银行外其他银行(13 家)	
九六公债	39,603
以上与中国财政部有关者。	
东亚兴业	
有线电报扩张改良契约费	15,000
同上利息借款	1,765
平绥铁路借款	3,000
南浔铁路借款	5,000
平绥铁路二次借款	3,000

南浔铁路一、二续借款	2,500
三井物产	
平绥铁路机关车二十一架	
供给契约	2,953
同上枕木欠金	1,027
津浦铁路货者三百架欠金	102
中日实业	
交通部扩充电话借款	10,000
同上利息借款	1,690
电话材料借款	3,329
中国政府铁路五厘公债	20,000
以上与中国交通部有关者。	
其他债权人	
山东省库	54,000
汉冶平公司借款	41,000
裕繁公司借款	4,142

交通事业投资极为乐观，故今后应准此以谋扩充，根据上述提出建议如左：

- a 中国因经济恐慌，而致购买力减低，应再拆低日金汇率，以便倾销。
- b 继续对华投资。
- c 中国对英借款，帝国应绝对参加。
- d 向中国政府清理无担保及还款延期各项借款。
- e 详细方案请本会议决定。

5 驻汉总领事三浦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政治 在驻汉总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之鄂、川、湘等省区之政

治情形，各个不同，兹分述之：

a 湖北省 湖北为直隶于南京政府之省区，在夏斗寅主湖北省政府时，以夏氏非蒋介石氏之嫡系，其对南京政府尚有不听命之处，故蒋氏因杨永泰之主张，而保荐张群氏继任。张到任后遵蒋氏之意旨，刻鄂省已为蒋氏实力完全达到之省区矣。张在任内之一切设施尚无甚可议之处。

b 湖南省 湖南在最近数年，均为何健势力所独占，一切政令均以各人利益为出发点，近以局势变更，在表面上不听命蒋氏之命矣。

c 四川省 四川在新政府未成立之前，全省划为数个大防区，在大防区之下，又各由该大防区中之军事领袖之部属占据，而形成大防区中之小防区，与封建时代之部落无异。新省政府成立后，亦以为时未久，除忙于筹措军费外，亦无所谓政治也。

B 军事 关于军事情形亦与上节略同，仍分述如次：

a 湖北省 该省军权原操于夏斗寅、何成虯两氏手中，夏氏倒后何氏遂独尊矣。后张学良回国，蒋氏以何之地位不足以资号召，且为威慑何健计，乃任张学良为剿匪总司令，驻节鄂中，总揽军权。今春江西剿赤军事结束，行营移汉，更任张学良为主任，因是武汉已形成中国中部军事中心矣。

b 湖南省 在昔湖南之军政大权均操于何健一人手中，自江西赤军经湘西窜，蒋张二氏部队乘机开入，自是何氏在军事上，即不能保持独立优势。

c 四川省 自大正年间以来，四川之军事与政治均为分权的形势。刘文辉败退西康后，刘湘氏实力大增，已有凌驾一切之势。刘氏入京后，复拜剿匪军新职，已取得总揽军权之地位，更加蒋氏赴黔，又将委员长职权交刘氏代行，刘之威望日增。据总领事观察，蒋氏极力拉拢刘氏，使为己效命，但在事实上，将来能否如蒋氏期望，殊难料也。

C 社会 本管辖区内之社会情况繁复异常，兹述其大要如左：

鄂、湘、川三省，虽系接壤省区，而其社会情形则各有不同，如鄂人多诈寡耻，湘人好勇斗，川人喜争意气。故往者排日事件发生，在扬子江上游常以四川为激烈，湘省次之，鄂省更次之。

三省之民气，川人大部能刻苦耐劳，湘鄂不及远甚；至于团结力，则四川不如湘鄂。故三省区互有缺点，在必要时匀可利用之，惟究如何利用，则本会议不可不预为筹划也。

D 经济 汉口为扬子江中部货物集散地，亦即中国内部经济中心地也，至其尾闾，则为农村，近三年来因受天灾及不景气双重影响，农产品收获额及购买力同样减低，汉口之经济情形，于是陷入长期恐慌状态中，结果百业萧条。致帝国在该地之商业蒙莫大影响，兹将总领事【馆】中商务领事之汉口各业昭和九年度营业总盈亏统计，列表如左，藉作汉口不况之例证。

金融业	获全业总资本额
典当业	同右 7080
铜器业	亏本全业总额 80070
旅馆业	同右 110070
燃料业	同右 02070
杂货业	同右 15070
南货业	同右 44070
绸缎业	同右 63070
报关业	同右 02070
进出口业	同右 39070
饮食业	同右 65070
棉系业	同右 05070
桐油业	同右 41070
面粉业	同右 06070
机器五金业	同右 0670

印刷业	同右	25070
制蛋业	同右	04070
卷烟业	同右	58070
航业	同右	21070
其他(一)	同右	38070
其他(二)	亏本企业资本额	124070

就表面观察，金融、典当两业之获利态度，盖即不况之反应，其他获利最多者如卷烟业，亦仅百分之五八。如再与昭和八年百分之十三·三相较，则更相差远甚。据商务推测，在本年内汉口经济情况无好转希望。

湖南之经济情形，较湖北稍佳，以输出品较湖北为多，然亦在挣扎中，如能加以相当整理，景象之回复，实易事耳。

四川原为中国宝藏地，物产之饶，堪与奉天诸省相埒，无如战祸连年，捐税繁重，民不聊生，造成人为之不景气，果能切实整理，四川无异中国国富之源。川、湘、鄂三省区之经济概况，以上述竣之后，总领事认为湖北经济恐慌程度，较甚于川、湘两省者，虽原因复杂，而汉口已成半国际市场，经济动静机向川、湘猛进，造成商业上之独占局面，免为英、美捷足先登。

E 华方对我之态度

a 当局 在湖北当局，因受南京政府直辖，而南京政府既对我事事敷衍，故该省当局近对我亦时采好感。湖南省前为邀好民众，故曾一度暗助民众排我，近因何健之政治环境变更，已对我变改初衷矣。四川当局，前纯取放任态度，在消极方面确有暗助民众排我之嫌；但自刘湘受新职后，对排日运动已加以取缔矣。

b 民众 川、湘、鄂三省中，排日空气最浓厚者首推四川，其次湖南，至于湖北人则多见利忘义，前次昙花一现之排日组织，仅仅具有形式上之意义而已。而川、湘二省民众之排日比较激烈者，则导源于好争义气与好勇斗狠，故总领郑重声明，欲达前节所述，造

成独占川湘商业之目的，帝国应在表面予川、湘人民以好感，而求实际之获利。

c 排货 排货运动，在湖北早已停止，湖南亦未认真执行，仅四川一省，尚在继续中，但已不如前次之激烈。

乙 对华交涉

对当地之一切交涉，长沙、渝、万、蓉、宜、沙等地，由总领事指导各该地领事负责办理。统计一年来所办之交涉，以要求当地当局取缔排日运动为最要，幸均前后达到目的，其次如大杉、板根诸事件，均未丧权。

丙 该地馆务

A 行政 关于馆务行政迭有报告，今应重行申述者，则为在总领事馆与各领事馆之连络。除成都外，各地均驻有帝国军舰，异常便利。但成都与汉口相距过远，又系陆地，无特殊通讯设备，时感不便，应请公使对此加以注意。其次，驻在川境内之领事，时有受当地民众威胁之虞，应转请第三外遣舰队，增派驻川舰艇。复次，重庆为川、滇、黔为中心，且与汉口距离亦匪远，今后因蒋氏实力达到四川之故，将更见其重要，现当地领事中野高一已不能应付此局面，拟请另调能者接替。

B 馆员生活(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商业状况

帝国在汉口之工商业情形，虽与华商同一命运，营业不振，但因帝国在汉口之各银行，能尽力扶助，故均各平安无事。目前日汇低落，售价更廉，如糖、海产、棉纱、棉布、人造丝、日用品等已易销售，故在形势上实优于外商及华商矣。在湖南、四川之帝国商人，以业桐油及川丝为多，去年营业虽无利可获，然亦未丧元气。今年亦因日汇低落，营业恐难如去年。刻总领事已令商务领事预谋救济办法。

戊 该地帝国居留民情形

自汉口溯扬子江而上，各地帝国侨民以汉口占多数，重庆次之，万县、宜昌、成都、沙市又次之，长沙与重庆相若。各地侨民多系业商者，其他自由职业，如医生、新闻记者极少。侨民组织以汉口为完备，计有居留民协会、俱乐部、在乡军人分会、商工会议公所等四团体，就中推居留民协会及商工会议所组织健全，在长沙、重庆两处有在乡军人支会及居留民支会两组织；成都、万县、宜昌、沙市以侨民过少，活动核心均为领事馆。在本管辖区域内，各地帝国侨民之品类，除汉口一地外，余均整齐。总领事俟出席会议返任后，拟对不良侨民严加管理。

己 建议

- A 筹划独占川、湘市场，握得扬子江中部经海尾闾总纽，以与英、美抗争。
- B 驻渝领事，另派干员继任。
- C 设法完成重庆日租界建设，及增派驻渝舰艇。
- D 完成成都通讯设备。
- E 设法恢复川、湘两省人士对我情感。
- F 劝诱帝国金融界，积极向川、湘投资。
- G 补助汉口商工会议所，筹设购买组合。
- H 最低级馆员薪金，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

6 驻青岛总领事板报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军事 在山东半岛内旧有两大势力，一为前张作霖旧部沈鸿烈氏之渤海舰队，一为已倒之刘珍年军。自刘珍年军为韩复榘击败调赴浙南后，由沈、刘两部占据局面，变为沈、刘对立局面，姜西园于昭和八年率海圻三舰归陈济棠氏，沈氏辞舰队司令职，由谢刚哲继任第三舰队司令，但实权仍在沈掌握中。韩复榘氏虽将刘珍年

部击走，而沈氏之海军势力仍占有山东半岛，自青岛、烟台，以迄威海卫。韩氏原欲驱而甘心，奈出师无名，乃于本年起变更初衷，尽力联沈，目前虽无若何成绩，但韩、沈二氏之情感，已较过去为融合矣。

B 政治 沈鸿烈长青岛已数稔，施政成绩无足称道，其故盖由于青岛已由德人及我帝国建设就绪，沈到任虽有一二兴革，然亦无关大体。其次我帝国在青岛已占绝对优势，沈氏在市长任内，大部分时间均在详划对我之方，其他已无暇顾及，由此可反证沈氏之无能，如沈氏能长期任青岛市长，则我帝国之福也。

C 社会 青岛为避暑胜地，又为山东良港，更为胶济铁路与内地联络，故为游览而兼商业都市，因之社会情形已入半资本主义化之阶段，但一般土著居民则异常朴实节俭，对于“信用”二字极端注意，足资矜式，惟昧于时势，如我帝国能在文化方面使其同化，此辈良民即我帝国之顺民。

D 经济 青岛经济情形，虽不能逃世界不景气之狂袭，然在华北各地中，比较为不甚恐慌之地，至其原因，厥有三端：(1)青岛在每年夏季，能吸收巨额游客所耗之游览费，足以抵补贸易上之货借差额。(2)山东及河北南部之物产，多由青岛输出。(3)在山东半岛以内各地之居民，尚能安居乐业，天灾人祸亦不如华中之纷至沓来，农村经济较为灵活，购买力未低至极点。

E 华方对我之态度

当局 当局对我态度，已略如前日 A 节所述，沈鸿烈自始至终即不敢仇我。

民众 青岛市区及附近居民多浑浑噩噩，对我既无好感，亦无恶意，将来如何，惟视我如何因势利导耳。

排货 青岛排货运动发生，纵有亦不过暂时式的，于帝国无丝毫损失也。

乙 对华交涉

在总领事所办之交涉多属日常者，重要者则呈转北平公使馆办理，其中比较重要者为：

a 青岛关估价过高案。b 没收西村人造丝案。c 塚本事件。d 川樾事件。e 大岛事件。以上各案均在坚强态度中，而获得最后胜利。故总结一语，在青办对华交涉，无甚困难棘手之事，即有亦即解决。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业

以面粉、火柴两业为代表，营业尚佳，商业中之海产业、杂货商、棉布商亦能获到利润。营业最佳者为旅馆商、饮食商、跳舞商，但营业仅属夏季为盛，然此一季之营业足抵一年也。他如进出口商、五金商、金融商、航运商也能维持。

戊 该地帝国居留民

青岛帝国留民，经常侨居青岛者，约二千五百余人，至夏季可增至五六千人。其分类，经常有职业者约为百分之六十五，无职业者约为百分之三十五（包括朝鲜人在内）。至夏季所增加者，为职员〔业〕游客百分之八十，无职业游客百分之二十。故在青浪人极多，幸管理严密，历年以来均无重大事故发生。居留民组织为青岛工商会议所、在乡军人青岛分会、青岛日本人俱乐部、青岛日鲜人俱乐部、青岛竞技会等团体，除日鲜人俱乐部外，均成绩斐然。

己 建议

- A 离间沈、韩二氏合作，助沈折韩。
- B 反对或助韩氏，拒绝蒋氏直属部队入驻鲁省。
- C 设法胶济铁路，不能使华方收回。
- D 举办“东京”青航空线，缩短与本土距离。
- E 设法同化山东半岛之土著居民。
- F 鲁省金融，既不十分恐慌，应再大事削价倾销帝国货物。
- G 增添二等书记官二员。

7 驻济总领事西田报告

甲 军事情形

A 军事 鲁省军权操于韩复榘氏个人之手。近三年来，韩氏鉴于南西二面均驻有蒋介石氏之军队，北方则有奉军旧部，东濒黄海，而海军权又握于沈鸿烈、谢刚哲二氏之手，韩恐四面受敌，乃步隐居泰山冯玉祥之后尘，埋头苦干，欲练成劲旅，以固一己之地位。总领事仅将此点提出本会议，帝国应先充分利用此机会，维持韩氏之地位，以造成中国割据局面。现韩氏所部实力，陆军可战之部队约在八万人以上，但缺乏空炮二军，如将来在必要时，帝国能以飞机大炮接济韩氏，则彼自可由帝国操纵也。

B 政治 韩氏治鲁，以治军之法部勒人民，似违反民治精神。然在事实上鲁民憨直，以此法治之，收效最易。故韩氏治鲁方数载，鲁省治安极好，且博得“韩青天”之美名。按韩氏作事极认真，亦其治鲁成功要素之一，但其思想陈旧，将来终难有为也。

C 社会 鲁省原为礼乐之邦，而近则文化低落，人民多憨直诚朴，因此人民认识多以直观为断，而不以理智为依归，社会机构亦甚简单，尚完全停滞于手工业时代，同化、征服均较华南易于着手。

D 经济 山东省经济情况，南部较北部为优，以北部时受黄灾。山东自韩复榘至鲁后，闾阎比较安定，尚未感受极度经济破产之痛苦。该省之面粉，尚属有利之投资事业；制蛋业以遭受各国取缔，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济南商业，以日用必需品及粮食为最佳，奢侈品极劣，此非由经济恐慌，而系鲁人俭朴所致，故今后帝国运鲁货品应注意此点。

E 华方对我态度

a 当局 韩复榘氏以过去曾受冯玉祥之训导，故前主排日；近以时势日非，已放弃其主张矣。

b 民众 在济南方面,因有“五三”事件之遗恨,故有百分之十五以上人士对我恶感极深,其余则无所谓,在外县更不知亲日排日。直言之,即与我不发生关系,更无甚感想。

c 排货 沈阳、上海两件事发生后,济南曾一度有发生排货运动之组织,然在实际上,亦不过此组织而已,近则此种空气已烟消云散,帝国制品依然畅销全鲁也。

乙 对华交涉

在鲁省之交涉因曾奉公使之训令,韩氏在实际上,既不受南京政府管辖,故无论任何交涉,均主就地解决,总馆秉此原则办理,在任内经过四十余次交涉,最后韩氏均能就范。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该地帝国居留民情形

在济南侨民总数,截至三月底止,总数为 1692 人,内男为 1012 人,女为 680 人,除孩童外,百分之九十七均有固定职业,故侨民生活情形,较在本邦为佳。至于侨民组织,有济南商工会议所、在乡军人分会、居留民协会等三团体,现已派馆员岩井正太郎协同推进,但犹嫌人力不足分配,以后增派馆员负责指导。

戊 建议

- A 助韩拒蒋,造成山东与南京对立形势。
- B 藉尊孔为工具,施行同化鲁省工作。
- C 协同在鲁侨胞组织专责馆员。
- D 增添负责指导侨民组织专责馆员。

8 驻津总领事川樾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军事 天津与天津附近北宁沿线,依据庚子协定,均为不驻兵区域,然在事实上,天津警察实力极强,且在天津周围均驻有华

军，现有之帝国派遣天津驻屯军实力尚嫌单薄，有增加之必要。在河北省之军权，自张学良氏辞后，即入于学忠氏手中。何应钦氏北上后，在表面上于学忠氏已不能自尊。又本管辖区域内之山西、察哈尔、绥远三省，为宁哲元、阎锡山两氏之势力，在北平军分会未成立以前，于、宋、阎三氏鼎足而立，近虽同受军分会节制，但暗中仍各自为政，互不听命也。

B 政治 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四省区之省政均操于军人之手，已无政绩之可言。盖河北因驻军情形复什，而察哈尔、绥远则地瘠民贫，故纵有贤能当局，亦有力不从心之叹。山西一省，自昔即在阎锡山统治之下，地方秩序比较有条理，但与其他各省相较，亦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较耳。

C 社会 冀、晋、绥、察四省之社会组织，几全以纯洁之农人为基础，仅天津、太原、保定等数都市为例外。人民习气，直鲁好斗，易受人愚，文化在水准以下；民族思想，亦不甚发达，在察、绥边区为半开化之部落，如与天津相较，则相差几一二世纪，在此互映出华北交通不便之全貌。

D 经济 华北经济以天津为中心，能了解天津经济情形，则对华北经济情形即可十知八九。在沈阳事变前，陆有北宁路，水有连津海运，与满洲相通，每年天津对满洲之贸易额颇巨。事变后即行低落，近尚未恢复原状，即此一点，已足说明天津在贸易上不振之情状而有余。天津之国际贸易，亦因受不景气之影响，贸易数年下降，当地工业更同样不况，由此可推知北支农村之破产，关于此点，可以历年出关人数增减数字列表说明之如下：

北支历年出关人数比较表

人 数 类 别	年 度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出关		292286	424454	490424	592343	1050828

入关	286765	232720	214547	299392	341599
居留	105522	196543	275595	282952	709229
一对二之比	26.9	45.8	56.2	54.5	67.5

人 数 类 别	年 度	1928	1929	1930	1931
出关		933472	1046291	748213	1000281
入关		394247	621897	512783	
居留		544225	424394	235420	
一对二之比		58.0	40.5	31.6	

综观上表，在1931年以前之出关人数递有增加，足见关内之谋生不易。近满洲国为防止人口膨胀过速，将影响满洲国经济，迫不得已，应加以相当限制；其反面不能出关之华北贫民，在破产之之农村中恐慌与不安，而间接影响天津之百业不振。太原系一非商业都市，所受不景气影响较小，而经济恐慌程度亦较低。张家口之府，蒙、新等地皮毛贸易，原已不知昔日之盛，且绥新汽车复通后，可望渐复旧观。

E 华方对我之态度

a 当局 冀、晋、察、绥四省当局之对我态度，在公开的方面，均为北平政整会之马首是瞻；在实际上，于学忠依违两可，阎锡山氏与我关系不密，对我行动，如不侵及晋军范围即不相关。宋哲元、傅作义两氏，均比较态度强硬，盖彼等如退出察、绥即无立足地，不得不与我顽强相抗也。

b 民众 冀、晋、察、绥四省民众中，重排日者不过百分之一二，皆属智识阶级中人，其余均努力于本身生活之维持，焉有余暇作此维持生活不及之事。

○排日 排货运动早已终止进行，年来更得忠于帝国华商之助，邦商在华北之营业额得以继长增高，几有凌驾沈阳事变以前之势。

乙 对华交涉

年来对华交涉均集中于华北，而本总领事馆又适在华北区域内，故参预重要交涉较夥，举其著者：为停战协定、通邮协定、圈筑飞机场、战区移交及新编保安队换防等，均有专文报告，其一切交涉方针及处理方法，均事先得外务省及军部批准，总领事不过其中负共同交涉之一员而已，故不作详细之报告。惟总领事有不能已于言者，以后对华任何交涉，无论巨细，与向地方或中国中央交涉，应貫澈一贯的强硬主张，决不可犹豫，虽迁延时日，亦必能获得最后胜利也。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商业

帝国在津之新式工业，而又能有利润可获者为面粉业、日用制造业；亏本者为榨油业、窑业；勉能维持者为化学工业。昭和九年度邦人工业营业统计如下：

类别	盈亏百分率	类别	盈亏百分率
面粉业	盈 9%	化学工业	盈 0.4%
日用品制造业	盈 8.6%	榨油业	亏 2.6%
窑业	亏 3.9%		

邦人之商业，就大体而言，尚属平稳，若分别言之，则如下表（昭和九年度）：

类别	金融	五金	进出口	皮毛	日用杂货	食粮
盈亏	+5.3	+1.7	+0.4	+1.1	+2.3	+4.2

类别	纺织	绢丝	油	零卖	其它(一)	其它(二)
盈亏	-3.1	-4.8	-1.5	+5.0	+6.8	-4.9

戊 该地居留民情形

津地邦人无确实数目,以时时往来于大连、沈阳、新京、青岛及本邦与天津间者极夥,经常人数约在10,000人以上,11,000人以下,而品类复什,管理致为困难,拟请本会议决定增设领事一员,专理侨民事务。至于邦人在津之组织亦异常繁复,兹将其已呈报备案者列表如次:天津居留民协会、日满鲜协会、日满鲜共进会、日满商工协议所、天津商工会议所、天津日本人俱乐部、天津日本人青年会、天津在乡军人分会、天津东亚同盟会、天津帝【国】联谊会、天津零售商分会。

己 建议

- A 以后对华交涉,以强硬为主。
- B 增加天津驻屯军实力。
- C 增设领事一员。
- D 改善馆员生活。

9 驻福州总领事宇佐美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军事 昭和八年时,十九路军调驻全闽,该军在上海事变时曾与帝国抗战,是军后虽败北,而中国各地民众对之莫不表示好感,闽人亦然。至八年末,该军于不堪受蒋氏之压迫,乃自立人民政府,终因实力不充,随于昭和九年一月解体,至此全闽遂入蒋氏势力笼罩之下。现驻该省最高军事长官为蒋鼎文氏,乃蒋氏可靠部属之一。中国海军本来仅具雏形,而此仅具雏形之中国海军,则马尾为中心;驻防马尾者,为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氏。

B 政治 自人民政府解体，陈仪氏入主闽政后，该省遂成能直接奉行南京政府命令之省区。陈氏自长闽后，所有施政方针多率空谈，而终日营营者不过左列三端：(1)军费之筹划；(2)公路之建设；(3)对我之折冲。因是陈氏长闽年余，毫无建树。

C 社会 福建社会情形，在沿海及沿闽江各地之文化，比浙、赣、粤接壤之处略高，而全省大部分人民，惟知寡廉鲜耻，拜金畏势，在闽江上游各地为尤甚，故易为外力所征服。此与华北之朴质民气相较，实相去远矣。

D 经济 福建之漳、厦等地人民，旅居南洋及安南者极夥，过去此辈华侨，每年兑回之现金，最多时在四千万元以上，足以抵补对外贸易入超之损失而有余。近来各地闽侨因受不景气影响，兑款减少，昭和九年度已减至三百余万元，与最多时几成十三与一之比，相差何啻天壤！因是之故，福建现在经济，则在恐慌中挣扎也。

乙 华方对我态度

A 当局 当局中如在任主席陈仪氏，马尾港司令李世甲氏，均对我亲切，至其是否出之真意，虽不得而知，但与十九路军驻闽时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矣。军事方面之蒋鼎文氏，因与彼往还时间极少，且无与其直接交涉，故其对我态度，不能明白判定，可担保其不至公开仇我。

B 民众 在本报告社会节中，已言及闽人畏势拜金，寡廉鲜耻，故在昭和八年度中之闽人排日全系由十九路军领导。自蒋氏入驻后，排日运动即告停止。

C 排货 排货运动情形，完全与前节所述相同，故不赘述。

丙 对华交涉

对华交涉极多，而极琐碎，以侨住该省之邦人、台人时时与华人发生纠葛也。至其重要者，则多系有华北之交涉，由陈仪氏转询意见。而总领事遇到此类交涉，均转请公使核示，未作直接处理。

丁 该地馆务(略——编者)

戊 帝国在该地工商业状况

帝国在福州之工业无一足述，商业亦不发达，推其原因，以福州并非通商要地也。邦人、台人在福州所经营之商业，以零卖商及旅馆商为多，此外则系与华人合股经营者，邦人在闽经营之航业，以福台线、福厦线较能获利。

己 帝国在该地居民情形

在福州之侨民，约为邦人1220余人，台人6000余人，其中不良分子极多，有时此辈固能为帝国效忠，然平时多有越轨行动。自本年3月1日起，总领事已呈准外务省，照所呈管理条件严厉施行，以免过度引起当地人民反感。侨民组织事先均应呈请总领事馆批准，否则不准成立，其依照合法手续成立者，计有居留民协会、台湾公会、福台协会、日台友共进会、商事会议所、台湾商会、在乡军人分会、日台俱乐部、东亚同盟台支文化策进会。以上各团体除居留协会、台湾协会、商事会议所、在乡军人分会等五团体外，余皆成绩平平。

庚 建议

A 福州之于台湾，犹之满洲之于帝国本部，其关系之如此密切，故总领事认采渐进主义，先自福州、厦门一带，建立经济基础，然后再向福建内部发展。

B 对闽人，时以小利诱之，则无不乐为我用。关于此点，请本会议向外务省建议，指拨专款办理。

C 维持陈仪、李世甲二氏地位。

D 居留民过于复什，为便于管理保护计，现总领事所管警卒不敷分配，应请照现名额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10 驻广州总领事河相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军事 两广在军事方面，自李济深在两广任政治分会主席

时起，已形成半独立状态。昭和四年，李济深氏在南京被扣，陈济棠继李氏之后。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后受蒋介石节制。昭和六年，非常会议成立，陈济棠、李宗仁两氏分任一、四集团军司令，自是而后，两广军事非蒋氏所能指挥矣。

现两广之实力，以陈济棠为最，李宗仁氏次之。陈氏有陆军十余架。李氏拥有陆军四万人，海军军舰约一万一千吨，空军约飞机十余万人，海军[舰艇]一万一千吨，空军约飞八十余架。李氏拥有陆军四万人，飞机约二十余架，但其办理保甲，异常认真，将来作战，可充之后备军。就目前估计，至少在六十万以上，实足惊人，最近陈氏复努力于兵器制造厂，迫击炮弹、炸弹等制造厂、飞机厂，海军船厂之建筑，及派遣大批高级军官赴各国考察，作改良粤军准备，其野心实在不少也。

B 政治 两广政治，在西南政务委员会指导之下，向前推进。以地方自治而论，粤不如桂；以建设而论，则桂不如粤，此无他，一则办事认真，一则经费筹划较易也。本年内粤桂之施政方针所定中心工作，均为完成地方自治，其次为商业、工业统治，及交通路线之建筑，一切建施，比较均富朝气。

C 在中国一般人，均确认广东为革命策源地。而粤人亦以此自负，考此实非幸致，自有其原因在也。粤省文化，在中国为较高，而一般粤人，有富于冒险奋斗团结精神及民族思想，其能产生革命领导者，原不足异。粤人之不良习惯仅好赌耳，若能将此恶习革除，实一最良优秀之民族。桂人亦勤苦耐劳，但边地则民智不开，人口增加，粤速于桂。劳工问题，以近二三年来，广东陷入不测之深渊中而不自拔，劳资纠纷，层见迭出。

D 经济 兹分两省述之：

a 广东全省经济情形，前自金贵银贱后，曾一度发生恐慌，续此而来者，为世界不景气及银价高涨，处处均予广东经济命脉以重大打击，而其致命伤，则莫如粤侨兑款减少。在过去，侨住旧金山、

加拿大、南洋群岛等处之粤侨每年平均兑款约在一万万元上下，而昭和九年度则不及二千万元，因此贸易贷借差额无法抵补，而致现金外流。更因现金外流，而筹今广东省政府为谋救济起见，乃有商业统制及工业统制之规定，已见诸实行者，有糖专卖及火柴公卖。广东省政府并决振兴工业，以缓和不景气，在开办中者，有新式土敏土工厂、酒精厂、制糖厂等。广东之第二中心地为汕头，汕头之经济支柱为潮梅籍之侨民，亦因侨民总款减少，现金枯竭，全市充斥不兑现之保证券，其不景气之程度，较广州更甚。

b 广西 广西以梧州为门户，换言之，梧州即广西之中心地也。广西原为协饷省份，不能自足自给，近亦犹然，不过经李、白、黄诸氏整顿之后，虽经济发生恐慌，然不致十分加重。广西之新式工业已略肇端绪，再加以扩充整顿，来日成绩亦未可限量。

E 华方对我之态度

a 当局 两广当局，系以反对“对日妥协”为攻击南京之武器，故异常仇我。

b 民众 民众方面，以富于民族思想，几无与我好感者。

c 排货 排货运动，近亦在暗中活跃。

乙 对华交涉

总领事任内对货之交涉，仅汕头筑造击船场案比较重要，发生交涉后，幸赖武力之援助，得收相当利益。据总领事经验，在华南方交涉，虽无繁而重要，但比较棘手，最主要原因，亦由帝国武力不能如华北之能直接深入也。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之工商业状况

邦人在广东全省，无经营工业者，商业因受排货影响，异常不振，且商店数亦不多。

戊 该地帝国居留民情形

在广州之侨民不过二百余人，汕头仅百余人而已，均各有固定

职业，故能安份守己。侨民组织，在广州为居留民协会，及在乡军人支会。侨民活动，极不活跃。

己 建议

- A 设法变更华南人对我心理。
- B 帝国武力应向华南直接深入。
- C 由政府协助邦商在华南扩充营业。

11 驻厦门总领事塙本报告

甲 当地情形

A 军事 厦门全市驻有蒋鼎文部及海军陆战队，均系南京政府直属部队，厦门非军事要地，复无高级军事长官驻节，故本节无甚可述者。

B 政治 厦门新近改为普通市，市长由前任公安局长王国磐升任，因厦门为一普通市，政治方面亦无特殊可纪者。

C 社会 厦门定期航轮，近通港、沪，远达南洋、西贡等处，交通极便，因是厦门社会，无一不随时代演进，而其里层则异常守旧。故厦门社会，乃为新旧两大洪流激荡而成，文化水准高于福建全省，烟、赌、娼三者，全市触目皆是，盖此三者之捐税，为厦门市库收入之大宗也。

D 经济 漳州附近各地之贸易均以厦门为转口，且福州出国侨民必经厦门，在交通上，福建省市无出其右者。有此种种原因，厦门商务原极繁荣，近二三年来，因旅外华侨汇兑减少，市业已不如远昔之盛也。然在比较上，仍优于北邻之福州、南邻之汕头也。

E 华方对我态度

a 当局 现任市长王国磐氏，以福建省政府对我之态度，无丝毫成见。

b 民众 民众方面，前曾作排日之拟议与准备，而无积极之进行，现即拟议与准备，亦已成泡影矣。

c 排货 帝国制品在厦门市场上,已恢复沈阳事变前之销路,据目前观察,或可过之。

乙 对华交涉

考厦门之设总领事,根于与台湾距离过近及侨民过多两原因,于是总领事馆对华交涉,均为有关保护侨民之案件,言之不胜其繁,故从略。

丙 该地馆务(略——编者)

丁 帝国在该地工商业概况

帝国在厦门无工业,商业均在台湾银行协助之下而谋发展。即以零卖商业而论,优于华商多多,假能谋进一步之扩充,必能压倒华商也,应请本会议定一协助方案。

戊 该地帝国居留民情形

厦门之邦人、台人,除时去时来者不计外,约为6200余人,内邦人1100余人,台人5100余人。经营正当事业者约为十分之五·五,经营不正当事业者约为十分之三,余为无业浪人,因有此将千名浪人之故。总领事馆对于侨民之生活状况调查,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而加以考核,以定适宜方针。侨民组织如下:居留民协会、台湾人公会、在乡军人分会、商事会议分所、台湾商公所、台湾协会、台厦联谊会。

己 建议

- A 协助邦商在厦扩充营业。
- B 要求投资中国政府拟建之漳厦铁路。
- C 向厦门移民。

三 讨论事项

1 主席选定审查报告人员请公决案

议决:照主席推定若杉代办,有野、堀内两参赞,岩井参议芦野

情报部长，通过。并指定若杉代办为召集人，所有审查意见，限于第一日会议提案报告。

2 若杉代办提打通内蒙商务案

理由：自英颁布羊毛管理法后，帝国羊毛须有满洲出产者为抵补，然亦时感不足，不能不筹救济之道，唯一方法为吸收内蒙羊毛，此主张打通内蒙商务理由之一；其次，商务所至之处，可以武力随之。外蒙既为苏俄屏藩，帝国若不再经营内蒙，则苏俄得寸进尺，内蒙亦必入其括囊，而阻我西进之路矣。此主打通内蒙商务之二。

办法：A、由拓殖商工、外务、军务等会同拟定实施办法遵办。
B、经济来源，可由拓殖、正金及朝鲜等银行贷款。

议决：照原提案原则通过，先向外务省请示，后再提出对华会议复议。

主席宣布散会时间已到，未讨论议案，留待明日第二次会议再议。

第二日会议情形

时间：昭和十年四月九日。

地点：同前。

出席者：同前。

主席：同前。

记录：同前。

一 主席报告

略谓：昨夜得外相电问，兹特的出宣读。出席及列席各位诸君：诸君在华为帝国争生存奋斗，出席总领事会议，无任欣慰，望矢志

诚为帝国效忠。主席继云：本日会议，按照议事日程所拟提案次序、依次讨论。

二 讨论事项

1 若彬代办、堀内参赞、岩进参议、芦野情报部长 合提“审查各报告意见书”请公决案

意见书原文

九总领事及横竹参赞所提报告书，已全部由若彬等共同阅竣，据共同协商结果，提出审查意件如左：

A、中国之军事、政治现虽未完全统一，但已有统一之希望，帝国应设法维持中国现状，尤其在华北区内之鲁、冀、晋、察、绥等省。

B、中国之经济，既已一蹶不振，帝国应利用此机会向中国投资，订立有利条件，既可挽救中贫困而广我倾销额，复可握中国经济实权与英美相抗衡。

C、扩大东亚文化事业部组织，以联络华人情感为惟一出发点。

D、筹组中日学会，将来交由京、沪两总领事办理。

E、津、沪、福、厦四总领事馆警察署警察均予增加名额，由各该警署另拟编制表，呈由主管官署裁决。

F、天津驻屯军增加与否，请军部决定。

G、帝国武力深入华南，目前无此需要，缓议。

H、所有低级馆员俸给，呈请外务省一律增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I、津、青、沪、福、厦等五地，为邦、鲜、台浪人集中处，以后该五地警察署，应妥筹管理办法。

J、胶济路案，呈请外务省会同铁道核办。

K、原各报告书，对投资建议，均并入B项中。

L、另筹联络华人感情机关。

M、设对倾销局，统筹倾销。

N、各地馆员之增减，依原建议照办。

以上各项，是否有当，提请公决。

决议：除将K、L两项删去外，余均照原审查意见通过，提出对华会议复审。

2 驻粤总领事河相提议在驻粤总领事馆内 附设华南调查提案

办法

A、在领事馆内，附设华南事情调查处。

B、组织 设处长一人，由副领事兼任；设书记一人，专任职。设调查员若干人，分公用、秘密两种，公开者专任职，秘密者由驻粤情报员兼任。

C、经费 暂定每月二千四百金元，在总领事馆第二预备费下开支。

D、任务专调查华南一切公开或秘密事项之责。

决议：照原案通过，呈请外务省批准。

3 驻京总领事须磨提议扩充南京邦商办法案。

理由：在南京邦商营业向极不振，现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各英、美进出口商多急直追，在京设分行扩充营业。帝国若再不扶助进出口邦商在南京争夺市场，则将来当让英、美着先鞭矣。

办法

A、由公使馆商务参赞与上海邦商之进出口巨子三菱、三井等商办。B、初期倾销费，应由商工省酌予补助。

决议：交横竹参赞照提案原则办理。

4 驻上海总领事石射、驻天津总领事川樾提组织倾销局

理由：吾人一考昭和九年度及十年一、二、三月帝国对华贸易额均渐有增加之故，一为日汇低落，一为广事倾销。但在此与帝国在华倾销制品有两大劲敌，一为美国，一为苏俄。美利用其通货膨胀为主力军，苏俄则以统制为进攻方法。美之通货膨胀，在帝国现状下不足效法。惟苏俄统制办法，至美至善，可资仿效，良以步调统一方能实力增强，计划周详方能有利无弊。总领事等之主张设立“对华倾销局”者，其理由在此。

办法：A、对华倾销局之组织采委员制，由商工、外务两省，及东京、横滨、大坂、上海四地邦人商工团体，各派代表人员组织之。B、关于倾销货品之价格，随时由倾销局以会议形势决定之。C、倾销局决定之应倾销或限制倾销之货品及价格，在华邦商应绝对遵守。D、倾销之筹集，除邦工商界设法外，并呈请帝国政府补助之。

决议：原则通过，仍交原提案人另拟详细计划，交对华会议复议后，再呈请外务省、工商省，转提内阁会议批准。

5 驻天津总领事川樾、驻汉口总领事三浦、驻上海总领事石射合提，各地领事调换新地服务案（略——编者）

6 驻天津总领事川樾、驻广州总领事河相、驻济南总领事西田合提促成中日使节升格案

理由：自沈阳、上海两事变后，国际间之观察，多谓中日关系恶化，实难好转，于是国际间遂有利用此机会，而施其纵横捭阖之术者，虽无所成就，然总留一与人可乘之机会。其次，自通车、通邮实

现后，中日友好虽未见如何好转，而关系总较密切，帝国应趁此机向中国表示好感，而转移中国视听。具此两项理由，故总领事等主张，中日使节于短期内升格。

决议：通过。呈请外务省核示。

7 公使馆情报部长芦野提各地领事人员 协助情报人员办法案

理由：情报部派驻各总领事馆以及各领事馆之情报人员，多系秘密职务。是以某种场合之一，不能不求当地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之助。而在事实上，各地总领事或领事馆，对情报人员之请求，未尝不予以协助，但总有不充分之嫌，因此致常影响工作效率，今为补救计，乃提本案，俾资遵守，是否有当，提请公决。

办法：A、情报人员，在执行职务时向总领事馆或领事馆请求左列各事项时，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不得拒绝：a 派员协助。b 掩护。c 垫支活动费。d 介绍有关系人员。e 调阅文卷。B、情报人员请求驻在地领事馆协助时，事先可不必说明理由，但结束时后，双方均应将协助经过情形函报本部查考。C、情报员赴驻在地之邻近领事管辖区内执行职务，如须请求当地领事馆协助时，应先由驻在地之领事馆备正式公文证明；各地总领事馆或领事馆交情报人员办理事件，情报人员不得推诿拒绝及延不进行。E、双方如有不履行本办法者，得由双方函知本部转请公使核办。

决议：修正通过。修正条文如下：A、该办法名称，修正为“驻全华各地总领事馆暨情报人员互助办法纲要。”B、修正条之下增加下列二条：a 本纲要如有应行增删之处，得随时由情报部长修正，呈请公使核准施行。b 本大纲自驻华总领事会议通过后，即生效力。c 条文中“本部”之“本”字，一律改为“情报”二字。

8 驻上海总领事石射驻天津总领事川樾、驻福州总领事宇佐美合提，请增加沪、津、福三地总领事馆案

理由：查沪、津、福三地，帝国居留民极夥，无论在保护方面或管理方面，均有赖于帝国驻在该地之警察。因是该地之警察署，在职务上日渐繁多，更加津、沪两地之不良鲜人；福州之不良台人，非雇用多数特务警察监视不可，以致经费支出，常常越出预算，原拟撙节开支，实已减无可减，爰特请增加沪、津、福三地警察署之经费。是否有当，提请公决。

办法：A、根本办法，于编撰昭和十年度预算中将应增经费核实增加。B、救济办法，在新预算未成立之前，暂行增救济金额如下：(1)上海每年 5000 元。(2)天津每月 3500 元。(3)福州每月 2500 元。

议决：原则通过，但救济金额减为：(1)上海每月 4000 元。(2)天津每月 2500 元。(3)福州每月 1500 元。并厦门前有同样情形，准每月支救济费 1000 元。以上救济费自昭和十年五月一日起，在公使馆第二项预备费项下开支。

9 驻汉总领事三浦提恢复华人对我好感办法案

理由：帝国目前之对华外交方针，据总领事之私见，除华北外，应处处佯示好感，减去华人知识阶级中对我仇视之心理，而扫去倾销帝国制品之障碍。盖华人知识阶级，在中国现社会之组织中，有绝大支配之潜势力在焉。帝国若能将中国之知识级加以笼络，即无异获得大批同情帝国之中国群众，其利之大，正不可以数字计。况佯示好感，在实际上于帝国并无若何损失，则帝国又何乐而不为，此总领事提出本案之微意也。是否有当，均拟具办法提请公决。

办法:A、以后无论对华任何交涉,惟求实权上之获得,而在表面尊重中国之尊严。B、命令帝国在华新闻纸、杂志、出版物编辑发行人,不得发表有损中国尊严之言论,即在帝国本土,亦照此办法。C、严禁在华邦人发表辱华言论,或在行动上表示。D、严禁在华居留民凌辱华人。E、在平、津、福、厦四处邦、鲜、台浪人,应责成各该地总领事严加管束,否则遣送出境。F、各该地总领事馆暗中策动,多多成立联络感情之团体,所需经费,完全由帝国政府补助。G、由帝国政府指定专款,对中国学术团体,自由职业……等民众团,时时捐助经费。H、其他一切,均照中日亲善原则处理。

议决:兹事体大,原案送请对华会议复议,本会议认为本案实【有】酌量采行之必要。

10 驻汉总领事三浦提重庆领事升格案

理由:重庆居扬子江上游,向为川、黔经济中心,自成渝公路完成,水陆交通均便,形势盖胜,今则因剿赤之故,而成为西南军事中心。如川黔公路完成,重庆之重要性更将增高,故总领事认为重庆领事所负之使命至重,实有升格之必要。当否请公决。

议决:目前先行遣派专员继中野高一之任,升格问题由本会建议,请公使呈请外务省核定。

11 驻济南总领事西田、驻青岛总领事坂根合提 发展山东贸易案

理由:山东半岛,与帝国本土所距,水程不过二十余小时,故欧洲大战时,帝国始有攻青岛计划,不幸后交还中国。帝国之损失极大,今欲完成田中计划关于青岛部分难矣。以帝国在华北已过度使用武力,决不能在山东方面采取同样手段也。如不得而思其次,则惟建立经济进攻阵线而已。兹拟具办法,提议公决。

办法:A、在胶济铁路、津浦铁路山东段,烟潍汽车路沿线,成

立各种大小购买组合。B、除通商大埠成立购买组合外，余均委托可靠之华人经营，而由邦人暗中监督。C、各大小购买组合，均附设借用放款部，以操纵中下阶级及农村之经济。D、所售货品应依国人之习惯心理制造。E、如遇有竞争者，应跌价倾销，所有跌价之损失，由政府补助之。F、所需资本，由参加之工商界负担，不足时由国库拨付。G、详细办法及进行步骤，俟本通过后，再行拟定。

议决：着原提议人补具详细计划，一并送请对华会议复议。

12 驻粤总领事河相提各地总领事 定期互通消息俾资查考案

理由：各地总领事馆，对于驻在地及管辖区内之一切情况，固能详悉；然对于中国其他各地之动态，时有不能灵通之感，为补此缺憾计，各总领事馆于一定之期间内，互通各自驻在地及管辖区内一切情况，以资灵通而便考查，其办法如左。

办法：各地总领事于一定之内，将其驻在地及管辖区内之一切动态，以通报方式通知其他各地领事馆，重要者随时通知。前项一定时间，拟定每月七日十日或一次。

议决：交各总领事照办，时间定每十日一次，于每月五日、十五、二十五日办理，将来因事实上之需要，得增次数。

13 驻上海总领事石射、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合提 增设商务助理员案

理由：公使馆内情报部所辖情报人员之侦查范围，多限于中国之政治、军事，而关于工商方面，虽有公使馆内之商务参赞及各总领事馆内之商务领事负责，但终因缺乏侦查专员，或消息不灵通，或有迟缓之嫌。故提请在各地商务领事之下，增设商务助理员，敬拟办法如下：

办法：A、各地总领事馆商务领事之下，设助理员若干人，专门

侦察各该地工商业动静状况，提供商务领事之参考。B、各级领事应设之商务助理员，名额如下：上海 一等二员 二等三员；南京 二等二员；汉口 一等一员 二等二员；天津 一等一员 二等三员；济南 二等一员；青岛 二等一员；福州 二等一员；厦门 二等一员；广州 一等一员 二等一员。C、商务助理员之俸给如下：一等月支 200 元。二等月支一百 160 元。D、商务助理员之资格，应如下列：(1)大学商科或拓植大学毕业者。(2)通晓驻在国语言方言者。(3)具有调查统计经验者。

议决：修正通过。

主席宣布已届散会时间，散会。

第三日会议情形

时间：昭和十年四月十日。

地点：同前。

出席者：同前，并有驻福州总领事宇佐美于是日赶到列席。

列席者：同前。

主席：同前。

记录：同前。

一、主席报告

第三日间，按照议事日程，继续讨论未提名案。

二、讨论事宜

1 驻厦总领事提在厦创办华字报案

理由：厦门现虽有台人创办之报纸，但因限于人力财力，办理

不佳，毫无成绩，兹为纠正闽南华人视听计，拟照福州出版之闽报办法，由领事馆派员创办一有力华人报纸，启发华人亲我思想，其大纲如左。

办法：A、由驻厦总领事馆派员筹办一每日出版之华文报纸。B、每月经费暂定为3000元，由外务省东亚文化事业部指拨。C、详细计划另行拟定。

议决：原则通过，由公使与文化部商洽经费划拨决定后，再由原提案人拟具计划书，呈请外务部审核。

2 公使馆参议岩井、情报部长芦野合提筹办 一由公使馆直接指导之对华宣传通讯社案

理由：通讯社为宣传之绝好机关，尤其在国际间收效更宏，证以电通通讯社之成绩，足证此言之不谬也，因是参议等感觉在转移华人之目的下，应有专司对华宣传之通讯社，俾步调齐一，方能收最大之效率；爰主办此类通讯，至由公使馆直接指导者，以此项通讯社之言论方针、行动与对华外交有关，今规定由公使馆直接指导，即不致有稿件与对[外]交方略有背道而驰之虞矣。兹暂拟办理大纲如下。

办法：A、由公使馆情报部暗负筹备之责，筹备一专事对华宣传之通讯社，成立后，派不在公使馆服务之邦人负办理之责，而由情报部长暗中监督指导。B、此通讯社专供全华各报消息，并旁及本土，所有编辑方针一以对[外]交方针为转移。C、此通讯社成立之后，凡属邦交之对华记载，一律应以通讯社稿为根据。D、每月经费暂定为一万金元以内，拟在情报部活动费项下开支。E、全部职员除公开之行政编辑人员外，所有通讯员一律由派驻各地情报员兼任。F、全部计划另行拟定。

议决：由情报部联合电通、新闻联合及大坂每日、朝日、东京等新闻社上海支局，会同办理，而由情报部总其成。俟有成议后，即拟

具详细计划，呈请外务省批准。

3 驻天津总领事川樾提密派邦人在华北 施行同化工作案

理由：在长城线以外，帝国实力固已达到，而在长城线以内，则基础不甚稳固，应再加以经营。本案之提出即针对此点着想，倘能实现，则将来能收攻心之战之益，在目前可为推销帝国制品之助。拟就着手原则，敬候公决。

办法：A、先由外务省、拓植省、军部，会同严密考取年富力强，意志坚决，刻苦耐劳之拓植大学毕业生，施以一年至一年半之同化华人秘密训练。B、训练完毕后，经严格考试合格者，宣令其归化中国，取得农村中之居住及耕种等权。C、完毕上两项手续后，乃长期推行渐进的同化工作。D、工作区域，暂以冀、鲁、察、绥四省为限。

议决：原案提交对华会议。

4 上海总领事石射提重新规定首席领事职责案 (略——编者)

5 驻福州总领事宇佑美提对华外交方针案

理由：自时间进入昭和十年后，中日关系已转入一新阶段中，帝国对华外交方针，自不能一成不变，非然者即失因时制宜之意义矣。窃维本会议之召集，即负有制定对华外交方针之任务，故不揣愚昧，提本案出，敬候公决。

办法：对华新外交方针，大体如下：A、中日使节升格，在表面上即可博得中国当局之好感，在实际上我无损失。俄、意之承认中意使节升格，其原因亦在此。B、水鸟外交，失之迂缓；啄木外交，失之操切，两均不宜。以后对华交涉，应采折衷办法，因事制宜。C、凡交涉对象应趋地方，避免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以一切交涉能延缓

时日多属有利于我。D、凡无关大事体，帝国应稍予让步。E、扶助与南京政府对立之军政领袖。F、劝令侨民处处敛迹。

议决：修正，送对华会议审核，修正文如下：A、原案“F”条删去。B、另加“在中国本土内一切交涉，侧重有利为经济件。”

6 驻汉总领事三埔提在沪、汉、津等帝国界内，创立专门教育华人子弟学校案

理由：凡对于某一国民施行同化工作，最切要者莫如设立教育机关，尤以小学校为最易收效。良以儿童感受最强，一经感受，即终身不忘，故特提本案。在上海、汉口、天津等三处帝国租界内，筹设专门教育华童小学校，其办法步骤，略为拟定如下。

办法：A、先由公使馆派定负责筹备人员，全同沪、汉、津三总领事馆分别筹备。B、筹备人员决定后，即从事于校地之选择，校具之购置，教师之延聘。C、教师应尽量采用华人之亲我者。D、预定本秋季开学。E、应需经费，由外务省文化事业费项下支给。

议决：原案呈请外务、文化两省审核。

7 驻青岛总领事坂根提每年夏季应聘情报部派情报人员赴青工作案

理由：青岛为中国避暑胜地，每年夏季各国人士广集于此，其中不乏有地位者。就总领事意见，每年是时，应由情报部派高级情报人员至青工作，必有意外收获也。

议决：照办。

8 驻北平代办若杉提 黄郛回任案

理由：北平政委会委员长黄郛，与帝国感情甚洽，故过去在华北之一切交涉，均能顺利交涉解决。今黄氏因苦环境不佳，乃倦勤南下，自彼去后，在平一切交涉，即不能如前顺利，如新保安队接防

问题，延至最近尚未完全商妥。故为对华北将来交涉易于着手计，主张扶助黄氏回任。

议决：交由公使斟酌办理。

9 驻广州总领事河相提建立在华南经济基础案

理由：华南向为英国经济势力所独占，基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两点上，吾人应向英分一杯羹也。且华南局势，因对方当局之努力，文化水准较高之故，在均优于华北，若不谋经济基础之树立，恐将来更无插足地也。因是总领事乃有本案之提。

办法：A、劝令各邦商设立华【南】支店。B、劝令各邦人银行设立华南分行。C、扩充华南航轮。D、向华南大量投资。E、设法经营海南各大小荒岛。

议决：原案提交对华会议复核。

10 济南总领事西田提组织馆员消费 合作社案（略——编者）

三、临时动议

1 主席交议本会议以后应否续开案

议决：以后每年续开一次，所有日期、地点等项，由公使馆会期前一月内通知各总领事。

2 主席提议：推员起草报告本会议闭幕电

议决：推堦内参议起草。电文如下：

外相钧鉴：总领事会议于本月八日开幕，继续举行三日，延至十日闭幕，经过良好，所有经过详情，由公使回京报告，谨先电闻。全华总领事会议主席有吉明

四 主席致闭幕词

诸位：本会议自开幕至闭幕，为时仅三日，而议决案件，亦仅二十余件。然为政不在多言，而在力行，倘果将此二十余件议决案，一一见诸实行，必能为帝国对华外交史上留一奇迹矣。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选译(上)

天津编译中心 供稿

编者按: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为首的重庆政府曾与日方进行过多次秘密“和平”谈判。日方参与者既有军政人员,也有以“民间人士”、“个人资格”身份出现,小川平吉就是其中之一。

小川平吉(1869—1942)号射山,日本长野县人。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8年参加东亚同文会,190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辛亥革命中,曾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犬养毅等组织有邻会,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14年任东亚同文会干事长。1925年任司法大臣,1927年任铁道大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筹建伪满洲国活动。1936年因铁道大臣任内受贿案被捕,次年被保释。1938年春至1941年夏,小川平吉与董长知等人,以“个人资格”与蒋介石私人代表在香港进行了历时最长的“和谈”。

蒋介石本人对此次谈判也极为重视,初期通过孔祥熙联系,后由蒋直接控制,宋美龄也亲临香港,幕后操纵。“和谈”虽以破产告终,但它对于全面研究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及重庆政府的抗战态度均具重要意义。1973年东京よすず书房出版的《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中,记载了这次谈判的过程及日方方针、策略等内幕情况,颇有参考价值,今选译刊出,以飨读者。

393 备忘录 (草稿)

昭和 13 年 5 月 18 日

建议要点

一、攻陷徐州为第四次媾和之机会,需要抓住。(对于长驱深入之困难,对俄作战之准备,长期战之增大牺牲,扩大媾和条件之比例,中国未来民心之趋向,中国之统一,以及日华之根本关系等之考虑,可参照丁丑^①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在攻陷南京前开始媾和谈判之拙见。)

二、一般希望以驱逐共产党及蒋介石下野为媾和谈判之前提。但因使两者同时实现,非常困难,故只能先使蒋以武力驱逐共产党,而后与蒋进行和平谈判。

三、和平谈判一开始,国民政府亦将发生相当混乱,如乘此时机,施展谋略,则驱共及蒋下台,并非不能同时实现。然而,此种情况不仅难以预期,而且在蒋下台之情况下,亦不易得到足能统一政府,缔结并履行和平条约之权威人士。故蒋如表示诚意,则可与之进行谈判。

四、由于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之战争,则以蒋介石为对手进行和平谈判自属当然。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声明,相信基于当时情况,认为其无媾和之诚意,而对其加以抨击之威胁性宣言,是乃一时权宜措施。若永远拘泥于此,而束缚自己进退之自由,则恰似尾生^②之坚守信约而溺死桥下。蒋介石今日如能表明幡然改变态度而希望以诚意开始媾和,则此蒋介石已非昔日之蒋介石,故可与之开始谈判。正如一般海内外人士之常识,一提媾和谈判即认为以蒋

① 丁丑:1937 年。

② 尾生:人名,古代传说中坚守信约之人。《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介石为对手。（所谓表示诚意，在于驱逐共产党并承认我方提出之日华共同确保东亚和平之大方针。但实际上颇为困难。）

五、媾和之宗旨，当然在于敦睦日华原来之邦交，拯救生民于涂炭，同时采取确保东亚和平之手段。故于谈判开始前主要强调此宗旨。媾和条件亦应尽量含混其词，在其体面上使之易于接受谈判。所谓条件，本属弱者之保障；强者无有条件反而更好。一旦媾和谈判开始，其结果必为强者制弱者，如前者秘密告知德国大使之条件，已在某种程度上留有余地，可不必表示严格坚持要求之态度。

六、谈判媾和开始有如攻陷南京之际，如许大使^①不在，虽不能公开劝降，亦需要讲求其他适当方法。其方法可有多种。但是，必须注意不得发生轻侮我方之结果。

七、谈判一开始，对中国之新政府由于从来之关系虽有背信之嫌，但并非背信，有如第四项之所述。就对彼等之处置而言当无甚大麻烦。本来今日之北京政府，实际上，甚至无统治河北一省之实力，故当决定大局之际，无须以全国性政府视之。媾和谈判结果，若能以河北地方作为特殊地域，使其成立自治政府，通过此种关系，可有使彼等获得充分满足之途径，同时与媾和谈判相关联，亦可使之与蒋政权合并。对南京政府亦然。我国政府认为国民政府有诚意而与其开始谈判，相信北京、南京政府对此决无异议。当前，两政府要人与汉口之间往来不断，必须特别注意。

（前述合并云云，以蒋介石根据条约，组成完全与日本同一方针之政府，施行同一方针之政治为前提。而对此条约之履行，当然必须获得驻屯军队及占领交通机关等之有效保证。）

八、不以蒋为对手之结果，虽有可使中国新政府与蒋进行媾和谈判之说，但此乃囿于形式之雕虫小技，且属下策。不足以处理

^① 中国驻日本大使许世英。

大局。

九、未至开始媾和谈判之时，可先迅猛前进攻占汉口及其他要地。以此促使和平谈判之实现。如有幸攻陷汉口，则可使国民党及海内外人士皆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在彼等内部及对外关系方面将产生更大困难。局面可为之一变，同时亦可期待新政权之发展活动，使其致力于打倒残敌。然而，出现如此前途可谓尚非轻易之举。

十、当前，为在战争之外打开局面，认为击溃残敌或使其屈服，进而采取有效之适当方法，组成正规谋略队伍，使之进行活动之时机，业已成熟。

(注)写有“为报呈字垣、荒木，已作文字修改”之附注。^①

394 小川平吉致近卫文麿(草稿)

昭和(13)年6月8日^②

虎山公阁下

敬启者。皇军以破竹之势，勇往直前，汉口惊恐之状，有如目睹。每阅报道，不胜欣喜雀跃之至。然而蒋之下野殊属难事，而且共产党未倒，更无下野之可能。但时至今日，其本人已到坚定最后决心之时，若其左右亦与之相同，使其下野认为自有道理。正如前者所建议，先使其断然排共，不拘其下野与否，即可开始媾和，乃为上策。为此，曾一再陈述，进行谋略游说等政治工作实属必要，并认为其时机业已到来。甚望最迟在攻取信阳、武胜关前，各方面工作均能充分展开，不知尊意如何，尚祈考究。汉口移转之后，形势将有变化，因而我方之政治工作亦应改变，今起开始行动认为绝好时机。

^① 此为原编者注，下同。

^② 函件标题下的年月日括号为原书编者所加，说明原件并未记明年代或月、日，下同。

昭和十三年为公元1938年。

其次，关于以蒋为对手云云，日前与荒木大将会谈之际，大将之意见与敝人大致相同。大将亦有签订停战协定之意，谨此奉闻，以供参考，余容面稟。草草顿首。

平吉 6月8日

408 萱野长知(电报)

昭和13年9月8日

一一四(孔祥熙)、一一三(蒋介石)、一〇九(居正)等如对一二二(反共)提出一一一(停战)时，一四(日本)一二五(政府)是否接受，为慎重计，请予明确。望复。萱野

(注)自上海发报。栏外有红笔批注：“九月八日到达，即日与外相磋商后复电。”另外，尚有墨笔所写以下复电草稿：一二二(反共)及六〇(和平)后必须约定五七(下野)。望首先明确此点。对方提出之一一一(停战)，尚不知一八四(参谋本部)是否附加麻烦条件。不如一四一(孔祥熙)等出面后，由八一(外相)前往为佳。详情请阅文件。小川

409 萱野长知(电报)

昭和13年9月9日

按照前订之二(协议)，一一四(孔祥熙)等前来。如八一(外相)亦来，希由八一(外相)与一一四(孔祥熙)二(协议)条件。地点在何处？我13日乘一二七(意大利)轮船赴一二九(香港)。萱野

(注)自上海发报。栏外红笔注有：“九月九日从上海发报，转送富士见。”墨笔写有：“复电(已用电话通知)，十日复电。”尚有如下复电草稿：长崎，云仙^①可能不便。昨已发文。小川

^① 云仙：轮船名称。

410 小川平吉致董野长知 (草稿)

昭和(13)年9月9日

敬启者

得悉一路平安抵沪，欣喜致贺。兹将别后情势陈述如下。

八一(外相)依然决心巩固，气宇轩昂。如日前所述，一一三(蒋介石)之五七(下野)，固为一四(日本)之希望，但为收拾时局，事前不可能五七(下野)一事大体予以谅解。在一一三(蒋介石)披沥一一二(反共)之诚意时，停止预先表示五七(下野)之意，而在六〇(和平)之后，不妨以自发之形式决定实行之。而且，对其五七(下野)亦拟尽量照顾一一三(蒋介石)之面子。此外，关于促使实现六〇(和平)之二(协议)之机会，曾与八一(外相)进行种种磋商，而对出现最坏情况时之处理方法亦已协议。然而，最简单之方法，莫如由一三二(汉口)一三五(政府)提出为最好。故希将此点对其竭力劝说。如您所知，实现此一方针，虽有不少障碍，但鉴于东洋之大局，考虑久远之未来，除实行敝等之意见外，别无他途。大势正日益接近我等之主张，事业必将成功。就对方而言，相信亦需要以诚意实行一一二(反共)与亲一四(日本)。

在轻井泽^①亦曾与八〇(首相)长时间反复磋商，已就手续方面交换种种意见。八二(陆相)近来态度亦大有缓和。为国家、为大局，不胜庆贺。

此外，就昨日尊电，经与八一(外相)面谈之后，已将敝意复电告知。在由对方提议一一一(停战)时，担心驻外机关就占领要地等提出麻烦条件当然亦请考虑此事在当时任其商谈是否合适，莫如按以前一四一^②(孔祥熙)之提案，暗中约定一一二(反共)、六

① 轻井泽：当时近卫文麿首相在此休养。

② 一四一：原文旁注(孔祥熙?)，孔的密码为“一一四”。原文“一四一”似误。

○(和平)后五七(下野)两项。由彼等前往，我方八一(外相)亦前往。立即开始二(协议)，岂不简便？此点务望认真磋商。当然，上述三条件，尚须获得一一三(蒋介石)之明确承诺。经航空邮寄，须待下周三，故交朝日邮便寄上此信。草草不宣，另有后函。

平吉九月九日

萱野老兄侍史

此外，国内之事对方虽有种种评论，但战争即使持续二或三年亦不致气馁，如敝人之辈希望此际对俄继续一战一事已为先生深知。此点务请晓谕对方勿予误解。

(本书绝对秘密)

413 萱野长知

昭和(13)年9月13日

敬启者

如昨已电告，云仙轮并不直航长崎，只好在香港、上海等地换乘二三次。途中不仅危险很大，并有为新闻记者发现之虞。窃以为莫如与海军交涉，在军舰会见最为方便。军舰可在上海、香港、厦门、长崎或洋面上自由活动，随处停泊。不知尊意如何，乞赐回音。敝人于十三日乘意大利邮船赴香港，预计十五日下午到达。香港之通信处为东京饭店。所附暗号系重新制定，请即启用。总之，在香港可以与有关要人磋商，进行谈判，望适当安排。

见首相、外相时，请代为致意。

匆匆敬具

长知 11 日

射山翁左右

按照附件之约定，正在等候航空信件之际，今日收到9日发出之尊函。关于事前要求一一三(蒋介石)表示在一一二(反共)、六〇(和平)后五七(下野)问题，彼等碍于面子，很难承诺。在一一二

(反共)、六〇(和平)后五七(下野)虽为必然之势,但以“秘约”或表态之形式,亦属难堪之事。因而事后由一一四(孔祥熙)等人负责保证以自发形式决定实行之。一一四(孔祥熙)等之出面,需要具有殊死之决心,届时一三二(汉口)方面或许引起重大事故亦未可知。即认为出面具有分水岭之危机。如在一个月之前,提出此案,尚不致孕育如此危机,但在今日时局下,已成为更加困难之事。勉强实行,对彼等确需极大勇气与决心。窃以为,彼等脱出之后如以不成功而告终,则必然生还无望。从彼等之切身利害着想,颇有寄予担忧与同情之处。仅以怀疑而行处理,窃以为过于为难。因此,敝人到港,经过充分研究后,再行发电。总之,正如在角力场上两强相逢,胜券在于八一(外相)之腕力。这方面在对方表示至诚情况下,万事均可冰消。敝意虽有必要在记录上签字,但最关紧要者仍在于促其付诸实行。此际切望能抛弃形式上之面子,而将真实情况展现于面前。

匆匆敬具

(注)萱野在上海萱野公馆。信封正面写有“敬托宇都宫氏”,背面写有“十三日”。另外有小川用红笔写的如下书信:本函于九月二十三日,由外相在五相会议上提出,与海相磋商派遣军舰问题。当时,外相曾询问陆相对与孔等之谈判,是否同意。陆相对已开始之谈判明确回答并无异议。至此不以蒋政府为谈判对手之主张,已完全消灭,为国家计实堪庆贺。上述陆相之明确答复,二十三日从首相听到,三十日又从外相听到。

因宇都宫中途去故乡,迟到。

414 萱野长知 (电报)

昭和 13 年 9 月 15 日

今赴香港。萱野

(注)自上海发电。

415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草稿）

昭和13年9月21日

敬启者 拜读13日发来之华翰，当即会见六六（外相），并附陈愚见，承蒙表示同意。

对方乘一四五（军舰）抵鹿儿岛时，六六（外相）亦前往，形成对方前来，我方接待之形式。反而对一八三（秘密）更为有利。六六（外相）与六八（海相）就一四五（军舰），可在军舰上进行磋商。

又，一〇二（孔祥熙）及一三〇（何）、一〇九（李）等如能保证前来，则一三二（下野）将无问题。万一彼等之保证不能兑现，则彼等必将陷于二三七（分裂）而对我方并无损害。对以上愚见亦予首肯。最近与六五（首相）会谈之际，商谈在进入达成一七六（协议）之紧要关头，如一三九（共产党）反对，一〇一（蒋介石）必将陷入或被推翻，或对一三九（共产党）发动暴力政变之危机。对此，商妥尽可能促使发动政变。希望务必对其进行劝说。果能如此，则一七六（协议）亦可顺利进行。谨此先将要件奉告。草草不宣

平吉九月二十一日

萱野老兄侍史

追加暗号，自二四六至二五五。

417 [萱野长知]（电报）

昭和13年10月26日

不出所料，前途渺茫。已至需要更加继续努力之时。其真相，与世人舆论不同。鉴于昨日二四八（日本政府）所作声明，如一三三（和平）不成，则将二〇七（如何进行为好），二九一（乞示知）。彼等迄今之不能进行，因尚有和平分子，将被少壮派一六九（暗杀），即使一〇一（蒋介石）之流也将失去自由。然则现今我方将与彼等一九〇（握手）。

(注)自香港发电。原文系罗马字。栏外有注如下：“六日下午收到。对此，发报：“方针不变，郑介民已来到否。”当夜复电：“尚未到来，如来到即电告。”复电，二四八(日本政府)一三三(和平)方针不变。八六(郑介民)来到否。”

419 萩野长知

昭和(13)年11月5日

敬启者

朝夕秋风袭体，望多保重，敬祝安康。值此广州、汉口相继陷落，举国上下，陶醉于欢呼万岁之际，呈上此杞忧之书，实深不安。但思虑邦国之前途，策划东亚永久和平者，不能徒附时尚，追随皮相之见，故愿以真实情况及个人愚见奉闻。正如敝人在京时曾直言不讳向当局及前辈、知己屡次陈述，武汉陷落之后，依然处于长期抗战之态势。彼时一般舆论认为：“只要攻下武汉，大体将可解决；如树立新政府而实施善政，将可风靡于世。”然而，如今大军深入万里，不知许几年后方能接近我方之理想境界。虽然攻克武汉三镇，中原已落我手，如此却使线、点破坏，而我大军处于四面受敌之势。其前途之渺茫，烟司令官在汉口已经言及。故如今必须具有继续扬我军威，不给敌以丝毫可乘之机的思想及准备，并须负起代替中国进行剿共扫匪之重任。以此吾人深感任务之艰巨。前者，与一〇一(蒋介石)、一〇二(孔祥熙)等之一三三(和平)问题，在攻取广州、武汉前后，颇为踌躇。八六(郑介民)之来港，亦需要视参政会议之结果如何而定，故仍滞留重庆一至今日。因会议将于明日结束，认为其后当可来港。实际上，在会议之前，曾举行干部座谈会，对措词奇怪的“和平与抗日之身份案”进行磋商。(当然在参政会上提出前之预先协商。)出席会议的有一〇二(孔祥熙)、一〇七(汪兆铭)、一〇八(张群)、九九(居正)等人。唯独四川之刘文辉虽曾表示反对，但经一〇七(汪兆铭)对其忠告后，方有表示赞成之意。根据

参政会上多数人之趋向，终于决定长期抗战之发表，同时发表蒋介石之彻底抗战声明。一切多属迫于无奈，大势所趋，深感确实困难。但在此期间，一〇一（蒋介石）方面曾两次发来电报声称“……我方一三三（和平），殊不便，参酌机宜……”要求对其谅解。对此，虽曾有二三次电报往复，总之暂待八六（郑介民）来港后再议。八五（马伯援）亦将于参政会后来港。一〇一（蒋介石）之代表（系其亲戚）及一〇二（孔祥熙）之代表仍在当地待机行事。

此次之政府声明，并未给中国以好感。

（却以反日而告终）。

既对蒋介石视为一地方性政权，同时日本又举全国之力，对外国之地方政权持续进行“圣战”，如此作法于情理不合。使蒋介石政府降低为与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并列之地位，恰似命著名演员向乡村戏班低头共处，未免过于难堪。但是，总理之广播声明，推测具有多少诚意，正在进行种种批判。

（总理之广播声明，对许多真诚人士，给与极大感动。）

关于武汉陷落后中国方面之布置：

（1）第五路军残部大约三十万人，尚在安徽境内。由总司令兼安徽省长廖磊率领。武汉失守时，廖曾拒不撤出，后由李宗仁下令始撤出。现在廖仍与游击队协同活动。第五支队长为余亚农，第七支队长为宗克夫。

（2）李宗仁率约二十万人之军队，退至平汉线西，与程潜之军队保持联系。（在山岳地带。）

（3）卫立煌之军队尚驻在山西境内，正与第八路军协同行动。

（4）刘峙所率中央军约十五万人，退至豫西与四川接壤处，为李宗仁、程潜之总预备队。

（5）陈诚率中央军约三十万，在四川、云南境内。

（6）罗卓英、胡宗南、郭忏等之大军约三十五万退至湖北、湖

南之西部山岳地带。

(7) 李汉魂、张发奎、吴奇伟、薛岳等大军驻在湖南东部，采取与广东军队保持联系之态势。

(8) 至衡州^①、桂林之公路及铁路线，有机械化部队约五个师，分驻守备。

(9) 英国大使卡尔应外交部次长曾榕甫之邀，自香港飞往昆明、重庆、长沙等地。据传其任务似为商谈第四期抗战计划。或商谈关于购买与运输武器之事。

(10) 飞机已有由英、法两国运来者，当前正进行训练。

(11) 中国之军费，每月接受南洋及南北美洲华侨送来八千万元。从十一月起，已经在华侨会议上决定。(折合成当前中国货币约为一亿元。)可能现在借款出现困难。但中国军队不需要多少钱，伙食费用甚低。战死者如同死猫死狗，一弃了事。

(12) 现在四川省正由苏联教官训练一百万人，云南由法国教官训练一百八十万人，预定十二月完成训练。(与现在未经训练之兵合并。)

(此数字过于庞大，尚须研究。)

以上报请参考。此外，最值得注意者，蒋介石亦有缺乏实力之处，不能任意而为，且正有无可奈何之事。堪称蒋部下七根支柱之七名将领皆为少壮派。

而且武汉陷落后，共产党势力非常强大，已经无法对付。实际上孔祥熙本应以财政会名义来港，但受共产党注视未能成行。

(1) 郭忏 陈诚之参谋长兼军长

(2) 柳云龙 书记官长

(3) 郑介民 国防委员外交处

(4) 戴笠 蓝衣社领袖，前武汉防卫指挥

^① 衡州：指今之衡阳市。

- (5) 胡宗南 军长
- (6) 康泽 青年党领袖,前警备司令
- (7) 高宗武

此辈无名英雄,最难对付,孔、汪、居、孙、于等及其他各院院长,如被等监视则至极危险而手足无措,尽管心怀不满,有时亦言不由衷发表违心之论。因此,按照射将先射马之故智,敝人目前与彼等会合。将来与该少壮派等合作,拟根据缓急情况相机进行。当然,欲速则不达,只能“慢慢的”行动。现在敝人之行动,对任何人均保守秘密,即对九〇(中村总领事)亦不告知。九〇(中村总领事)除自己外,不愿任何人有所行动,故此事暂不与其合作,拟于最后再行研讨。有关此事,尚有种种复杂内情,容改日相告。今日有经由台湾之诹访丸之便,但为慎重起见,此信以经由上海之航空信寄发。英国邮局中有中国人局员可谓危险至极。对此,须特别小心。以上消息务请告知总理及头山翁、绪方先生。

再者,不知有田新外相将以何种方针处理对华问题,希望了解其真相。敝人与有田在田中内阁时期曾共同恳谈满洲问题,当时非常赞成敝人之建议。有田为理解中国问题之适当人选,值此时局千钧一发之际,由此人出马,实乃邦国之幸也。相见之时,请就时局与其商谈。邮船即将起碇之际,谨陈愚见如上。匆匆不能尽言。

弟长知拜十一月五日

射山我翁玉座下

又及,蒋介石亦发表洋洋数千言之声明,汪精卫亦以谈话方式声明长期抗战。针对日本方面之声明,估计在参政会闭幕时,将再发表声明。现今声明之多已令人厌腻。

《诗经》中有如下几句,说明文王时代已经领悟其中玄妙。叹为观止。

君子屡盟	乱是用长
君子信盗	乱是用暴

盜言孔甘 亂是用
匪其止共 维王之邱

人情古今无误，大可借鉴。屡发出声明，其弊甚多。

(注)董野在香港。信封正面有红笔字“十一月二日收到，自上海发出之朝日航空信。”

422 小川平吉致董野长知 (草稿)

昭和(13)年 11 月 25 日

敬启者

别后久疏问候，殊属失礼，敢请宽恕。

日前寄来之详情书信，已向近公及有田、头山、绪方三位呈阅，均认为可作了解对方内情之重要参考。我方依旧为收拾大局、确立和平而行动。敝等之意见，已如电报所述，六七^①(外相)亦有好转，二五二^②亦无异议，不禁为国家额首称庆。我方观点已趋一致，认为对方之形势，因有共产党之关系等，不能按蒋、孔等之希望进展，想老兄定亦为之焦虑不安。然而，确信天若不灭东亚，和平之机会近期必然到来。头山翁亦是同此意见，充分谅解蒋等之苦衷。与中国人共事，除继续缓缓努力推进之外，别无他途。此外，关于一三四(停战)、一三三(和平)尚有其他趣事。因正在进行中，须共同严守秘密，是以尚难明言。相信老兄近期定可获悉个中消息。

昨日受有田氏之委托，由敝人先寄上慰问金三千元。屈屈之数，望乞笑纳。如有差遣，请即示知，当尽力而为。

王子惠之来日，系由松本君为之联系出京事宜，王已顺利离京，今逢松本君返沪之便，特写此信，托其面呈。

适接明信片，拜诵玉音。敬悉感慨万千之心境，不胜同情。敝

① 六七：原文如此，按此外相暗号为六六，陆相为六七，此处六七为六六之误。

② 二五二：原文如此，未注人名。推测可能为德国大使。

人事务繁多，时光匆匆流逝。就此搁笔，切望诸多保重。草草顿首
平吉十一月二十五日

萱野老兄侍史

424 小川平吉致近卫文麿（草稿）

昭和（13）年12月12日

十二月十二日 近卫公阁下 平吉

敬启者 昨日拜聆高论，欣快之至。贵体病中久坐长谈，是否有碍，深以为念。谨祝速退病疴，早日康复。并望善自珍摄，安心静养为盼。关于声明书之事，其后深思熟虑，仍认为昨日面陈之愚见，以在对方作出决定前暂不发布为宜。兹再将下列要领列陈，以供浏览。

对内关系

一、通过报纸发表对华声明，一般均认为举行御前会议之后方可发表；而在大阪之演讲会上发表，则国民未必认为其具有严格且应迅速实现之性质。多数人简单以为大阪演讲既然拖延下来，以后将利用某种机会再行发表。从而由于其发表之拖延，难免对政府之对华方针持有疑问以及对时局怀有危惧者。历来认为御前会议所决定之事均属秘密，故一般国民未必期待发表声明。

二、今日发表以具体条件为内容之宽大对华声明书，在中国并未引起任何反应。此种情况将弱点暴露于敌，必将遭到普遍非难。而其条件亦将成为批评之焦点，可否之议论将喧嚣一时。

三、类似书记官长将发表声明趣旨对新闻记者作了传达，相信可作为一件小事，以“尚未决定”一语而轻易取消。历来发表重要政策或议会提出法案等，不少为出于政略上之需要，通过报纸作为一般性决定进行试探。在此情况下，可不必拘泥无足轻重的体面或言行，而简单予以抹消，并无任何贻害之例甚多。

对华关系

一、敌国要人等见到声明之发表，首先必对日本产生极大怀疑。一部分人认为日本终于暴露出弱点，而更加巩固抗敌之决心；另有部分人会因此而加深日本在国民政府中藏有内奸之嫌疑，从而和平派将受到更加严厉之监视。尤其因见日本要求条件宽厚，虽可出现不少新的和平愿望者，但由于蒋不能下决心，亦只可默然追随抗战而已。

二、由于上述情况，我国发表声明之后，必将使○○○（汪兆铭）之脱离更加困难。

三、发表声明之效果，在于达到刺激敌国之人心而给以剧烈冲击之目的。如果○○○（汪兆铭）在昆明发表重大宣言，与此同时发表我国宽厚之重要声明，必能震动敌国之人心。其效果必居“日军百万杭州湾登陆”之宣传以上。然而，若只是草率断续发表声明，则对○○○（汪兆铭）之计划很少有利之处。

根据上述理由，此时应照对方之要求，遵守信义，认为声明可暂不发表。对照汪之为人及其近来之表现，相信其必能实行诺言。当然，根据今后情势，若认为必须向国内外发表声明之时，因议会临近召开，则由议会发表声明，不露锋芒岂不更好？……（以下数字判断不清）或者修改内容，使之含混不清，纵有任何议论，修正案应以如何内容为是，毕竟难以取得良案，如勉强进行修正，则将形成所谓为修正而修正，为声明而声明，反有暴露失态之虞。因此，相信此际莫如暂守缄默。古人云：“维摩一默，犹如声雷。”此言颇有耐人寻味之妙处。

以上陈述愚见。世上风云，尚须观测，如思有所得，定当呈请鉴核。草草书不尽言。

425 小川平吉致近卫文麿（草稿）

昭和（13）年12月19日

敬启者

谨祝贵体健康。敝人因公务相隔三年重来此地，远望太平洋，贪得一日之清闲。

回顾去冬除夕，于永田町拜谒尊颜时，曾面陈来年应谋求战斗以外之各种方法以结束战争之意。迄今又届岁暮，而有妖云未全收，前途尚望洋之叹。但自初秋以来，和平问题复渐露端倪，来年局面必有变化，大事似可成功。重庆乃蒋之作战中心地区，政府内部对和平之期望甚殷，反蒋气氛亦相应抬头。蒋声称各种准备尚须相当时日；同时关于共军之配置及对该党之对策虑及前途，对驱共之日亦须进行准备。诸多繁难问题颇费周折。因此，关于最近来华之前途进行种种考虑，○○○（汪兆铭）问题虽有进展，但在蒋未投降期间，前途尚属多难，切不可袖手听之。若该问题又告失败，则时局难免更加混乱，殊堪忧虑。对此，须有各种对策，想定有高见在胸。敝人亦有一考虑成熟之方案，拟面陈述敬聆指教。为此，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三）趋府面谒，望能拨冗赐见。该日晨再以电话请示，以便谒见。草草不宣。

戊寅十二月十九日 平吉 于热海旅舍

近卫公阁下

427 萱野长知（电报）

昭和 14 年 1 月 5 日

事情复杂。有分歧。难奏效。三〇〇（对方）一三三（和平）有望。乘明日船返京面谈。特先奉告。萱野

（注）香港发电，原文系罗马。有红字注明：“卯一月五日夜到手。”

429 杜石山致董野长知

昭和 14 年 1 月 30 日

董野先生：

一、昨勘(二十八日)电敬悉。今日晤柳云龙^①等。据称：“二十一日五中全会开会，二十八日闭会。数日内，蒋氏决有电报以复先生，并恳多告我等以详细情形。”云云。

二、菲律宾群岛。黎氏用致公堂名义，召集海外华侨四十余团体之代表，开会议决“抗战逾十八月，失地十余省，兵民死伤近千万人。财产损失，不可计数。邻邦日本，损伤亦巨。各国在华权益，影响亦深。苟长此相持，唯有两败俱伤。今日本既露和平意见，汪精卫等复赞成之，是宜召集同志，组织和平救国政府，以西南为基础，进而及于全国。一面要求日本撤兵，一面责蒋下野。化干戈为玉帛，而救中日两国之民。兹为实现此种和平救国大计，特议决委任杜石山先生为代表，分向各方面接洽。务底于成，海外华侨，誓为后盾。”云云。

三、弟之愚见，如果蒋氏日内有电报答复先生，则依此以实现和平，亦为一时权宜之妙计。否则当依照海外华侨议决案，联络汪精卫、李济深、陈济棠等，运用滇、桂、粤、湘等省势力，组织和平救国政府以实现和平大计，自亦属为妙策之一也。滇省龙云，因汪案受嫌疑，正在自危。粤余新败，苦蒋之咄咄逼人，亦露怨望之心。苟予以运用，决可收以为助。而桂省李、白，因济深关系，即一时不敢独立，亦可利用之所为缓冲也。

四、简杰因地图而入狱，潘林则因地图被枪毙。各人妻儿，常到弟处追索欠款。窃以为古贤有千金市马骨以招集贤士者。今简等努力过度，致失性命或则失却自由，而武官领事等所约之款，数仅

① 杜石山、柳云龙均是蒋介石所派在香港与日本谈判代表。

一万三千五百元，而迄今不予清偿。简为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同学满中国。此事传播而后，无异说明中日军人之不可合作，而皇军军人，名誉攸关，尤应早日理楚，较为上等也。敬请格外设法，以安简等妻儿，而保全皇军军人之令誉也。

五、自海外华侨发动另组政府之议，各方代表常到弟处接洽。每日需费之巨，已非微力之所能持久。亦请设法接济，以利进行。

六、古贤有备无患之训，窃以为我等应取以为法。何况蒋之多计，已受共产党之包围，我等不有第二计策，设一旦蒋不能履行所约，而实现和平，则不仅我等失却信用，亦且害及二国之国民也。故以同时一并进行海外致公堂等之决议案，比较为妥万分也。

综上六端，伏乞详为文复，以便进行为幸。杜〇〇叩。艳（三十日）。

正月三十日晚刻石山书

（注）信封上写平井光子寄出，东京新桥萱野长知收，平井光子是否即杜石山之化名？

430 黎耀西致救国诸先达（抄件）

昭和（14）年2月1日

呜呼中国时至今日，势成累卵之危。一般军政要人犹不知发奋，如雄空任敌人蚕食，寝簾^①山穷水尽奔走无路，何外是我家张乡。慨观中央政局，不能同德一心，意见纷岐，尔虞我诈。遂致互相攻击，视国家如儿戏，又安得而不日促其亡。呜呼惨矣！宁不痛乎！窃思我洪门人士，自满洲入主中夏，强夺我汉族山河，于是诸先烈起而挽回，实行革命□二百六十余年。合上中下三等人物奋斗，任何牺牲不计，终获推翻满清，建立堂堂中华民国。岂不懿欤！即以本弟而论，公历千九百零三年在美国三藩市适致公总堂开创《大

① 寝簾：原文如此。

同日报》，忝司编辑。方三阅月，而孙文大哥由夏威夷抵埠，共商革命工作，极力进行运动，乃于报上尽量鼓吹宣传，一面黄三德盟长与之周游各埠，而演讲筹备款项，为反清复汉所需。其后武昌起义革命成功，而洪门人士复将公堂产业按揭巨款，以助孙大哥归国之行囊。今者如陈树人侨务委员长所深知，非虚言也。更有孙大哥在美国时所发出之五元纸币不知凡几，民国成立以来何曾有一收回！即此可想，洪门中人协助孙大哥之尽力，不独本弟个人然也。独是民国，我洪门人自甘身退，并不贪官慕禄，当亦国人所共见而共闻。迨至民国十五【年】北伐后，以党治国，党权高于国权，我洪门更急置身局外，绝不敢预闻政事。本身亦未敢涉进国门，只有奔走海外而已。讵料“九·一八”日人无端侵掠我东三省，七年来未闻有起而反攻者。彼日人得寸进尺，鲸吞不止。及至“七·七”芦沟桥事变，北京失，南京陷，津沪均非我有。今者广州策源之地，武汉重兵驻守之场，一闻敌来先行退走，日人如入无人之境，并无丝毫抵抗，不知日日言抗战二字果作何解也。汪精卫先生目击山穷路绝退之无可退，乃自作聪明，建议讲和，欲求一线之希望。岂知军政中人尽行反对，以为和也亡，不和亦亡，与其乞和而亡，孰若抵抗到底死剩一兵一卒而后亡之之为快也。此两方面各持一种见解不能合作，致有党政如此分裂者也。独以各人特别眼光观之，置身局外意见推之，本革命先烈之精神而挽救之，超然于现任党国中别具理由，足令敌人甘心而佩服。盖“七·七”一年以来两京重要，何以俱失？芜湖为一国粮米产生之地，何以甘心不取而弃之？天津、上海、汉口悉为商业繁荣地所在，何以束手而断送之？且也，策源地放弃，起义场无存，回首一思，是谁之过？日本数十年蓄精养锐，无不准备，一旦大兵临诸我国，既无战舰潜艇以守海岸，又无飞机以窥探而先行抗拒，更无计策预防设备攻守，果操何术而可获胜利？今观党政军政界中之大人物，位高望重，其才能胜任者有几？一家相亲水陆空军全权统揽，无可分责而胜其任，余可想见。一经敌人来侵，空无

策略：一、不识先发制人；二、不知步步为营以守为攻；三、不事设防不探敌情；四、不用党外贤能。似此乌有胜券之可采^①耶！时至今日，攻固无可攻，守亦无可守。甚至敌人再进一步，飞天不能，遁地不得，唯敛手待毙而已！花者^②临危救急，非速速开除党见，聘请有远大眼光有阅历经验者出而维持，断不可使之勿亡也^③！当此抗无可抗，和不能和之际，唯有联合华南各省独立，脱离战事。通令敌人凡一兵一卒皆不能在独立区域携有军械战品。其余失陷地点拥护独立者皆可准其参加。若经已组织别政府者亦不能忘却中国之主权。如是办法，我敌均有好感，维持下去两方无再决裂，永不准复有侵犯行为。则本弟所乐于建议，亦我洪门人士所乐观，厥有威者也。是否可行，容俟卓裁为盼。此致

救国诸先达大鉴

本弟黎耀西敬启印

小吕宋致公堂

Dr Lai Hung

8 Yebana st.

Manila P. J.

(注)信封上写原田竹雄寄发，东京新桥董野长知收。原田竹雄是否杜石山之化名？无日期，依据邮戳上的日期。

431 平冈致松本藏次(电报)(抄件)

昭和 14 年 2 月 4 日

迳启者

3 日柳氏接到电报，为陈诚所发。内称：过去两组织《指国共合

① 采：原文如此，似为操之误。

② 花者：原文如此，疑为兹者之误。

③ 断不可使之勿亡也：原文如此。“勿亡”恐误。

作》之协议，对新交易《和平》之成立力量不足。新组织正网罗人材于蒋氏之下，时机一到即可立即开始交易活动。希将此意告知老翁。然汪氏出发，吴氏必不下海，许氏到此后决使之加入新组织。特此奉闻

P.C 生二月四日

致电贵处请示知名称。

(注)小川红笔写明：“因本文不明了，故不能转电。由上海松本氏以航空信来函。”“二月十一日松本自上海寄出，二月十四日收到。”又，P.C 生旁写有“平冈”二字。《 》为小川所加。

432 杜石山致董野长知 (抄件)

昭和 14 年 2 月 4 日

董野先生：

二十七日台示拜悉，谨代蒋氏感谢鼎力维护。昨夜柳云龙接陈诚将军电报称“参政会与五中全会，俱不足以和平之根据。今组织之国防会，网罗朝野人员置于蒋氏一人之下。时机一至，便可运用和平而无阻。幸将此策转告石山兄、董野翁，并盼多寄消息互通声气。汪决赴法国。吴不下海。许改住港，遥领国防会委员职。并闻。诚。江(三日)。”等因敬为转陈于先生，并候

台安

杜石山敬上四日

(注)附记“(后接重庆已完成部署之电报，依杜氏之邀请电，董野赴港)。己卯二月十五日收到”。

433 杜石山致董野长知

昭和(14)年 2 月 19 日

董野先生大鉴：

1、别后，柳兄日日来问消息。曰：“先生到东京未？先生到东京

后，如何情况耶？所商事果能继续否？无电来港，终属可虑。”云云。弟质问曰，蒋氏有电否？柳曰，郑复一电（已托平冈报告矣）。曾曰，五全会后，必有复电矣。云云。乞先生来一电以慰其心，柳兄并言，汪、孔、何等尚有代表，继续向贵国人士接洽，似此不统一，双方俱属吃亏。如果勿与汪、孔、何等代表接洽，则吾人所商者，更为速于实现，云云。乞先生注意为盼。

2、菲律宾群岛华侨领袖黎翁，因护照问题，须十日后始能到港。唯已召集海外各处华侨代表，开会议决——收拾时局——之方案盖印签名，寄到香港。俟本月二十二日，平冈（十五日入广州）回港商定详细报告之法，再用电报报告。总而言之，海外华侨成绩之佳，殊出弟意料之外，诚属东亚前途之幸也，亦先生之洪福也。

3、石野、宫崎等有调任他职离去华南之消息。伏维吾人所商各事，既以香港为重点，对于领事、武官之人员，乞先生请求贵国上峰，选派有见识有度量而能与吾人同以东亚幸福为念者，则吾人前途欲为东亚尽力者，更属多助，而免却许多障碍也。

4、简杰因图案入狱，其同事潘、林二人且已被枪毙。各人之妻儿常到处请求资助。潘、林之事虽曾与石野商量，彼欲证明书。潘、林之妻即徽到证明书一封，石野说该证明书是假的。弟亦知该证明书是假的，因见其夫已死，情属可怜，虽无证明书，亦应负责周济，以奖励来者。然而石野则以为不然。此事弟以为应请先生设法，要求当局将未还清之款壹万三千五百元（港币）清偿简氏。一则关于此案，已二人死，一人入狱，钱尚未还清，实属不公道之至；一则简、潘、林等之同学同事（黄埔学生）布满中国，今简等受欺，无异说明日本军人之无信，则因此区区万余元失去大多数之同情心，甚为可惜也。昔人如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劝其千金买马骨，盖死马之骨且以重金买之，况生马乎！今以喻此，则华南之迄今无法者，夫岂无故哉！

5、又如拜亚士湾之向导者罗昆，拥有部众数千人，彼既有功，

理应重赏，以鼓励其他。此亦应请先生设法者。逆耳之言，明知非石野等之所喜，然而事业上之关系，极为重大，虽不为石野所喜，亦欲请先生设法，因事关中日前途者极重大也。

6、弟自子侄朋友等入狱者十余人，朋友被枪毙者亦十余人，各人之妻儿欲弟资助，弟所以苦楚万分。藤岛兄既远去美国，更无可为弟证明者。然为前途起见，亦应请先生为弟设法者也。专此。敬候 台安

石弟拜启 十九早

(注)杜在香港，萱野在南京。经岸外相秘书官送来，并附有以下函件。

敬启者 谨祝康宁。兹奉有田大臣之命，送还另有附件之文件，请查收。谨祝万事顺利。敬具。

岸 秘书官 三月十六日

小川先生座下

附件如下。

中国致公堂

五洲洪门团

组定、分十六区

第一区	英属、加拿大	第二区	美东纽约各埠
第三区	美西金门各埠	第四区	墨西哥
第五区	古巴	第六区	檀香山
第七区	中南美巴拿马、智利等各处		
第八区	南非洲	第九区	澳洲纽丝伦 ^①
第十区	英伦及欧洲各埠	第十一区	小吕宋
第十二区	南洋英属	第十三区	南洋荷属
第十四区	上海	第十五区	香港 澳门

① 纽丝伦：即新西兰。

第十六区 内地各省
中国致公堂宗旨

- (1) 团结五洲致公团体
- (2) 拥护致公历史
- (3) 实行组党救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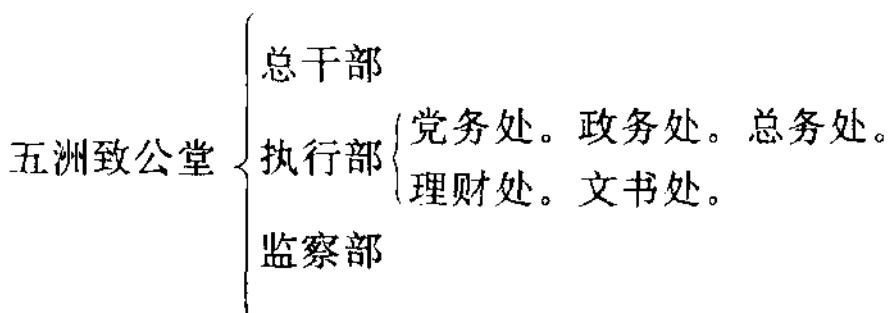
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议公约

- 甲、对国内 (1) 联卫共济 (2) 介绍职业 (3) 安老怀少
- 乙、对国家 永护共和 安定社会
- 反对共产、反对军阀、提倡道德、尊崇孔教
- 扶持正义、锄于①、去恶、振兴实业、调和劳资

中国致公堂总干部，欲达上项各目的，决定进行方法如下

- 子、设立致公堂以作育人才
- 丑、编修历史以发扬洪门伟绩
- 寅、改良入党仪式(要保存洪门精神，以全其真)
- 卯、先办星期小报以为言论机关
- 辰、促成香港公报以扩大宣传
- 巳、厚集财筹备起义
- 午、派员切实整顿国内堂务
- 未、改组公义号以接洽会员
- 申、联络相与之团体为以资互助
- 酉、收回上海五祖祠以重公产
- 戌、搜罗人才商定主义政纲
- 亥、以致公堂为主体组织政党
- 以上决议案由致公堂代表签署负责实行

① 锄于：原文如此，疑为锄奸。



名誉部长 尤列

常务长 黎耀西(俗称华侨王)

(各区处长及副处长分在各埠,从略。由黎耀西负常务之责任)

434 小川平吉致[董野长知]

昭和(14)年2月25日

敬启者 想已平安抵沪。此地情况并无变化。不知贵处如何?如前所述,对鲁渔业问题本月可能解决。如欧洲形势无特大变化,一〇一(蒋介石)在完成各项布置及整顿军队阵容之后,汪问题之风波亦将解决。至本月底,表明一七七(讲和)决心之机会可否到来?如机会到来,在办理手续上,似可有劳七四(头山满)之处,请即作好准备。七四(头山满)老当益壮,不畏远行。若一〇一(蒋介石)在周围情势尽管一七七(讲和)时机成熟之际仍然犹豫不决时,亦可由七四(头山满)代表我等同志劝说讲和为宜。总之,本月内希望看到大体上之决定。请按此方针与对方进行谈判。关于一七七(讲和)之手续等,窃以为仍以前者面陈敝人与六七(陆相)所研讨之范围为宜。尊意如何?

其次,前者三二七(陈诚)之电报中所称之许,莫非许世英?今日报纸有许世英、颜惠庆等来港之消息,世英似非国防会议委员。故而前电所称仍系三二八(崇智)耶?望告知。其后八六()^①有消

^① ():括号无说明,据后文应为郑介民。

息否？三三八（华侨）方面情况如何？

前作送别诗中脱落二句，现经修改附上。此诗可以向中国人展示。另有后函。草草不宣。

436 平冈致萱野长知（电报）（抄件）

昭和（14）年3月1日

来电已见。马尼拉《华侨常务长，俗称华侨王，黎耀西，曾回电称“誓不背叛委托云云，”已电告。》来电称，已与致公堂《华侨团体通称》谈妥交易《和平》，经与南洋四十个组织协商，皆赞成。在西南开设新店，向全国推销，详情函达。柳氏《七人之一，柳云龙》称，蒋氏数日之内将回电。俟有回电，立即告知。《一月二十七日，萱野曾向香港蒋之秘密事务所发出内容大意为日本政府方针不变，蒋方如何之电报。回电即指对此电之答复。》

（注）小川笔迹。《》内为红笔说明。有注释：“三月一日香港平冈发电，自日本邮船在打狗发无线电报。”昭和十四（1939）年二月十九日杜石山致萱野之信，亦在同一信封内。另外，尚有大体相同之抄件如下：

三月一日香港平冈自日本邮船在打狗发无线电报。致萱野。
来电已见。马尼拉（华侨王黎耀西）来电称，与致公党（华侨团体通称）谈妥（和平），与南洋四十个组织协商，皆赞成，在西南开设新店，向全国推销，详情函达。黎曾有回电称：誓不背叛委托云云。柳氏（云龙）称：蒋氏数日之内将回电。俟有回电，立即告知。（系对一月二十三日萱野向香港蒋之秘密事务所发出“日本政府方针不变，蒋方如何”电报之回电。）

437 蒋介石致杜石山（电报）（抄件）

昭和（14）年3月4日

柳云龙科长：译转

石山兄台鉴：历次来电，及萱野翁前日来电，均已诵悉。中日事变，诚为两国之不幸。萱野翁不辞奔劳，至深感佩。唯和平之基础，必须建立于平等与互让原则之上，尤不能忽视芦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日本方面究竟有无和平诚意，并其“和平基案”如何，盼向萱野翁切实查明，伫候详复。蒋中正。豪

《三月四日蒋介石电报》

(注)墨笔写在香港集大庄制格纸上，《》为小川所加注释。返点①及引号是以誊写板印刷的。

439 杜石山致蒋介石 (电报) (抄件)

昭和 14 年 3 月 6 日

蒋委员长钧鉴：豪日电示，敬悉种切，唯电文往返，延误堪虞。乃以石珊名义电邀萱翁南来，届时敬当协同柳兄谨奉钧谕，与谋旋转救国家，并拟随时电请示遵，以纾钧座忧勤。盖石珊之得以乘时报国者，即所以报答钧座相知之盛德也。驰电奉闻，伏乞垂察。杜石珊谨叩。麻。

《三月六日，杜石珊对蒋返电》

(注)墨笔写于香港集大庄制格纸上。《》为小川之注。返点是以誊写板印刷的。

440 [萱野长知] (电报)

昭和 14 年 3 月 7 日

四二(重庆)来电称有望，今赴三六(香港)。烦通知麹町。

(注)上海发电。注有“三月七日夜收到。”

① 返点：用日语读汉文时标记在汉字左侧的读音顺序符号。译稿中已将此符号删去。
(下同)

443 小川平吉致[董野长知] (电报) (草稿)

昭和14年3月13日

望详告一〇一(蒋介石)之态度及一七六(协议)二一九(方法)、一八〇(意见)。

(注)注有：“三月十三日夜发电，会见外相后向香港发电。”

444 [董野长知] (电报)

昭和14年3月14日

一〇一(蒋介石)准备为一三三(和平)进行布置。大体上以三一〇(近卫)案为基础，以平等、互让为原则。二一九(方法)尚未决定。华侨情况良好。三二三(黎耀西)电告再来协商。确能成功。

(注)香港发电。原文为罗马字。

445 小川平吉致董野长知 (草稿)

昭和(14)年3月15日

拜读数电后，正如吾人所预料，一〇一(蒋介石)终于亦下决心。和平之进程即将就绪，为国家、为生民不胜同庆。然而前与六六(外相)^①会谈之际，六六(外相)对手续问题，要求：1、需要郑重；2、要考虑二四八(日本政府)与一〇七(汪兆铭)之关系。最后，敝人陈述希望渡华，并表明早有于适时渡华之决心。昨晚会见六七(陆相)^②，报告电报并附带进行协商，发现六七(陆相)对香港电报似有不感兴趣之神色(当然并未反对进行)，对蒋之诚意多少有所担心，对手续问题亦有忧虑。经过种种谈话之后，敝人提出：处理此种

① 此时外相为有田八郎。

② 此时陆相为板垣征四郎。

国家大事之际，切不可如征战朝鲜之媾和。由于双方缺乏诚意而致失败，政府亦将贻笑后世，同时敝人等迄今之努力亦化为泡影。随后，根据情况，敝人陈述决心渡华与九二（萱野长知）协力之后，始露满意之状。六五（首相）^①之意亦与六六（外相）相同。三一〇（近卫文麿）前已赞成七五（小川平吉）之二八四（渡华），昨夜又向热海与其通过电话。今日又与头山商谈，彼亦表示非常赞成，更与六六（外相）商谈后，现已发出二八四（渡华）电报。

大约于 24 日乘镰仓丸直赴香港，望将一〇一（蒋介石）之权威代表找来。务请对二四八（日本政府）继续进行前在手续上形式之充分准备予以关照。望尽可能在不损害面子之范围内，由一〇一（蒋介石）给敝人等拍发电报等，表明意见。详细可面谈。再者，关于一〇七（汪兆铭）云云，待到达贵地后再行商谈。以愚之见，实现六六（外相）等之希望，并非难事。谨此，先供急需。草草不宣。

平吉 三月十五日

萱野老兄侍史

随后即向麹町一一报告，敬请放心勿念。

446 小川平吉致（萱野长知）（电报）（草稿）

昭和 14 年 3 月 15 日

二四八（日本政府）方针虽无变化，文中有不能尽言之事；且为慎重起见，二四八（日本政府）希望七五（小川）二八四（渡华）。七四（头山满）亦赞成，故决定二八四（渡华）电文已发出。

（注）写有“三月十五日发电”。

^① 此时首相为平沼骐一郎。

449 董野长知（电报）

昭和 14 年 3 月 18 日

三二四（柳云龙）一八四（提出）二七八（原则）。平等互让，恢复三五六（事变前之状态）、三五四（领土）、三五三（主权）。三六〇（要求）三四〇（撤兵）三四一（期间）订立三五二（防共）三四三（协定）。二（中国）一五三（赞成）三五七（经济）提携。对一四一（维新政府）、一四二（临时政府）人员不予追究。满洲另行三四三（协定）。能如此，即进行。二九一（望示知）。

（注）香港发电。原文罗马字。此电系小川之亲笔字。并有以下注释：“二四八（日本政府）对一九六（手续）特别慎重。特由七五（小川平吉）二八四（渡华）一六七（交涉）。希望四二（重庆）亦派权威人士来港。”十九日下午一时半接收电报抄件。

450 三月三十日呈董翁 备忘录（抄件）

昭和 14 年 3 月 30 日

- 一、日本政府未至确认蒋委员长有和平之诚意，故予希望依何等方法表示蒋委员长之意志。而最良之方法，则为代表的要人之派遣。
- 二、日本政府五相会议，未至议定媾和开始之手续及媾和基础条件。然媾和基础条件者，有近卫声明在，其决定非甚难。但至媾和交涉开始之手续，五相中今尚有希望国府之改组者，而国府认之以为不可能事，故此点之解决为最先至要之问题。予乃反复考究苦心焦虑，别得一便案可不毁损两国政府之面目而停战议和。唯和议一开始则如细目条件可迎刃而解也。予欲提此案要求两国政府之赞成，但该案之内容极微妙而要秘密，非亲面蒋委员长若其腹心的要人而详细谈判不能尽委曲。切望速定会见之手续，以启和平之端绪。

小川平吉记 己卯三月三十日

(注)注有：“三十日交萱野氏并请其出示柳氏。”返点等是以誊写板印刷的。

451 关于宋美龄条件之意见(杜氏笔谈)

昭和(14)年(3)月

宋美龄责柳氏提出七、九条时，曰：“此种条件何能提出于国防会议耶！如能办到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符政府累次宣言。此事当时记住。蒋先生可以提出国防会议者，即可成功。”

宋美龄口头上说，可以密约办理。厥后由弟电询蒋氏，亦复称可用密约办理。盖自得知日本真态度后，宋氏谓“满足”云云。因宋氏有此二种表示，故与约定晤面时期，与小川翁面谈。宋氏三月十六日晚到港。即晚，柳兄属弟与萱翁约定，十七日晚在香港大酒店三百五十号会商条件七条。即晚约定十九夜再晤，以俟政府命令也。

(注)原件在写有“宋美龄关于条件之意见、杜氏笔谈，一条件三月末，讨共密约四月初”之信封中。返点是以誊写印刷的。

452 杜氏笔记

昭和 14 年 4 月 2 日

- 1、因感觉机能之有迟锐钝敏，遂形成见仁见智之派别系统。此各国之政治现象，日本亦不能出此范围。
- 2、我国之有共产党、国民党、社会国家主义青年党，乃有各种不同之主张，而联俄、联英、联美、联日之各种计划，遂纷呈于左右。
- 3、然而小川先生、秋山翁、立云翁、萱翁等早识钧座为时世之俊杰，至今爱钧座者无所不至。诚如豪日钧座所云，即为小川先生等所可为钧座谋者。舍此以外，诚恐徒迫时日，误尽二国苍生耳。
- 4、昔宋太祖语赵普曰：“风尘中谁识先生为未来之宰辅耶？”然则论

公论私，小川先生等可称钩座之知已者矣！亦可谓如风尘中之知已者矣！用是之故，自无庸多所顾虑，致延误一切。且和平之事，当在汪氏等所欲谋者未成熟之前，始克有济。否则夜长梦多，多一纠纷即多一障碍。届时钩座虽欲当机立断，恐亦为事实之所不许也。时危势迫，用敷陈管见。请即电示，以便遵循。不胜盼祷待命之至。

十九早得重庆复令：继续进行。故十九晚得继续面商。蒋并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字便可。余请商量改删，是以弟再三说明可以改删也。

蒋《每日》

《萱野、小川等之联络线》

此线无论如何乞为维持

宋美龄

七条九条 两方 《据说柳答复宋，基础案由日华双方作成，杜氏加以修改》

《据说宋之意见以此为条件》

领土完整主权独立

康泽

蒋—郑介民—柳—杜

宋《美龄意见，对南北政府之入选，仍如去年黄郛时之政务委员会，并由上述人中充任》

北平之临时政府、南京之维新政府二机关之人员亦须设法安置

北平 黄郛 政务委员会

少壮派缓和

国民政府在淞沪协定之前有睦邻之公布

《如在》南京《进行和谈》，《有将共产党》一网打尽《之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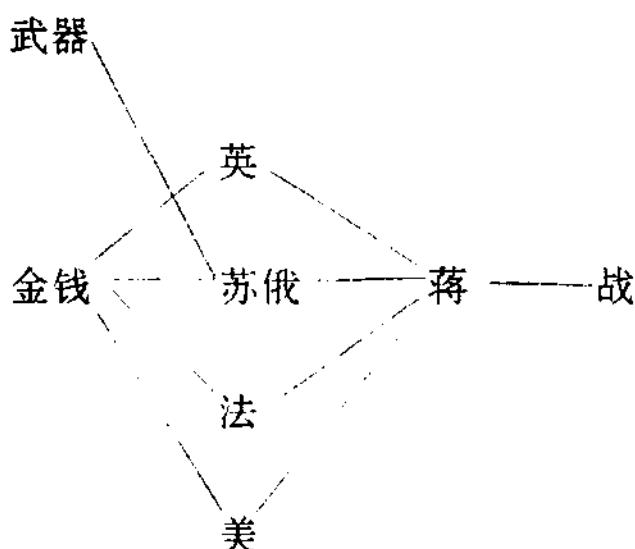
七十万包围《今日已布置完毕，在山西、陕西包围共军。并已使

两个军团进入广西云云。同时已从各地军官学校中驱逐了共系学生》

俄之先锋队司令蒋 《蒋今为俄之先锋》

计《蒋》乃有感情之人

现在



日本—蒋—如突然和《睦》，则《必然》孤立
标语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

抗战彻底

英法—借款

孙文方针《在于》和平救国，势薄 困难 飞机 汽车 法—
汽车六万辆，飞机六百架《据说有运往中国之约定云云。可疑》英—飞机一千架《据说有约定，可疑云云》，《在日本内地飞
行时，亦禁止轰炸，为此听到之军官均愤怒退出云云。蒋经常
说《不许》反攻，《只许》应战 基案

(注)杜之笔迹。《 》内系小川之字。信封上写有“己卯四月
二日杜氏谈话并电报抄件”。

453 小川平吉致秋山定辅 (草稿)

昭和14年4月4日

敬启者 谨祝安康。今日日本邮船启航之际，特呈一书。（当地邮局难以信任。二十一日由东京寄来之挂号信中，追加暗号部分未见。但电报未有不到之事。）敝人二十九日抵港，同日及三十日听取九二（萱野长知）详细经过。四月一、二两日，听取九八（杜石山）所谈情况。所有电报已看过。其要领如下：

— 此次交涉，专由一〇一（蒋介石）直系之手，一八三（秘密）进行。对八四^① 及八五（马伯援）亦绝对一三八（保密）。

— 三二四（柳云龙）系一〇一（蒋介石）母妹之子。与一〇一（蒋介石）有暗号联络，凡给一〇一（蒋介石）之电报，均经三二四（柳）之手收发。四二（重庆）由八六（郑介民）转达。

— 前者九三（萱野）来港之前，一一三（陈诚）之参谋长郭氏来港，作对共准备之详细报告。

— 对共产党之准备，以七十万大军在陕西完成包围共军之态势，又从各地军事学校，全部驱逐了赤系职员、学生。对广西之白崇禧，亦以中央军数个军团进驻完毕。

— 一〇一（蒋介石）曾给九八（杜石山）发来电报（见附件），对此，当时已由九二（萱野）复电，其内容一如近卫声明。另外尚有数次往来。（已由九二（萱野）报告东京。敝人出发之翌日寄到本宅。）

前者一〇一（蒋介石）曾数次致电九八（杜石山），谓此线（与九二（萱野）之间的联络）无论如何，乞为维持。

— 在四二（重庆）将小川抵港误为二十七日，二十八日询问小川是否到达。

^① 八四：暗号原文如此，不知是何人。

一 关于九八(杜石山)电请一〇一(蒋介石)派遣权威代表一事,无复电。十五日一〇一(蒋介石)之一〇〇(夫人)已来港。四二(重庆)之八六(郑介民)通知,一〇〇(蒋夫人)系为一三三(和平)关系赴港。尔来三二四(柳云龙)、九八(杜石山)会晤频繁。

一 十七日电告东京的一三三(和平)之一八七(条件),全系三二四(柳云龙)个人意见,并非对方所承认者。对此在我方尚未答复时,三二四(柳云龙)又增添二个项目,据说当其出示给一〇一(蒋介石)之一〇〇(夫人)时,受到叱责。据说,一〇一(蒋介石)之一〇〇(夫人)之意见,在“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上,要以简单为宜。

此外根据各种报告及文件等,业已确认一〇一(蒋介石)对一三三(和平)具有二七三(诚意)。

敝人在三十日会见九八(杜石山)以前,已将备忘录交付九三(萱野)。进入一三三(和谈)以前之三六八(先决问题)极为重要。对于一三三(和平)一八七(条件)及三六八(先决问题),已向对方言明,如不能与一〇一(蒋介石)或其心腹之二六七(重要)二七二(人员)会面,则不能进行谈判。九二(萱野)已将此备忘录交付九八(杜石山),九八(杜)亦已呈一〇一(蒋介石)之一〇〇(夫人),一〇〇(夫人)并无任何答复。

四月二日九八(杜石山)曾向一〇一(蒋介石)发出长文电报,劝其迅速进行一三三(和平)一七六(协议),一、二日内可能有回电。或许能与一〇〇(夫人)面谈,但对方如不提出要求会面,我方决不提出。

此地人心不稳,敝人之行动很难与二(中国人)在绝对一八三(秘密)中会晤。香港政厅对敝人之来港,亦推测可能与一三三(和平)有关,中国人之侦探已经插手此事。四二(重庆)之情况,已由七八(和知)今日赴京向六七(陆相)报告,大体与敝人之所闻相同。虽承认一〇一(蒋介石)之二七二(诚意),此际究竟能否立即开始一

三三(和平),亦难明言。但对九二(萱野)及九八(杜石山)确实相信。谨报告如上。另有后函,草草不宣

平吉(于千岁旅馆)四月四日

秋山老兄侍史

455 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 (草稿)

昭和(14)年4月8日

敬启者 诸公身体愈益康健,为国家敬表祝贺。此地气温急剧下降。寒冷如冬。想亦波及贵地,气候不调,切望保重。

五日政府机关报《大公报》,以汪与平沼首相订立秘约之题,大肆报道日军攻取南宁、西安、长沙、襄樊,汪解散南、北政府,组织反共救国政府,且因反共、反蒋军之需要,请求每月拨给活动费三百万元,内二百万元分两次支付,由高宗武领取,以及影佐与高宗武之关系等。并载称以上情况系日本翻译夏某泄漏云云。在群情极度愤慨之下,已以汪为汉奸,且有称之为豺狼者。无论事之真伪,对汪而言皆为莫大遗憾,恢复其名誉越发困难。重庆政府事先是否有预料,故而比较冷静。其后蒋曾有电报致杜氏,提出根据萱翁意见进行为要。杜氏与萱野商谈后(敝人未加入),制成讲和之基础条件草案,作为二人之个人意见,昨日致电对方(其原因似为对方希望先提出假设的基础条件之后,始派重要代表与敝人会面。因此敝人尚未提出任何意见)。条件抛开细则,而以日前一〇一(蒋介石)的一〇〇(夫人)之意见为主,在“领土完整,主权独立”之后,再加上“平等互让”为原则。如罗列细则,必有两国均难赞成之处,而且以后恐有自绳自缚之虞。在萱野及杜石山反对之下,使其极为抽象。敝意应尽可能删去后加四字为宜,否则改为“双方互让”不知以为然否。对于此点,原则上只是文字上的面子问题,在实际上不致带来特别妨碍,希望设法予以解决。尚请预先多加考虑。

其次,敝人即将与对方要人会面。在看到对方态度之后,个人

意见预定以提出改组国民政府作为先决问题，如不可能，则应表明讨伐共产党、亲日之后，先行部分停战，开始谈判讲和。希望可以如此提案。然而，在停战之前实行讨共将属困难；相反，如停战立即要求对方开始对共战争，结果将使其取消容共抗日，约定实行排共睦邻两大要点，从而可形成与停战同时开始讨共及和谈之局面。

细思之，此次战争之目的，在于使国民政府由容共抗日变为排共亲日，而返回正道。只要国民政府一改从前之态度，遵循我帝国之大方针，表明排共睦邻之诚意，服从于我，即可谓已完成战争目的之第一阶段。既然容共抗日为战争之两大要点，相反，则排共睦邻四字就必须为“停战讲和”之两大要点。此即敝人平素之观点。总之，停战讲和之基础条约，必需简明而且着眼大局。排共睦邻四字实既简且大，足使天下万众，一目了然洞悉讲和之要旨。同时，又与首相在议会上之说明相符合。但愿抛弃拘泥于末枝细节，以及偏狭强硬主张之顾虑，唯高瞻远瞩东亚之大局，审视百年之大计，迅速收拾此旷日持久且无效果之战局，防止共匪之蔓延，消除两国之怨恨，以期早日巩固东洋和平之基础，实乃不胜期盼者。往昔（明治6年）征台^①之役起，大久保公挺身赴北京热心折冲^②。结果，清国由顽强不肯赔偿难民之损害，而终于让步给予赔偿。获得微少之抚恤金后，立即收拾战局，恢复国交，为后来处理琉球打下基础。当时，距戊辰战争^③为时不久杀伐之气氛尚充满海内，正当军人激昂之时，而能断然恢复和平局面，此乃大久保公之所以为大久保公者

① 往昔（明治6年）征台：按日本武装入侵我国台湾为明治七年，此处原文注明治六年有误。

② 大保利通（1830—1898）在日本侵台后，于1874年8月亲自出使中国与李鸿章谈判。结果于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义举”并赔款50万两。成为日本武装侵略邻国的开始。

③ 戊辰战争：1868年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庆喜的军队与以大保利通、西乡隆盛等为首的讨幕军在鸟羽、伏见开战，结果以讨幕军的全胜而告终。

也，今日仍可引以为鉴。明治十七年伊藤公之于天津签订日清两国从朝鲜撤兵之条约^① 亦有同样之气概。热诚之余，缕陈妄言，不胜惶恐。伏乞宽宥。

平吉敬具昭和十四年四月八日

东京诸公阁下

(注)红笔写有“四·八日发，(送去 7 日《申报》剪报)”

456 小川平吉致蒋介石 (草稿)

昭和(14)年 4 月 10 日

介石先生有道：小生为东亚前途以及中日两国百年大计而来，幸有以教之。专此。并颂道安

小川 《黄惠霖侍从副官长》

国府诸先生均此候安 《特派专用飞行机》

(注)小川笔迹注“四月九日，杜氏草案”。《 》亦有注。在抄件上记有“四月十日委托蒋氏专用飞机”。

457 蒋介石致杜石山 (电报) (抄件)

昭和(14)年 4 月 13 日蒋介石电

特秘

转石山兄鉴：文电及小川翁、董翁台示，敬悉一是。小川先生本为余等生平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歉甚。唯托其在港友人马伯援君代为致意也。希与马君联络，并将详情电告。蒋。元。

《四月十三日蒋介石电》

(注)墨笔写于香港集大庄格纸上。《 》系小川所注，返点是警

① 按：该条约为明治 18(1885)年 4 月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的天津条约。条规定今后中日两国出兵朝鲜时，须互相通知。日本意图在必要时得以随时出兵朝鲜。

写印刷的。

458 小川平吉致秋山定辅 (草稿)

昭和(14)年4月14日

敬启者 谨祝安康。十日发出信中,所提之二四七(国民政府)专机,比预报推迟一日,已于十日夜间到达,立即飞返重庆。侍从副官长黄惠霖只带来交付一〇一(蒋介石)之一〇〇(夫人)之小包一个,此外并无其他谈话,九八(杜)与三二四(柳)(宋氏因病由其代替)出迎并会面,九八(杜)托其带去书信一封,即告别。而对前信所提之九八(杜)及九二(萱野)之私案(基础案)并无任何复电。一〇〇(蒋夫人)亦提出与敝人会面及其他要求。十二日九二(萱野)发出致一〇一(蒋介石)之长信,今晨已有复电,现在正由三二四(柳氏)进行翻译,此信来不及等其译出送上。

据我等三人观察,一〇一(蒋介石)心中莫非等待某种时机?近来一〇七(汪兆铭)之《南华日报》连日频频发表评论,敦促国府和谈,一〇七(汪)亦应协助等。一〇一(蒋介石)之讲和,颇有追随一〇七(汪氏)提议之嫌。对此,似可从旁静观其变为宜。又二五一(卡尔大使)本日抵重庆,九二(萱野)与九八(杜)皆认为一〇一(蒋介石)有与其面谈之必要。总之,当前尚须观察其如何演变。九二(萱野)与九八(杜)皆相信其事之可行。许云章今日动身返京,急草一书托其带上。

草草顿首
平吉

四月十四日
秋山老兄侍史

萱翁特别嘱余代致问候。

书信到东京后,恐有被拆开之虞,请来电告知是否收到。(请拍给千岁旅馆大山太平)

一九二(萱野)曾两次发信,是否收到。

一敝人四日除托千原氏带上一信之外,十日曾经英轮邮寄致津崎一信,不知收到否?前函曾告知,三月二十一日敝人从东京寄出追加暗号之挂号信,终未到达。故而十日寄出之信,收信人改为津崎。连日来气温上升,清晨即达八十度(华氏)且湿度极高,颇令人郁闷不适。不知贵地如何,望多珍重。

八五(马伯援)4日曾来敝寓拜访,对时事慷慨陈词,对前途有种种论述,翌日竟罹脑溢血而死。去年以来,为忧虑时局,多方努力奔走,而天不假年,可惜,可哀!(此人在万一情况下,乃非常有用之人物。)

(注)红笔写有“十四日托许云章氏。加拿大因不斯号邮轮”。

459 小川平吉致秋山定輔 (草稿)

昭和(14)年4月15日

敬启者 昨(14)日发信后,到港之四二(重庆)、一一三(陈诚)及一〇一(蒋介石)之来电,于下午译出后,由九二(萱野)带去。

— 九二(萱野)、九八(杜石山)所拟之基础案,关于领土、主权等三项条件,经一一三(陈诚)秘呈一〇一(蒋介石)。一〇一(蒋)看后回答:“未可。”少顷,又答曰:“暂勿复”。据此,一一三(陈诚)电告九八(杜石山)暂行搁置。

— 关于另派代表一事,一〇一(蒋介石)曾特秘电致九八(杜石山),内称:“小川先生本为余等所敬慕,但在此两国战争之中,不能派代表来港致敬,歉甚,唯托其在港友人八五君(马伯援)代为致意也。希与马君联络,并将详情电告蒋。元(十三日)。”

— 对八五(马伯援),可告知委托三二四(柳云龙)之事。

— 三二四(柳云龙),对九八(杜石山)恳切要求,一〇一(蒋介石)之代表与七五(小川)会议时所提之基础案(七条及九条)由三二四(柳云龙起草秘示一事绝对保守秘密。

然而，正如今晨电告八五（马伯援）于昨日清晨因脑溢血而死亡，须得另派会议之代表，只好暂时静观。总之，只有一〇一（蒋介石）另派要人前来，事情方能进展。因明日上午浅间丸出发，特此匆匆报告。草草敬具

平吉四月十五日

秋山老台侍史

又及，本函因付邮寄出，故信封写津崎收。

460 陈诚致电杜石山（电报）（抄件）

昭和（14）年4月25日

文日以来各电，俱已译呈委座，唯未得批示，请暂待为要。小川翁、董翁等务恳切实联络。陈诚。

（注）写有“四月二十五日电”

461 董野长知致电蒋介石（抄件）

昭和（14）年4月29日

介石先生：仆与足下叨为盟友，谊若弟兄，忧乐之情，曷尝有异。每思面议俾可释然，但远隔河山，莫偿斯愿。自得石山书，辄图效愚诚报大命，经多方设计，启发和平。迨晤左右，更悉深谋，用申忠悃，殚精竭虑，冀达苦衷，而足下客气乘之，使老友奔驰，徒劳往返。若此则何必事虚词而多顾盼哉！良非宿之所欲也。但马伯援虽死，已证劫运之可挽回。兹承贵使藉诉鄙怀，恐违尊意，爰修翰墨谨布腹心，以代正罄。足下诚听谏诤之言，察其心如手足，急难之情，则微诚听可见，而大计亦可决矣。立云有言：“二国交兵，敬义不立之咎也；如二国存诚修好，则化大含宏。”旨哉斯言！足下闻之能无动于衷乎！今观事势，窃致忧疑。冀息兵争，永契睦好，引领西望，曷胜神驰。愿足下其细察之。足下之与日本，非有深仇而必战也。况有国家者，

岂可轻祸患而以战争危害民众乎！抑国民党之与日本历有互助之事实。

足下身居总裁之位，谓可弃所厚而事所仇乎！彼矜功名之士，献久战以崩溃日本之议者，必曰决无中途妥协也。粤汉路以西，山高流急，辎重不并行，士卒不成列，艰于进取。而我则据险阻以逸待劳，操纵游击之术以剥削日本兵力，日本将师老而无功。故最后之胜利，必属诸我。此说似也。庸讵知兵事千变万化，守之者虽如此，而攻之者岂有胶柱而不知变，而谓为善用兵者耶！日本计策初主速战，欲免生民久受兵燹之苦耳。继主久战，树立百年不拔之基。近则以世界扰攘，方当多事之秋，欲善用兵力，划设军区，建筑堡垒，以为永久兵营，一则保守其已得，一则运用其所得。复扶植地方自治，而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设施，同时并进。并于汉口、宜昌等地设立远大空军基础，近可威胁北西南，促起人民之自决；远可建树东亚大陆之空军中心，以为太平洋之后卫。进而监视国际阴谋之蠢动，开拓资源与培植生产，以雄厚黄种之力量，封锁海上出入门户，破坏陆上国际交通，以吞吐抑扬善法，而进退我敌之源流。凡此诸端，胥我国青年干部之妙算，而为足下及中国之致命伤者也。且人类之欲望，乃秉天赋而俱来，习惯成自然，积时久而敌我不能分。同化作用与反应用乃科学时代正负二面俱得活用之机能，何况国际情势视力量与事实而转移者耶！此则主长期抗战以崩溃日本之议在，可以慨然悟矣！近阅此间各种刊物论日本财政贫乏将崩坏，此尤为无稽之谈。盖日本自维新以来，积厚流光，有非别人所得而探知者。足下与仆等游，时日不为不多，对日本财政想必早有研究，当然不至于受邪说之所惑耳。或有主张推动英、美、法、苏四国形成阵线，欲以扬中国而抑日本，此其浅薄不识世务，尤为可怜。盖英、美与英、苏之间利害之冲突固多，政略之对立尤甚。试观苏俄最高干部近日之报告，亦可以知其旨矣！数年以来，足下之于苏俄及中国之于苏俄不谓稍尽人事也。然而苏俄最高干部竟不顾中国今

日之危急而不信任足下之报告与决定，甚思以此报告悦媚其邻邦。然则足下与中国欲恃苏俄之援助，何异缘木求鱼！孟子谓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试问倚赖苏俄而不得其援助者，虽欲无后灾，其可得耶！苏俄素以阴险残忍著，此种事实恐非期待苏俄援助者所得知其端倪者也。呜呼！国际外交之形势错综变化，纵累千万言亦莫能尽其详。是以智者必虑于未萌，机重其先见，图难自易，居安思危。故曰，计福不及，虑祸过之。盖以福之修也，乐于心而望以奢；祸之种也，每出不期。或以心之所恶，致有所忽，祸遂不期而至耳。此人情常也。仆自少即与中国志士结成坚强关系，足下之所知也。仆之爱中国亦已不自知其所以然。若谓仆之专爱于足下，则未敢以欺足下者也。恐仆之不得久事足下也，是以恻恻之意不禁悲从中来，诚恐足下不幸而违心，则大事去矣，中国亡矣。此所以悲也。谚曰：路遥知马力，事久知人心。区区之诚，足下何故尚不稍一顾念之欤？岂事虽久而仆心犹未足以见者欤？足下之慷慨陈之于天下者，欲求中国领土之完整与主权之独立也。此则立云、小川、秋山与仆等固已竭其力而辅翼足下以达所愿望矣。岂石珊报告犹有未尽而尚见疑乎？若石珊已将各事详报矣，足下又何为而犹豫不决哉！今万民苦战事之灾厄也久矣，幸足下有以教之。临书垂涕，不尽拳拳。耑此。并候大安

弟萱野长知敬白

四月二十九日

462 小川平吉致秋山定辅（草稿）

昭和 14 年 5 月 4 日

敬启者 谨祝安康。八五（马伯援）死后，九八（杜石山）向四二（重庆）要求指定后继人，迄今数日，仍无回音。敝人为稍事休息，于二十五日动身赴三九（广州）视察，于三日晨回港。在此期间之情况如下：二十五日一一三（陈诚）有回电致九八（杜石山）：

文(十二日)以来各电，俱已译呈委座，唯未得批示。请暂待为要。小川翁、董翁等，务恳切实联络。

九八(杜石山)二十六日发出长达千余汉字之电报表示意见。[敝人去三九(广州)九八(杜)亦向一〇一(蒋)秘报]因尚未指定后继人，三二四(柳云龙)及毛氏(蒋介石原配夫人之弟)亦感不安，曾向一〇一(蒋介石)要求派五三(专机)接彼等去四二(重庆)。预定三十日夜五三(专机)抵港，因天气拖延，三日夜始到。三二四(柳云龙)因其子生病，延期动身，只有毛一人去四二(重庆)。董翁托其带去措词相当激烈之文言书信。三二四(柳云龙)之子病已痊愈，将于五日晚乘特派五三(飞机)去四二(重庆)。毛在四二(重庆)等三二四(柳)到达后，同谒一〇一(蒋)后再回港。据此，当可了解诸般情况。事虽困扰，只好安心等待。另据上海二十四日报道，八四()接四二(重庆)来电，因八五(马伯援)死亡，电令其离开上海赴香港，不日即可到达。可能系一〇二(孔祥熙)之命令。明晨乘(桥本兴亚院事务官)从此地出发之便，匆匆报告如上。草草不宣

平吉 己卯五月四日晚

秋山老台侍史

八五(马仁伯援)之葬礼相当隆重，王正廷发表演说，赞扬八五(马伯援)终其一生为日中亲善而努力。并称，今日我等并非与日本作战，仅为对日本军阀作战而已。表示称赞日中亲善之意。政府机关报《大公报》亦全文予以刊载。八五(马伯援)之死实在令人遗憾，徒唤奈何！

此地已入雨季，每日湿热难堪，幸而敝人身心均健，请勿垂念。顺祝诸公健康。

日本对中国的毒品战

原题：日中鸦片战争

[日]江口圭一著
杨光尘 董秀敏 译

虚幻的鸦片资料——题记

在旧书店的遭遇

1982年10月的一天，东京神田T书店给我寄来的旧书目录上有一页写有“金井章次氏旧藏，蒙古联合自治政府^①有关资料，〇〇万日元”的字样，引起我的注意。

T书店是专门经营有关中国旧书的书店。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在内蒙古所扶植的傀儡政权，通称蒙疆政权。金井章次以任其最高顾问而知名。从标题看，不是正式出版物而是原始资料，是稀见之物。从价格来看象是收购来的有价值的旧物。

遗憾的是，我不住在东京，饱尝这样的珍品被东京的同学们捷足先得的经验。我料想不会有希望，但还是给书店打了电话，出乎意料，说尚未售出。幸好第二天是没有约会的自由日子，遂即告知书店主人我明天去东京。

对我来说，并不是不寄希冀于万一。但更重要的是从未见过的蒙疆政权资料是些什么内容，作为一个十五年战争史研究者，即使

^①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在1939年9月日本侵略者将其早已炮制的内蒙、晋北、察南三个伪组织改组而成的。

只是看一看，乘新干线当天回来也是值得的。

该资料并没放在 T 书店，而是放在神田旧书店街中间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三个盛柑桔的瓦楞纸小箱子里，杂乱无章地装满了陈旧文件材料。的确看到不少文件写有“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或“蒙疆”的字样。我从其中找到认为或许有用的一个口袋，上面写着“鸦片”二字，还有一本封皮写有“有关鸦片的调查文件”的资料。此外还有若干有关鸦片的文件或统计之类的东西混杂其中。

十五年战争期间的绝密和未公开资料，在日本战败以后，不断被发掘、被公开。然而，有关鸦片、毒品方面，除极其片断的东西以外，可以说完全处于空白状态。我现在终于碰到了一批曾经认为只存在于虚幻的有关日本鸦片政策的原始资料。于是一边强忍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一边嘴里却说：“这些东西能不能派上用场？”故意做出不合算的样子，把文件拿出来又放进去。

但是，令人不安的是，始终找不到证明是“金井章次氏旧藏”的字样。相反，倒看到好几处注有“沼野”、“沼野次长收”的地方。“沼野”究竟是何许人？据书店主人说这些是转手买进的，因而不得要领。不过据说这些文件都是蒙疆政权的内部文件确属无疑。

问题是价钱。差不多要花掉两个月的工资，使我不得不犹豫。据书店主人说，还有人也在查询这一资料。看来如不当场买下，以后就再也买不到了。我谈起减价问题。年轻的书店主人说：“我欠先生的钱”——他以前曾谎报过书价，因而答应削价 5 万日元。我再次犹豫了一下，自己劝告自己，决定照削价付了巨款。

资料来历

送来资料后，立即打开检查一遍，并未发现任何证明“金井章次氏旧藏”的地方。相反，倒弄清楚了资料和沼野英不二之人有密切关系。

沼野，1896 年生于东京，1922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

后，进入大藏省专卖局，1941年4月任烟草事业部烟草课长，继任盐脑部长^①，6月14日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次长，1942年10月27日辞职，其后历任神户税(海)关长。神户海运局长，日本战败后担任公司董事，1981年7月亡故。

文件中多处注有“沼野次长收”。其中有寄给沼野邀请聚会的请帖，大部分都是沼野任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次长期间的，遍及经济部所管的各个部门。据此可以断定：这些资料是沼野在蒙疆政权任职时所持有的。我想可能是沼野在辞职时舍不得丢下自己处理过的文件，而把它带回日本继续收藏起来的，他死后经有关人员当作旧书处理了。

另一方面，金井章次任职蒙疆政权最高顾问是在1937年11月到1941年11月期间。文件虽然注明“沼野”字样，但其内容却与以1941、1942年为中心的，基本应包含经济部主管事务的文件内容不完全一致。此外，或许由于某种情况，并不排除金井持有沼野资料的可能，但金井于1967年去世，他的“旧藏”在死后十五年才在旧书目录上出现，这种情况很少可能。而沼野的有关文件在他死后一年两个月出现于旧书市场，时间是完全吻合的。

最后，所谓“金井章次氏旧藏”，只能认为是卖书人为了吸引读者，肆意利用了知名度较高的金井的名义而已。老实说；假定目录上写的是“沼野英不二氏旧藏·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有关资料”，我也许会错过这个机会。

为了确认以上事实，我向T书店提出希望了解资料的来源。T书店主人虽然答应，但参与其事的另外同行却断然拒绝。作为研究人员也许应该更加努力确认资料的出处，但考虑到旧书业者的意向和处理这份资料人的立场，终于放弃了追查的念头。

^① 盐脑部，专卖局下设的一个部门，分管盐及樟脑专卖事宜。——译注

蒙疆政权与鸦片

中日战争期间，鸦片政策的原始资料何以会落在曾任蒙疆政权经济部次长其人手中？

关于日本在 15 年战争中施行的鸦片、毒品政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进行追究。东京法庭的判决书“B 部第五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有三处提出这一问题。判决书称：

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公布了鸦片法。……这些法律炮制了政府统制的专卖机关，向经政府批准的商店配给鸦片和毒品。这些专卖机关为了由毒品中增加收入，不过是鼓励使用毒品的征税机关。

凡被日本所占领的地区，从占领时起直到日本投降为止，鸦片和毒品的使用都在逐渐增多。

判决书就有关日本的政策意图进一步认定：

毒品的买卖是与军事行动和政治发展相关联的。由于毒品买卖使日方获取了为设置各种地方政权所需的大部分资金。……至于吸食鸦片人员的大量增加，给中国民众道德上的影响是不难想象的。

东京审判认为日本施行了违反国际鸦片条约的政策是“对和平的犯罪”之一环，对荒木贞夫等 28 名全体被告起诉，并判决有罪。

可是，请注意判决书中提到的对华关系的中央机关兴亚院（设于 1938 年 12 月）。判决书中说：

在兴亚院所掌管的各种事项中有鸦片一项，兴亚院研究中国各地的鸦片需要状况，办理鸦片自蒙古分配到华北、华中及华南各地的工作。

作为检察方面的一件书面证据提出的北京市政府文件称：北京的“鸦片来源”是“由日本人鼓励”的蒙疆土业组合提供的。检察方面的最后论罪求刑指出：北京的“鸦片主要供应者是蒙疆土业组合，它接受蒙古傀儡政府的管理，由日军鼓励种植鸦片而组织的。运输及销售都由日本人和朝鲜人进行”。这个“土业”的“土”字系指鸦片。

蒙疆政权正是全中国被占领地区的“鸦片来源”，是“鸦片的主要供应者”。蒙疆政权纯粹是日本的傀儡政权，同满洲国一样，各部的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次长手里。而在蒙疆政权中掌管鸦片生产、配给（销售）的是经济部。

经济部次长实际上是处于长官职位的人物，持有有关鸦片政策的原始资料毫不足奇。当我看到旧书目录时就有“寄希冀于万一”的想法。这或是由于头脑中存有蒙疆政权如此分配职务的缘故，但可没料到实际上竟会真的碰上了。

被隐匿下来的资料

东京法庭虽然追究了日本的鸦片、毒品犯罪，并且大致进行了证实，但在以后对再清中日战争中的鸦片、毒品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虽然公布了大量有关中日战争的研究书籍、战记、资料及回忆录、经历记，但极少涉及到鸦片、毒品问题。

之所以未能充分追查中日战争时期的鸦片、毒品问题而拖延至今的重要原因，是受到资料上的制约。东京法庭的证据，大部分根据中国人及在中国的外国人的见闻证词或记录。日本方面的内部文件、原始资料基本未向法庭提出。并如前所述，其后也未被公开和发掘出来。

由于鸦片、毒品犯罪的性质和谋略气息过强，有关人员根本不想留下可能成为证据之类的记录。尤其在最深层次的收益处理和售给消费者的第一线更是如此。

即或已经编制成资料，也被有关人员秘密藏匿起来，特别在日本战败之际，大半都销毁了。

资料的公开刊布

我偶然遇到的资料在当时是迄未公开发表过的蒙疆政权、兴亚院等的内部文件，是由蒙疆政权制订的有关鸦片生产、配给的方针和意见、报告、记录，或是合同、统计之类。为了真正搞清日本的

鸦片政策，我想由这些资料作为突破口，后又继续搜集有关资料附加上解说，于198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资料井中日战争时期鸦片政策——以蒙疆政权资料为中心》。

恰好在战后四十年这一年，这本资料集公开发表，出乎我意料之外得到人们的注目。《每日新闻》于1985年8月9日以“中日战争是‘鸦片战争’政府方面的资料大量发现”为题介绍了资料的概要。

消息立即传到台湾和中国。8月10日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8月11日中国的《光明日报》报道了《每日新闻》的消息要点，8月12日中国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的在头版头条全文刊载了《每日新闻》的报道。

以1982年的教科书审定问题国际化为契机，在中日战争史研究方面，要进一步弄清日本侵略、加害各国实况的趋势增强。有关南京事件、平顶山事件、毒气战、731部队与细菌战、三光作战等新事实、新资料都接连被发掘出来迄至于今。

鸦片、毒品问题也是其中之一，1986年又有另一部重要资料，由冈田芳政、多田井喜生、高桥正卫合编《续·现代史资料(12)鸦片问题》公开刊行。在该书第一部中收入日本、台湾、关东州、满洲以及涉及整个亚洲的有关鸦片、毒品的文献；第二部中收入从中日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鸦片政策，特别是有关兴亚院的文件；第三部收入外务省的电报、文件。

由于1985、1986年两个资料集的相继公开出版，使鸦片、毒品问题，特别是中日战争期间日本鸦片政策的空前爆光成为可能。当然，已经掌握的这些资料，对弄清楚问题的全貌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处于问题最深层的鸦片收益究竟是怎样处理的资料仍然一无所有，秘密的帷幕依然很厚。然而关于问题的表层，并非不能描绘到相当具体的地步。本书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想把鲜为人知的在中日战争下进行鸦片战争的真相尽可能予以清楚地揭露。为此，

首先作为前史，在对鸦片、毒品与中国、日本的关系以及“九·一八”事变期间的状况 予以概括介绍的基础上，然后再缕述鸦片政策本身的问题。

一、鸦片、毒品与中国、日本

1. 鸦片、吗啡、海洛因

台湾的鸦片渐禁政策

日本素知中国的鸦片之祸，自幕末以来即严禁鸦片，并取得成功。但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面临鸦片问题，开始染指毒品。占据台湾、租借关东州、吞并朝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领山东半岛，扶植“满洲国”和冀东政权是其发轫。

台湾和福建同是中国吸食鸦片最早的地区，恶习蔓延，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有赖于鸦片。日本在“日清战争”（中日甲午之战）中获胜，1895 年占领台湾后，便面临如何处置吸食鸦片的问题。

虽有采取和日本内地同样的在台湾严禁的主张，但日本是依据内务省卫生局长后藤新平^①的主张，实施的是渐禁政策和专卖制度。理由是：严禁鸦片将使吸烟成瘾者遭受痛苦，从而导致他们的反抗，为进行镇压则又需牺牲兵力，而渐禁政策则给予烟民以人道的考虑，且可免除军事负担又能确保巨额的专卖收入。

1897 年 1 月公布台湾鸦片令。规定鸦片统由政府专卖，任何人不得输入、制造鸦片；不经特别许可，对鸦片不得买卖、授受、持有；只限经批准的吸毒成瘾者方得吸食烟膏；违反以上规定者处以严重监禁（最高 5 年）或罚款（最高 5 千日元）。

而实际上，虽没有正式医生所开据的烟民证明，但超过 20 岁

^① 后藤新平，(1859—1929)后于 1898 年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长，历任“满铁”总裁、拓殖局副总裁、内务大臣等职。日本称之为“殖民政策先驱”。——译注

即可特许吸食鸦片。另外对烟民并不采取救治、纠正措施,从而获得巨额鸦片收入。

不过因为吸食鸦片的特许费太高,由于烟民的自动忌烟及死亡,特许烟民数由1900年最高的16万9千人,经过1910年的9万9千人和1920年的4万8千人,到1930年减少到2万3千人。

更因遭受内外强烈批评,以1930年为转折点,开始推行纠正工作。在引导烟民通过治疗克服禁烟症状方面,台湾人医学家杜聪明做出了极大贡献。旋即以太平洋战争而断绝了鸦片原料输入为契机,给台湾的吸食鸦片划了句号。

以上过程详见刘明修等《台湾统治和鸦片问题》(1983年)。

关东州和鸦片、毒品

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于1905年租借辽东半岛尖端部,于此设置关东州。又得到了在1906年开始建造的南满铁路附属地(由铁路两侧的带状部分及主要车站周边的市街构成)的行政权。在关东州、铁路附属地尚有相当部分的人吸食鸦片。

日本对鸦片的输入、制造和销售,当初原采取个人特许制度,但从1915年以后,将特许给予大连宏济善堂。由其输入、销售鸦片。1924年制定关东州鸦片令,采取鸦片渐禁政策,更于1928年在大连设立关东厅专卖局,垄断鸦片的输入与销售。

不过,就关东州的情况而言,当局本身在《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1936年)中不得不承认处于窘境:

当局尊重(国际鸦片)条约的精神,在期望合理管理取缔的同时,致力于鸦片正当消费的灵活编制,但因地理关系与毒品类最大消费国中国各地接壤,其间的交往也极其频繁,年年均有数十万流动性移民来此,等等,给取缔带来诸多困难,因而实际上至今尚未充分到达所期之目的。

结果,特别是大连便成为走私日本毒品的一个中心地。1934

年9月8日日内瓦国际会议日本国代理事务局长横山正幸(横山这一职名是随同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后,由历来的国际联盟会议日本国事务局长改称的)致广田弘毅外相的《关于取缔自大连方面向中国走私毒品交易事》的文件中,做了如下的报告:

综合最近来自天津、芝罘(现在之烟台)、青岛等地国人(指日本人——译者)关系走私毒品报告,其没收品之大部分有来自大连方面走私之迹象。关于关东州,尤以大连给人以走私运出毒品之中心地之感,应对该地方之违禁药品经营严厉取缔,尤应对走私运出毒品实行严密监督至为紧要。故恩希就本件所提之事与该地官员进行磋商。

此外,横山又报告了以下情况:

历来之帝国对在华毒品走私罪犯处罚之领事判决,确有失之过轻之嫌。最近即有对二三罪犯仅科以微不足道的20日元罚款之实例。如此,……与中国及欧美各国所实行之严厉处罚相比,显然过轻。在遭受未收到任何实效非难之同时,容易招致我方官员以如斯无效之处罚放任罪犯,莫如说是鼓励走私的臆测。事态如此继续下去,将有导致不利于我方大局之虞,窃以为最低限度应按有关法规对此类罪犯处以最重之刑罚。

与中国方面对私运毒品的罪犯处以公开枪决的取缔态度相比,日本官员的取缔给人以“莫如说是鼓励”之感,明显过于姑息。

朝鲜与鸦片、毒品

日本于1910年吞并朝鲜。在朝鲜,尤其与中国国境邻接地区,吸食鸦片甚盛。日本根据朝鲜刑事令在取缔吸食鸦片的同时,对烟民采取了渐禁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药品价格猛升,朝鲜不断出现种植罂粟

者，朝鲜总督府为此于 1919 年发布朝鲜鸦片取缔令，限制种植罂粟，同时将鸦片统归政府管理。后因药品价格下降，罂粟种植减少，总督府指定的种植面积大幅度下降。

但在中日战争开始后，朝鲜罂粟种植和鸦片、毒品的生产增加，朝鲜成为台湾及满洲国鸦片专卖制的鸦片原料供应地，促进了罂粟种植面积的扩大和鸦片产量的增加。

1938 年至 1944 年时大略而言，朝鲜每年种植 6000—8000 公顷罂粟，有 3 万至 8 万农民从事此业，38—1944 年间复生产吗啡 1194 公斤、海洛因 2791 公斤。

海洛因的 1938 年产量为 1244 公斤，1939 年为 1327 公斤，几乎都集中在这两年，但与从 1929—1933 年的五年的海洛因的世界平均总产量是 2097 公斤，其中日本的产量为 1003 公斤，占 47.8% 的数字相比，便可知这生产量是何等之大。然而迄未见到说明其用途等的资料。

在朝鲜与鸦片、毒品的关系中，一个不能漏过的问题是，日本人与朝鲜人共同在中国从事鸦片、毒品的私运、私贩活动，成为中国人谴责和憎恶的对象。其实际情况详见后述。

在青岛、济南的私运、私售

日本由于占领台湾，租借关东州，侵占朝鲜，而与以上各地的鸦片牵扯到一起。但是严重的是 1910 年代以后到 1930 年代，从日本向中国走私，私卖鸦片、毒品的问题。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侵占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半岛，1914 年到 1922 年期间对之占领，置于军政之下。青岛军政署采取鸦片专卖制，业务委托于刘紫山（亦称刘子山）。刘缴纳保证金 20 万元，挂出“大日本鸦片局”的招牌，设总局和七个分局，批发、零售鸦片。合同规定，利润军政署七成，刘三成，原料除当地产品外，输入台湾、印度产品，据说是由于日军士兵护送的火车运送，与大连是

毒品走私中心相对应，青岛是日本鸦片的交易中心。

山东交还中国后，仍是日本人私售鸦片和毒品的一大据点。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在《武装的市街》（1930年）中，对济南的情景有如下的描述：

从事武器交易的是硬派；从事鸦片、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可待因交易的是软派。均以中国人为对象。……国人大部分从事软派交易。表面挂着的馒头铺、土产店、钟表店、古玩店招牌，不过是个表面幌子而已。……从事此种交易的在此处有1000人以上。

关东厅事务官藤原铁太郎的《鸦片制度调查报告（1923）》中也提到：“在济南的日本人有2000人，其中半数以上参与违禁品交易。”

可卡因是从古柯科的古柯（原产地南美）叶中提炼的麻醉剂，其中毒症较吗啡更为恶性。可卡因是从鸦片提炼的麻醉剂之一种，作用较吗啡为弱。

毒品的走私出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日本自德国输入的医用吗啡断绝，于是筹划国产化。1915年以后，星制药株氏会社独家承揽台湾总督府的粗制吗啡，开始用来精制吗啡。此后，大日本制药、三共、内国制药等各会社也参加了制造。这种日本的国产吗啡类及进口吗啡类均走私出口中国。

关东厅藤原铁太郎的《鸦片制度调查报告》列举了以下数字。从1916年至1920年的五年期间，吗啡的日本内地产量、输入量减去输出量为68540公斤。当时日本内地医用吗啡的使用量每年约900公斤，五年计为4500公斤。 $68540\text{ 公斤} - 4500\text{ 公斤} = 64040\text{ 公斤}$ 的余数。按同样计算方法，五年间约余海洛因6600公斤，可卡因6700公斤。很难想象，在当时日本内地有这么多的瘾者非法消费。

掉了这些剩余。那么，这些剩余毒品到了哪里呢？

藤原报告说：“不能不认为其大部分走私出口”，“从日本内地向中国走私运进吗啡及其他麻醉剂迨无疑义。”

另外，1932—1933年，日本每100万人的海洛因平均消费量为9—10公斤，第二位的芬兰是6公斤上下，两者差距很大。可卡因亦达14—15公斤，仅次于关东州的18—23公斤。

关于这种异常之高的数字，日内瓦国际鸦片会议所设置的常设鸦片中央委员会的日本委员宫岛干之助在其所著的《国际鸦片问题之经纬》（1935年）一书中写道：“由于日本国内并不存在多数海洛因、可卡因中毒者的事，当然会引起他人的怀疑。……同时出现异常大量的制造和消费，是否有非法的毒品输出的怀疑，依然存在。”

另外，关东州在1932—1933年每100万人的吗啡平均消费量为27—44公斤，与可卡因消费量均占世界第一位。

天津的吗啡交易

藤原报告书中指出，有关从日本走私出口的毒品，“在满洲是由大连，在中国中部是由天津，在中国南部是由上海进口”。

大连是毒品走私的一个中心地区已如前述。关于1898年以来天津日本租界的情况，藤原做了如下报告：

因为此地的取缔不像大连那样严厉，所以相信走私进口为数极大。天津居住有日本人5000人，据说其中七成与吗啡和其他违禁品交易有关联。药店自不必说，凡属料理屋、日用杂品商店不从事违禁品交易者极少，所说均为吗啡现货大宗交易，零售者甚少。

这样，不能不说租界地的日本人的繁荣全得自吗啡交易。吗啡和鸦片同样有巨额利润，周围已全是与此有关之人。故天津总领事称，欲在此地捞一笔的人，均立即计划私售吗啡等毒品。

有艺妓 158 人堂堂一流的料理屋。为何竟无人谈及日本人之富有?!(原文如此——原引者注)而此富有竟全为吗啡之结晶。岂非可惊之事实!

警察之取缔亦不如大连之严厉,领事馆之方针,仅逮捕极为猖狂者。故仅对被中国海关发现者或因牵涉其他事件而被发觉者起诉,更无因罪行被揭发而进行逮捕者。如彻底取缔,则天津将无日本人。不能不说领事馆处于进退维谷之境地。

前面已经看到日本官厅在关东州的取缔是何等松懈。但由天津来看,大连的取缔(虽然年代不同)仍属“严厉”、“严峻”,所以可以说天津完全处于放任自流状态。诚如关东厅事务官员所说,“岂非可惊的事实”!确是骇人听闻,天津的日本租界是私售吗啡的天堂。

再有天津的日本租界也盛行买卖和吸食鸦片。藤原的报告书中有如下的叙述:

天津的租界中贩卖鸦片及开设的烟馆为数甚多,其中尤以日本租界和法国租界为甚。日本警察署虽对之严加取缔,但私自犯禁者仍多,大正 10 年(1921)被逮捕的鸦片犯有 76 人
.....

据报纸的报道,在日本租界当时有烟馆 70 家,其他贩卖烟土者有 100 家。法租界有烟馆 80 家。

在上海的走私

根据藤原的同一报告,上海的情况有如下述:

上海是南方输入违禁品大门,吗啡和其他毒品多聚集此地。自日本输入数量虽认为数额甚巨,但无法得到正确统计数字。

日本侨民约有 2 万人,与违禁品交易有关联者亦在多数,然不如天津之甚。社会似未对之加以过多注意。然而日本人

在上海走私输入违禁品乃属事实。大阪与神户为其策源地。

另外，长期在日本驻中国公使馆、领事馆任职的岩村成允，于1928年在《中国取缔鸦片实况》的讲演中说：

近年来吗啡日盛，其集散地仍向南方——上海，北方——大连输入，此类多为欧洲方面产品，在日本神户一带一度上岸，然后分散转运到南方的上海，北方的满洲方面则几乎大多数输入大连……

日本人多参与此项营业，诚为遗憾。如现在所述，据传运往中国的鸦片、吗啡有用日本船舶装载者。尤以船中装载毒品，并与中国方面相勾结，在船上交与中国人的犯罪行为时有所闻。或混入各种行李之中走私进口，秘密售与中国人之事颇多。

另外关于台湾专卖局制造的鸦片走私进口上海并私售的情况，在二反半著的《战争与日本鸦片史》(1977)中有所叙述。

私自制造海洛因

毒品由走私出口、私售而发展到在当地私自制造。山内三郎其人，1929年去青岛，任制造海洛因技师，1933年转赴大连，翌年设立南满洲制药株式会社，表面上生产医药用乙醚，而实际制造海洛因。在山内根据自身的经历所写的《毒品与战争——中日战争的秘密武器》中有如下叙述：

与制药会社大厂在日本国内生产鸦片，进而制造海洛因，并将产品运往中国大陆不同，到了大正末期，大阪道修町的制药业者等开始采取在中国当地制造海洛因的办法，多数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去了中国大陆。富士的售药行商参加了为推销当地制造的产品的销售网。

当地生产组主要落脚于满洲、华北，用热河产鸦片做原料，开始了海洛因制造……

海洛因生产当然不能在中国政府官府前公开进行。……但是，日本药商开始当地生产的地区是满洲、华北，这些都是在日本军驻屯地区之中，不仅靠日本军队掩护，而且得到充分保护，简直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在当地生产海洛因对制造者的有利条件之一，是用简单的生产用具即可对付生产。

不需要大型工厂等，只要能充分准备好鸦片及无水醋酸、乙醚等原副料，在洗澡间之类的小作坊内，一无即能生产五公斤或十公斤海洛因。

技术上的问题也只是在刚一开始确实需要专门的化学技术人员认真指导制造技术，在这期间即使是纯粹的外行，只要学习四五次制造工艺，便立即可以成为制造海洛因的能手。

这里所提的日本军，系指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中国驻屯军是根据 1900 年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后所获取的驻兵权驻扎在中国的部队，配置于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处，因司令部设于天津，所以也称天津军。引发 1937 年芦沟桥事变的即是此中国驻屯军。关东军是配置于关东州及满铁沿线的部队，是任人皆知的 1931 年以柳条湖事件为发端的“九·一八”事变的主角。

根据 1933 年 5 月的塘沽协定，在河北省东部设立非武装地区，在中国驻屯军、关东军所推进的华北分离工作之下，在满洲及华北的海洛因的私造和私售，逐步正规化。

2.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鸦片、毒品

满洲中的鸦片政策

1931 年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 年在中国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吸食鸦片在东北早已广泛蔓延，尤其是与东三省毗连的热河省是中国有数的种植罂粟地区，省财政收入的一半依赖于鸦片收入。

日本在满洲国对吸食鸦片也是采取渐禁政策和鸦片专卖制度，1932年11月公布鸦片法，1933年1月实行。鸦片法的第2条规定：

鸦片不得吸食。但对非未成年的鸦片瘾者在救治医疗上必要时不在此限。（据日文转译——译者）

罂粟的种植，鸦片的制造、销售、持有、接受，烟具的制造、销售、持有、接受均置于政府统制之下。对违犯者处以徒刑、罚款。

专卖机构系在中央（新京（即长春——译者））设专卖公署，地方设专卖署、分署，受理鸦片生产，烟膏、医药用鸦片（麻醉剂）的制造及官方出售事宜；指定批发商、零售商；开设吸烟所，供领取吸烟许可证吸食鸦片。

但实际上则与“渐禁”相去十万八千里，是公开许可和扩大吸食鸦片和使用毒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检察方面提出的书面证据——美国财政部报告（1935年），指出了辽宁省安东的情况如下：

安东的大烟馆数量于“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市街，秘密大烟馆超过20家，但在日本租界则有500家以上进行营业。……中国市街登记的大烟馆……数量逐渐增加，1933年春达到145家。然在同一时期，日本租界内的烟馆增至684家。……

九·一八事变前，鸦片毒害的范围尚属小规模，仅危及安东。当在日本租界内秘密出售之际，中国当局为抵制这一毒害逐步蔓延，实行了坚决镇压举措，当时极为收效，取得了成功，但在日本并吞满洲、朝鲜后，形势为之一变。

这是指日本人和朝鲜人中的流氓恶棍利用其本身的政治势力，从位于鸭绿江东岸新义州的制药工厂，公开向当地输入鸦片及其他毒品，并在七道沟设点制造、推销。日本人和朝鲜人开设的妓院是他们的销售代理店，当铺也被用于同一目的。

可悲的是，耽溺于毒品的瘾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渴望，竟以自己的衣服和其他所有之物去典当，用以购买毒品。

此外，美国驻上海的另一财务官员的报告中，对哈尔滨和其他地方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日本军占领哈尔滨以来，在中国街和大正街一带开设了500家以上的烟馆，超出其他街区烟馆家数的总和。以前鸦片均由松花江及绥芬河下游地区走私，迨自日本军占领以来，则必须从长春购进。

为了防止被盗、丢失，通常由日军士兵担任护送。……

吉林市有900家，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有500家以上，安东及营口各有400乃至500家烟馆。这些烟馆全在满洲国专卖局登记。

营业许可的手续费每家500日元，不论鸦片营业额多寡，均需以0.60日元一两购买鸦片专卖局（的鸦片）。

烟馆里的招待，全由妓女摇身一变而成。

实行这一制度的结果，20岁至30岁间的青年们就成了常客。

鸦片专卖的利润1936年度为1331万日元，占全年岁收的5.0%。1939年度为3393万日元，达全年岁收的5.6%。

毒品蔓延

满洲国的鸦片渐禁政策的专卖制，事实上形成公开承认无限制地扩大吸食鸦片，这不外是为获取巨额的专卖利润。在日本占领下毒品中毒者也急剧增加。

前面已经介绍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时提出的美国财政部的报告，其中指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从朝鲜向安东周边带进毒品的情况。该报告更继续指出：

本地区（安东）的海洛因情况是比较新的问题。在九一八事变前，

尚是不公开的而且少量使用,其范围仅限于铁路沿线的城市及村庄,但到事变之后,这一毒害的影响已波及农村,并且使用海洛因的恶习已漫延到满洲国的士兵中间,因而随着中日纠纷和军事行动扩大的结果,便是海洛因需要的必然增加。因此当地居民受其影响,开始用海洛因代替鸦片。

同一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提出的 1937 年 5—6 月国际联盟鸦片谘询委员会第 22 次的会议的会议记录中,就哈尔滨的情况有如下的记载:

哈尔滨市的今天,事实上不将构成哈尔滨市的一部分的傅家甸市的烟馆计算在内,即有 3000 家以上的海洛因魔窟。在这些魔窟中,每天有约 5 万人的中国人、俄国人及日本人的鸦片瘾者出入其间。

在这些海洛因魔窟之外,在哈尔滨和傅家甸,有公开批准的贩卖海洛因的鸦片烟馆 102 家。……

在酷寒的哈尔滨冬季,多数的瘾者冻死街头,死后的尸体谁也不屑收拾,多日暴露街头,甚至连狗也不吃。

毒品不在哈尔滨市内制造,全部来自奉天(沈阳)的日本人居住地区及大连。

中日战争时的满洲国的鸦片、毒品情况后文再加叙述。

内蒙工作与鸦片

热河省当初原在满洲国领域之外,1933 年 3 月日本宣告退出国际联盟前后,关东军推行热河作战,从热河省进攻河北省,中国屈服于日本,5 月 31 日签订《塘沽协定》,在河北省东部设非武装地带。结果中国不得插手含热河省在内的满洲国事务。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由此获得了华北分离工作以及内蒙工作——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各省的第二满洲国化——的立足点。

热河作战之际,原属东北军的蒙古族之李守信叛降于日本。关

东军支给李守信军武器、军费，以之作为谋略部队，侵攻察哈尔省，在多伦设立察东特别自治区，以李为行政长官。

正当此际，内蒙古（察哈尔、绥远省）正由蒙古王公等推进内蒙古自治运动，与国民政府间产生对立。关东军计划利用这一内蒙古自治运动推进内蒙工作。

1935年6月，关东军乘与宋哲元军发生微小纠纷之机，签订了秦（德纯）土（肥原）协定（秦德纯为察哈尔省代主席，上肥原贤二为奉天特务机关长）。根据这一协定，宋哲元军自察哈尔省东部与热河省毗连地区被排除，代之以日本的政治、军事统治。

关东军使李守信与内蒙古自治运动的领导人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于1935年12月侵攻察哈尔省万里长城一线北侧的口北六县，掌握了六县行政权（察东事件）。

口北六县在日本方面领导下，鼓励种植罂粟，根据种植面积对种植者予以免除地租、免除兵役等补偿。到了1936年时，由属日本国籍的人开设的毒品销售店已达55家。

满铁出身的阪田诚盛组织阪田组，经营热河省承德与北平（北京）间的汽车运输，与冀东政权的殷汝耕（详见后）合作，向天津走私热河产鸦片。察东事件后，又在张家口开设阪田组分支机构，有职工170人，开始制造海洛因。

如此，日本的内蒙工作是和鸦片、毒品的生产与鼓励密切结合的。关东军唆使德王、李守信于1936年11月在关东军的指导和支持下由蒙古军进攻绥远（绥远抗战——收复百灵庙、大庙）。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控制绥远省的鸦片收入。但是蒙古军在傅作义所率领的中国军队面前惨败，日本的内蒙工作受挫。

冀东政权下之情况

与关东军所推行的内蒙工作并行，中国驻屯军同时推进华北分离工作，于1935年6月签订了《何应钦—梅津协定》（何为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梅津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根据这一协定，国民党势力自河北省被排除，11月份，以塘沽协定停战协定所制订的非武装地带为区域，建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自治政府，行政长官殷汝耕）。

这一冀东政权成为日本方面私制和走私毒品的绝好舞台。我们再一次让山内三郎出场，他称：

正是这个冀东地区，开始出现了成为自满洲、关东州等地运进海洛因等的走私基地的景象。

自治政府所在地为通县，甚至在其郊外，就在日本军特务机关的默许之下公开制造毒品。

以海洛因为主的种种毒品，从冀东地区象奔流一般流向华北五省。冀东的景气使整个满洲、关东州如火如荼。日本青少年在征兵检查前，无论稍稍染指于海洛因制造或是贩卖的哪一个方面，都可以取得与其身份不相称的收入，天津的妓院街夜夜见到他们冶游的身影。一晚挥霍当时的钱数百日元的青年们，充斥大连的烟花柳巷及舞厅等处。

海洛因的私制、私售是在日本军保护下进行的。请看山内所述：

对日本的制造、销售海洛因的人们来说，日本军，尤其是宪兵所交付他们的“安导券”，是千金不易之宝，如果没有其保护，中国、满洲的官府纵使如何软弱，也无法如此安全地经营买卖。

他们考虑如何用某种形式将经营海洛因的利润补还给日本军，于是盛行捐献飞机，用以代替直接捐献现金。……

军人之中的老奸巨猾之徒，以慰劳部队官兵为名，直接来到海洛因店铺命令捐献。如此狼狈为奸，将魔手伸向中国大陆。

根据山内所述，从海洛因的制造到批发、转发，全由日本人把

持，开辟小型批发到私贩者的销路是朝鲜人的事。

世界海洛因中心地天津

中国作家林语堂的 *Moment in Peking* (1939,《京华烟云》) 为山内三郎所述的正确性提供了证明。这一长篇小说的第三卷《秋之歌》的主题即是描写日本走私、私售鸦片的实际，揭发了日本的侵略。

在冀东政权下，日本人强行推销含有海洛因的“多福”牌香烟，甚至在天津日本租界的中国学校旁贩卖掺有麻醉剂毒品的糖果；以“军用品”或是“交日本军司令部”的名义发出的货物往往是吗啡或海洛因。林语堂在书中对此作了形象逼真的描写：

伪冀东政府是日本和韩国走私的、贩卖毒品的和日本浪人的人间天堂。滔天的洪水已然突破了万里长堤，毒品和走私货品的细流已然泛滥到北平，南到山东，西到山西东南，日本人所说的“亚洲新秩序”已经呼之欲出了。^①

这一时期天津的景况，从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提出的，1937 年的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第 22 次会议的会议记录中也可看到。现在把埃及代表拉塞尔·帕沙的叙述做一介绍。

天津的日本租界现在以世界制造海洛因及吸食鸦片的神经中枢而闻名。洋行以及用外国商会名义经营的鸦片和海洛因魔窟足足超过了千家以上。不仅如此，在旅馆及其他建筑物中，公开销售白色毒品的也有数百处。

200 家以上的海洛因工场分布在面积不足四平方英里的日本租界之中，超过 1500 人的日本技师和 1 万人以上的中国工人从事制造海洛因。此项事业利润极大，原料供应也属丰

^① 此段引文系据《京华烟云》下卷《秋之歌》译文。林语堂著，张振玉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 年出版，第 754 页。——译注

富，所以新工场每日开设。这些工场完全公开经营。……

在任何一个店铺里，均可自由地买到海洛因。海洛因质量上等，无粗劣产品，价格低廉，零售价格1克中国钱币1元，批发价格1公斤800元。

世界的非法白色毒品的九成是日本制造。天津的日本租界、天津周边、大连市内及其周边。以及满洲、热河和中国其他城市，一定有日本人或是在日本人监理下制造的白色毒品，这样说决不夸张过分。

如果真对日本人租界的魔窟令人作呕的可怕情况给以叙述的话，简直是无法形容。

……在魔窟附近的卖淫处所，少女为了能够注射一支海洛因，就会当场给你做出下流表演。中国人、俄国人以及外国人躺在肮脏的木板上，甚至连两三岁的孩子也同样白痴般的变成鸦片中毒患者，脑袋浮肿，身体瘦得透明。

魔窟的第一室，朝鲜女人（她们自身决不是常吸鸦片者）忙于在海洛因中掺入不纯物质。小的一份价格10美分，上等的一份或是注射一针吗啡价格50美分。

注射器污秽不堪，有时还用自制的。注射针头决不清洗、消毒、更换。以针头为媒介，梅毒自由地从一个瘾者身上蔓延到另一个瘾者身上，我曾见到好几个胸前生着坏疽样的肉块，可以插入整个拳头的大窟窿的瘾者。麻醉剂注射器在不断糜烂勉强维持生命的濒死的身体上，轮番注射下去。

的确是令人作呕的景象。日本人已在“九·一八”事变时，以满洲国与华北为主要舞台，利用鸦片、毒品大规模地污染了中国。不仅是中国，前述的国际联盟会议记录中还有：

紧接着在著名的满洲及热河的魔窟和工场后面的是，天津日本租界成为中国本部（中国中央部）及世界的海洛因中心地。从这里开始，使包括中国民族在内的全世界其他各国人民

身体销蚀和堕落。

日本成为全世界攻击之的

然而满洲国的专卖制等另当别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的私制、走私、私售鸦片、毒品虽然均有当地日本军的参与和保护，然从整体来看，仍属于一种不道德企业和行为败坏的日本人私人恶行和犯罪行为。而日本在中日战争时，把这种恶行、罪行公然做为国策推行。

日本内地的罂粟种植

最后就日本内地的罂粟种植、鸦片生产做一简单叙述。日本虽然在台湾施行鸦片渐禁政策和专卖制，但原料均以从印度、伊朗、土耳其、中国等处输入的鸦片充当。台湾总督府筹划鸦片的国产化，在取得内务省的同意后，于1905年开始在大阪府三岛郡试种。然而由于伊朗鸦片价格低廉，1907年停止试种。

之后由于鸦片价格不断上涨，1913年以后又在大阪府丰能郡、三岛郡、河内郡等处种植罂粟，面积逐年扩大。尤以三岛郡福井村（现茨木市）的二反长音藏得到后藤新平的支持，大力种植罂粟，被称为“鸦片王”。

罂粟种植与鸦片生产置于内务省管辖之下，鸦片统由政府收购。1930年代时，以和歌山县和大阪府为中心，种植面积为800—1000公顷，鸦片生产量达1万公斤以上。

中日战争时，医疗用原料鸦片虽然需要增加，但因与罂粟相当的作物价格上涨，赔偿费（政府收购价款）率低下，劳动力、肥料不足等原因，种植面积减少，生产量下降。因此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曾强制摊派和歌山县种植罂粟。

二、蒙疆、华北占领地区的鸦片政策

1937—1939 年

1、察哈尔作战与蒙疆政权的建立

推行察哈尔作战

1937 年 7 月 7 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扩大为全面战争。

关东军前一年末绥远事件受挫，现在抓住了一举实现征服内蒙古计划的好机会。出乎常例，编成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为首的察哈尔派遣兵团，关东军 8 月以后进攻察哈尔省内，8 月 27 日占领张家口后，9 月 4 日建立了中日全面战争下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察南自治政府。

军部虽有意抑制关东军的行动，但关东军对此置之不理，攻入山西省内，9 月 13 日侵占大同，进一步侵犯绥远省，10 月 14 日侵占绥远，17 日侵占包头，察哈尔作战逐步结束。

蒙疆政权的成立

关东军 10 月 15 日在大同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0 月 28 日在厚和豪将[特]（厚和后改称绥远——即现在的呼和浩特）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将之与察南自治政府合并，并在占领地区成立了三个傀儡政权。虽然任命中国人或蒙古人为三个政权的最高委员或主席，但实权最大的最高顾问由日本人担任。

11 月 22 日召集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政权代表齐集张家口，作为三个政权的统辖机关，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金井章次任代行总务委员长、最高顾问，村谷彦次郎任参议。

同一天，蒙疆联合委员会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要求关东军司令官“对有关内部的指导予以深切地关注”，对最高顾问、参议、顾问以及委员会主要人员，请关东军司令官“推荐日满两

国人员充当”，并“希望当前由贵帝国军驻军”等内容。25日植田军司令官回答：“愿在对我方可能之情况下予以协力。”以此作为双方间之秘密换文。并分别任命了张家口特务机关长及大同、绥远(厚和)的各特务机关长。

如此，关东军司令官通过特务机关长形成对蒙疆联合委员会和三个自治政府“内部指导”的控制体系，实现了由关东军统治蒙疆的“第二满洲国”化。

此外，所谓“蒙疆”一语，因张作霖曾在1921年任“蒙疆经略使”后才公开使用。其“疆”的意义并不明确。有的说是指万里长城内外长城线的中间地带，或说是漫指边疆之意，也有的指为新疆省之疆。

驻蒙军、兴亚院、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37年末，新设了中央直辖驻蒙兵团，兵团司令部的主要成员大部分是从关东军调任。驻蒙兵团是忠实行关东军意旨的继承人，1938年7月改为驻蒙军。

1938年12月16日，作为对中国的中央机构设置了兴亚院。兴亚院以首相为总裁，外、藏、陆、海相为副总裁，在总务长官之下设政务部、经济部、文化部、技术部，并于1939年3月10日设置华北、蒙疆、华中、厦门4个联络部和青岛办事处，作为当地机构。

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以张家口为驻地，酒井隆中将任长官。3月11日，驻蒙军与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及其它机关交换备忘录，确认了军的指挥权和“各机关经常以军为中心一致配合”。

其后，在驻蒙军主导之下，筹画成立统一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政权的单一政治体制。9月1日于张家口成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主席为德王，副主席为于品卿、夏恭，蒙古军总司令为李守信，金井章次为最高顾问。不过置于驻蒙军强力支配下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正意味着完成了蒙疆的“第二满洲国”化。在蒙疆成

立的日本傀儡政权，通称“蒙疆政权”。

1940年3月30日，于南京成立了汪兆铭的中华民国政府，即所谓汪政权，是日本在中国占领地区的傀儡政权。11月30日签订日华基本条约，^①在其秘密换文中确认：

蒙疆基于前记条约规定，鉴于在国防上、经济上、中日两国持有强度结合地带的特殊性，根据现状承认（蒙疆）是具有广泛自治权的高度防共自治区域。

这样，就确定了这个“高度防共自治区域”的蒙疆的地位，所谓“自治”当然完全不是意味着蒙疆地区中的蒙古人或中国人的自治，而是在“自治”名义之下，甚至排除汪政权的干预，将蒙疆完全置于日本的武力支配之下。

在此期间，日本军将广及华北、华中、华南的中国的广大地区置于占领之下，其中作为鸦片产地，广为人知的仅有蒙疆政权领域，特别是绥远省，因此蒙疆政权处于日本鸦片政策的中枢地位。

2、继承旧制

察南的鸦片税

定为蒙疆政权领域的绥远省，是中国屈指可数的鸦片产地，也是除当地产鸦片之外，甘肃、宁夏等西北产鸦片（西口货）通向平津方面的中转地。这种鸦片生产与运出运进及在当地的消费，都成为各地政权课税的对象，是重要财源。以下按察南、晋北、绥远的顺序看一看他们的情况。

察南基本不生产鸦片，但从绥远、宁夏、甘肃流入的鸦片一年间有500万—600万两（1两=36克）上下的交易，其中大约100万两左右在当地消费。充当鸦片买卖经纪人的烟土商和零售的烟膏商加在一起是58家。

^① 全称为：《日本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译注

察哈尔省根据禁烟法设置了清查处(管理鸦片机关);实际上除禁止鸦片走私、私售外,还在每两鸦片上贴附印花作为税收。又对烟土商、烟膏商课以营业税、鸦片税。如表 1

表 1、察哈省之鸦片税

税种	征收对象	税额
印花税	管内销售之鸦片	1 两 0.15 元
入境税	管内销售之鸦片由陆路运进内管内之鸦片,铁路免税	1 两 0.02 元
出境税	自管内运往平津地区之鸦片	1 两 0.02 元
过境税	通过管内运向平津地区之鸦片	1 两 0.08 元
土照税	烟土商营业税,分三等	1 月 40—80 元
膏照税	烟膏商营业税,分四等	1 月 60—120 元

察哈省中的相当于察南自治政府区域,1936 年度税收约 617 万元,其中约 80 万元,即 13% 来自鸦片税收。整个察哈尔省的鸦片税收额为 110 万余元。

察南自治政府 1937 年及 1938 年,原样继承了这一察哈尔省的鸦片税制,到 1938 年 9 月末共征收了 116 万余元。

晋北的状况

在晋北,绥远以西的鸦片通过大同运往张家口、平津,在大同的鸦片过境税收入,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聚宝盆。阎锡山采取以鸦片收益充当财源的积极政策,其结果,山西省烟毒蔓延,据说瘾者比率之高在中国罕见。阎锡山更从 1936 年 9 月实施鸦片专卖制度,以求确保财政收入。

晋北自治政府成立之时,有关旧省政府的财政资料全部湮灭,完全没有能作参考的资料,主要官员也全部逃走,于是晋北自治政府要求满洲国官吏前来支援,研讨和重新制订税制,认为鸦片专卖制不适合现状,而决定采用察南、蒙古联盟两自治政府同样的鸦片

税制。其税种和税额基本与察南自治政府相同。

晋北自治政府 1938 年度的当初预算均为 78 万日元，其中鸦片税收预计 10.2 万日元占 13.1%。其后虽然编制了大幅度追加预算，由于鸦片税的征收额因资料不完全不得而知。货币单位 1 元 = 1 日元。

绥远的鸦片税

1918 年绥远都统蔡成勋出于筹措军费的需要，开始解除种植罂粟禁令，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控制绥远省的山西军阀的鼓励，因此产量与年俱增，成为仅次于四川、云南、甘肃的中国屈指可数的鸦片产地。

山西军阀直辖的禁烟稽查处收缴的鸦片税的正税收归属山西军阀，其附加税和省政府直属的税收机关禁烟办事处收缴的鸦片税归绥远省。1936 年前后的鸦片税收入为 370 万元，其中 270 万元归禁烟稽查处，100 万元归禁烟办事处。

到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原样继承了绥远省的鸦片税制。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1938 年度预算总额为 930 万日元，其中鸦片税收入为 256 万日元，预计为税收的 27.5%。

鸦片输出盛极一时

蒙疆联合委员会于 1937 年末公布“鸦片业务指导要领”，命各自治政府组织鸦片收买、销售机关：鸦片公会。除公会会员以外不许买卖、输出入鸦片；严厉取缔毒品、鸦片的私自买卖；罂粟的种植仅限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区域内等。其后于 1938 年 8 月，蒙疆各政府指定鸦片商人，规定只限于发给身份证明书的指定商人及有收购认可证、收购许可证的商人，方可进行鸦片交易。

另外，三个政权根据蒙疆联合会委员会的“指导要领”，分别对鸦片生产、交易、吸食等实行申报制及许可制。但这些并非以限制

鸦片为目的,而是为了确保鸦片税收的措施。

此外,对鸦片买卖价格完全没有统一控制。张家口的鸦片行情,1937年每两为2.20日元—2.30日元,到了1938年,由于歉收及西口货的来源中断等原因,价格暴涨,10月已经超过6日元一两。再加上京津地区没有例年由上海方面来的外国鸦片上市,因而极度缺货,北京(1937年10月改称北平)^① 行情突破7日元,呈现30年来未有的高价。

因此蒙疆的鸦片输出呈现空前繁荣。1938年蒙疆的鸦片输出量为9854779两,计43821175日元。平均每两4.45日元,鸦片占输出总额的41%。输往地点为输向京津的8908040两,输向满洲国的946793两。中日战争前,蒙疆运向平津的鸦片约为700万两,现在超出了这一输出量。

根据另外资料,三个政权向京津的运出量与上述贸易统计有20余万两的差异。详细内容如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管内560万两,晋北自治政府管内60万两,察南自治政府管内250万两,合计870万两。

3、建立清查制

向新政策的转变

于1937年9月—10月间成立的蒙疆三政权,从1938年继承了原有的鸦片税制,1939年的鸦片政策最初也仍以确保鸦片税收为目的,和前一年相同。

但到1939年6月,蒙疆联合委员会对鸦片政策做了大的变动。6月9日蒙疆联合委员会发表了如下的当局谈话:

蒙疆地区的鸦片政策,由于鸦片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及本地区是鸦片产地这一情况,对内对外有极为纷繁复杂的关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28年6月。

系，施行原来一贯的政策，虽属必要，但以事变后匆忙之间，三自治政府各自沿袭旧有的方针政策，从而产生诸多弊害，给民众生活上不断带来种种巨大不便。有鉴于此，为了欲对中国新政权及满洲国的鸦片政策适应配合，同时纠正各项弊端，乃援用民国 22 年(1933)禁烟法，现决定断然实行全面的管理统制。作为实施该政策的总机构，决定于张家口设置清查总署，作为其下属的执行机构，于张家口、大同及厚和(绥远)设置清查署。

通过实施本政策，国民生活必得到净化，农民种植者将免受鸦片市价的急剧波动带来的经营不稳定，与中间商人的非法盘剥，历来经营鸦片的烟土商及烟膏商，分别为根据新制度成立的收购土药公司及配给机构的公会所吸收，由此凡从事种植及交易者均可保证以前的营业及利益，且能匡正以往的积弊。从一切方面考察，无疑系有助于建设明朗跃进之蒙疆的政策，因而希官民一体对此一致配合。

这一当局谈话援用国民政府的禁烟法，颇为奇怪。第一，蒙疆联合委员会在其成立当时的声明中，骂国民政府为“暴虐的南京政府”，力求本身存在的理由在于否认国民政府的统治。而这个蒙疆政权在鸦片政策方面反而“援用”国民政府的法律。

第二、国民政府的禁烟法，如前面所看到的那样，原本是为了禁绝鸦片而制定的。但是蒙疆政权关于禁绝鸦片的毒害问题一语未曾触及，仅是为了生产者和从业者的利益而“援用”禁烟法的。

这种奇怪现象可暂置一边，如根据这一当局谈话，对生产者、从业者可以就是再好没有的事情了。但是新政策的意图与发表的谈话是两回事。

新政策的意图

蒙疆政权内部文件中有“最近蒙疆经济特殊事情最高顾问上

京原稿”(1942年3月),此项文件回顾采用新政策的情况,作了以下的说明:

(蒙疆政权之)健全发展,在于首先确立财政经济,因此首先必须全力以赴对作为确保财源一项政策的鸦片行政应根据:

(一) 鸦片在财政经济上的重要性;

(二) 伴随中日事变所占领地区内的鸦片缺乏;

(三) 必须防止由于进口外国鸦片而致日元经济圈的资金外流等之立场……撤销从来纷杂的鸦片制度,使之一元化,采取准鸦片专卖制度的形式,应遵循对内采取渐减禁绝政策,对外计划增产的宗旨进行,于成纪(成吉思汗纪元)734(1939)年开始建立清查制度。

另外,在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经济部烟政盐务科所编制的“蒙疆鸦片情况概说”(1941年9月)中说明:“以确立流通于蒙疆、华北、华中、华南范围的鸦片自给政策为根本方针,建立增产计划”而建立了新制度。

除了满洲国的热河地区外,蒙疆是日本军占领的中国地区的唯一鸦片产地。因此,通过在蒙疆增产鸦片,以实现整个占领地区的鸦片自给,用以确保傀儡政权的财源。同时防止日元经济圈的结汇资金流出日元圈。这是新政策的意图。为了实现这一意图,才“援用禁烟法,坚决实行全面的管理统制”。

关于能够说明这项新政策究是何处制定的资料,到现在还无法确切证明。然而很难想象,从“防止由于进口外国鸦片而致日元经济圈的资金外流”或“确立流通于蒙疆、华北、华中、华南范围的鸦片自给政策”这些观点来看,是根据蒙疆政权的判断而提出的。

正如在前面所看到的,1938年末设置了兴亚院,1939年3月成立兴亚院蒙疆联络部。而兴亚院掌管在中国占领地区的鸦片供求事项,在蒙疆联络部的文件中可以看到:“昭和十四年(1939年)

以后,每年于本院召开的中国鸦片供需会议决定的计划事项”的文字。由此看来,可以认为新政策确实是由兴亚院制定和准备的。直接参与新政策准备工作的是满洲国专卖局职员,1939年5月中旬,他们大约有30人调任到张家口。

接着在6月20日任仙台税务监督局关税部长的一个大藏优秀官僚,调任兴亚院蒙疆联络部经济课主任抵达张家口。他就是在1930年6月大选最高潮中,身为现任首相而突然去世的大平正芳。大平到任虽在新政策发表之后,然而就其职务而言,对鸦片政策的实施具有密切的关系是无可置疑的。大平于1940年10月调任兴亚院经济部第二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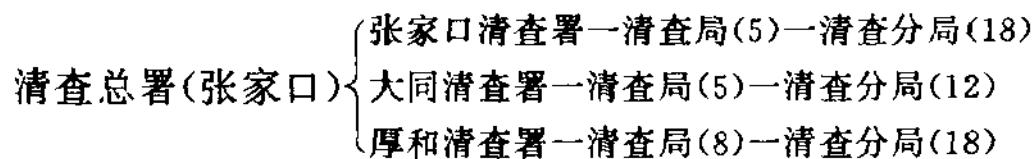
清查制度的开始执行

蒙疆联合委员会于1939年6月6日公布暂行鸦片管理令等一系列有关法规,7月1日开始执行清查制度。所谓“清查”就是毫不遗漏地彻底调查的意思。

暂行鸦片管理令在第一条规定:“有关鸦片事项,除准据禁法外皆依据本令”之外,还规定了鸦片的配给统制、鸦片的输出入、运输许可制、罂粟种植许可制、通过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清查署对鸦片的收购、交纳、取缔和罚则等。

清查机关是掌握有关鸦片罂粟种籽、毒品事项的机关,其配置如图7。

图7. 清查机关的配置



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6月26日,“土药”代表鸦片。资本为150万日元,206名土商缴纳了金额。董事长为贺东温,总

公司设于张家口、大同、厚和等 11 处设立分公司。6月 30 日于张家口召开成立大会，据《蒙疆新闻》报道，金井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作了训示：“以前的土商 206 名作为新股东，誓以感激的心情献身完成事业”。

如此，建立了由罂粟种植者→土药公司→清查署→鸦片配给人→瘾者这一近于专卖制的清查制度。此外，如表 2 所示，指定罂粟种植区域，预计约生产有 20000 万两，其中约可收缴 760 万两。见表 2。

罂粟种植指定区域与生产收纳预计量

(1939 年度)

	计指定面积(亩)	预计生产量(两)	预计收缴量(两)
张家口署	10000	200000	75000
大同署	155000	3100000	1163000
厚和署	846000	16920000	6345000
计	1011000	20220000	756300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从以前就是罂粟种植地区的旧绥远省(厚和署管内)，连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没有种植过罂粟的晋北(大同署管内)以及察南(张家口署管内)也都指定种植罂粟。

清查榷运特别会计

随着清查制度的建立，设立了以清查——鸦片专卖与榷运——盐税为对象的清查榷运特别会计。采自盐湖和盐土的蒙盐是蒙古高原地带的特产。蒙疆政权在施行清查制度的同时，对蒙盐的制造、销售、输出入等均欲加以统制，因而设立了盐法、蒙疆盐业组合、榷运署等。然而占盐税收入的清查榷运特别会计的比例各年度都达不到 4%，96% 以上都是清查收入，因此，希望对以下记

述中的数字上可不予以重视。

1939 年度清查榷运特别会计预算概要如下：

岁收	2529 万余日元
岁出	2217 万余日元
其中拨入一般会计	300 万日元
岁收超过	312 万余日元

即从一开始就预计有 312 万余日元的岁收超过，再加上因为岁出中向一般会计拨入所列入 300 万日元的转帐，实质上等于预定有 612 万余日元的岁收超过。

此外，因为一般会计总预算岁收为 2528 万余日元，清查收入具有与一般会计同样的规模，来自清查榷运特别会计的转帐部分等于只占一般会计岁入的大约 12% 的比重。因为原本 1939 年当初三政权的鸦片税收入为 1043 万余日元，列入为岁收的 36%，与此相比，清查收入预算可以说是留有余地的。

惨重的失败

清查制度从 7 月 1 日开始执行，首先急于开设清查署和整备土药公司，着手收购鸦片。收购时全凭人的器官机能鉴定，用眼看、鼻闻，鉴定鸦片的色、香、质的方法决定鸦片的等级，由公司支付给种植者以补偿费（官定收购价款）。每一两的补偿价格一等品为 3.50 日元，二等品为 3.35 日元，三等品为 3.20 日元，等外品为 2.80 日元以下。

公司收购的鸦片全部由清查署收缴，政府对公司作为手续费，付给 9% 的收购补偿价格。

但是开始收购之后，各地上市均极不景气，蒙疆政权的官方文件记述其状况称：“在强制实施贡献性的缴土工作的同时，启发指导土药公司，上市务期万全，但毫无成果可言。”所谓缴土工作指的

是“督促鸦片上市工作”，因为是“强制实施”“贡献性的”缴土工作，所以可能采取了相当严酷的手段。尽管如此，然全无成果。

原因之一是“未曾有过的天灾”。首先是罂粟生长期的 5 月到 6 月，蒙疆地区连续干旱，鸦片以及其他农作物受到严重打击。察南自治政府最高委员于品卿与最高顾问竹内元平，因此于 6 月 17 日及 19 日两次举行了求雨祈祷。

可是，一进入 7 月，天气一变，变成了连日暴雨。张家口上一年的总降雨量为 555 毫米，而本年 7 月一个月的降雨量竟达 269 毫米。大同上一年的总雨量为 478 毫米，而仅是本年 7 月就降雨 332 毫米。7 月 15 日晋北的浑源县乾河泛滥，死伤者多达约 400 人。7 月 25 日京包线（北京—包头）的青龙桥东站更被山崩埋没，25 天不通车。在鸦片采摘期间，遇到 20 年来从未有过的暴雨，生产锐减。

鸦片的歉收当然影响其价格。张家口、大同的鸦片行情 5—7 月间与上一年同期相比，约高出五成，每两为 7.20—7.50 元，京津市价从 1938 年底的一两 7 元，涨到 1939 年后期的 15—16 元，到了 1940 年又暴涨到 22—23 元。

然而如前所述，蒙疆政权对土药公司系以 2.80—3.50 日元的价格收购。正如在蒙疆政权官方文件中不得不承认的，“官定收购价格与京津行情产生巨差的事态”，因而土药公司的收购工作无由成功。

如此，1939 年度的鸦片收缴情况如表 3 所示，与蒙疆政权的积极收购态度相距甚远，与当初预计收缴 760 万两相比，张家口署管内虽超过预计量，然而特别是本应名列第一位的厚和署管内竟造成“悲惨的结果”。总共仅收缴了 887000 两，只占预计的 11.7%。收缴总金额为 331 万余日元，平均单价每两 3.74 日元。

表 3、1939 年度鸦片收缴的预计与实绩

	预计收缴量(两)	实际收缴量(两)	与预计量的比例%
张家口	75000	265280.5	353.7
大同署	1163000	170432.0	14.7
厚和署	6345000	451306.1	7.1
计	7583000	887018.6	11.7

未被收缴的鸦片走私到其他地区。特别是山西省，据省当局说：“从蒙古政府地区越过国境走私的鸦片如潮水般涌入。”加强走私鸦片收购网管理的结果：“旺盛时期……只在一个稽征所(走私品征税机关)就有一个月 6 万元以上的鸦片税收。”

鸦片的配给

蒙疆政权将收缴的鸦片中的 727000 两以每两 9.55 日元—10.55 日元，平均 9.91 日元，(如图 1 所示)向中国各地“配给”，亦即销售，获得 720 万余日元的收入。对蒙疆政权管内“配给”了 14 万余两，价格为：一等每两 6 日元，二等 5.50 日元，三等 5 日元。共收入约 78 万余日元。收入共计 798 万余日元。

图 1、1939 年度鸦片配给状况

管内	141429 两	16.3%
北京	300000 两	34.6%
天津	100000 两	11.5%
唐山	100000 两	11.5%
济南	100000 两	11.5%
上海	100000 两	11.5%
其他	27000 两	3.1%

(上表原文为图，为排印方便改为表。—编者注)

结果,蒙疆政权命土药公司以每两 2.80—3.50 日元收购,付给该公司 9% 的手续费,将以平均每两 3.74 日元,用 331 万余日元收购的鸦片,在管内、管外平均以 9.20 日元销售,共获 798 万余日元的收入,是差额收益 476 万日元的暴利。在前述的蒙疆政权当局谈话中称:“可免受中间商人的非法盘剥”云云,实际上蒙疆政权本身正是最恶劣的剥削者。

清查榷运特别会计的决算如下:

岁收	829 万日元余
岁出	829 万日元余
其中拨入一般会计	270 万日元余
过剩额(储备品价格)	41 万日元余

清查收入只占预算的 1/3,关于拨入一般会计 300 万日元的预算,实现了 270 万日元,作为结转下一年度的储备品价格计为 41 万余日元的过剩额。

另外,在贸易统计中,鸦片的输出是 3575000 两,26866000 日元,占输出总数的 28% 弱。和前一年的数字(见《鸦片输出的盛极一时》一节)相比,减少 628 万两(63%)、16955000 日元(39%)。

4、华北占领地区情况

中日战争的发展

与察哈尔作战平行,日本军在华北及华中进攻中国。华北方面军进攻河北、山西、山东三省,到 1937 年末占领了三省的主要城市和铁路。作为华北占领地区的傀儡政权,12 月 14 日在北京成立了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长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在华中面对中国军的强烈抵抗,日本军被牢牢胶着于上海,进入 11 月方始击破中国的防线。华中方面军派上海派遣军和第 10 军分两路攻到首都南京,12 月 13 日占领南京。从其进攻路上开始,到占领时的 1938 年年初期间,对败兵、降兵、俘虏以及一般居

民展开了大屠杀，掠夺、强奸等残暴行为，遭到国际上的谴责。1938年1月16日近卫内阁发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于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了华中占领地区傀儡政权，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日本军继蒙疆政权后又在占领地区成立了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做出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的姿态。对此，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17日决定将首都迁至重庆，以武汉作为事实上的首都，坚持抗战到底。

日本军于1938年4—5月进行徐州作战（即台儿庄会战），为连接华北、华中占领地区，更于8月发动武汉作战，10月27日占领武汉。又于10月21日占领华南要冲广州。

如此，日本军基本将所有中国的重要城市置于占领之下，但日本军事动员力量已达极限，中日战争转为持久战。近卫内阁又在11月3日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希图通过汪兆铭工作瓦解国民政府，但只达到使汪叛逃。日本在军事方面、政治方面都失去了收拾中日战争的前景。

1938年的鸦片政策

中日战争前的华北鸦片一年间的消费量为：北平1150万两，天津650万两，大部分为西口货（宁夏、甘肃、绥远产），一部分是北口货（热河产）。中日战争一开始，西口货停止运进，鸦片价格在1937年4—8月时原本每两2.90元的货，到1938年超过4元，9月以后暴涨到7元以上。

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清查科1938年征收的鸦片印花税（过境税），每月达20万元以上。为了进一步增收，2月，临时政府委员长王克敏对日方表明：“如历来南京政府采取之表面禁止，实质专卖的作法毫无意义，此际计划实行鸦片专卖制度，实行明朗之政治。”然而日本大使馆方面恐招致“国际国内的误解”，对专卖制采

取消极态度。

其后，临时政府自 6 月 1 日起试验性地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市内设烟馆 140—150 处，旅馆、妓院等作为营业，许可吸食鸦片。

(二)对申请者收登记费。

(三)对违反者课以登记费之 2—10 倍的罚款。

(四)未经批准而供人吸食鸦片者，课以 30—150 元之罚款。

(五)每户烟馆一个月收 10 元灯捐(营业税)。

(六)对吸食鸦片发给“限期戒烟执照”，征收手续费 1 元。

日本大使馆 1938 年 10 月对“华北的鸦片、麻醉剂对策指导根本方针”及其他提出讨论，其内容如下：

关于华北鸦片对策问题，鉴于过去此项交易、吸食之实际情况，以及现在该地区之其他各种情况，对此不仅不可能强行禁止且不适宜。如今亦非以骤然禁止为宗旨施行专卖制时期。因此，当前以严格取缔为前提，日本方面应进行适合实际情况之指导。

此外，基于上述方针指导之结果，应有助于财政收入。

关于麻醉剂问题应坚持禁止主义。

具体办法是设置作为鸦片取缔机关的戒烟局，为收购、批发鸦片，设立由以华北为地盘的有力商人组成特许专卖公司或组合，并指定零售商。罂粟的种植，烟膏的制造实行政府许可制。吸食鸦片者必须向戒烟局登记，特许专卖公司(或组合)向政府上缴戒烟税，零售商向政府上缴特许费。又把“随同本制度之施行所得的政府收入，作为特别科目，以其收入充当戒烟取缔经费，戒烟设施及其他一般社会设施费”。

鸦片取缔在“严格实施之前提”下，事实上是官准鸦片的交易、吸食。使之有助于“财政上的收入”则是日本方面的方针。而此项

方针未及具体实行，1938年即行过去。

此外，同年北京市鸦片运入量为1088万两，运出量411万两，消费量473万两，结存量204万两。天津市运入量252万两，运出量3万两消费量249万两，无结存。

公开的鸦片交易与吸食鸦片

1939年3月10日，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成立，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中将就任部长。4月28日举行兴亚院与临时政府之间有关鸦片、毒品问题的会谈。席间，王克敏等临时政府方面虽对日本方面的戒烟局、特许专卖公司提案表示同意，但汪时 财政部总长就戒烟特别科目提出质问。对此，爱知揆一书记官（后任佐藤荣作内阁外相、田中角荣内阁藏相）作了如下说明，表明了真实意图。

（本案）宗旨系以鸦片收入充当戒烟费及社会设施为前提，此外，如鸦片收入在预算及决算上对外部明显，在第三国关系上多有不便，因此有必要设法向外部表示在戒烟费及社会设施的名义下进行收费，且就超出以上收入，财政部内部应作出严格明确的收支安排，对此宗旨作了说明。之后，全体认为具有道理并且我等表示同样意见。

设立戒烟特别科目，只不过是欺骗第三国的一种“办法”而已。

然而，1939年5月由中国方面提出的禁烟法草案，在第三条中规定：“鸦片及专供吸食鸦片的器具禁烟公署专卖之”，意在实施鸦片专卖制，而与日方的专卖公司方案的方针龃龉。为此，日本方面华北联络部，大使馆进行协议，决定将修正案递交临时政府，新制度未能顺利实施。

在新制度未实施情况下，鸦片的交易和吸食已经公开。1939年7月当时，在北京已有烟土店（批发商）107家、烟膏店（零售商、吸烟馆）231家，计338家。此外罂粟的种植也大量发展，1939年临

时政府管内的鸦片生产预估量：河北省为 562000 两，山东省为 2719600 两，山西省为 1411200 两，河南省为 10 万两，共计 4792800 两。

临时政府于 1939 年 7 月 22 日，制定该年度鸦片生产暂定处理纲要，决定将临时政府管内生产的鸦片卖给特许收买人，未经特许收买鸦片者及向特许收买人以外出售鸦片者，均课以罚款。

管内产鸦片运进北京者仅 68925 两。1939 年运往北京鸦片的产地，分别为厚和 552 万两，张家口 153 万两，武威 162 万两，张掖 69 万两，热河 144 万两，加上管内产为 1088 万两。此项数字因资料的来源不同，与图 1 的数字相差很大。

“自由而合法的吸食鸦片”

山东省的济南、青岛也公开进行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济南统税局虽于 1938 年 6 月制定了管理禁烟清查暂行简章，但济南总领事有野学向外务省的报告中提及此项简章时称：“商人或旅馆、饮食业者向统税局登记之后，领到执照即可轻而易举地进行销售、贩运，使之成为便于顾客吸食鸦片的体制。与以往比较有方针一变之感。”

其后，7 月出于对国际关系的考虑，临时政府指令禁止在烟馆、旅馆、饮食店等处吸食鸦片，改为只限持有省所发给执照（每月 0.5 日元）者准许在自宅吸烟。但是在 8 月成立的山东省禁烟委员会，设立名为禁烟设施，实为烟馆的戒烟社，除重要街道或学校、官署附近外，公开允许吸食鸦片。营业登记费定为，每一烟灯每月征收 3 元。有野学总领事对其情况报告如下：

不仅任何人都可自由合法地吸食鸦片，一方面烟馆（戒烟社）之开业许可亦逐渐倾向于收入本位主义，另外有关鸦片之运输、销售……除从业者可随心所欲地进行营业外，私自营业者亦处于可以轻易交易之状态，整个各种规定基本完全没有

“完全禁烟”之精神。照此现状，结果有临时政府以及为地方政府利用扩大新财源之最佳手段之感。当地现行有关鸦片税捐，包括国税、地方税已有 9 种之多，其税收已达相当数额，有随治安恢复而渐增之势。

1939 年 1 月，公布济南市土药业同业公会暂行章程，同业公会成立。另外，同年 11 月制定的济南统税局的统税公署禁烟清查暂行条例规定：

第三条 吸食鸦片者需要之土膏，由各统税局于所辖地区设置适当土店及膏店，对之供应。

第八条 凡已贴付销烟证（印花）之烟土于各统税局分局所辖地区内，许可民众自由吸食或销售。

完成纳税后，鸦片交易及吸食完全自由化。

青岛的鸦片。

1938 年 11 月青岛日本总领事馆与陆海军方面协议之后，作为试行方案，在“虽以逐渐减少吸食鸦片者为目的，但不立即强制禁烟，在市监督统制之下努力逐渐去除其吸食鸦片之恶习”的方针下，由治安维持会（市公署）购进鸦片交给指定鸦片商人。另外批准以 20 处为限的烟馆进行营业，每处可设置烟灯 50 个。原则上禁止在烟馆以外吸食鸦片。但在家庭吸食者，许可向市登记纳税，预计一年间约收入 150 万日元鸦片税，把它从国税中分出，充作市府财源。

其后，于 1939 年 7 月设立禁烟清查委员会，8 月实施禁烟清查暂行条例。其内容虽未经查实，但可能与济南无大差别。

山东省内的罂粟种植横行无忌。有关 1939 年的情况，济南统税局报告称：

山东省公署因在播种之前并未特别采取禁止政策，及地方治安尚未完全恢复，因之官府注意不及，省内到处可见种植

罂粟。省府当局不得已设立取缔鸦片机关山东省查禁烟苗临时稽查处,每亩仅征收 8 元罚款,与其说是取缔,莫如说是考虑农耕者的生活,结果有如给农民一种许可公开种植的印象……私自种植的面积为 6500 余亩……据云可获收 39 万余两。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数字,说是种植面积为 4400 亩,收获 26 万 2000 两。

青岛统税局也曾制定生产烟土处理暂行办法进行取缔,但毫无实效。1939 年的耕种面积定为 4960 亩。收获量估计为 246 万两或 573 万两,到 1940 年 4 月为止在统税分局的管理下所能收到的仅只 3322 两。

翁文灏纪事诗选

杨永庆 整理

编者按: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号憲士,浙江鄞县人。清末秀才,曾留学比利时学习地质,获博士学位。民国初年回国后,先从事地质学教学与研究工作,颇多建树,为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者之一,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代理校长。1935年后,因忧心国难,受蒋介石延揽,入南京政府,任行政院秘书长。抗战时期任重庆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长、战时生产局局长等职,主持大后方经济生产建设。抗战胜利后,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后赴法国暂居。1951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克服艰险,回归祖国。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翁文灏先生虽“不自期为诗人”,但“兴之所至,偶有吟咏”,竟也蔚为可观。先生自编有《蕉园诗稿》,为“从政之时,以迄还都之日”所作,并未公诸世人。今选录部分发表,多为纪实叙事之作,希冀于近代史研究有补于万一。

追念丁在君^①

1936年1月

踪迹追随廿载前，一朝分袂最凄然。鸡鸣共涉浑河渡，余曾随丁君共研宣化鸡鸣驿区域地质，浑水洪流，蹇裳共渡。鹞势同翻云水边。同游房山水云洞，内有鹞子翻身。创造艰难犹昨日，殷勤讨论忆当年。为师为友终生约，未老何图去竟先。

携斧曾经汗漫游，西南山谷最清幽。碧鸡金马云南路，在君，国人中最先勘研滇省地质矿产。漓水藤滩黔外州。对广西、贵州地质亦研究特详。霞客遗踪追绝域，君深佩徐霞客，著有霞客年谱附地图粤湾车路达江流。君以为渝钦铁路不如改道至广州湾，亲勘路线。搜罗多少详图籍，申报馆六十年纪念，地图由君主持编绘整理端须仔细求。

一代英才一世师，典型留与后人知。出山洁似在山日，君著《麻姑桥晚眺》有句：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论学诚如论政时。君善论著，在《努力》周刊中，与张君劢论战，力崇科学而不信玄学。自日本侵攻东北，君在《独立评论》详研日政，力崇国权，并刊漫游散记。理独求真存直道，章演存挽词：能让难，能争更可佩。人无馀憾读遗辞。赤心热力终身事，君故后，上海西报社论称为爱国人。此态于今谁得之。

古道巍存直到今，艰危此日已非轻。救时大计行难得，欺世空言愤不平。君历游美欧、考察苏联，深感吾国须从实际，彻底革新。国士无双君已往，知心有几我何生。临终话别衡山侧，君在衡阳因煤气中毒，余曾飞往省视。若谷虚怀语足惊。

① 丁文江，字在君。

长沙丁在君葬事

1936年5月

涕下怆然一梦中，更兼苦雨又凄风。江城远映长天外，朝露堪怜大数终。我友已亡心太苦，君才未尽记难工。潇湘西侧螺丝眼，白石红泥埋此躬。

绥远战争

1937年1月

英雄最佩傅将军^①，守土捍边力不群。惠政及民留德泽，忠心护国建殊勋。阴山北出声威远，大庙东收讨伐勤。战士允应如此辈，□枪共起收燕云。

题涿州战纪

1937年1月

孤军坚守一危城，壮士雄风博大名。革命尽能如此辈，神州何患不升平。

伦敦地质学会

1937年5月

真理研求二百年，殷勤讲学世称先。此会成立特早，已逾两世纪。猿人发现传西士，余往会，适有意国学者讲第四纪初史，言及裴文中发现之北京猿人地质相逢见美贤。余又遇曾来中国之美地质家勃拉克威尔特讨论从容神不敝，友情洋溢志逾坚。参加远客心欣慰，史绩探寻共著鞭。

^① 傅作义

巴黎博览会(外一首)

1937年6月

奇珍搜寻显琳琅，各国分呈物产光。欢迓嘉宾泯虞號，翩然莅止却非常。德国武力怒张，法国颇感恐惧。德馆落成，德经济部长沙赫德飞往巴黎致词，法国人心颇为引慰。

国际地质学会议^①

1937年7月

万邦共赴气堂皇，国际宏开会议场。政见竟教停德意，德意两皆因政治关系完全缺席。嫌猜更复避扶桑。日本正式邀请下次往东训京开会，亦因政见不同，全体辞却。原应学术穷研切，偏恃疆畿嫉忌强。太息仓皇多世变，弦歌声里寓兵芒。

华北战起

1937年7月

战事凭空起卢沟，侵陵步步见深谋。鲸吞已去金瓯地，民国二十一年日占东北蚕食未忌黄炎胃。自前清侵占台湾以来，日本略吾国坚进不已。坐视冀幽归左衽，凭准砥柱挽中流。河山半壁终难恃，奋起抗争誓不休。

国联空语尚和平，仗义徒劳口舌争。须识皮难从虎得，可怜草竟随风倾。横行可畏邻谋远，决战非关国策轻。拼以牺牲维国脉，冲冠怒发愤难平。

① 翁文灏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地质学会议，并被选为大会副主席。

苏联建设决心

1937年8月

重工业以国宗邦，建设宏流似怒江。节食缩衣为国事，人亿兆力无双。苏联建设重在加强国家实力，而不务提高人民生活。

乌克兰邦

1937年8月

成绩著称乌克兰，苏联初期重大工业集中乌克兰。游观到此最徘徊。铝钢百炼工夫远，水电五年利益开。指聂朴治水力电厂。灌水种田欣稻食，造林养木满山岩。漫言气象干旱地，郁郁葱葱一望间。

勉心翰学空军^①

1937年10月

飘然一叶入云霄，壮志英风侪辈超。报国心忠追往哲，献身志切在今朝。千寻奋击空中斗，百世长垂勋绩昭。淬历琢磨凭此日，前程发展正迢迢。

全国统一抗战

1937年10月

日人料我棼，种种促裂分。东北别新旧，各方挑拨勤。彼想大战启，各省独立闻。不费区区力，华夏便悉焚。不知我民族，已具识见遥。国家有观念，忠诚意志昭。频年受欺迫，更领压与挑。虽在负贩者，愤火亦中烧。武士如张宋，张自忠、宋哲元。战伐不辞劳。桂帅如李白，李宗仁与白崇禧。亟起披征衿袍。退职如伯南，指陈济棠捐款奖英豪。远如川与滇，遣军志气高。即在各异党，亦不徒徘徊。兄

^① 心翰，翁文灏次子，1944年9月在对日空战中牺牲于广西。

弟互携手，箕豆不相摧。集合维国命，联结成堡垒。日人料我穷，物力素不丰，一朝遭大战，枯竭国运终。不知我国策，早已备兵戎，内退保心腹，建置尽精忠。厂矿次第设，生产见宏兴。航空与公路，运输亦相应。更定长久战，不避艰苦承。惟仗我坚毅，庶遏彼侵陵。勾践兴弱国，怒蛙争良谋。卧薪与尝胆，卒能沼强吴。光武兴汉室，河内供粮输。寇恂精筹策，终见复皇图。内守以外攻，兴复定嘉谋。河山暂受侮，终克得还收。坚守与久抗，实最称勋猷。决以全民力，唤醒世悠悠。

胡适之电劝汪精卫切勿半途言和

1938年11月

空言切莫误和平，为国今须用甲兵。美法英苏方共议，东西中外尽同情。艰苦终能臻胜利，迟疑势必害苍生。劝君一著休迷失，大局全盘需战征。时余持电面言，汪答词支吾。

五十自述

1939年9月

行年倏已五十寿，去日已过来日久。今朝瞻思未来时，过去光阴应回首。鄞城西侧石塘村，枕山居临余祖名所居曰枕山碶桥右。夏月诞生己丑年，教养劬劳赖慈母。岂敢自恃得天独厚，培植仍靠人力厚。初因家教尽殷勤，继得琢磨自师友。辗转避乱入江城，天峰寺前读书声。论文策义随时变，史鉴检讨复品评。时科举改用策论。年华十四举童子，光绪壬寅余成秀才。雀顶蓝衫传盛名。为因国事需改革，青年求学沪上行。光绪丙午余入震旦。徐汇学术导西土，震旦遂以学府鸣。二载辛勤探科学，负笈更复向滄瀛。余于戊申乘船赴欧。舍作人传名早，罗文学籍相探讨。翘然胜选称三文，时胡文耀、孙文耀同在罗文，考较冠首。华裔才情藉以昭。精研地质入专门，更以余闲探大道。郅治应有至理存，盛世端赖人工造。假期更作法英游。风土人

情观览饱。革命大声振远东。辛亥民军革命。睡狮骤醒天将晓。民初返棹抵国门，决计终身学理尊。谢绝私交厚薪给，愿为地学启朝暾。吴兴泰兴具同志，吴兴章演存，泰兴丁在君同治地质。荜路蓝缕何足论。及今回想当时事，困境全凭决意温。数年勤治专精业，后起群宗学术魂。更以实地广探察，施用锥指与斧痕。高峰曾登泰岳顶，边塞复越阴山岭。更忆白山黑水间，三十诞辰度此境。民国庚申余年三十遂驻吉林之双河镇。万山深入窥地利，四出远游驰车轮。禹域绘成物产图，劳生给养惟麦饼。史迁登涉识见多，霞客遨游文字炳。最赖勘查实察，得窥真相良足幸。默念富庶称中华，人工惰废不堪夸。饱见遍地资源在，更悲频年困苦加。尤惧邻国侵陵入，愈赖宗邦建设嘉。自度学术新颖理，光明灿烂如晴霞。切磋美欧前进例，应竭驽骀报国家。会逢白日青天帜，提倡三民主义花。首都肇建钟山麓，南渡磋商定工作。四十生辰在鼓楼，民国戊辰余年四十，时寓南京鼓楼。穷愁焦虑复躑躅。人生际遇本难常，壮士不为艰困服。同人相勉竭辛勤。世风不愿相角逐。燕京旧址足留恋，社会同情憎蔬藐。其时地质调查工作多赖捐款维助。秦岭横越入川滇，桂岩北上经黔蜀。远探边塞至甘青，更察康藏越阪陉。车路远规模联渝粤，矿物宝藏发奇珍。一时成绩超往昔，直前奋发绝埃尘。各言馈赠纷纷至，藉建新址大江滨。时余创建首都地质所址。水晶台畔起崇厦，邃古动植共列陈。燃料研究设专室，石油制炼导其津。中国正殷奠新宇，东洋忽然动鼙鼓。辽东袭击被兵戈，辛未九月日袭沈阳。国难挽回赖政府。大将忠诚秉均衡，遗才搜访求裨补。相邀远道面磋商，牯岭交谈挥松麈。蒋公专使邀余至牯岭，相谈累日。为救宗国千秋劫，须将全民真力努。停止同提萁豆争，发挥精神亲爱煦。更以经济固国防，建置工矿图富强。内守腹地为根本，外结美欧扬光芒。誓尽艰贞扶民族，激起忠爱归中央。团结朝野贤能士，筹划旋回战守方。内阁组成树新政，所延官长多贤良。乙亥冬蒋为院长，余入院治事。对日婉转缓战祸，不分南北保全疆。为使邦交更加处，专使驰赴欧西地丁丑余奉使

历访英法德苏各国。极权猛地见精神，稳健和平是民治。和会愿开求太平，兵争思避免纵恣。念我中华物力盈，人口众多复才智，应在全
球成大邦，岂如郑宋供播弃。见彼勇往进步多，更洒家乡贫弱泪。无
何炮火起卢沟，忍耐至最后关头。丁丑七月抗战军起。危时受命兴生
产，余时奉命任经济责。誓竭智虑挽骅骝。会值五旬大衍日，正在播迁
武汉秋。戊寅八月余年五十，政府方迁武汉。津浦敌兵方肆虐，豫襄亦正
被戈矛。鞠躬尽瘁救国命，岂有馀时为己谋。综余寿日类如此，颠沛流漓与烦忧。二十方在留学途，三十松花江畔趋，四十鼎革方草创，五十极荡居中枢。半生既已忽忽去，来日能成绩效无？不怨自
身辛劳甚，惟愿邦家大难苏。不求自身享安乐，惟祝同胞能快愉。大
江东去滔滔水，激发前程胜故吾。

綦江看水工

1940年1月

一载经营绩效明，綦江蒲水庆平城，峡因坠石生峒险，川得奇
工许楫行。忽湍崩碎垂壘坝，闸河齐整仿岩城。愿看煤铁源源运，
此项工程特为大渡口钢铁工厂便利运输。造福邦家利万氓。

甘肃油矿

1941年2月

天助宗邦地出油，祁连山麓石脂优。背斜形势规称善，开架探
寻愿得酬。甘肃油矿地质民国十年由谢家荣初察，二十三年以后孙健初迭
次测勘。二十八年起由资源委员会凿井试探，得油颇富。源出玉门边塞外，
富看甘肃远关头。

甘肃油矿同人

1941年9月

矿源启发赖人工，大地蕴藏富且丰。邦国盛衰凭物力，忠诚贡

献见勋功。油泉滚滚新生气，壮志堂堂众士风。共望西垂宏建设，流传惠泽利无穷。

国事须凭动力旋，环封阻遏竟徒然。日敌封锁吾国，阻遏油运。燃油已得矿中利，建屋先须立柱坚。把握良机共奋进，联翩勇往莫迁延。宁看发展垂长久，最赖辛勤创造年。

玉门油田

1942年5月

走廊要点出油泉，天赋资源非偶然。嘉峪关崇华夏险，玉门路扼远陲坚。战期开发辛勤起，卫国经营计划全。此责于今应重视，更须勇进莫迟延。

咸阳新工业区

1942年5月

汉唐都邑在咸阳，此日乃由制造长。棉织机杼供被服，麦粉磨作奋军粮。凿渠既助农田利，设厂更教产物良。但愿程功能继美，兴工利器远传扬。

宝鸡新工业区

1942年5月

秦岭之南渭水边，欣看陇海铁轨全。陈仓古道从来著，工业新基于此奠。黄土岸岩开洞窟，新申纺织厂为防空计全设于洞中。食衣制作避峰烟。自今生产源源起，继长增高千百年。

与苏联专家谈建设

1942年7月

堂堂大族气豪雄，建设真因革命崇。苏联革命成后专重建设。鼓励人心同猛进，以教育宣传使全国人心一致，同趋建设。宏扬国力达丰

隆。建设目的在大量提高国家实力。重工业盛经营志，天产物呈启发功。如此邻邦应借镜，前规具在足堪从。

祁零煤矿

1942年11月

桂湘铁路速通行，燃料祁零开矿坑。冷水滩边新建设，黎家坪畔善经营。驰车大半佳煤贡，运物西南便利宏。即此可观争抗力，短时期内立工程。

杨秀清给林凤祥等一篇诰谕抄件正误

祁 龙 威

《剿平粤匪方略》录咸丰三年五月初七日军机大臣传给河南巡抚陆应谷的上谕：“前据向荣奏，查获金陵城中贼首寄江北伪谕有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贼目姓名，察其语意，是贼匪后路无援，专以裹胁为事……^①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节引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向荣遗著《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抄本，为《方略》作了注释：“按所谓向荣奏系指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一疏，中有云：‘彭福兴……系江宁人，被贼裹胁……不甘从贼，乘间奔赴上游战船中投首，并据呈出贼目伪谕……系伪东王杨秀清等寄给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光（元）三人伪谕’。”郭氏未言这诰谕的内容。其后，向达等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公布了《向荣奏稿》，读者始知郭氏所节引的，乃是向荣于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所发奏折的附片。其略云：“再，臣等近所获奸细，均讯系乘间溷往东坝一路，业经正法。其北窜滁州之贼，除误入六合县一股，已被该县督率民勇焚歼殆尽外，所有窜往滁州、凤阳一带贼情虚实，尚未得知。正在设不法查探间，据杨焕章由兔儿矶水次军营禀解自行投道[首]之彭福兴一名前来。讯系江宁县人，被贼裹胁，遣令扮作乞丐，由临淮进江宁城中送信。渠因有老母、妻子现被拘管。思欲藉此入城探闻[问]，遂携带贼信投递。又乘间回家看视，

^① 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三十七。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用时，弄错了这上谕颁发的日期。郭氏误作咸丰三年五月初六日，应是初七日。

领取伪东王等回文，仍装扮乞丐出城。……伊不甘从贼，乘间奔赴上游战船中投首。并据呈出贼目伪谕一函，外用黄绫装封，上写‘奉地官副丞相令众兄弟不得阻拦’字样。中装白绫二块，俱有绳〔蝇〕头细字，臣等绎其语气，系伪东王杨秀清寄给伪丞相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光〔元〕三人伪谕。其中所云：‘左二军及各军错路兵士十一日俱各回朝’二语，系指误入六合被歼余匪逃回报信者而言，却将焚杀殆尽一层讳匿不肯提及。又云：‘现令铺排镇守天京不必县望’等语，系指逃回余匪留在金陵拒守，不能再添贼兵往援，嘱勿等候之意。又云：‘尔等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所具各禀，至今未曾接到’，系因沿途盘诘严密，贼匪信多失落之故。以此观之，滁州、凤阳一带贼匪，并不为多，且无真正老贼在内……良不足怪〔畏〕……谨将贼前所寄信函，照其逆式缮录，恭呈御览。现仍分饬各路文武遇有渡江奸细，随时严密搜察，毋许乘隙窜逸外，所有查探贼情缘由，理合附片具奏。”^①《向荣奏稿》未抄存这两篇杨秀清给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的诰谕。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据向荣所引“左二军及各军错路兵士十一日俱各回朝”之语，考明由朱锡琨、黄益芸率领的一路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六合被火攻挫折回京的经过，并引陈作霖《可园备忘录》为佐证：“（咸丰三年）四月十三日，见贼多带伤入城者，盖自六合败归，相传为神火所焚也。”^②咸丰三年四月十三

① 见向达等编《太平天国》第七册，135—136页。向荣原奏无题目，《太平天国》编者为取名《请搜察渡江奸细片》，与内容不合。笔者在摘引此处时，校正了一些错字，皆用〔 〕表明。

② 见简又文《太平天国史》上册，570—571页。简氏据周长森《六合纪事》叙咸丰年四月初八、初九两日六合之战后，自注：“据《向荣奏稿》，有彭福兴赴清营自首，呈出东王致李、林、吉谕，有‘左二军及各军错路兵士，十一日俱各回朝’语，即指此事。十一日即六合大败之次日也。”其实天历的癸好三年四月十一日，已是农历咸丰三年的四月十三日，不是太平军六合战败后之又次日。简氏疏于考辨天历与农历之差，应予补正。

日，正是天历癸好三年四月十一日，与诰谕是吻合的。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据故宫博物院所藏两篇东西王联衔诰谕的抄件排印，于是全文始公布于世。兹节录如下：

(一)

“兹于四月二十三日午刻，接阅来稟，称说到处诛妖情形，既经洞悉。此虽天父天兄权能与我主天王鸿福，亦是尔等居官颇有胆略，能至此也。至于尔等前在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所具各稟，至今未曾接到。本军师为此特行诰谕，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其左军及右军错路兵士，于初十日起行，至十一日俱各回朝，现今铺排镇守天京。前时既行诰谕示知，未识收到否？谕到之日，尔等急速统兵起行，不必县望。勉之慎之，切切遵谕。”

(二)

“兹于四月二十三日，尔等差来递文之人彭福兴、张大里等，果是真心。本军师接闻阅尔稟后，即酌议奏旨，蒙恩批准，封他为监军之职，以奖其忠。自今以后，尔等凡要行稟，即交他递送。至到北京之日，即与监军袍帽，光宠其身。各宜凛遵，毋违诰谕。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诰谕。”

但是，《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未交代这两件诰谕抄本是向荣奏报“贼情”的附件。到了最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六册，始据故宫军机处录副，将向荣奏片及以上两件太平天国文书一起发表。其中所录《向荣等奏报被胁民人彭福兴携带杨秀清信函自行投首片》，与上录《向荣奏稿》除个别文字差异外，其他相同。附《杨秀清致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诰谕》二件与《太平天国文书汇编》所录者全同。在附件后，向荣说明：“以上贼书二件，系用白绫书写，长六寸，宽二寸，用朱点句标曰：‘奉地官副丞相令众兄弟不得阻挡。’以上十四字书于黄绢之上，绢宽长皆六寸，上盖用朱印，印长五寸五分，宽三寸，印文模糊，

难以辨识。伪信二件，即包于黄绢内。”可见，这是由地官副丞相陈容所颁发的。西王萧朝贵已阵亡，但仍由东、西王联衔发令，其实出自东王一人。

对杨秀清给北伐三将的这两件诰谕，向荣奏片的引文与抄件是不一致的。从六合退回天京的部队，引文作“左二军及各军兵士”；抄件作“左军及右军兵士”，向荣引文是对的诰谕抄件是错的。按太平天国设前后左右中军主将，其下各军以数字编次，金田起义后，设置中一、中二，前一、前二，后一、后二，右一、右一，左一、左二，共十军，见《天命诏旨书》。随着部队的发展，编次的数字陆续增加。如左十四军、后十三军、右十一军、中十五军、前十三军等，先后见之于张德坚《贼情汇纂》所摘录的太平天国文件。朱锡琨、黄益芸率六军从浦口误走六合，其中有林绍璋部前四军，全师回天京。也见于《贼情汇纂》。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考证，太平天国北伐军共九军，其中有左二军^①。由此可见，向荣所摘引的杨秀清等给北伐诸将诰谕之文“左二军及各军”一语是正确的，而故宫军机处所存诰谕抄件作“左军及右军”是错误的，应予订正。

^① 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三册，1901页。此据《张维城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评介

知 之

不论是从事文史工作的专业人员还是一般的文史爱好者,乃至海外的汉学家们都应该知道,中国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或办公室组成的史料编撰机构。数十年来,他们编印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书刊,而且大多是据中国近现代历史风云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自撰或口述整理。这些文稿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记录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情况,大到中央政府政治、军事、外交决策内幕,权力斗争中的尔虞我诈;小到地方掌故轶事、婚丧嫁娶,三教九流。各种各样的事件,形形色色的人物,翔实生动,构成一幅中国百余年历史的立体画卷。许多文史工作者、爱好者,均从中获益非浅,视为自己研究、创作的资料素材宝库。同时,它也是我们了解国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编撰地方史志、专业史志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然而,据初步统计,自各级政协开始文史资料编撰工作以来的三十余年间,全国编印的文史资料已达 2300 多种,约 13000 多辑(期),收文共 30 余万篇,总字数已近 2 亿,真可谓汗牛充栋。如何在这瀚如烟海的书刊中,迅速寻找到自己所需的资料呢?以前,也曾有一些科研机关、高等院校编录过有关篇目索引,但因年代已久,且收录有限,均已不敷今日使用。笔者最近见到由李永璞教授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篇目索引(1960--1990)》一书,它可以说是目前有关政协文史资料收录最全、分类恰当、检索方便的唯一工具书,因此特向读者介绍推荐,以期与大家共享这一新的成果。综览全书,其特色有三:

1、内容宏富,收录齐全。为了达到收录齐全这一预定目标,编撰者烟台师范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所,不仅自己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全国县以上各级政协文史资料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并且得到各原书刊编印单位的大力支持,因而才有了这2300余种,13000多辑(期),30余万篇的资料。据悉,该研究所已成为目前全国收集政协文史资料最多的机构,甚至超过了国家图书馆。在此坚实的基础上编撰的《篇目索引》,自然能够使编者如愿以偿达到预定目标。

2、分类编目,准确恰当。该书以主题分类编目,在5巨册、1500万字的书中,按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社会,地理,人物分为七大类,大类之下又分六级子类。全书共约4000个类目,同一类目之下,则以时序、地序排列,具体精细。如在“社会”大类下,有社会综述、群体与组织、阶级与阶层、风俗与习惯、公害与禁治、动乱与治安、灾害与救济、宗教、民族、港澳台华侨与华裔等10个子类。子类之下又分子类,如“风俗习惯”类下又分为:地方概况、岁时节日、庙会期会,生丧嫁娶、衣食住用、习俗种种、新风新习等等。据了解,为使每篇资料归类准确恰当,读者查找方便,编撰者不仅参阅原文标题,更细心研读原文,力求做到使分类最大限度地揭示该篇内容。在“工具书”满天飞,粗制滥造屡见不鲜的今天,该书编者的科学态度和敬业精神,相信读者会在使用中得到要身的体会。

3、可靠实用,检索方便。在科学准确分类的基础上,该书收录的每一篇目之后,均有详尽清晰的著录。其著录事项包括篇名,作者,发表原文的原书刊名、辑(期)号、出版日期。例如:“《民初国会生活散记》 韩玉辰 《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53辑(1964年)。”为读者查找原文提供了可靠准确、方便的依据。书后又附有按笔画排列的全书篇目索引,使知篇目而不晓分类的读者也可迅速找到自己所需。毫无疑问,这是一本真正为读者提高工作效率,给使用者带来方便的工具书。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ZILIAO

总 8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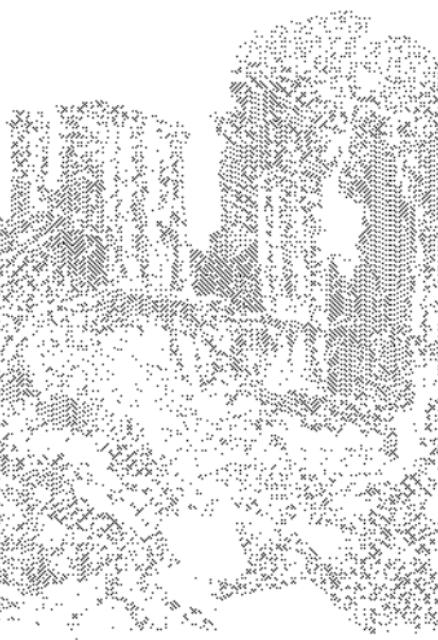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道
武
史
城
林

中國書畫研究會
民族時代
藝術文獻編輯委員會



(京)新登字第 030 号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李学通

封面设计:一 泓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 代 史 资 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86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国家建材局情报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23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ISBN 7-5004-1486-2/K·226 定价:8.50 元